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　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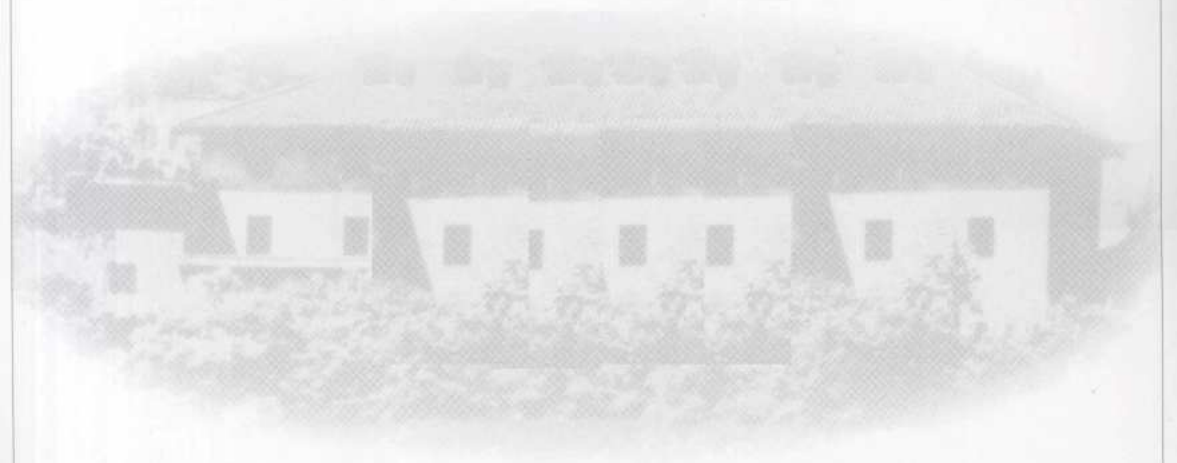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王福琨　邓群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　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王福琨　邓群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王福琨，邓群主编；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98-0264-9

Ⅰ.中… Ⅱ.①王… ②邓… ③中… Ⅲ.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史料—重庆市—1937—1945
Ⅳ.D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734 号

书　名：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

主　　编：王福琨　邓　群
编　　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潘　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62mm×230mm　1/16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27.5
版　　次：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264-9
定　　价：53.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总 序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党组织的工作。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于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基础上，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全面领导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38 年底，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

1939 年 1 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至 1946 年 5 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其间，南方局实际存在大约八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在这一时期内，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等）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南方局的历史，与此前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之后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以及东迁后在重庆建立的四川省委，还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关系。因此，南方局的活动，基本上

涵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历史过程，它的光辉历史和卓著功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艰难复杂的谈判和合作，与国民党内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泛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战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又配合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参与政协会议和停战整军谈判，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前景做出了不懈努力。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动与各中间党派广交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战民主，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抗战胜利后，发动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适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掀起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极大增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南方局配合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广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南路人民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开辟了敌后根据地；领导粤、滇、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等地武装斗争，使之不断发

展，壮大为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领导地方党组织深入农村开辟工作，掌握部分武装，以应对日军入侵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军事统战，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参与抗战和支持民主，进而在解放战争中举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南方局把以工、农、青、妇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通过抗日宣传、募捐献金、战地服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反汪”运动、宪政运动中动员群众；按照“三勤、三化”要求，深入群众，建立据点，积蓄力量；动员群众参与反对“一党国大”的斗争，在领导胡世合运动中迎来抗战胜利；领导一二一运动，促进政协成功，在和平民主运动高潮中推动进步群众组织的建立；在领导群众求生存、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特别是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我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党的组织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稳住了脚，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胡乔木同志曾经

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也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培育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为骨干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进行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与编研工作,并很快在史料征集方面取得成效。1985年,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有关地区党史部门共同确定,合作编纂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纳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系列,由此正式拉开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帷幕。1990年6月,在中央及相关省区(市)党委的支持下,经过南方局老同志与各省区党史部门四年有余的努力,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座谈会。此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1990年初，完成使命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宣布撤销。

2002年5月和10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南方局历史功绩，深刻阐述红岩精神，要求认真总结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同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中秘局[2002]97号），批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重庆市委等有关省区（市）党委，部署开展新一轮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的高度重视。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长沙召开协调会，就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初步意见。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京向宋平同志做了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同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在重庆联合召开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等活动。宋平同志专门发来贺信，鲁明、张颖、成元功等老同志以及相关省区党委负责人应邀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主任黄镇东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根据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正式成立了以宋平、荣高棠、童小鹏等为顾问，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有关负责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安徽、江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建立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内设的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提出了继续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协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专题类书稿编写，以及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任务，并决定首先启动丛书专题类第一期六本书稿（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的编写，以最终形成丛书“一主九专”结构的工作计划；确定了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小组会议（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以加强交流、研讨问题、检

验进度、部署任务的工作模式，并以《会议纪要》将相关任务固定下来。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南方局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出重要批示："就是要通过我们扎实有效的工作，让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自此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由李忠杰副主任负责，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力度，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和组织部署每年的工作任务；有关省区（市）党委及党史部门认真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和重庆会议确立的任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人力物力上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工作小组办公室也切实履行职责，在信息沟通、工作协调、档案查阅以及会议组织等方面提供大量服务。2005 年 11 月、2007 年 6 月和 200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相继在昆明、武汉、重庆召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李忠杰每次都亲自出席，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和《丛书》编写工作提出指导性原则，把关定向，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同时检查工作进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每次工作会议主题突出、任务明确，对涉及南方局历史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充分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共识。这些工作会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务实、认真、和谐、高效"的风格，并一直坚持至今，从而保证了以《丛书》编写为主体的南方局历史研究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正是由于坚持这样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作风，南方局的历史资料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保持着"年年有部署、年年有检查、年年有推进"的良好局面。

如何统筹规划丛书编写工作，保证丛书质量，是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一直注意的中心问题。每次工作会议，都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李忠杰副主任在 2005 年的昆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编写工作的九条意见、要求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强调体例结构要坚持"横向展开，纵横结合，脉络清楚，反映全貌"的总要求，丛书各个专题之间要坚持"大系统、多侧面；大统一，小灵活；大分工，小交叉"的分工原则。在 2007 年的武汉会议上，又根据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在 2008 年底的重庆会议上，针对审稿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九条处理意见。历次工作会议对这些原则和要求都达成了完全的共识。经过各成员单位近五年的努力，现已编写完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较好地遵循和体

现了这些原则、要求和意见，达到了“主题鲜明，观点正确；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表述准确，文字流畅”的要求。丛书集中反映了十几年来在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比较好地搭建起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现在，这套承载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多年期望，寄托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凝集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们长年心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这套丛书，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为主干，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等一期专题类六部书稿为支干，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等书，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协作开展中国共产党专史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党史工作者历史责任和攻坚克难敬业精神的凝聚。在此之后，我们还有若干专题书籍需要继续完成并出版，在成果转化上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但这一次这套《丛书》的集中出版，标志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完成了主干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

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我们全体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党所尽的历史责任，也饱含着我们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们谨以这套丛书，献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5月

前　言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南方局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高举全民抗战大旗，对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从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所负责区域的实际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和提出建议；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以中共代表团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通过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内外骨干多渠道多层次地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内主张积极抗战的力量、抗日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开明士绅、少数民族、宗教界和华侨等各个方面的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密切交往，在争取抗日民主的共同事业中，与他们建立了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民主进步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南方局的历史，是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进行的纷繁复杂斗争的历史，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始终。这段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政治财富和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和政治优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党的光辉历史和业绩密不可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力量，凝聚人心，联合各方面的积极力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②他特别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③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其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重视和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不仅与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还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甚至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抗日，因而团结了最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配合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战胜了各种困难和风险，夺取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为推动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倡导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整合社会资源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保证，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05—60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6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45 页。

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②"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③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无畏的文化自觉和革命气概担当起整合民族力量的重任,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努力寻找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文人绅士、乡党民团、黎民百姓进行互动对话的平台。使社会国家政权、地方当局、乡村社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构建强大的抵御外侮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与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政治交往则强调"不挖墙角";对民主党派,则帮助其发展,如帮助民盟建立广西支部等;对进步文化人,则从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对百姓则在根据地号召减租减息,减轻负担。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强调交往、对话和共识,致力于全民族的团结,而且也致力于构建政党的主体性,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一种民族复兴的战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得到发展,也创生了"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新的民族精神。通过对统一战线的研究,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意义,从而获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启示。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斗争艺术。抗战时期,国共的政治交往本身就是一门艺术,特别在国共的谈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当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页。

'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其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磨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①]南方局的组织系统，由于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因而带有鲜明的特色。南方局的组织建设实质上也是随着统战环境的变迁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其重大的事件以皖南事变和重庆谈判为标志，前者将国共合作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直接导致了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动，为深刻理解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要求提供了政治学的解答；后者标志着南方局统战工作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转变，为人们透视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质提供了视角，从而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斗争艺术。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展现出独特的人文魅力。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占据优势，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只有不足5万军队，偏占西北一隅。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控制着9千万人口居住的地方。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没有统战工作，中共也不可能成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并取得胜利的旗帜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成员，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继承优良传统，融汇时代精神，在统战工作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这一光荣传统。他们为宣传全民抗战的正确路线，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不懈努力。以浴火重生的文化创造激情，推动和领导了抗战文化运动，谱写了一曲曲抗战文化壮歌，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灵魂；同时他们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卖国投降主张和行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同志生活勤俭节约，工作夜以继日，与当时国民政府官员灯红酒绿、淫靡腐朽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构建了南方局独特的人文魅力，也为南方局统战工

①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作注入了精神之魅。深入研究这一工作，不仅使研究进入史料层面，而且进入文化心理层面，展现时代精神与社会的互动，加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气质的理解。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推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要中国人民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民的‘心’。前者靠刀枪炮就能办到，后者则需要‘文化’这一把软刀”①。日本不仅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经济掠夺，还对中国实施“文化战”（思想宣传战、奴化教育战、学术情报战、新闻舆论战、语言文化战、宗教文化战、文学艺术战等），推行“皇国观念”，企图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为日本开辟侵华第二战场。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昂扬民族意识，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经历了皖南事变等磨擦事件，但仍然磨而不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国也成为“亚洲大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②，它牵制和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直接援助了英国和美国在亚洲战场的军事行动。深入研究这一工作，有助于认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现实的角度看——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所体现的是一种有原则的团结与合作精神。这对建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开创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经过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一百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同样，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运用这个法宝。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还有许多利益矛盾需要协调和解决。这就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的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思想、理顺情绪

① 王向远：《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

的功能，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需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高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切实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最大限度地把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引导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上来。

本书在对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同时，着重关注几个问题：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主线问题。即由高举抗战民主的旗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既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问题，即国共关系的合作和磨擦之间的关系及性质，同时也涉及南方局与其他政治势力的政治交往与合作关系。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证明，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沟通国民党当局者、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文化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华侨等的重要作用，成为整合社会资源，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成为一种拯救民族危亡的强大力量；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空间上则是连接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人民力量的桥梁，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到了光辉的极致。正是在这种统战工作的磨砺中，诞生了红岩精神。研究南方局的主线不仅要展现历史发展脉络，而且要展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理性精神，从而立体地展示南方局所孕育的红岩精神的内核。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核心价值问题。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涉及必须处理好中共中央、南方局、地方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从组织层面研究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政策、策略、方法、动员机制以及社会影响范围程度、认可程度，进而把南方局统战工作研究纳入中共南方局与国民党当局者、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文化界、工商界、宗教界以及华侨等互动的社会学视野，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相统一，充分展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逻辑生成和历史合理性，为南方局通过统战工作掌握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作出解释。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斗争原则与艺术问题。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由于其统战对象的广泛性、复杂性等多种因素，使国共两党的阶级对抗性、自发性在民族性的框架下达到一定均衡。期间虽然发生分歧、磨擦，甚至武装冲突，但国共合作并没有中断。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南方局为代表的中共组织在与国民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策略运用于统战工作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斗争策略，展示了高度的艺术性，使统一战线经受了严峻考验而得到巩固和发展，赢得了民心，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不断丰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历史地位问题。南方局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统战政治交往实践显示出独特的历史地位。南方局极力维系国共合作抗日大局，拓宽统战工作领域，确立大统战思路，从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同时，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丰富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也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目　录

总　序

前　言

第一章　贯彻中共全民抗战路线，确立以统一战线为中心工作　1

第一节　抗战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变化　2

一、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　2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变化　4

第二节　确立以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心任务　10

一、南方局的建立　10

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心工作　18

三、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26

第二章　坚持团结、抗战、进步方针，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31

第一节　团结、抗战、进步方针的提出及在实践中的发展　31

一、方针的提出和发展　31

二、抵制国民党“溶共”计划，维护中共的独立性　36

第二节　击退反共高潮，力挽国共合作危局　40

一、配合抗日根据地斗争，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40

二、开展政治反攻，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42

三、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53

第三节　配合国共谈判，妥善处理国共关系　56

一、皖南事变前解决军事磨擦的谈判　56

二、协调和配合林彪赴重庆谈判 60
三、围绕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64

第三章 争取和团结中间党派，不断壮大统一战线 68

第一节 贯彻中共对中间势力的新政策，重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 68
一、贯彻争取团结中间势力的政策 68
二、加强与中间势力的联系 73
第二节 密切与国民党民主派的关系 75
一、加强与国民党民主派的联系 75
二、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建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83
第三节 支持中间力量建立新的政党组织 85
一、在反击反共高潮中，与中间力量密切合作 85
二、支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立 88
三、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92
四、支持九三学社的成立 99
五、支持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101
第四节 团结中间党派，共同争取政治民主 102
一、与中间党派共同推动第一次宪政运动 102
二、团结各党派，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112

第四章 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其抗战进步 118

第一节 对地方实力派的新认识和新政策 118
一、重新认识地方实力派 118
二、调整对西南实力派的统战策略 121
第二节 团结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 126
一、推动民主人士，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 126
二、促进与滇系关系的新发展 128
三、推动广西实力派实行较为开明、进步的政策 132

四、对国民党第四战区的军事统战工作 142
五、积极开展川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145
第三节 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争取民主政治，反对独裁 151
一、团结西南地方实力派，推动抗日民主 151
二、与滇系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亲密合作 154
三、运用灵活统战策略，促成与桂系合作 156
第五章 做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促进抗战文化繁荣 162
第一节 实施正确的文化政策，引领抗战文化运动 163
一、提出正确的抗战文化方针 163
二、加强领导，巩固和发展文化统一战线 170
第二节 关心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聚合进步文化力量 178
一、团结关心爱护进步文化人士 178
二、精心组织文化人士大转移 186
三、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深入开展 190
第三节 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
一、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抗战文化运动的勃兴 192
二、昆明、贵阳、成都等文化据点的形成 204
第六章 开展工商界统战工作，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209
第一节 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 209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的转变 209
二、积极开展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212
第二节 鼓励爱国工商界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214
一、激励民营企业、积极生产 214
二、引导爱国工商界以大局为重，服务战时经济 218
第三节 支持民族工商界，争取自身权益 222
一、反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222
二、推动民族工商界走向联合，开展斗争 228

第四节 团结爱国工商界，争取政治民主 233
一、引导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 233
二、引导教育民族工商界，争取政治民主 237

第七章 加强对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 244

第一节 开展对宗教界统战工作 244
一、对宗教界统战工作的提出 244
二、动员宗教界抗战 251
第二节 开展对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258
一、对少数民族面临各种矛盾的分析 258
二、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 260

第八章 加强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268

第一节 以香港为枢纽开展港澳地区统战工作 268
一、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初期的工作 268
二、全力营救香港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 278
三、抗战胜利后，港澳地区统战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281
第二节 开展侨务工作，争取爱国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 284
一、贯彻海外统战政策 284
二、做好海外侨领的工作 287
三、扩大对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 291
四、组织海外华侨回国抗日 293

第九章 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开拓外事工作新局面 301

第一节 外事工作方针的确立与贯彻 301
一、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加强对外宣传 301
二、确立外事工作方针 303
三、贯彻落实“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 305

第二节 扩大与各国使馆、国际机构的交往 312
一、承担起与国际社会接触的任务 312
二、与各国使节和国际人士广泛接触，打开外事工作局面 315
第三节 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团赴延安 320
一、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 320
二、促成美军观察组赴延安 325
第四节 实现中共外事工作新突破 330
一、促成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 330
二、董必武在美国开展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 335

第十章 发展人民民主战线，奠定中国政治格局基础 338

第一节 以重庆谈判为契机，实现统一战线任务的转变 338
一、协助毛泽东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338
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变 346
第二节 与民主党派精诚合作，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和维护政协决议 353
一、争取政协会议召开 353
二、力促政协会议成功 356
三、维护政协决议 363
第三节 争取和平民主，开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368
一、广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368
二、挫败国民党包揽“国大”阴谋 376
三、开辟第二条战线，壮大人民民主力量 381

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光辉篇章 387

第一节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确立了中共大统战格局 387
一、南方局历史使命和地位的特殊性 387
二、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提升了中共统战工作新境界 392

第二节 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宝贵经验 396
一、凝聚人心，共赴国难，是南方局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396
二、领导集体的正确抉择，是南方局统战工作能开创全新局面的重要因素 398
三、又联合又斗争，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驾驭局势发展 400
四、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战工作新局面 404
五、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实现民主政体而斗争 408
主要参考文献 410
后 记 416

第一章　贯彻中共全民抗战路线，确立以统一战线为中心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军事抗战，以及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抗战的支持，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举国上下为之振奋鼓舞。抗日战争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面对战争转向长期相持的形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调整侵华的战略和策略。在军事上，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减少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极力加紧扶持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力图分裂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诱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

与此同时，因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欧洲，英国、法国因惧怕法西斯德国的入侵，与德国签订牺牲别国利益的《慕尼黑协定》，使法西斯侵略战争在欧洲迅速蔓延。在亚洲，英国、美国也企图策划“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利益求得与日本妥协，保存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既得利益。由此，对国民政府也采取过缓靖政策。在此背景下，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 年 12 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没走投敌之路，仍在继续抗战，但抗战立场却产生了动摇，逐渐持消极妥协的态势。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将政策重点逐步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基本办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

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战争由此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把抗战新阶段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统一起来，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作为中心工作，始终执行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分裂、倒退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节　抗战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变化

一、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经过一年又四个月的中日战争，日军已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主要中心城市和周围大片富饶地区，以及铁路、水路主要交通线，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但是日本迫使中国人民屈服和中国政府投降，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却完全失败了。日军由于侵占地盘和战线的扩大，又要储备相当的力量（主要是关东军和海军）以防备苏联和在太平洋与美国、英国争夺，因而它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日益困难，已没有力量在中国大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中国方面，经过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损伤惨重；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力的敌后根据地虽然有很大发展，但远远不足以发动全面反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的新阶段。这是抗日战争中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引起敌、我、友各方面情况和方针政策的一系列变化。

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在“灭亡中华”这个总前提不变的情况下，具体侵略方针逐步有了一些重大变化。第一，它的兵力转为进攻在其后方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多次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反复“扫荡”和“清乡”，以巩固它的后方。第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图谋诱使国民政府妥协。第三，从分别扶植各地方的汉奸组织转为扶植一

个统一的沦陷区的汉奸中央政权，强化“以华治华”。

在中国方面，1939 年 1 月以后，到 1940 年 6 月沙（市）宜（昌）战役前，正面战场基本无大战，前线相对平静。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发展敌后战场，迅速在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北、山东以及华中地区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许多地方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 5 万多人发展到 50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①]。国民党当局对此深为恐惧。

在国际上，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对中国抗战都表示同情与支持，并给予了部分物资援助。其中，苏联的援助最为有力。到 1940 年先后四次提供贷款共 4.5 亿多美元，并供给了大量的武器，派出了 2000 多名空军志愿人员[②]。美国、英国、法国也给予了相当数量的财经援助。但随着欧洲局势的逐步紧张，面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威胁，英国、法国对日本采取了安抚、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战爆发。1940 年 6 月法国投降，投降后的法国政府准许日本使用越南机场，却不准中国使用滇越铁路。英国政府也应日本要求，封锁中国当时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 3 个月，并中断通过口岸对华运输物资的渠道[③]。苏联在 1940 年也与日本签订了一些产业协定，并于 1941 年签订了《苏日中立友好条约》。美国政府对日侵华本来不满，但受其国内“孤立主义”，即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主张置身于亚洲、欧洲战争之外的思想的影响，宣布在中日战争中实行“中立”。1939 年 7 月虽宣布废除 1911 年订立的《日美通商条约》，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实际上仍与日本保持一定的通商关系（供应日本废钢铁以制造武器）。直到 1940 年 9 月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军事性同盟条约，主要针对美国，美国政府才改变其远东政策，从而大力反对日本，积极支援中国抗战[④]。

在这种背景下，国内政治局势随之发生逆转，这就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蒋介石加强反共。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4 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第 599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第 670 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第 668—670 页。

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新变化

早在1937年12月，为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了长江局，并派驻了中共代表团，在加强对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领导，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代表中央与国民党当局继续就加强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这一时期，长江局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设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大楼内

一是响应蒋介石的邀请，向中共中央建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二是响应国民党的邀请，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参加国民参政会及人员名单。

长江局为推动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不断与国民党联系交涉，并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提出建议。国民党副总裁、被确定为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曾告诉中共代表，中共参政员可推荐10人。长江局向中共中央提出人员名单建议，并认为，如果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可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可以出任参政员。最后规定中共参政员只有7人，确定由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任（毛泽东从未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于1938年7月6日召开。开会前夕，中共参政员7人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开宗明义声明他们7人是受中共中央之命受聘为参政员的（即表明不是文化团体代表），认为参政员在产生方法和职权规定上虽不尽如人意，但并不因此失掉它在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并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民主化的初步开端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参政会对于发扬民主，增强团结，讨伐汉奸，鼓舞

士气，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言论，提出过许多好的主张，通过了许多好的决议，对推动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中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策逆转，利用国民参政会制造反共磨擦。中共在参政会里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各抗日民主党派和广大中间势力，争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到抗战胜利为止，国民参政会在各个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是国内政治的一份晴雨表和一个温度计。

三是积极推进与国民党军事合作，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军事当局保持联系，向中共中央提供情况，供中共中央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武装，与正面战场作战略配合的参考。同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方针和某些战役指挥提出积极建议。周恩来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此前，在1937年8月，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谈话会上发言指出，在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广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8年3月，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会见到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军委会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就第五战区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新四军配合，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在徐州以北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随后又派长江局友军工作组的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徐州会见李宗仁，建议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与日军打一战。这些建议为李、白基本接受，对后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促进作用[①]。

在相当时期内，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分歧不断、斗争未停，却出现过一段较为平稳正常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在党内也出现了王明等人为代表，主张放弃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放弃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错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采取新的侵略方针，挑拨国共关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506页。

破坏国共合作，分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日益壮大又深感恐惧。这就使蒋介石既不得不继续抗日并同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同时又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受到影响。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相忍为国，继续维护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巩固国共合作，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坚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为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是一次双方均有军队、政权的合作，而这次合作，既无正式的共同纲领，又无合法组织形式，只是一种以遇事磋商和谈判等形式存在的"君子协定"，这就造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形成之时起就存在先天不足。国民党企图利用它所持有的中央政权和在全国所占据的优势地位，通过统一战线来控制、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多种方式、渠道向国民党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实现中国抗战民主进步的光明前途。然而，在怎样抗战的问题上，国共两党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指导路线，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由于存在两条不同路线，就必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如何保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争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由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实行的抗战路线不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表现形式的统一战线内部，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尖锐的矛盾和斗争。随着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共独裁的本质日益显现。因此，能否处理好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就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因素，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全面抗战之始，中共中央就感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争取人民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和中心环节。中国共产党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

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同时，必须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此，中共中央对在国共合作中，党内出现的个别过分相信迁就国民党、对国民党反共阴谋缺乏认识等右倾错误趋向予以了高度警惕，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1938 年 3 月，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共实行的抗战路线和策略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并给予了充分肯定[①]。这就为中共中央彻底纠正右倾错误，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为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会议总结，认真总结了抗战 15 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了抗战新阶段的形势。毛泽东不仅专门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透彻分析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而且还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深刻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正确的方针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并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毛泽东的这些报告全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

在六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也专门做了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实践经验，全面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和形式，系统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但由于蒋介石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第 655 页。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的”，所以它又是不平等的；且不是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个人关系的习惯中发展。鉴此，周恩来提出了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各地方军队的联系，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等十二条原则[①]，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和制定的一系列有关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具体化，为相持阶段到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方法。

全会最后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获得抗战胜利的基础条件，“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②]。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7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对友党友军应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①。由此可见，《政治决议案》的核心，就是以坚持抗日战争为党的中心任务，维护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实现这中心任务的基本保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以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其推动全民族团结抗日向前发展的基础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正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分析抗战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新任务。更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批判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把统一与独立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要求对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②等灵活对策，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会议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在战区和敌后，批判了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强调军事战线上，必须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并将直接影响着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并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③。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全民抗战“最自觉的领导者”④。中共的这些主张和策略，既坚持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又更加强调政治上的斗争，特别是把进一步发展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组织和动员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参加抗战、争取民主，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紧密配合的另一个重要战场。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随着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到来，适应国民政府西迁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

①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0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7 页。

一战线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就是在批判了党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的同时[①]，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建立南方局，以全面加强和统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至此，标志着在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以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重庆为依托，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统一战线，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二节　确立以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心任务

一、南方局的建立

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而建立的。它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民主，争取抗战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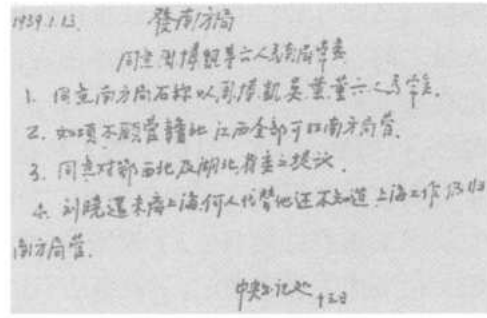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驻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机构人员已开始随国民政府西迁相继赴渝。1938 年 10 月 25 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停刊的同时在重庆复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随后在重庆建立起来。是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经湖南、广西抵达重庆。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南方局筹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

1939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电复，根据周恩来等建议，批准周恩来、博古、凯丰（何克全）、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并指示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辖。在此之前的 1 月 5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16 日，南方局向中央报告领导干部分工情况：周恩来为书记，负责统战工作；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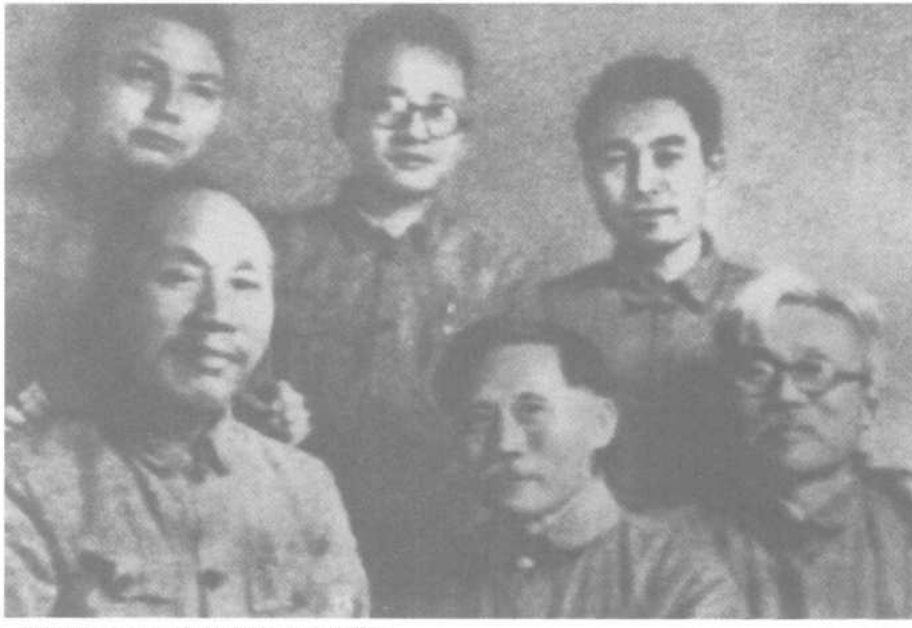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第 659—662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64 页。

作委员会[①]。至此，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从此以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坚持在重庆这个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作为其首要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始终高举抗战和民主两面旗帜，为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周恩来等六人组成南方局常委的电报

南方局开始设立的工作部门虽然较多，而实际工作人员很少。除军事组主管友军联络工作，有七八人之外，大都只有二三个工作人员，而且


1939年初，南方局领导人在重庆合影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第5页。

各部门之间，以及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兼任。还有一些不在南方局机关，另有社会职业的党员，也在南方局工作机构内任职。一职多责，一人多用。皖南事变之后，人员疏散，机构更为精简，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随着工作的需要，南方局后来重新作过组织分工。1940年10月4日的南方局会议决定，董必武任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下设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5个组。凯丰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下设书店、社科、文艺、文化、宣传、新闻等组。此外，还设有组织部、秘书处、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工作组等机构①。南方局还设有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南方工作委员会。西南工委书记孔原（后为钱瑛）、副书记廖志高，负责川东、川康、云南、贵州、鄂西、湖南等地工作。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负责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香港、澳门等地工作。两个工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3年6月，周恩来等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南方局工作由董必武主持。194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王若飞为书记的工作委员会主持南方局范围的工作②。

1939年初，南方局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在机房街驻地。左起：王炳南（外事组长）、董必武（常委）、叶剑英（常委）、钱之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何凯丰（常委）、吴克坚（常委）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第66—67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第65页。

化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报馆

南方局是秘密机关，依托在机房街70号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对外就是“八办”。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飞机数十架次轰炸重庆，“八办”和《新华日报》在城内的房屋都被炸毁。自此，“八办”和南方局迁到红岩，《新华日报》总馆迁往化龙桥虎头岩。南方局在城内还有一处机关，是以周恩来私人名义租下的曾家岩50号，对外就称为周公馆。周恩来和邓颖超以及董必武、叶剑英等常住在这里，当时南方局的党派组、文化组、军事组、外事组、妇女组的工作人员也大都在这里工作。实际上，这里是对外接待最多的地方，也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据点。

南方局的负责人当时都有公开合法的职务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他工作人员则以“八办”、《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或领导人秘书、副官等名义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红岩、曾家岩、虎头岩合称“三岩”，是当时中共在重庆的三个主要的公开阵地，也是一个相互配合开展统战工作的有机整体。

以周恩来名义在城区租下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南方局设立在重庆城区的办公处

南方局从成立至1946年5月迁往南京，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1月至1944年11月，称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周恩来回延安并去苏联治疗臂伤期间，博古任代理书记。1943年6月至1944年11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筹备期间，董必武任代理书记，主持工作。1944年5月，王若飞

到重庆后，协助董必武工作。第二阶段，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12月，称重庆工作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1944年11月7日，董必武回延安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因此时南方局主要领导成员均先后离渝，中央决定由王若飞留驻重庆，组织重庆工作委员会，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第三阶段，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恢复中共中央南方局名称（或称重庆中央局），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期间，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出席政协会议和谈判，实际继续领导南方局（重庆局）工作，中共代表团成员即为重庆局负责人。1946年5月，随着南方局与中共代表团以及其他中共公开机构一道东迁南京（随后改称南京局），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后，南方局在重庆的工作宣告结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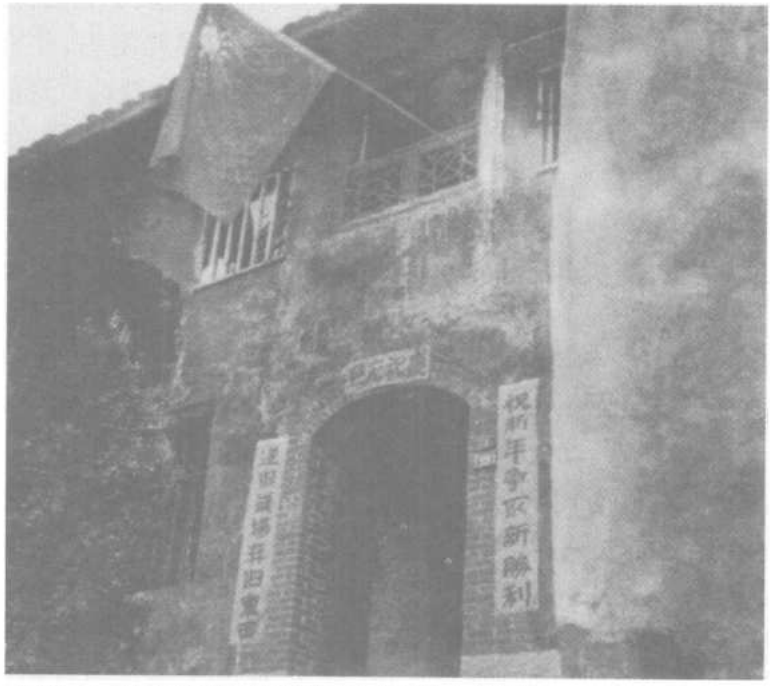
根据周恩来建议，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南方局（暂名重庆局），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图为董必武、王若飞与部分委员钱瑛、刘少英、熊瑾玎、童小鹏以及中共代表团在红岩水坝留影

南方局成立后，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加强与国民党方面的抗战军事合作，直接领导了有关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并根据需要新成立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04页。

了一些办事处，它们是：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实际也是南方局的办事处，是南方局公开的对外办事机构，掩护南方局机关，承担南方局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重庆“八办”定期向国民党当局报送战报，领取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即停发新四军军费后又停发八路军军费）。重庆“八办”还通过多种渠道经营企业，组织收入，保证南方局和各地中共党组织的经费需要，帮助许多爱国人士和人民团体解决经济困难，同时还向延安提供大量经费。抗战胜利后，各部队驻各地办事处撤销，重庆“八办”改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1942 年，迎接新年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门口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这是周恩来离开武汉赴重庆途中，经与国民党桂系白崇禧商谈同意，于 1938 年 11 月设立，由周恩来秘书吴奚如和李克农先后任处长。桂林“八办”实际也是南方局的一个办事处，承担与桂系的联系；负责人员、物资、经费转运；支持和指导当地抗日文化运动；领导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驻衡阳交通站、驻韶关办事处；联系并指

图为位于桂林城内的万祥商号——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

导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香港一部分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41 年 6 月，因桂林“八办”撤销，当地工作重要，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建立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李亚群任书记。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外，还帮助安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紧急抢救到桂林的文化人，发展了党员，重新建立了文化界党组织，并直接联系广西的一些特殊重要的党组织和党员。1944 年夏，李亚群返回重庆，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结束。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以八路军高参名义为驻湘代表，同时在长沙成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以王凌波为主任。随着战争发展，驻湘通讯处先后迁往沅陵、邵阳和衡阳。1940 年 2 月，被迫撤往桂林。留在衡阳坚持工作的徐特立回延安，王凌波被强押出境。

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交通站）。1938 年 11 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成立，1939 年初改为交通站。1939 年 7 月撤销。

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成立于 1939 年 7 月，并联系云南、贵州地区中共党组织。1941 年 1 月被国民党查封。

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迁到韶关，改为韶关办事处，仍由云广英任主任。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撤销。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于 1938 年 1 月经与港英当局商谈同意成立，潘汉年任八路军代表，廖承志任主任。对外称“粤华公司”，以商业活动为掩护。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办事处撤销。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和著名文化人在广州。前排右起：廖承志、夏衍、茅盾；后排左起：潘汉年、王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此外，南方局还负责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及港澳地区和海外等地中共党组织，还直接联系和领导一些情况特殊的个别支部。这些党员和支部分布在重庆、上海、成都、雅安、贵阳、桂林、昆明、香港等地和海外[①]。

与武汉时期不同，在重庆已不再设常驻的公开的中共代表团，但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仍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代表和有关当局谈判，与各界人士交往。南方局以公开合法的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这个机构和获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抗战史 1931—1945》，第 205 页。

《群众》周刊为依托，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开展工作，事实上成为了国共两党保持高层联系的重要枢纽，以及中共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主渠道。

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心工作

南方局是在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共双方磨擦不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裂痕的形势下组建的。因此，加强同国民党的联络，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是南方局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范围广泛、情况复杂、矛盾尖锐，但又在共同抗日的总目标下实行合作的庞大阵营。南方局的中心任务，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背靠解放区，立足国民党统治区，与各方力量打交道，致力于维护、巩固和发展这一条战线。尽管南方局大体承接了中共长江局的工作任务，但是在抗战形势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南方局所要承担的任务已不再是组织开展公开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斗争，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巩固党的组织，代表中共中央，担当起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巨任务。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就没有抗战的胜利。而这个基础却不是坚实稳固的，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一方面，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坚持一党专政，极力在抗战中剪除异己，限制共产党和各派民主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民主，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迅速扩大。双方的尖锐斗争不可避免。

南方局在组建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处理当时已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国共关系。1939 年 6 月上旬，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共中央写出《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两党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但报告同时指出，整个形势基本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要团结。报告中的结论是南方局针对当时局势，对未来时局发展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7 月，中

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由此，这一方针成为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国民党在1939年后对国共合作抗日虽日渐冷淡，但合作关系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对此十分重视，始终将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希望通过努力使之加强，至少保持已有的军事联络。南方局理所当然承担着沟通和改善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因此，南方局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这一公开机构，主要从三方面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负责分别向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和国民政府军委会呈转关于对日进军的行动方向，作战计划、方案，两军协同作战意见，以及有关命令、报告等。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重大军事行动，事先都要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在晋察冀、冀鲁豫、冀南、山东、华中等地的军事行动，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等，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做出方案后，即电告南方局，再由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或备案。抗战时期，军队是分区作战，但为了联合力量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委会有时也要求中共军队执行某一作战任务，或配合某部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些作战命令和要求，不论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出自军委会某部，基本上都以书面形式发送办事处或周恩来、叶剑英，由他们负责转达。1939年冬季对日攻势作战，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在山西上党一带和正太路、平汉线、平绥线、陇海线等方面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个电报送达办事处后，叶剑英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配合作战初步意见，随之将蒋电及南方局、办事处的意见一并报告中央军委。得延安复电后，南方局又以叶剑英或办事处名义将中共军队配合国军作战的方案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1941年中条山战事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问及周恩来中共军队是否配合作战事宜，周恩来当即表示十八集团军必能协同作战无疑。当局将本次作战情况告之周恩来后，南方局即将此意电告中央军委。经中央军委研究后，速以朱德、彭德怀名义复电表明八路军决心协同作战态度，并将协同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转交。中条山战役虽发生在皖南事变之后，但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记前仇，很好地配合

友军的对日作战。

二是负责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送中共军队抗击日、伪军的战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了解整个战场情况，要求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在每次对日作战后，都要把作战时间、地点、参战部队、作战经过、战绩、损失以及敌方状况等以战报形式呈送军事统帅部。从抗战的大局计，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后都按照要求写出战报，通过办事处即时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办事处把做好战报转呈工作，作为增进国共两党、两军相互了解，消除隔阂，坚持团结抗日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一直予以重视。1940 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蒋介石就通过办事处呈送的战报及时了解百团大战战绩，并给予八路军嘉奖。战报转呈工作使国民党对八路军对日作战能力有所了解。中条山战役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诬蔑我军“游而不击”，不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周恩来即以八路军大量战绩予以严正驳斥，制止了顽固派的诬蔑。可见，南方局、办事处坚持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政府军委会转呈战报，对维护两党两军团结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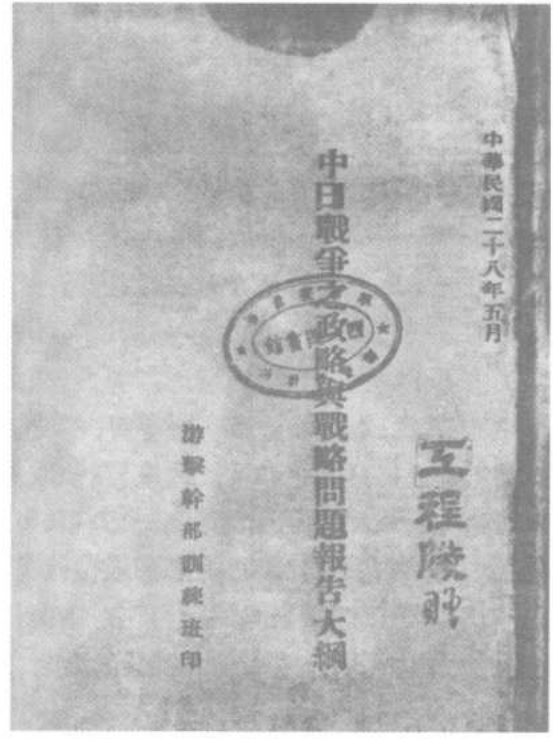
三是在两党两军之间负责有关情报的中转。国共两军合作抗击日、伪，除相互的军事配合外，还保持着双方之间日、伪军情的交换，由于南方局、办事处所处的特殊地位，便自然成为国共两党两军互通军情的重要中转站。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方面搜集的各种日、伪军情报，经过查实之后都一并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办事处军事组分别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有关部门。国民政府军委会也把其编制的《敌伪广播》和《敌情通报》等送发办事处。办事处军事组再将军情分类电报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种情报的交换，是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现，在整个抗战期间，办事处很好地发挥中转站作用[①]。南方局、办事处承担的这些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的具体体现，所开展的工作和付出的努力都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排除党派之争，坚持抗战团结的诚意。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给这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还时时寻机进行迫害。但是，南方局、办事处却始终能相忍为国，顾全

① 王明湘主编：《重庆抗战丛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19 页。

大局，坚持不做有碍两党、两军团结，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没有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以口实。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过南方局的努力，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有限范围内的合作，对维护国共合作局面，推动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在南方局推动下，国共间还进行过一次重要军事合作。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期间，接受白崇禧的《万言书》中关于组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在研讨二期抗战时提出与中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请求。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予以积极回应，经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派叶剑英参加训练班筹建。为此，次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帮助国民党及其军队工作原则的决定》。

1939年2月15日，在中共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第一期在湖南衡山南岳镇正式开学。中共派出了30人的代表团，有教官6名，由叶剑英任团长，特聘周恩来为讲师。1939年4月18日、19日，周恩来借到江南视察新四军之便，到游干班作题为《中日战争中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游干班虽然只办了三期，后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终止，但是它的积极意义却显而易见。



周恩来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所作的《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报告大纲》单行本

正如叶剑英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项工作是有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非神秘性，实际的

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这就使那些为着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军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不少进步学员继续与中共教官保持联系;有的重返前线打击日军,为国捐躯;有的毅然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队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国民党既是中共需要联合的主要对象,又是与之斗争的主要对手。南方局在与国民党交往中,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握主要矛盾不转向,对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几度濒于决裂的国共关系得以缓解,避免了全面内战,维系了国共合作,终于赢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是南方局的中心任务。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结合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分析判断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行径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过程中,努力弥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的裂缝,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同时,把团结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中间力量,作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级基础,发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基础的重要战略举措,以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南方局主要负责人充分利用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合法公开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与国民党民主派、各爱国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抗日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开明士绅、少数民族、宗教界和华侨等等一切抗战爱国力量广泛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政策,在争取抗日民主的共同事业中与他们逐步建立起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关系;与此同时,积极利用重庆作为国际反法西斯东方指挥中心的有利地位,广泛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国际社会与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日民主进步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外交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南方局在与国民党交往中，始终高举抗战与民主的旗帜，从根本上代表和团结了大多数。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共双方既团结又斗争的焦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即抗战初期，斗争的焦点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是由国民政府包办抗战，还是组织千百万群众和朝野军民合作全面抗战。在这一阶段斗争中，国民党的限制和压迫，挡不住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文艺运动的发展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但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是做了不少积极抗日的工作，政治上有一些改良。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是抗战期间关系最好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南方局成立之后，从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到1944年春夏国共第4次谈判止，前后近6年时间，斗争的焦点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还是妥协、分裂、倒退。斗争局势时急时缓，总的趋向是逐步加剧，其间国民党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成为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皖南事变后，两党斗争的激烈程度、力量的消长，以及中间派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南方局准确地估计形势，执行中共中央政治进攻，军事防守的方针，坚守阵地，力挽狂澜，积极镇静地开展艰苦的工作，争得国内外广泛同情，击退了这次严重的反共逆流，维系了国共合作，避免了全面内战，维持了抗战大局。同时中间力量有鉴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危及自己存亡，也组织起来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并与中共接近，而国民党则日渐孤立。通过皖南事变后的一系列坚决斗争和细致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逐步取得了主动，劣势变成了优势。

第三阶段，是从1944年秋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口号到抗战胜利。这是一个新的阶段，斗争的焦点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领导抗战到底，还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由此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在此之前，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主运动在各党派各阶层力量中均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广泛开展，积极要求发扬民主，取缔特务统治，废除一党专政，坚持抗战到底。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更使国民党

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也进一步加强了运动的力度。

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矛头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时民主运动的开展仍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斗争，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应有之义。

第四阶段，是抗战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为代表的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时斗争的焦点是和平民主，还是内战独裁。

这一期间，国内政治分化非常激烈。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切成果，包括战后的《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均被破坏。至1946年底，国民党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除青年党、民社党和极少数社会贤达外，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均拒绝参加，双方营垒已见分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党派各阶层力量广泛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形成。而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民主运动已发展成为与武装斗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把蒋介石政权包围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除了国共两党外，还有一大片中间力量，其情况也非常复杂。就其大多数而言大体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当时主要包括国共两党之外的各抗日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工商界、文化知识界、华侨的中上层人士，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等诸多方面，而中间党派则是与各方面有着广泛联系的最具代表性的力量。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不断加强了对中间党派的工作，把他们自身的要求融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政策作斗争。以后虽在某些具体对象上有所反复和变化，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与各中间力量的团结不断增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稳定因素，成为抵制国民党反共政策的重要制约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发展，并成为以后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取得了对中间力量的领导权，也标志着牢牢地掌握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权。

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人民群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最广大、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南方局和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党组织继承

和发展了这一优势，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主导了群众运动的方向。从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到国民党加剧迫害后，各单位、学校据点活动的扎实深入推进，到民主运动兴起，各项群众运动，尤其是青年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始终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前列。在各种运动中成长了大批干部，成为以后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科技建设的重要骨干。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有机地相结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走出边区，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南方局是一扇窗口和一座桥梁。不仅通过民间的渠道，争取了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斗争的同情与支持，而且与有关国家建立了半官方的外交联系，在一些问题上得到他们各种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击退，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制止，旧政协的召开，当时的美国、英国、苏联都分别起了一定作用。这一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互相结合，推动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南方局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局面，成为新中国外事和外交工作的先导。

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建设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抗战初期，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文艺运动中，中共的组织空前发展壮大。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南方局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隐蔽精干的方针，既避开了国民党的镇压锋芒，顾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巩固了斗争，积蓄了力量，在国民党的严重高压下，保全了各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骨干力量。待到民主运动兴起，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时机到来，便进入新时期的战斗。在极其复杂的地下环境中，南方局所属各地各系统党组织大都成长为能坚持革命斗争、执行党的政策、保持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战斗堡垒，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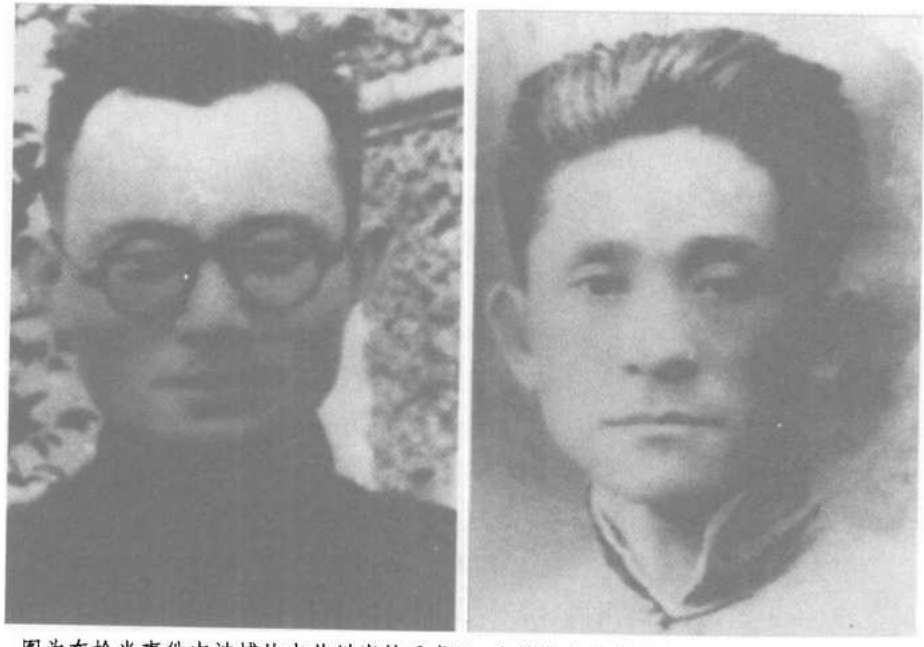
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期斗争中，始终担负着直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独特政治使命；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善于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务实的合作精神，真诚的团结愿

望，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直到抗战取得完全胜利。

三、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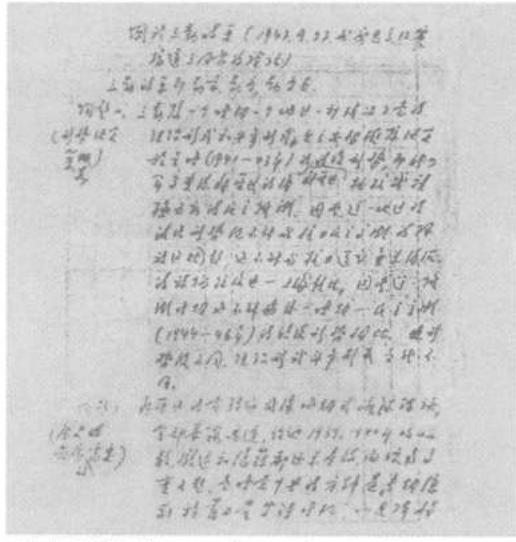
南方局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局面，争取抗战胜利。然而，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对国民党统治区怎样进行统战工作，还处于探索方式方法的阶段，因此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大多由各部门分别进行。

1939 年 12 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诱降、英国和美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情况下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40 年 3 月，就在反共高潮将被击退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采取嫁祸于人的伎俩，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 10 多人，使四川的中共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也面临严峻形势。为了适应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4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提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



图为在抢米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分销处主任罗世文（左）和中共党员、群众救亡领袖车耀先（右）

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二字方针，稍后又提出隐蔽精干方针。4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针对新的斗争形势需要，又提出“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职业化”，“干部要隐蔽在群众中”[①]的工作策略。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批示。明确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执行反共政策的时候，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而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并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应该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隐蔽精干，反对急性和暴露[②]。之后，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国民党统治区斗争实际，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提出了实现“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具体要求。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为南方局在深入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中稳健地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图为周恩来关于“三勤、三化”要求的谈话要点

1940年5月31日，周恩来回到重庆，开始为改善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共关系而奔波。他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正式谈判，阐明中国共产党希望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立场。同时，连续召开南方局会议，详细听取各省情况汇报，具体分析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作出部署。7月10日，周恩来召开南方局会议，强调：“当前投降的危险是空前的，困难也是空前的，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可能争取的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我们不要只是同投降派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4月2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6页。

斗争，要争取中间力量，党组织也要加紧巩固。"①

7月底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一、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二、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三、要求政治改革。②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制定的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认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通过南方局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两头小（指工业无产阶级、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大（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中间党派、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现在才逐渐了解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他特别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突出地强调把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作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任务，从而解决了中共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关键问题，是团结中间势力，对南方局在新环境下全面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8月下旬，周恩来离开延安，经兰州回重庆，随即召开南方局会议，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了更好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10月4日，南方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和解决内部组织分工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各地高级党委均设统战工作部门的通知要求，周恩来提议在南方局设立专门的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南方局所辖区域内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王梓木任秘书，统委下设10个组，即军事组（又称叶剑英工作处）、党派组（博古负责）、社会团体组（董必武负责）、妇女组（邓颖超负责，由妇委兼）、青年组（蒋南翔负责，由青委兼）、国（民）党组、文化组（由文委兼）、国际组（即外事组）、经济组、政治研究室。此外，设立的国际问题研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7月10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81页。

②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7月30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81—582页。

究室、华侨工作组等机构[①]也是为围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服务的。

南方局妇女组成员，（左起）张玉琴、邓颖超、廖似光、卢竞如在机房街驻地

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是南方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40年8月15日《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的具体体现。专门设立一个统战工作委员会促使南方局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方式，从过去各部门分散开展统战工作的状态，转向集中、规范、高效的统一领导。这就有效避免了各部门或工作人员由于工作性质不同、联系渠道各异，以及各位领导人的不同要求等因素，而可能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上出现的偏差，工作对象上可能出现的重叠和交叉，以及可能给统战对象造成的误解，实现了党派、社会团体、妇女、经济、文化、国际等不同系统的统战工作分工，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国内统战与国际统战，党派统战与社会统战的统一领导和

① 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记录，1940年10月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84—585页。

相互配合。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打开了南方局各系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视野，拓展了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与中间力量的联合，以共同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和对爱国进步力量的压制，探索有效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新途径，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全面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牢牢地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此后，随着南方局围绕皖南事变而组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迎来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第二章　坚持团结、抗战、进步方针，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比较正常。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当局便逐步由抗战初期的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制群众运动，限制人民抗日武装发展，不断制造大大小小的武装磨擦，直至发动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逆转的形势下，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用最大的努力不断地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以斗争求团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合作的诚意；同时配合根据地的武装自卫斗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坚决而又有分寸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迫使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坐下来谈判。从而在尖锐、复杂、艰险的环境中，维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

第一节　团结、抗战、进步方针的提出及在实践中的发展

一、方针的提出和发展

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南方局成立初期即做了大量促进国共团结合作的工作。例如：董必武、邓颖超等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积极推进精神总动员运动，开展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在一些地方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联合开展讨伐汪精卫运动，打击公开的暗藏的投降派；配合国民党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等。通过上述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

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国、美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缓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由于国民党强化反共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更加困难。一方面要抗击日军，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国民党制造的种种刁难和磨擦事件。南方局在与国民党的"遇事协商"中，更是矛盾重重，斗争尖锐。但这时的矛盾和斗争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问题，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和斗争交织在一起。南方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完善和具体化，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合作中进行斗争，维系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针对国民党政策重点的转变，1939 年 6 月上旬，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共中央写出《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两党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报告同时指出，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要团结。这是根据当时形势作出的重要判断，也预见到以后一个时期形势走向。周恩来在《关于目前危机》中的情况估计和应对的观点在延安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进一步得到完善。1939 年 6 月 18 日，为研究如何解决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磨擦事件愈演愈烈的办法，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6 月 25 日，他在延安为《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7 月 3 日，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意见书。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共对时局宣言应成为动员全国舆论反对日本诱降政策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其纲领应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发动全民战争。经过政治局的讨论，中共中央指出：对于国民党，应"赞助其继续抗战和联共抗战的积极方面，对其缺点错误则应根据中共六中全会决议，进行口头上、文字上的批评解释工作，目的是要以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拥护的彻底抗战路线，来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抗战路线"①。党的任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 1014 页。

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又公开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鲜明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指出了当时的斗争方向，对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动员舆论，团结多数，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政治局势的逆转，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需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一次作出总体性估计，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8月4日起，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一是抗战两年的总结——经验与教训；二是目前时局的关键——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及克服危险的紧急任务；三是论统一战线。周恩来的报告以丰富的材料，论述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时局的演变过程和阶段性，详细剖析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日本侵略者动向和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他认为目前抗战已转入二期，在这个转折时刻存在的主要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即也会有社会解放的初步的和推动的作用）。但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战线的强点，弱点是在民主性和社会性方面。对蒋介石，周恩来分析道：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认统一战线，实际政策也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统一战线，存在着妥协投降的危险；但目前的方针及形式上还讲团结，还主张抗战，还不愿造成全国破裂的局面，这是蒋之思想与政策的矛盾之处，也就是他的政治特点。蒋没有马上投降和分裂是因为：第一，投降将成为汪精卫的尾巴，或许会被迫下野。第二，分裂会遭到全国人民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对，并且无法战胜中共。第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很苛刻。第四，国内坚持抗战的困难还不是完全无法克服。第五，国际的妥协派还不是一定要中国全部马上投降。蒋介石也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承认现实，只要现实对他有利，也能影响他改变一些办法，但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思想是不会变的。幻想蒋介石放弃其阶级立场，特别是其对敌妥协性、对英美依赖

性、对内反共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使抗战延长，国内情形相当好转，以便于各方面的进步而已。周恩来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和心理状态作了透辟的刻画：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迁就事实，以保存它未来的利益；但是它又是自大的，即使事实已经存在，只要它有权力否认，有可能拖延，仍然是不愿公开承认的，仍然企图设法取消的。因此，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时局再有进步，也仍然会如此①。

根据这些情况，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的方法应当是："一、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二、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三、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②他对当前统一战线工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逐一进行细致的剖析，并根据长期积累的统战工作经验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明确原则和具体办法。如对蒋介石的关系，周恩来主张：在他困难时援助他，在他蛮横时拒绝他；诚恳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影响他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他。周恩来特别强调：有利的应该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将来会有更好的；无利的应该严正拒绝，不要拖泥带水，使他增加幻想；让步的应该自动让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实现的应该适时适当的提出要求，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亏。总之一句话，对蒋不要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对各党派的关系，周恩来主张：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在民众问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39年8月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59页。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题上，周恩来认为，一般的讲，我们在民众中间统一战线的基础并不宽广。努力争取我们活动的机会，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仍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他主张一切群众工作仍应以抗战任务为出发点，以利发展；一切工作应以隐蔽为上，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分开；采取分开而不集中的原则，以求适合环境的发展；宁愿重复，不要急求统一；宁愿隔开，不要打通；宁愿持久，不要速成；宁愿埋头苦干，不重表面浮夸。对文化宣传工作，周恩来认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中共文化政策的方向。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他主张先求量的发展，后求质的进步；先求面的发展，后求深入；先求个性的发展，后求集体创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进步，后求艺术上的成功[①]。

周恩来还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六条守则："一、坚定的立场。二、谦诚的态度。三、学习的精神。四、勤勉的工作。五、刻苦的生活。六、高度的警觉性。"[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报告作了充分肯定，并从发展统一战线等六个方面对南方局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毛泽东还针对南方局工作中存在的弱点提出解决方针：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工作；三、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③]。周恩来对毛泽东提出的三个解决方针作了具体的阐发：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过去偏于联蒋，对中层阶级联络不够，如对黄炎培、梁漱溟等的联合工作做得不够，而国民党现在是不要中间分子。二是群众工作做得不够，即利用公开合法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同志不会灵活地打进公开合法的团体中去工作，不懂得群众工作要利用合法才能做得通。三是巩固党的问题。巩固已有阵地是主要的，但有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巩固党的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内部，一方面是加强群众工作[④]。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抗战处于新的转折的历史时刻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对统战工作以至整个国民党统治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39年8月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59—560页。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5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6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62页。

区党的建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进一步指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是这一策略总方针的中心环节，是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分裂的基本条件。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即放手扩大人民武装，广泛地创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发展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争取中间势力十分重要，它往往可以成为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党派也属于中间势力，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他们采取一面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联合其还愿团结抗日的一面，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同时对其反共反进步的政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以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三个不可分离的环节，而以斗争为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为了进一步指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对待各种社会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毛泽东进而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原则。南方局在此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上述指示精神。

二、抵制国民党“溶共”计划，维护中共的独立性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这是由于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它在实力上又有某种优势，加之对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自主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毛泽东正是针对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迁就主义、不敢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错误，十分明确地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

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①]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

南方局成立前后就面临蒋介石企图吞并共产党并与国民党合并为“一个大党”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企图利用合作的机会从政治上、组织上溶化和取消共产党。从武汉到重庆，他先后四次对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提出这个主张，而且要求愈益迫切，办法愈益具体，态度愈益严厉。最先是1938年2月1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有陈立夫在座。蒋介石表示：第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第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但是，“唯愿溶成一体”。这是一种试探。上面两条为虚，“溶成一体”是实。这也是后来一系列“溶共”政策的蓝本。周恩来心中有数，当即说明：中共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③]。随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也是应蒋介石的要求，向蒋介石提出口头和书面建议：共产党员以公开身份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实行跨党合作。接着，又有蒋介石第二次表态。1938年12月6日，周恩来从武汉撤往重庆路经桂林，适逢蒋介石也在桂林，周恩来与其会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对国共关系问题的意见表示：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跨党办法。他说，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如果此点可以谈，准备约毛泽东在西安面商；如果全体做不到，可否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周恩来回答说：“（一）中共赞成目前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是如此认识，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问题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对国家有害无益。”[④]蒋介石的态度也很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48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34页。

脆，如果合并的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了。紧接着，蒋介石第三次表态。12月12日，周恩来还在桂林，蒋介石已到重庆，他约见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明、董必武、博古、吴玉章等，更加明确地提出，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这一次，他一改过去比较含蓄，留有余地的某些说法，说得十分露骨。他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①] 王明等中共代表拒绝了合并成一个大党的主张。但蒋介石仍未死心，第四次表态。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一天，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的事，周恩来回答："不可能。"蒋介石仍然坚持要周恩来就这个问题再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为此，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并由周恩来转达给蒋介石。中共中央的电报明确指出：要坚持抗战到底，实现建国大计，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合作，"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国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②]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既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主张，又表明了合作诚意。这才断了蒋介石想通过组织"一个大党"来并吞中共的念头。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策从重点对外（抗日）到重点对内（反共）的转折点。但在这次会议的公开文件和言论中是看不出来的。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蒋介石总结抗战的形势，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强调加强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34—535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203页。

结，积极奋斗，努力建设三项任务。直接涉及与中共关系的，只说到一处："吾本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重党籍之事实"。这是拒绝共产党提出跨党合作的主张，本来中共已经说明，如不同意，不予强求，可另采他法。但是，国民党在它的五届五中全会的会前会后、会下会外却实际搞的另一套。会上公开讲的是团结抗战，下面实际干的是加强反共。会上说得很明确，要"溶共"，不要"容共"。蒋介石在会内会外往往是言行不一，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他在反驳近卫第三次声明的谈话中，指出：反共即灭华。他又说，国民党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主义的目的。他变来变去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要取消中共。当他组织"一个大党"的打算破灭后，便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办法。仅在1939年内，由国民党中央和其有关部门直接制定的就有五个文件，即1939年4月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颁发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6月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12月由战地党政委员会制定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国民党中央制定的《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内政部会同制定的《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并在各级党部设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这说明，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是它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对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和蒋介石表示祝贺，对其坚持抗战，驳斥近卫声明，开除汪精卫党籍表示赞赏，希望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以巩固两党长期合作基础[①]。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对全党发出指示，指示全党对其公开表示的坚持抗战主张予以赞助，对其缺点错误进行适当的、婉转说理性的批评。对于国民党中央在其五届五中全会后所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密反共文件，通过统战关系和情报系统，及时为南方局所掌握，并报告中共中央。1939年5月，周恩来即向国民党当局指出，近来发生的反共事件与其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的训令有关。7月又直接写信给蒋介石，对《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36页。

第二节　击退反共高潮，力挽国共合作危局

一、配合抗日根据地斗争，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平江惨案中遇难的湘鄂特委书记、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负责人涂正坤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对陕甘宁边区等大规模武装袭击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先后制造博山惨案、平江惨案、山西的十二月事件等反共事件，并加紧对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和对共产党员、进步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配合根据地，面向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多方面的政治斗争，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赢得了主动。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一方面，由周恩来、叶剑英当面或函电向蒋介石和发事地方军事长官陈诚、程潜提出抗议和交涉；另一方面，抓住平江惨案这个题目开展政治斗争，介绍真实情况，争取中间势力和公众的了解和同情。继8月1日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遇害烈士追悼会后，8月13日《新华日报》复刊日这一天，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也组织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代表和新闻界人士1000余人。《新华日报》发表了由叶剑英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撰写的《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启事》和《追悼遇害烈士专刊》。启事和专刊历数第二十七集团军杀害新四军抗日官兵的暴行经过，尖锐激烈地谴责反共投降派的阴谋。董必武、吴克坚和萧正岗分别代表中共中央、新华日报社、新四军严厉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

平江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径提出的严重抗议

战，破坏团结的反共行径，强烈要求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战大业进行到底，表明了中共坚定的态度。这次追悼会是一次政治反击，取得了众多群众和中间势力的同情。如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川东盐务管理局重庆分局致送的挽联是："古今同慨六月飞雪；曲直表明九泉饮泣。"著名小说家张恨水致送的挽联写道："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很形象地表达了当时各界爱国人士的态度。

1940年初，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叶剑英、董必武当即致电国民党成都地方当局，并直接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罗世文等被捕共产党员，严惩肇事者。同时，南方局以"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名义发布《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四川同胞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阴谋。此外，南方局及时对川康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隐蔽工作做出部署，避免了组织的进一步被破坏的同时，又特派潘梓年等赴成都，向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说明真相，争取他们保持中立，竭力维护抗战大局，避免事态扩大。①

1940年3月上旬，国民党在华北挑起的军事冲突刚受挫，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名义在重庆召开军以上作战单位参谋长会议。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南方局常委的叶剑英接通知后单刀赴会。会上，蒋介石诬称：冬季对日攻势打得不好，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游而不击"、"制造磨擦"所造成，故要彻查此事，整肃军纪。接着，各战区参谋长按蒋的授意依次发言，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对日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第二天叶剑英发言，以大量事实证明了"十八集团军坚持敌后抗战，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乃是抗战战略的需要"，并以大量数据列举了抗战两年半来，十八集团军在缺衣少食、武器弹药匮乏和敌人残酷扫荡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敌后作战，进行大小战斗2689次，歼敌8万余人等辉煌战绩，以及所付出的阵亡将士19000余人，负伤40000余人的巨大牺牲，有力驳斥了顽固派的诬蔑。在承认磨擦存在的同时，强调了磨擦的产生是由于政治意见、战略思想的分歧和奸人挑拨所致，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是磨擦的根源，指出："十八集团军与友军间一些磨擦是国共合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第211—212页。

作全民抗战前提下的局部现象。当前中日民族矛盾才是第一位的大问题，决不能把局部磨擦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痛仇快的事。”叶剑英的发言，赢得了富有爱国精神和正义感的国民党军人的同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收起对共产党的“讨伐”令。叶剑英在参谋长会议上的斗争，受到南方局的高度赞扬，被董必武称誉为“叶剑英舌战群儒”①。

二、开展政治反攻，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国民党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南移，把反共目标指向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筹划新的反共高潮，国内局势依然紧张。1940年3月，因手臂受伤赴苏联治疗的周恩来回国，5月即返回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并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到达重庆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处理了因叶挺、项英关系紧张，蒋介石企图调换新四军军长的问题，说服叶挺回到新四军。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表示中共合作抗战的诚意，谴责了国民党在抗战中“反共、溶共、剿共”的行径。接着，周恩来又与何应钦、白崇禧就划分作战区域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在划分战区谈判中，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往旧黄河北岸的狭小地带，以此达到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借日军之力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目的。针对这一不合理要求，周恩来在接受战区划分的同时，提出了旨在保证八路军、新四军独立性和发展战地的六个条件。随后，国民党方面又抛出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区的“提示案”。为了维护抗战大局，争取谈判有所结果，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再次做出了适当让步。但是，国民党却完全置之不理，对谈判采取拖的态度，致使谈判无果而终。1940年3月上旬，蒋介石下令苏鲁战区副司令官韩德勤率部向西，配合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夹击皖东新四军。② 当南方局获悉韩、李部正计划大规模进攻新四军消息后，董必武、叶剑英立即致电项英，建议积极做好应战准备，陈毅精心设计，并亲赴李明扬、李长江的驻地泰州开展统战工作：第一，高举爱国团结抗日旗帜，揭露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从政治上孤立韩德勤；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9页。

② 马洪武、王德宝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第二，耐心争取和反复争取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等人中立，从军事上削弱韩德勤。陈毅此举是通过统战工作取得黄桥决战胜利的关键，并打开了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的通道。这是统战工作结合军事斗争的典型范例。面对国民党军队愈演愈烈的军事进攻，周恩来、叶剑英于7月7日两次致函何应钦，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立即停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袭击[①]。10月初，正当八路军向日军发动百团大战之际，国民党却聚集3万兵力向黄桥新四军展开了军事行动，并着手酝酿更大规模的反共事变。

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军事重点南移之际，也加紧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治和反共活动。1940年春季，国民党特务先后在重庆、万县、宜宾等地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使这些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同时，爱国民主人士屡受政治压迫，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遭软禁，邹韬奋创办的44处生活书店分店被迫关闭，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等爱国进步社团也纷纷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国共关系，保障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安全，1940年5月以后，中共中央对巩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发出指示，明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据此积极部署所属党组织坚决贯彻，以实现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根本转变，做好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的准备。

1940年9月初，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军令部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新四军命令的重要情报后，速电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即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准备自卫行动”。9月17日，南方局又获悉一系列国民党军将袭击新四军的情报后，急电中央并转新四军[②]，建议做好应对部署。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致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最后通牒江南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78页。

为了探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动向，了解各界人士对时局变化的反映，给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对策提供依据，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接触冯玉祥、孙科、覃震、于右任、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们对“皓电”和时局的看法①。10月24日，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提议“皓电”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一要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集结应战；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队需做应战准备。10月25日，毛泽东将周电转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并就国际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两次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刘、项，指出：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贝当，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②。

为了使中共中央决策获得更充足的依据，11月1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条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终采纳周恩来的建议。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彭、叶、项名义致何、白“佳电”经叶剑英转给国民党当局。“佳电”刚柔并济地批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不实之词，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发布后得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中间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与此同时，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局，南方局除要求《新华日报》将“佳电”广泛印送给各阶层人士外，还加强国际统战工作力度，特意向英、美、苏、法等驻华使团

朱德司令彭副总司令叶军长项副军
长转何参谋总长白副参谋总长佳电一

共产党“佳电”部分内容

何参谋总长白副参谋总长致十八
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解释
军长皓电

国民党“皓电”部分内容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抗战史 1931—1945》，第213—21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及在华国际团体提供了编辑的有关国共关系资料。12月下旬，周恩来约见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说明国共两党分歧的实质，预计了发生重大反共事件的危险性。并说明：我们不想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以加剧磨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些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外国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地进攻时予以揭露①。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称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但“如果你们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冲突绝难避免”。次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电指出：蒋的承诺“靠不住”，这次不过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罢了，而事实上，国民党“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②。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包围袭击，皖南事变发生。大部将士英勇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来得到皖南新四军遭袭消息，当即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晚会时，再一次收

图为在皖南事变中被无理扣押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左）和遇害的副军长项英（右）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91页。

到有关事变急电，他当即向与会各界宣布，强烈谴责了顽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1月17日，周恩来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即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词严指出："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①是日晚，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二楼走道召集南方局、办事处人员开会，通报事变发生经过。指出：目前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经过斗争两党还可继续合作抗日。而我们则应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周恩来提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应当采取的应变对策，并作了具体部署②。在谈到必须从最坏的可能做准备时，他表示一定和同志们一道斗争到底。周恩来说："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③次日凌晨，周恩来奋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与挽诗。《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在天亮前发往全城，使事变真相大白天下。时局骤变后，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方局领导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安全考虑，于1月18日后的十多天时间内，连续数次来电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迅即回延"，并将其他党内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南方局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周恩来认为国共关系尚未到最后决裂之时，决定坚持下来，争取时局好转。并及时向中共中央陈述理由，最终得到中央同意。不久，中央决定对第二次反共高潮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指示南方局"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④，南方局则制定了政治进攻、军事防守、组织严密、工作分散等对策。从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和舆论攻势。

1月19日，南方局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传单，并广为散发到中外各界人士、普通群众，以至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手中，甚至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广大侨胞。这份传单在向国民党顽固派发

① 《人民的好总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99—60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0页。

为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揭露事变真相，1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题诗手迹

由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经周恩来、叶剑英修订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传单

动政治攻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澄清了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谈话，揭露顽固派反共阴谋，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周恩来通过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及时将上述“命令”和“谈话”转交国民党中央。随即，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出抗议，并致函蒋介石，谴责其“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2日，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内战

方案，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党派也愤然抗议，章伯钧等与周恩来会面，表达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的意愿。国民党内也不乏反对内战者，张治中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认为皖南事件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①]。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2—683页。

世杰，向蒋介石面陈慎重处置新四军问题，以免造成内战危险及国际间的不良观感[①]。国共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在事变发生后"感到没脸见人"，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指亲日派）是奸。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与此同时，经过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美、英、苏等驻华使馆以及国际机构也了解了事变真相，逐渐对中共倾于同情和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1月下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会晤后将事件真相报告本国政府，英国政府即电告蒋介石，指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②]。2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便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③]。国民党当局在国内外由此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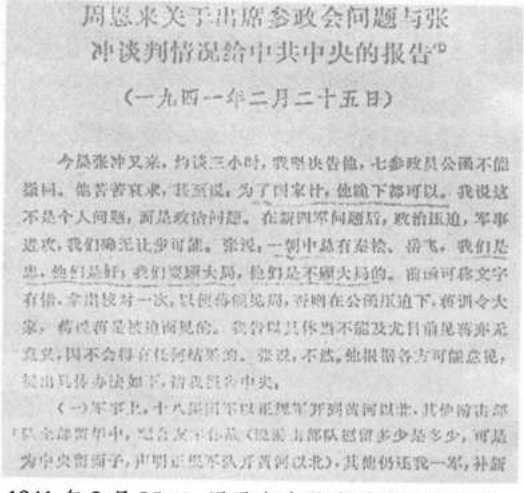
1941年2月初，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于2月10日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等进行商谈，告知中共对这次参政会的方针是拒绝出席，得到了他们的谅解。他们建议中共参政员以要求答复十二条善后办法为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④]。周恩来在获得中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的指示后，即于2月19日将中共七参政员[⑤]致国民参政会公函交该会秘书长王世杰，并同时转各党派有正义感之20多名参政员。这个公函开列了十二条善后办法，请政府采纳，并表示在政府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次会议[⑥]。这一措施将迫使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十二条善后办法作公开表态，借此以揭露蒋介石坚持以所谓处置新四军"纯然是整饬军纪"为幌子，对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置之不理的蛮横态度，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使其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承认皖南事变的发生乃是国共两党政治争执问题，这是国民党当局所不愿意做的，于是千方百计要求中共将公函收回。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1990年版，第10—11页。
② （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59—361页。
③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内刊），《南方局中段军事工作概况》1986年第1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第503页。
⑤ 即毛泽东、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陈绍禹。
⑥ 《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1151页。

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
参政會之全部文獻

图为《新华日报》刊载的中共七参政员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有关报道

从2月19日起至2月26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接连以公函、电话和面谈的方式向周恩来纠缠不休，他时而以如不收回公函“蒋介石必致翻脸”相威胁，时而又以“为了国家计，下跪都可以”作苦苦要求，时而还提出某种让步企图诱使中共收回公函。周恩来一一揭破了这些花招，对于蒋介石要“翻脸”的问题，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指出：“翻脸已半翻了，现在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对于张冲所谓只要收回公函他“下跪都可以”的要求，周恩来回答说：中共坚持十二条善后办法，“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发生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不断，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对于张冲提出的让步条件，周恩来说：“谈判具体条件，我可上报中央，不必收回公函。”[①]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中共参政员在国民党对十二条善后办法不作答复的情况下出席参政会，其目的就在于既要掩盖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国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①]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他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我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张说，一则中央有杨、白、飞，我们是患，他们是好；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面函可修文字有借，拿出钱对一次，只能答顾危局，否则在公函压迫下，将讨令大发，蒋或将是迫而见他。我告以只作当不能及此目前是将事无补实，因不会得出任何结果的。张说，不然，他报蒋各方可能意见，提出具体办法如下，请我贡献中央。

（一）军事上，十八团国军以开往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总名义上仍为〈隶属〉上部队，愿留多少是多少，可是为中央留面子，声明正规军队开黄河以北），其他仍还我一军，补新

1941年2月25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叙述了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的谈话

① 《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7—218页。

民党大搞反共分裂活动阴谋，又要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面前制造举国团结一致的假相。由于中共坚持要求对方接受十二条，否则中共参政员坚决不出席参政会，亦不撤回公函，国民党当局对此无计可施。

为了打破僵局，争取主动，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2月28日指示，于3月1日又向张冲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十二条临时办法。3月2日，周恩来为此两次以信函方式致张冲转蒋介石。这个临时办法的内容包括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中共军队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承认敌后之民主政权；释放叶挺，回任军职；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等①。临时办法没有再提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逮捕各亲日派首领及废止一党专政等问题，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委曲求全，顾全全国团结抗战最高利益所作的让步。可是，蒋介石集团依然对此加以无理拒绝。这样就关死了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大门。中共参政员是否与会的问题，当时已成为国内外人士瞩目的焦点。由于在皖南事变中，中共是受害者，而蒋介石集团则罪责难逃，此点国人皆知；加之中共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十二条善后办法后，又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主动作了让步，却反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蒋介石集团是理亏的；中共参政员为此而不出席参政会，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加之国际上美英继续对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先后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信函，强烈要求他不要同共产党人全面决裂②。蒋介石集团对此无可奈何，毫无办法。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在没有中共参政员参加的二届一次参政会上，对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和十二条临时办法进行答复，也对其反共分裂罪行进行辩解，只是由于理亏，其辩解只能处于防御地位，并欲盖弥彰。蒋介石最终还是不得不在3月6日会议上的演说中作出"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③。蒋介石的这篇演说，虽然不可避免会有反共的噪声，这种噪声还包括参政会通过的有反共内容的决议案。

①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156页。

②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

③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887页。

但是，蒋介石演说本身已经表明“剿共军事”在国内外不得人心，尽管蒋介石“以后绝无……”之类的话也是不可信的，然而他毕竟被迫作出了这一承诺，为其所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敲了退堂鼓。这次参政会也还是推举没有出席会议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驻会委员。会后，蒋介石于3月14日约见周恩来，询问延安中共中央有何意见，作出缓和两党气氛的姿态，表示有部分让步和谋求妥协之意。至此，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

蒋介石在1941年3月6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作出了“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反共开始，虽然新四军受到严重损失，但这一反共行径却使顽固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在道义上失去人心，使中间势力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也教育了标榜要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人们，吸引了更多的中间派人士，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日益下降，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

三、发动政治宣传攻势，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胜利希望完全寄托依赖于美、英、苏等国际力量，极力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希图利用其有利时机削弱或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集团的立场、观点和内外政策。它歪曲中国历史，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声称这是今后中国之命运要解决的主题。《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既是从理论上替中国的封建法西斯统治辩护，也是为再次发动反共高潮做舆论准备。4月，国民党中央通知各省党部和政府，称中共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庞炳勋等顽军开始向我军挑衅，不断制造磨擦事件。

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

誰來命？拿誰的命？

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

1943年春，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义正词严地批判此书，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

5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从6月起，其中央宣传部给各级党部发布秘密指令，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6月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南方局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预料国民党将利用这一时机加强反共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迫，强迫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到他们所谓政治解决之目的。并提出加强宣传、统战等各方面的相应对策。

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国民党顽固派借机在政治上及至军事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七八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继续发动宣传攻势，妄图从政治思想上动摇中共；7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来的可靠情报，蒋介石、胡宗南正在秘密调兵进攻延安。为避免内战，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这次反共高潮，毛泽东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把蒋、胡阴谋进攻边区的消息迅速向外界传播，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二是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准备以武力还击国民党的进攻；三是请正在返延安途中的周恩来、林彪火速赶往西安，直接向胡宗南交涉。

7月4日，毛泽东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数日内爆发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董必武立即将此种消息向国内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美英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愈快愈妙。要求董必武向张、刘交涉时，应讲明自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正准备讨论改善两党关系，现若动兵，全局破裂，绝对会给国家带来灾难。7月9日，毛泽东又致电董必武，要求速将中共方面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边区的各种材料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界人士，并应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并强调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要求南方局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机密进行之。①

①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570页。

图为董必武在重庆

董必武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后，立即领导南方局从四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利用各种交往关系，利用一切场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利用欧战紧张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反复声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反对内战、坚持抗战的一贯态度。二是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及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秘密刊物，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资料，批判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理论，揭露法西斯特务，揭露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反抗战的行为。三是将中共中央、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民众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电，和南方局搜集整理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国民党统治区迫害抗日民主力量的材料，编印成中英文小册子或单页传单，向国内外散发。四是领导和动员文艺界利用文艺手段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宣传坚持抗战与民主和人民大众的希望。

通过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积极活动，国内外纷纷对国民党顽固派内战、独裁的行径表示严重不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非常关注中国的抗战问题。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大使开会“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各国援助即将停止”①。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集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就国民党顽固派是否坚持中国的团结抗战问题进行质问。面对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反抗，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7月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声明无意进攻边区；12日，胡宗南命令原拟进攻边区的部分军队撤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迅速破产。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寻找一切机会进行反共宣传。1943年9月，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董必武就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

①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第572页。

对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中共七参政员因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已有一年多没有出席参政会。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前一天，即9月17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往访董必武，希望他出席参政会，声明绝无利用会议反共之事，董必武因此报到出席。

可是，当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下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作《军事报告》过程中，大肆诬蔑中共和八路军不顾大局，袭击友军，破坏抗战。何应钦的反共报告令董必武非常气愤，他按议事规则，当场站起来对何提出口头询问，董必武指出：何应钦既是代表军委会总结作战情况，为什么对十八集团军艰苦卓绝地在敌后坚持作战一字不提，反而诬蔑其破坏抗战？董必武进而列举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所取得的巨大功绩，以铁的事实，粉碎了何应钦的诬蔑。

董必武口头询问结束后，国民党CC系的参政员王普涵等3人即在会场上对董的询问大加抨击，叫嚣捣乱，开会场未有之先例。董必武当即向大会声明，刚才3参政员讨论他的询问，违反了议事规则，因此退席。当晚，董必武即致信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说明国民参政会已经被人利用来破坏团结，声明不再出席该届大会。①

董必武在参政会上的正义斗争，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在参政会上的反共部署，事出突然，国民党诸参政员非常被动，互相推诿责任，弄得狼狈不已。王世杰亦称："对共问题既不用武力解决又不愿政治解决，这是自告党的政策破产。"②

第三节　配合国共谈判，妥善处理国共关系

一、皖南事变前解决军事磨擦的谈判

政治谈判是国内外各党派、集团间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和手段，也是通向合作的桥梁和纽带。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两党两军之间协调对敌作战行动和调整相互关系，解决矛盾冲突，长时期里都是按照周恩来提

① 本书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1页。

② 本书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第410—411页。

出的建议，采取遇事相商，即遇事通过两党间的谈判来谋求解决的方式。在中共方面，主要由设在重庆的南方局承担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中央谈判的责任。南方局的主要领导，如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就是中共负责同国民党中央谈判的代表。有的谈判，中共中央也从延安派人来重庆，但来人又都是和中共常驻重庆的代表、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一同出面进行的。许多有关谈判的具体方案、办法和应对策略都是在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决定的，大量具体工作都是南方局人员做的。南方局直接出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王若飞，其中周恩来的作用最为重要。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的高级谈判时断时续，几乎每年在进行。其中最重要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为1940年1月至7月，为争取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时局好转和国民党继续抗战，周恩来、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进行谈判。第二次为1942年10月至1943年7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为改善两党关系，派林彪到重庆，与周恩来等以中共代表身份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谈判。第三次为1944年5月至11月，为缓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争取应有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到重庆，与董必武一道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谈判，并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上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三次国共谈判，南方局领导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6月到1940年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在重庆就军事磨擦问题、边区问题、扩军问题、划界问题等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从国民党吞并共产党的“一个大党”企图失败后，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冲突和磨擦明显增多起来。国共两党的军事磨擦始于华北地区，双方冲突最厉害的地区也在华北。早在1938年秋冬之交开始，因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试图解散八路军建立起来的冀南行政公署，这种磨擦很快就白热化了。为此，1939年春，博古、董必武与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以及李济深等人就解决河北军事磨擦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一些进展[①]。

① 本书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第350页。

但是由于此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反共方针已经明确，因此不仅河北军事磨擦继续扩大，华北及西北地区的两军间的磨擦亦愈演愈烈。5月，周恩来视察东南各省回到重庆后，找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多次会谈，并于6月7日向陈诚提交了“合理与公正”的解决两党冲突的建议，提出陕甘宁边区划界、河北政府改组、扩编十八集团军等要求①。

1939年11月，国民党方面派出何应钦和贺耀祖同叶剑英进行谈判。国民党提出首先谈八路军人事任免及其经济制度问题，要求十八集团军在冀南发行的钞票要立即销毁，十八集团军各军、师政治部人员应由国民党委任，人事权也要统一于国民党中央，军费直接发到师级等。对此，叶剑英答复说，钞票问题纯为冀南行政公署之事，此事只有八路军代表参加河北省政府后方能过问；八路军的人事权已按中央要求办理，惟政治部及军需署派人办不到等等。经过14日前后的几次谈判，双方意见难于统一，只得作罢②。

正当双方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之时，国共两党在华北及西北的军事磨擦突然急剧地白热化起来。国民党部蒋鼎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阎锡山在晋西对新军施以军事压迫，中共奋起反抗，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很快处于劣势。国民党不得不重回谈判桌来。1940年一二月间，叶剑英、博古与何应钦、张冲在重庆就承认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扩编和停止军事冲突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到1940年春，双方在西北和华北的军事磨擦亦以中共占据优势而逐渐告一段落，而在华中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就成为国民党关注的焦点。

华中地区是国民党极端重视的战略要地，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人染指其间，而在1940年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已获得长足的发展，于是蒋介石明令已在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新四军统统撤回皖南，并批准了“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为目的”的“剿共”方案，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鉴于这种情况，一度坚持对蒋介石此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的中共中央，不能不一面决定调派八路军南下增援，一面同意与国民党进行正面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52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第290页。

交涉，开始了国共两党就划分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区域问题的谈判。谈判先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之间进行的。谈判的重点是陕甘宁边区的辖区及其地位、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扩编、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作战区域的划分等问题，而以作战区域的划分为谈判的中心。周恩来和叶剑英首先提出中共方面的提案。其中要求陕甘宁边区辖属23个县并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个师，新四军扩编为三个师；为了明确战争责任，避免误会和磨擦，我方请求划分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的作战分界线等。国民党方面只承认陕甘宁边区辖属15个县，至多不超过18个县，且只同意边区成为陕北行政区，暂时隶属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对于扩编，他们只答应给第十八集团军三个军、六个师，另加六个补充团，新四军只允许扩编为两个师七个支队，其他一切纵队、支队和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对于划分作战区域，国民党则主张将中共军队限期开往旧黄河以北地区去作战，美其名曰，是为了避免两军磨擦，利于团结对敌，而实际上是企图将共产党军队赶到他们所指定的狭长地带后，以便配合日伪军进行夹击，达到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之目的。周恩来等原则上表示同意划界，但提出必须实行以下六个条件：(1)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2)人民在全部敌占区的游击权；(3)八路军、新四军有正规军的足够战区(华北五省)；(4)八路军和新四军有足够的补给；(5)中共有冀察两省的行政领导权和其他游击区的行政权；(6)八路军、新四军有发展保证(扩充补给)①。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这六个条件，何应钦、白崇禧或是避而不答，或是含糊其辞，只强调中共军队必须服从军令，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地区作战。致使谈判一个多月无进展。直到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才拿出一个《中央提示案》作为对中共的正式答复。这个提示案在边区辖属、部队扩编、战区划分等问题上，不仅重申了何应钦、白崇禧的最初意见，而且还作出了一些更强硬的规定。不只是要求在一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赴旧黄河以北，还规定，没有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部队"不得擅自越出战区地境线外"。这就完全拒绝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提出的各项要求，谈判遂陷入僵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579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南方局的有关会议上对两党间的谈判进行深入研究后，周恩来于7月25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8月25日，周恩来回到重庆，自26日起，周恩来、叶剑英又连续同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蒋介石等分别举行会谈，虽然周恩来等表示愿意让步，然而蒋、白等人则寸步不让。他们表示提示案已是"最后决定"，很难改变。特别是将中共军队开往旧黄河以北，已很难作出新的考虑。他们声称：如八路军、新四军不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周恩来、叶剑英一再以中共50万军队要抗日，开到冀察两省狭小地带无法生活的事实，拒绝国民党蛮横无理的条件。9月，周恩来以个人名义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队办法提议三项》：（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限，分头击敌。[①] 但是，这个提议却被国民党顽固派搁置起来。

由于谈判的失败，终酿成了皖南事变。

二、协调和配合林彪赴重庆谈判

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联、美国、英国等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视，希望中国杜绝内战，坚持抗战，以确保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也需要苏联、美国、英国等同盟国的配合与支援，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不敢再挑起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事件引起国际公愤，转而降低反共调门，谋求以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压制进步活动，对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则采取封锁和破坏办法。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因此发生改变。

1941年12月29日，在苏联治病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由苏联回国。由于林彪过去为黄埔军校学生，平型关一仗名震海外，加之又是从苏联回国，所以蒋介石特别重视，想通过林彪与中共重开谈判，改善国共关系。

此时，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国民党方面的变化。新疆的盛世

① 《团结抗战反对内战》，1940年冬在重庆秘密发行，现存红岩革命纪念馆。

才改变过去依赖苏联的政策，转而归顺重庆国民政府。随后，西北回民反抗也得以顺利解决。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希望尽快解决中共问题，重开谈判的心情更加迫切。1942年7月21日和8月14日，他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拟亲自在西安与毛泽东直接谈判。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缓和国共关系一手压制进步活动的矛盾做法，周恩来和南方局做出了准确的判断。1942年3月21日，周恩来致电林彪，告诉他大后方顽固派目前已决心肃清地方党，监视、孤立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他们对边区和游击区则采取封锁和破坏的办法。电文判断：外松内紧为目前蒋的中心政策[①]。中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恩来的估计。由此，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既肯定其缓和的一面，在两党之间协调，努力使两党问题以政治手段解决，避免冲突尖锐化；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其反共措施，利用各种途径予以坚决反击。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虽有了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中共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蒋、毛会面时机未到。但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颇具信心，虽然在8月17日电文中表示同意周恩来意见，拟先派林彪赴西安见蒋，但是，接着于19日改变主意，致电周恩来提出"依目前形势，我拟应见蒋"[②]。以后又多次致电周恩来强调见蒋的必要性。而周恩来仍坚持毛与蒋见面尚非其时的意见。9月5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认为："1. 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2. 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3. 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并具体分析了在国际国内局势方面对中共不利的若干因素："1. 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军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2. 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3. 毛出谋为改善根本关系，而蒋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②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第543页。

图为周恩来(右)、邓颖超(中)和林彪(左)在红岩

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因此仍然建议先由林彪出面,“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①

经过反复磋商,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先派林彪会见蒋介石,看林彪见蒋介石的结果如何,再决定毛泽东是否与蒋见面。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13日,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对林彪前几段话表示有兴趣听,但一提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约林彪走前再谈。16日,周恩来应约同林彪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提出了“三停”、“三发”、“两编”的要求,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蒋介石等表示,只要遵守政令军令,事情总可以解决,而对“三停、三发、两编”不作明确表示。②

根据一段时间的接触,周恩来作出明确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应该尽力所能及将两方关系处理缓和,再谈根本问题。从原则上说服国民党改变他们的观念(如军队、政权等),至少使他们当面不能反驳。周恩来并主张根据同蒋介石谈判的特点,采取灵活的做法:在林彪第二次见蒋介石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不提具体问题,或提到愿听调遣,但有困难,请求停打接触③。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随后,林彪与张治中、何应钦等进行了多轮谈判,周恩来并向张治中逐条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四项意见: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

①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第544—5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674页。
③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第548—549页。

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会上发言大多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①]，谈判进入搁浅状态。

正当这次国共谈判处于搁浅状态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43年5月22日发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宣布解散。蒋介石以为解决中共的时机到了。6月7日，蒋派张治中约周恩来会谈，提出中共要想解决两党关系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交出军队政权，组织可合法；一是同国民党合并为一党。周恩来立即拒绝。随后，蒋介石会见周恩来、林彪，重复他让张治中对周所谈的要求。周恩来、林彪表示难于接受，提出要回延安与中央商讨，蒋答应周、林回延安[②]。至此历时9个月的国共谈判结束。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林彪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图为离开重庆前的周恩来、林彪及其他人员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第684—68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下），第678—679页。

林彪、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的这次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打破了皖南事变以来国共关系的严峻局面，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围绕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3年以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战场胜利在望，太平洋战场已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在国内，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国民党政治上的独裁和军事上的溃败，使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了同中共的谈判。在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仍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于1944年4月下旬，即决定派林伯渠为代表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5月4日至11日，首先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作了初步的商谈，后至重庆继续谈判。在西安谈判中，林伯渠提出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即要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要循民主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问题为谈判的基础[①]。但国民党反对就实行民主问题进行谈判，主张先谈军事及边区问题。5月17日，双方代表一起飞往重庆继续谈判。林伯渠到重庆以后，中共中央于5月21日电示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关于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其主要内容如下，关于全国政治制度的有三条：一、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承认中共及其他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17条，主要有：关于编军，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并给予给养、军火、医药等接济；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撤销对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停止对敌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称号；停止特务人员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与各抗日根据地的破坏活动；停止在报纸上对中共的造谣；释放各地被捕人员，停止对《新华日报》无理检查，等等。

① 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原文载1944年3月14日《解放日报》第1版。

国民党对林伯渠到重庆谈判事前做了充分准备，研究对策。首先诬蔑中共谈判代表来重庆是“作政治攻势”，“是要作一猛烈的政治宣传”，在于“将中国战场的弱点暴露于世界”，“乃以谈判不成为目的，决不以谈判成功为目的”①。由此折射了国民党对这次谈判采取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的方针。

鉴于国民党在调整国共关系方面缺乏诚意，并率先将国共矛盾公之于众，由此导致中共必须改变过去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态度，于1944年9月15日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婉转而又含蓄地表示要改组国民党独裁政府的态度。由此，国共两党围绕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交锋，国共之间的谈判由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变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民主政府的问题。美国以调解国共关系为名，介入国共谈判。各民主党派也高度关注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进一步公开化和国际化，并且注入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为了促进联合政府主张的实现，林伯渠、董必武同赫尔利在重庆举行了三次会谈。赫尔利对中共代表表示：他已告诉蒋介石，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随后赫尔利飞往延安会晤中共领导人，经与毛泽东等磋商，他同意中共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针，并同中共签订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及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这个协议表明了美国政府希望促成“联合政府”实现和迫使国民党作某些让步的意向。可是，美方的实际目的是想通过谈判让中共交出军队。因此，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当蒋介石表示反对他和中共达成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赫尔利也立即改变了态度。国民党针对五项协议提出三项“反建议”，片面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政府“整编”、“管辖”，然后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对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则明确地加以拒绝，赫尔利也出尔反尔，“劝说”中共接受。为此，周恩来严正拒绝了国民党的“反建议”，返回延安。

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后，赫尔利仍斡旋于国共之间，一方面邀请周恩来

① 《林祖涵来渝事应付之要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二)282，《中国现代政治史史料汇编》第3辑第24册，第32489—32492页。

到重庆谈判，一方面与蒋介石商谈同中共继续谈判的方针。12月28日，周恩来答复赫尔利：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并提出了取消边区封锁、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要求。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共产党人还是不愿放弃继续谈判的努力。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为联合政府问题到重庆，与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会谈。会谈中国民党不仅坚持原提条件，而且还提出：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下，附设一个机构，邀请中共及其他党派参加；由当局委派中共将领在内的中美两国军官负责中共军队改编等附加条件。对此，周恩来表示拒绝，并电告中共中央。28日，毛泽东复电：“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并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①

2月2日，周恩来提出关于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未被国民党接受。接着，周恩来与王世杰又草拟一建议案，提出由国民政府召集一次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等方案。2月3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报告后，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承认一切党派合法，撤销对边区的封锁，承认解放区，组织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等中共参加政府的先决条件。2月5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强调：“如无真正的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会见中说，他不会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赫尔利也表示：“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的先决条件，谈判无法再继续下去。2月15日，周恩来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说明谈判没有结果，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坚持一党独裁，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和反对人民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的缘故。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由此，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最后一次谈判无果而终。②

围绕联合政府的谈判虽然无果而终，但国民党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306页。

②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第310页。

态度，孤立了顽固派自己，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的民主运动的高涨，从而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首先，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条件中充分肯定了大后方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先后提出了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民众团体推选代表召开国是会议，建议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参加的国是预备会议、党派会议等议案，明确地把民盟置于与国共两党同等的地位。其次，在谈判过程中注意联系、联合大后方民主党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他们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在谈判斗争中，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商讨时局，听取他们对国共谈判的意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民主人士，与中共的谈判斗争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联合政府的实现。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斗争目标的明确，使大后方民主运动展现新的面貌。大后方中间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受到教育和鼓舞，使他们看到了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反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坚定信念和实力，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对国民党本质的认识，增强了为民主而奋斗的勇气和与中共合作的愿望。

围绕联合政府问题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既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给予大后方民主运动以很大援助。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善于利用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对国民党独裁政治施以压力和谴责，这些都对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章　争取和团结中间党派，不断壮大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是指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和社会贤达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统称。而中间党派则是在中间势力中形成的政治组织，与各方面有着广泛联系的最具代表性的力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对中间党派采取争取、团结、帮助和合作的方针，对大后方的中间势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成功地改变了与中间党派曾经互不认同的关系，使之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重要伙伴，成为制约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①]，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其成功经验对推进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节　贯彻中共对中间势力的新政策，重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

一、贯彻争取团结中间势力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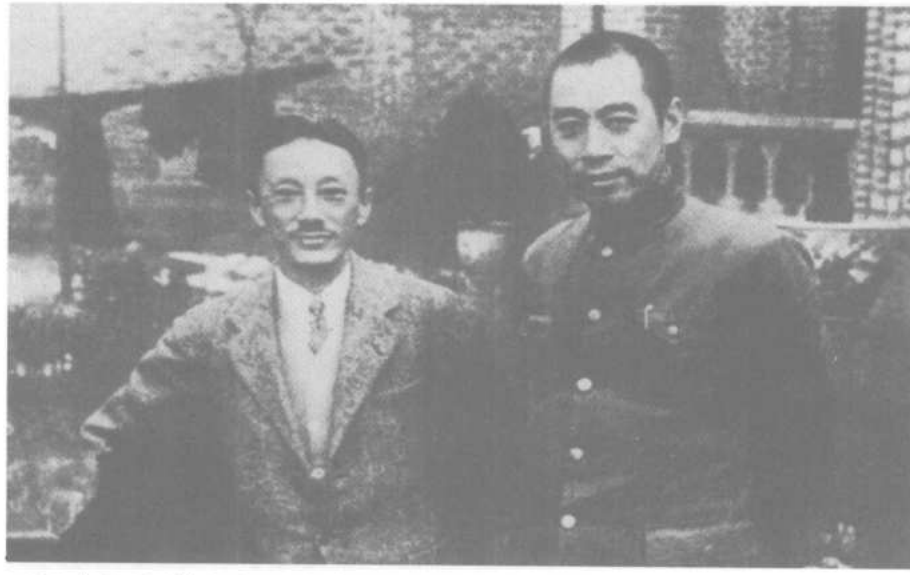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全国武装，对日作战也较为努力，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中间力量的态度是倾向于国民党政府的，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能力和抗战条件，认为各党派应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导致了一

① 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华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0 页。

系列军事失败，大片国土沦陷，使中间力量对其产生不满。

上海失陷后，1937 年 11 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划分为左翼集团、右翼集团和中间集团三种势力，指出“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①。

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代表团派驻武汉，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广泛地结交朋友，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总的来说，武汉时期的统战工作主要侧重于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而对于中间力量的统战工作比较薄弱。



1939 年春，周恩来与爱国将领蒋光鼐在重庆上清寺渔村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美国英国的绥靖政策和日本的诱降，又由于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蒋介石反共和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5—396 页。

日妥协的倾向日益明显，并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在这种形势下，争取中间力量，加强对中间力量的统战工作，成为反击顽固势力，保持团结抗战的极严重的迫切任务。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设立统战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积极开展了对各党派的统战工作。周恩来首先身体力行积极投入对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实践。

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内出现投降派，“党应当更亲密地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党员群众联系……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①。6月10日，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号召“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人员”②。

1939年8月，周恩来出席了4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分析了党派关系的近期变化，指出：“一期抗战各党派趋于团结，二期抗战各党派便趋于分化，国民党便趋向妥协，救国会、第三党更向我们接近，国社党、国家主义派本身也起了分化”。因此，他指出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民族的”，同时还是“民主的”、“社会的”，而“中国的统一战线虽为全国人民客观上所拥护，但真正发起的坚持的尚只有共产党及其同情分子与团体，国民党始终是带被动性的”，为此，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十大策略，其中对中间力量提出了“帮助友党、友军进步，首先要给以适时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并帮助其进步分子的发展”，“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③等策略。

“对各党派关系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分子”，这就是，对接近我们的党派、团体及个别分子，应扶持其向进步发展；对其他党派应施加影响，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以促进其进步或分化；对中间分子或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③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摘录）》，1939年8月4日，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23、24、28—30页。

团体，应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以便争取他们走向进步。周恩来认为，从长远来看，统一战线应该推动社会解放，起码应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无法依靠国民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应该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与他和南方局的工作实践是一致的。可见周恩来已结合抗战现阶段的特点、党的民主革命任务要求，将前一阶段的工作实践作了总结升华，产生了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未来发展的统战工作新思路的萌芽。

1939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①]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中，重申党的争取中间党派的主张，提出"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②]。此后中共中央又发了大量文电、指示、报告，系统阐发了争取中间党派的重要性和具体策略。

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几篇文章中，系统地提出对中间势力的政策。毛泽东把国共两党以外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党派归入中间势力的范畴，并分析道："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毛泽东系统地分析了中间势力的特点，指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毛泽东强调，"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他指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8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13—714 页。

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

7月底到8月上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间党派问题。他认为,中间派是最无组织的,数量又最大。从而提出对他们要采取各个争取的办法。救国会、生活书店等是进步分子的组织,他们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我们不应该使同盟者失败,将中间力量的成败视为自己的成败,与之休戚相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扶持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等争取中间势力的具体方针,得到中央的肯定。毛泽东在发言中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②毛泽东还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三个时期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③。也即中国社会结构是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形。这次会议强调了把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把争取中间力量的统战工作提到如此高的程度,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南方局开展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推动他们的政治进步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8月2日,中共中央在致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电中指出:外交政策问题及内政改革问题上,你们应与各中间党派报纸的某些观点采取统一战线态度,不采取对立态度,以便有力地打击投降派④。

为了健全统战组织,加强统战工作,1940年11月2日,中央统战部决定自中央局至省委或区党委必须设立统战部,其中的党派科专门负责进行对各党各派的统战工作。

1941年5月,毛泽东总结了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6—748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83—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583页。

③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④ 李勇、张仲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

训，再次指出争取中间力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强调："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①。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争取中间势力的原则、方法，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遵循新思路，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汲取了武汉时期"太重视了国共合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的经验教训②，十分注意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工作，与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争取中间党派的工作。

二、加强与中间势力的联系

广交朋友是周恩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曾把"勤交友"作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统一战线的发展，除了依靠中共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外，还需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交往，增进了解，建立感情。周恩来坚决反对画地为牢，把自己限定在一个小圈子里，把自己孤立起来，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争取同盟军，才能完成革命任务。他认为，不仅要与那些同情进步、同情革命的人交朋友，而且还要善于和勇于同已经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或者能争取过来的人交朋友，"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③。他认为交朋友，不仅能使对方通过自己这个媒介，认识革命，认识共产党，而且通过自己这个桥梁，参加统一战线，参加革命，扩大革命队伍，还可以听取不同的意见，保持自身的活力。1940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统战部一定要扩大做好交朋友的工作，"各级统战部的组织需要加强，经费需要增多。对这种交朋友工作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④。南方局在广交朋友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结交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促进了革命工作的开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83 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612 页。

③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23 页。

④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6 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1 页。

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方式，向中间力量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一道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共商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等重大国是问题。1940 年 3 月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后，周恩来随即多次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讲话，强调要切实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交涉的同时，与博古等一起频繁地会见中间党派的负责人，商谈时局问题；广泛地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元老派、黄埔系爱国将领以及地方实力派人士交谈，共商制止顽固派挑动内战的办法。通过这些活动，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争取了中间势力，使之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进一步动员所属党组织，依靠广大党员和党外先进分子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民族资产阶级、宗教界以及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工作，使得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争取中间势力中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发展。

南方局对中间力量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和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尽其所能推动各中间党派的联合：支持中间党派的三党三派建立联合性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资助他们在香港出版机关报——《光明报》；在周恩来的帮助和领导下，经过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的联络筹备，1941 年夏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后来发展成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局还做了大量争取工商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在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黎锦熙、劳君展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 年 5 月发展成为爱国的科学工作者的政治组织——九三学社。

每当民主人士遇到危难时，南方局都及时伸出友谊之手，给予真诚的帮助。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立即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持人廖承志等人，设法将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约 800 人，安全转移到内地，保全了许多社会精英。1942 年 2

月，邹韬奋因国民党的迫害愤然出走后，他所创办的生活书店得到了周恩来的具体帮助，组建了第二线、第三线书店，其中二线书店国讯书店，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存在了8年。当陶行知为筹办育才学校而四处奔波时，当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而身陷囹圄时，当张申府因被取消参政员资格而生活困难时，当章伯钧身患痢疾而危在旦夕时，当左舜生因女儿患急病而束手无策时，当范旭东为筹建建业银行出现困难时……南方局都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南方局对待中间阶级人士的真诚态度赢得了广大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信赖。共产党人与救国会、国民党民主派、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青年党、国社党建立了良好的党派关系，与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章伯钧、陶行知、胡厥文、古耕虞和康心孚兄弟等中间势力代表人士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与川系、滇系、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也有一定程度的密切关系。

南方局在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中，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三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当进步势力尚弱小时，中间势力往往受制于顽固势力；当进步势力斗争顽固势力取得一定的政治、军事成效时，偏左的中间势力会向进步势力靠拢；当进步势力忽视中间势力利益时，中间势力将会被顽固势力所利用；当中间势力利益为顽固势力侵犯时，将会倾向进步势力，成为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举足轻重的力量。就是说，中间势力的政治态度会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会随着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力量的消长的改变而改变——由动摇而趋向坚定的政治态度。这是历史发展和逻辑统一的结论。

第二节 密切与国民党民主派的关系

一、加强与国民党民主派的联系

国民党民主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和革命精神的忠实继承者，是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核心。宋庆龄、何香凝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坚决要求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分

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政治民主，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民主派是一支非常重要必须努力争取的中间力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①，用极大的耐心和力量去团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密切同他们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图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宋庆龄在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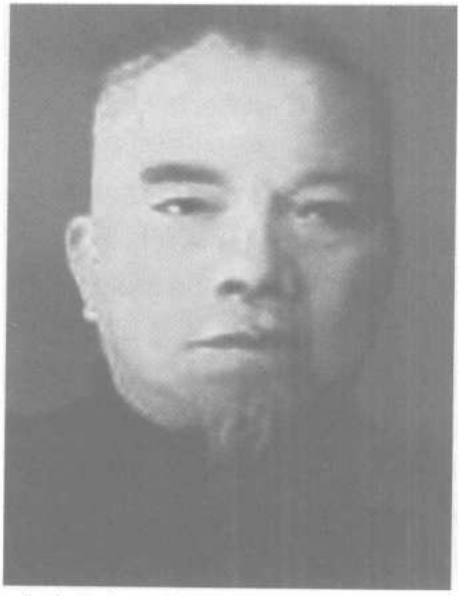
宋庆龄以她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在许多关键时候支持和帮助了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和蔡元培、鲁迅等成立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共产党人廖承志、陈赓等人。抗战爆发后，她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对外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为国内抗战作出特殊的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帮助护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元老安全撤出香港。宋庆龄到重庆后，起先住在孔祥熙家，她的一举一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平时除了和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外，一直深居简出。周恩来对她的处境非常关心，曾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中共中央。保盟迁到重庆后，宋庆龄很快恢复工作。周恩来特地把廖梦醒（廖承志的姐姐，中共党员）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在政治上、物质上大力帮助中共。1943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5周年纪念，宋庆龄欣然命笔题词“发扬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这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诬蔑攻击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

①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77页。

据”，鼓吹法西斯主义。宋庆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沉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严正指出：“应该实现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开国民会议，在绝对民主的原则下，动员全国民众，使他们都有平等的机会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对各党各派，也应给予同等的机会，使他们的党员得尽个人的能力参加工作，争取最后胜利。”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至于物质上对中共的支持，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千方百计运到根据地。抗战初期，“保盟”就曾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建立和扩大好几个国际和平医院，帮助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1939 年，“保盟”派出一个给八路军运送援华物资的大型车队，又为新四军募集购置医疗器械和药品，由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到上海、香港洽购秘密运到根据地。1944 年外国捐赠一台大型 X 光机，她通过史迪威派出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运送到延安，延安终于有了这种大型医疗器械。宋庆龄对我党我军抗战事业的支持，是十分巨大的。①

图为保盟主席宋庆龄和在港的中央委员们合影。右起：廖承志、诺曼·法朗士、沙尔文·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1—272 页。



李济深，广西苍梧人，原名济琛，字任潮。民革主要创始人。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主席

李济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本的退缩妥协。抗战开始后，他积极支持并参加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武汉期间，他就曾写信给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请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抗战派来主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南方局同李济深建立了和衷共济的合作共事的关系。1939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李济深任副主任，主持工作，南方局派张友渔、梅龚彬等中共党员到这个委员会工作，李济深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信任和支持。战地委员会中有一批国民党左派，南方局也通过李济深对他们做工作。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周恩来多次指示在桂林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努力做好对他的工作。起先由李克农与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八办”撤离桂林后，由在桂林负责统战工作的李亚群同李济深联系。在李济深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胡希民、张威、林伦彦、刘为群等，经常向李济深传达中共的政策主张，向南方局反映李济深的意见和要求。此外，还通过救国会和中共党员、上层民主人士如沈钧儒、胡愈之、杨东莼、范长江、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千家驹等，与李济深频繁接触，及时向他反映情况，表达中共的意图。这说明周恩来对李济深的重视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济深在桂林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对中共帮助极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正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李济深亲自帮助“八办”解决华侨赠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物资运输困难。对在桂林以及途经桂林的中共党员，李济深总是保护他们的安全，或者给他们提供方便离开桂林。皖南事变后，李济深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对“八办”人员的撤退和物资转运尽量给予方便，使“八办”的撤退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李济深在桂林时，采取开明政策，允许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开展活动，建立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剧社”，支持一般剧展和西南剧展的开展。1943 年，支持南方局在桂林举办十月革命节纪念会，李济深不仅主持了大会，而且题写了《广西日报》上援苏专栏的标题，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1944 年秋，日军入侵广西后，南方局支持李济深在其家乡开展游击战争。1945 年 6 月，李济深在玉林召集各界开会，宣传“自治、自卫”的主张，批评蒋介石独裁、腐败。中共对李济深的行动给予有力的支持。抗战胜利后，南方局通过狄超白向李济深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李济深同何香凝等组织政治团体，促进实现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李济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与蔡廷锴、李章达、梅龚彬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他坚决反对内战，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决裂，跟着共产党走上光明道路。①

图为李济深在前线作动员

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周恩来同何香凝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一向尊敬她。在广州时，他和廖家就亲如一家人。抗战期间，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何香凝不能到重庆来。周恩来仍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73—278 页。

十分关心她，常常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了解她的情况。何香凝始终支持共产党，两个子女都参加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风雨同舟。皖南事变后，她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非常愤慨，与宋庆龄等通电给予严厉谴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非常担心她的安全，指示香港党组织派人护送她到内地。①

张治中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向委以重任，张却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周恩来私交很深。不仅国共合作的融洽时期如此，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以后，他的态度仍然不变。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为八路军代表，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王凌波任主任。张治中和中共在十年内战中中断的关系又接通了。长沙大火之后，周恩来见到张治中惊恐憔悴，既指出他的责任所在，又婉言劝慰。张治中拟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的名义，发布《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子送周恩来审阅。周恩来批评了国民政府"焦土抗战"的方针，但对文稿字斟句酌，多次修改，特别对起火原因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张治中对此由衷地感激，认为当时各方责难纷纷、落井下石之际，只有周恩来这个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的态度。1939 年 2 月，张治中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周恩来和张治中的公私往来都很多。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和张治中也有不少交往，相互之间以诚相待，共同为巩固国共合作和坚持抗战到底出力。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濒于破裂，张治中忧心忡忡，但他无能为力，只得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厉害，而在他职权范围内，仍尽力而为。抗战后期，国共继续谈判，张治中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奔走于两党之间。②

周恩来对其他国民党上层人物，也都尽可能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工作，通过有关人员和他们联系，使他们了解中共的方针政策。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周恩来通过他的女婿屈武开展工作。他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在国民党内部，还不能算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亲长辈，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上爱护他，帮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问题的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73 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80—282 页。

重要性，对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于右任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听信所谓国军在前线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不打日本鬼子，一味扩充自己等谣言。屈武把国民党对中共的恶意宣传告诉了于右任，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军队在前方后方都"围剿"八路军。于惊奇地问：这是谁告诉你的？屈武说：主要是王炳南告诉我的，有些是恩来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对屈武的介绍深信不疑，认识有所提高。皖南事变发生时，于右任拍着桌子大声说："这种破坏两党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①

为了团结抗战，周恩来心胸宽广，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他说过，在团结群众交朋友中，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即派张冲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判。张冲曾是策划陷害周恩来炮制了所谓"伍豪启事"的主谋者，但后来他主张与中共联合抗日。1937 年到 1941 年的 5 年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和张冲交往频繁，张冲也能做到及时把中共的意见向国民党蒋介石反映，在沟通两党关系中起了积极作用。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冲很气愤曾对人说："这使我没脸见人。"②张冲因病去世，1941 年 11 月 9 日，追悼会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社大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了 3 万元。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联名致送了挽联。周恩来写下了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事后，特务头目徐恩曾感叹道："周恩来真厉害，做宣传工作竟然做到我们家门里来了。"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作为代社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抗日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代表中共和人民表达了对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③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85 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273、285、286 页。

③ 李静、廖心文：《周恩来交友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8—159 页。

图为爱国将军冯玉祥在重庆

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多次专门拜访冯玉祥，并与之坦诚交谈，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使冯玉祥深受启发。冯玉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第二天他在会客厅写下了"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八个大字以示对周恩来的钦佩。此后冯玉祥经常请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给他部下讲课。邓颖超还亲自讲过妇女工作，并提了"精诚团结，贯彻始终"八个字。冯玉祥深表赞同。认为抗日和团结不能分开，这使得冯玉祥在思想感情上更加靠近中国共产党。这八个字不仅反映了周恩来与冯玉祥中间真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表达了周恩来对冯玉祥的殷切期望。[①]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继续和冯玉祥密切往来。冯玉祥是真诚地和中共合作抗战的。1939年他亲拟电稿指责他的旧部鹿钟麟与我军搞磨擦，告诫他要和八路军搞好关系，团结抗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周恩来请冯玉祥帮助营救，冯都尽心尽力，先后营救了张申府、周茂藩等人，冯对国民党顽固派这种行径非常气愤，曾大骂何应钦是法西斯。[②] 1941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出版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发表了中共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各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代表人士的祝词。周恩来撰写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文章。文章写道："焕章先生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能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亦正是先生成功处。先生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肯诤言，这更是

① 李静、廖心文：《周恩来交友录》，第163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278页。

人所难能的。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不负天下之望。"[①]祝词对冯玉祥做了全面、中肯的评价，表达了周恩来对他的真诚祝愿，鼓舞了冯玉祥对此后生活道路正确的选择。冯玉祥在同周恩来的交往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鼓舞和帮助，并与旧的过去划清了界限。冯玉祥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在统一战线政策中取得的重大成功。

二、推动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起来，建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3 年春，中国抗战仍处在艰难阶段，而世界法西斯势力还十分猖獗。蒋介石希望日苏战争爆发，可以乘势消灭中共，与日妥协，维持他的反动政权。但是，日本在东南亚、太平洋的战线拉得很长，根本不敢撕毁日苏协定，对苏宣战，并且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力量也远比过去强大。日军就用主力专打华北，放松南线，而以政治攻势诱蒋介石反共，蒋介石因而乘第三国际解散之际，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只要打退进攻，仍愿谈判解决问题，以维持抗战大局。坚持仍用谈判与斗争、既团结又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同蒋周旋，既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性，又灵活地拉住蒋介石令其找不到退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借口；同时发动中间派民主力量，牵制反动派，收到很好效果。

抗日相持阶段，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政策已有深刻认识，他们支持中共倡导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虽时有表现，却没有团结成为力量，影响甚微。1943 年 2 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联络十多位同志，打破禁忌，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有计划、有目的地定期召开时事座谈会，交换意见，遵循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精神，切磋时政，统一认识。到 1943 年 8 月，座谈会着手筹备组织工作。组织的名称，最初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来定名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示恪守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除保留座谈会这种形式外，还另邀一些进步人士和骨干分子参加，积极进行民联的组建工作。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17—118 页。

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事上大溃败，引发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公开提出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改组军政机构，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中间力量的响应和支持。此时各方面的政治活动也活跃起来，重庆各界人士要求团结抗战，又一次掀起实行民主宪政浪潮。各界代表人士李济深、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均公开参加由中国共产党与知名人士发起的宪政座谈会。开始形成以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为中心的最广泛的民主运动。在此期间，民联的组建工作有很大进展。自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以民联的名义吸收成员，并开展活动。到1945年1月召开全体会员会议，决定进行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的起草工作，同时动员大家积极投入蓬勃开展的民主运动。

民联中央机构，都由比较年富力强，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进步骨干担负领导工作，上层知名领袖人物则做指导员，避免公开暴露，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并参加一些党派、团体联合组织的反内战协会和其他和平民主活动。在领导骨干中，如王昆仑、许宝驹、屈武、曹孟君、于振瀛、甘祠森、吴茂荪等，大都是“小民革”的负责人，这样就能在统战工作中互相沟通配合。在民联的长期孕育过程中，南方局的徐冰、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熊瑾玎等，都同民联和参加座谈会的部分人士常有过往，倾注了中共的关怀和支持，促进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团结。民联投入民主运动，多半通过“小民革”的关系，取得同重庆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联系和配合行动。民联部分同志还同时参加了中共所领导的另一外围政治团体——民主实践社，有的同志还担任理事。民联还同这些团体一起多次组织大型时事报告会。由于在各民主党派、团体间都有互相支持配合的传统，因而民联能在民主运动中生根和发挥作用。这与南方局的推动和对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曾约见民联的王昆仑、柳亚子等负责同志，表示支持民联宗旨，争取战后和平民主和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双十协定》签订后，民联即于1945年10月28日举行代表大会，宣告正式成立。当时重庆上层政治活动极为活跃，民联上层人士也积极参加支持停战谈判和促进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在会外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46年初，并以组织名义参加发起和召开陪都各界庆祝停战

协定签字，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等大会。在庆祝和平大会上，王葆桢任执行主席，通过了以他的名义提出的争取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等均以个人身份以及其他各界代表人士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都讲了话，扩大了民联在民主运动中的影响。

在民联组织建立的同时，另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陆续到达桂林。在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香凝派人同冯玉祥以及滇、桂、川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在反对蒋介石独裁中一致行动。1946 年 4 月 14 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即民促）在广州成立，并发表宣言，公开宣布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独裁专政。

民联和民促成立后，工作重点在国民党内，争取中高级干部，团结民主派，发展反蒋统一战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成为以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节　支持中间力量建立新的政党组织

一、在反击反共高潮中，与中间力量密切合作

中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后期或解放战争初期成立的。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斗争中，中间力量不断分化或重新整合，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政党组织，这些新的政党组织，如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①]、九三学社等，很大程度上是在南方局的引导或协助下成立的，从酝酿、成立到发展都得到了南方局的全力支持，成为反对独裁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力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在加强对各党派进行政治压迫的同时，反共的军事磨擦也在不断发生。1939 年 4 月至 11 月，就接连发生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南方局参政员本着维护团结的大局，对国

①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情况，详见第六章。

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最初也未在国民参政会上予以揭露，以免激化矛盾。

1939 年 1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后，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军事磨擦不断升级，达到了一个高潮。12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在山西，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1940 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山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

中共中央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的同时，力争时局好转。1940 年 4 月，第一届第五次国民参政会刚召开，南方局就向参政会表示了“加强国内的团结”，“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的愿望，愿意诚心诚意来商讨国共纠纷，以便求得圆满的解决。但是，国民党并不理会共产党维护国共团结的诚意，在参政会上竟公然发动反共攻势。会议第一天，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就在军事报告中连篇累牍地攻击八路军、新四军。中共参政员当即驳斥了何应钦的诬蔑，指出何应钦的报告多与事实不符，要求秉公查明办理。国共两党在参政会上的公开对立，引起了各中间党派参政员的极大忧虑和不安，他们纷纷发表谈话，呼吁国共加强团结，停止磨擦。

但是，国民党置中共和各中间党派的呼吁和警告于不顾，一意孤行，1941 年 1 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中共转到与国民党坚决斗争的立场。

各中间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这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倒行逆施也极为愤慨，他们纷纷发表谈话，对中共表示同情和支持。皖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在香港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彭泽民，就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于 1 月 12 日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斥责国民党当局“剿共”“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又为敌人之乘间找隙造成便利机会”，要求蒋介石“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①。柳亚子还拒绝了蒋介石的电邀，并在复电中严词质问：“此次新四军事件，中枢当局，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

①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6 页。

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市民切齿，而当事者无悔过之心，何也？”要求蒋介石“严惩祸首，厚抚遗黎”。柳亚子的正义立场触怒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竟被开除国民党党籍。① 在港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党员联合各界人士400余人，也联名给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制止内战的通电。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国民党制造反共事变是“绝对不可宽恕的罪行”，提出“集中全国意见，共商国是”，“确立民主的领导抗战方针”，“应切实保障抗战人民一切应得的合法的自由”，“正式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重新建立各党派间平等合作的正常关系，并具体的解决党派间的‘纠纷磨擦’”等14项主张。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和职教派黄炎培等在重庆连续集会，“对被难新四军表示同情”，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美洲洪门致公党总监司司徒美堂、阮本万等发表通电指出：皖南事变是“自坏长城，自促亡国”。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告以国际舆论的谴责，晓以利害，痛说苏方关心中国统一团结。②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预料和期望之外，中共反击有理而坚决，国内外反应很强烈，纷纷反对反共、打内战。为了改变被动局面，蒋介石企图利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的机会，诱骗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以掩饰皖南事变在抗战营垒内部造成的最大裂痕，减少各方非难。为了取得政治进攻的彻底胜利，毛泽东等7名参政员将中共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正式提交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同时抄送20多位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等7位参政员公开声明：“在政府未予裁决前，泽东等碍难出席。”③ 各党派对中共这一原则立场表示谅解，并愿意采取一致行动，这使国民党极为恐慌。为了拉拢中间党派支持国民党，蒋介石便利用中间党派成立各党派委员会的心理，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并提出增加委员人数。于是中间党派对蒋的幻想增加，与中共采取一致行动的立场发生动摇。接连

①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第23页。

② 李勇、张仲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事记》，第290页。

③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9页。

几天，各党派负责人到南方局力劝中共再作让步，出席参政会，并表示如蒋介石再失信，愿与中共共进退。周恩来、董必武等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中共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出席条件不具备，决不出席参政会，并反复提醒他们切不要上当，免被各个击破。

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延期一天举行，各党派负责人再次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为了表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的诚意，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团结中间派，中共于3月2日作出让步，由董必武、邓颖超等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将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要求改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表示只有政府全部采纳，并有明确保证，中共参政员才出席会议。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还同时致函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罗隆基、张澜等16位各党派参政员和无党派参政员，阐释了中共的原则立场。但是，国民党仍不接受中共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中共参政员最后拒绝出席第二届第一次参政会。中共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态度赢得了各中间党派的理解和尊重。3月10日，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闭幕。同日，《新华日报》不经国民党当局检查，出版增刊《中共七位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之全部文献》，公布了中共未能出席参政会的真相。

这场斗争中，南方局在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指引下，与各派中间力量团结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使中间力量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间党派的合作关系，不仅导致国共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且对中间党派政治走向的发展、演变、重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支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立

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共活动，成为当时时局的主要危险。

鉴于在第一次大革命与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中共党员加以凶暴摧残的惨重教训，为了尽量减少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损失，避

免牺牲，周恩来从斗争需要出发，提出在重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与党配合工作。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亟须有些党外人士与各方面进行联系，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还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洞察国民党内部的动向。在国民党内，周恩来有很多同事、学生和朋友。而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左派和上层人士中，有些人早在抗战初期即在南京、武汉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到重庆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团结在党的周围。由这些同志联络其他一些同志，成立党的外围组织的条件是成熟的。这样，在国民党内发展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达到孤立、分化和打击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的目的。

1941 年夏，在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正式成立。参加成立会的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屈武、赖亚力等 18 人。王昆仑和许宝驹被推为负责人。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传达并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图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领导人王炳南（左）、屈武（中）、王昆仑（右）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有较严密的组织。它的成员中主要包括中共党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和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它是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它的成员也有参加其他人民团体的，因此它也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之初人数较少，在工作中，其成员逐步发展。它的

不少成员后来成为民革和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重要骨干。他们有时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身份，在一些公开场合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妥协的阴谋。周恩来对它十分关心，每次从延安返回重庆，都要邀请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座谈，传达中共中央的新的方针、政策，并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对他们同意中共的政策及做法密切配合给予高度评价。“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同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等作过一次通宵谈话。王昆仑等向毛泽东反映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情况，并提出对时局看法。毛泽东对‘小民革’的工作极为赞赏。”①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任务主要是在政治运动方面。“小民革不以组织群众运动为职责，而主要是以团结各民主党派积极努力，共同斗争，推动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实行抗战，实行民主为自己的宗旨。”②它积极贯彻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努力促进国内团结，把国民党中愿意进步的人士尽量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反对民主的情况下，它从国民党内部去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工作，这对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及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还向中共提供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情况与动态，特别是努力协助国民党民主派的活动，配合中共的各项工作。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工作。王昆仑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出名的“太子派”（即孙科派）人物，有便利条件对孙科做工作。孙科毕竟是孙中山的儿子，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他和蒋介石素有矛盾，特别是到1943年前后，他对蒋介石的专权极为不满，对国民党的批评也就更为严厉。孙科态度的转变和在抗战后期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活跃，与他周围民主人士的默默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

刘仲容、刘仲华长期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做参议、咨议工作，利用工作关系传达中共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和方针政策，做桂系上层人士

① 彭友今：《在南方局领导下进行统战工作的片段回忆》，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② 侯外庐：《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活动》，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95页。

的工作。赖亚力是冯玉祥的秘书，在冯玉祥身边任秘书工作十多年。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许多活动中，冯玉祥都是积极的热心人。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亲属，受周恩来指示，屈武做于右任的工作，使于右任对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坚持全面抗战和其他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有严正的态度和明确的立场，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也采取积极态度。同东北联系的有阎宝航、高崇民，同西北联系的有杨明轩、杜斌丞、于振瀛，与文化界联系的有侯外庐、阳翰笙，还有联系其他党派的成员。

“小民革”的一些成员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后，以中苏文化协会为公开阵地进行活动。王昆仑以该会常务理事名义主持会务，屈武、刘仲容先后以秘书主任的名义主持日常工作。侯外庐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阳翰笙、曹孟君、谭惕吾、王炳南、阎宝航等人都先后在中苏文化协会中任职，他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工作，广泛联系发起和参加各方面开展的抗日民主活动和各种会议。由于中苏文化协会的会长是孙科，对《中苏文化》的进步宣传，国民党顽固派也无可奈何。因此，《中苏文化》在大后方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在“小民革”的直接影响下还形成了一些进步团体，如民主同志座谈会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左派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民联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同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实行独裁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小民革”还组织领导了一个由一批革命青年和大学生参加的半公开的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主实践社”，在组织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中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成立到1949年宣布结束，前后八九年里，从政治见解到斗争行动上都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并在具体政策和做法上处处密切配合，在坚持团结进步，争取上层人士中一切可以争取的分子，孤立、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及瓦解其反动统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总起来说，小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缩影。他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重要桥梁之一。”[②]

---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165页。

② 侯外庐：《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活动》，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95页。

三、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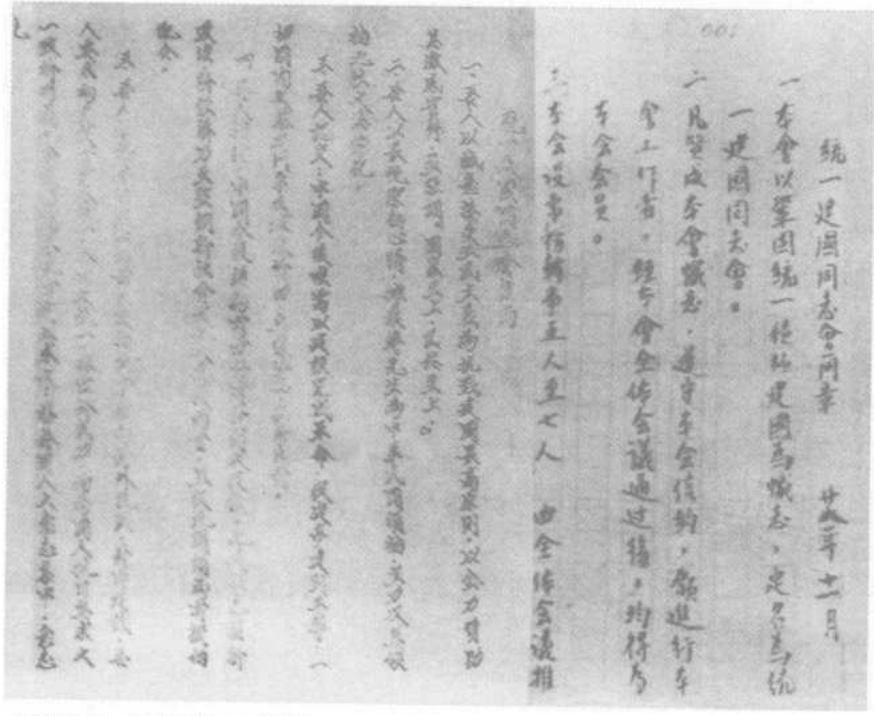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不仅发生了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事件，而且出现了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分裂、反共倒退逆流，不断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磨擦流血事件，制造分裂，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来之不易的举国一致、团结抗战局面受到严重的威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举国团结抗战的旗帜，而这面救国旗帜又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国共合作破裂，持久抗战就将失去它的基础。满怀救国之志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目睹国家民族的不幸，忧心忡忡。他们十分关注国共两党的关系，都想尽力调解国共纷争，免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又都感到各自为战，势单力薄，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也难以在国共两党间发挥调解作用，甚至自身的前途也岌岌可危，因而产生了联合起来的要求。于是中间党派出现了联合起来的趋势，其发端于统一建国同志会。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并随之而来的反共磨擦事件迭起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针锋相对地斗争。通过周恩来、董必武等在参政会内外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处于中间地位的民主党派，忧虑万分，决定采取适当方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性质的政治组织，形成一种“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1939年9月，第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期间，中共参政员与参政会的其他中间力量进一步加强联合。会前董必武与他们多次会商提案；会议期间，中共参政员与其他中间力量共同努力，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及声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等提案。会后兴起的宪政运动加强了各民主党派的联系。特别是在宪政期成会、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的活动中，各民主党派实际上已走上了联合的道路。但作为党派同盟，尚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组织。在董必武的积极帮助下，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分别商讨建立联合组织问题。这个民主党派联合组织，后来

定名为统一建国同志会。这个组织最初是由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救国会的沈钧儒、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以及青年党的李璜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张澜等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两地酝酿发起的。

1939年11月23日，由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等5人领衔发起，约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有关人士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成立大会的主要是“三党三派”的一些领导成员，共30余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的影响下，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它的建立标志着民主党派的初步结合，为随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图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行动的尝试。它的建立对促进宪政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为民主党派的进一步联合积累了经验。但它是一个狭小松散且受制于蒋介石的组织，不能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其成员少，既没有具体的组织原则，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内部意见不统一，未能显示组织的力量。国民参政会本是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唯一的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但由于国民党的倒退和加强对参政会的控制，它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的御用工具。第二届参政会参政员名额比上届增加了40名，而民主党派参政员反而减少了。大量顽固分子加入了参政会，形成了绝对优势，民主党派很难在其中发挥作用。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异常紧张，抗战局势危殆，而国共两党之间任何一个党派单独的力量都是薄弱的，难以起到影响国共两党的作用。基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逆转，中间党派迫切要求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第三者的“政治集团”，以便将各方中间力量汇合起来，“矫正散漫无中心之弊”，向顽固势力抗争，“不畏强梁，挺身而出，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①，“居于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团结。并使于抗战期中于抗战军事结束后，均不至再发生内战，损害国家元气，益陷于不易恢复之境”②。梁漱溟等民主人士决定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民主政团同盟就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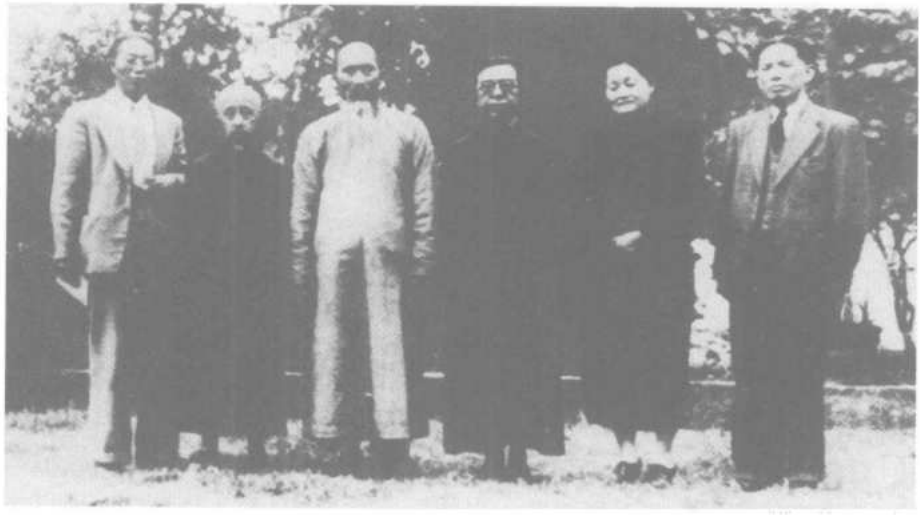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即四川民主人士鲜英（字特生）私邸秘密召开。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确定了中央机构。政纲的主旨是，强调坚持团结抗战，开放民主，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这些政治主张，与当时中共提出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反映了全国人民当时的政

① 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转引自中华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

② 张澜：《中国民主同盟的起源主张与目的》（1945年2月6日），转引自《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治要求。当时组成同盟的有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救国会①、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6个党派及社会贤达。这样,民主政团同盟就成为"三党三派"的政治联盟。在盟外,"三党三派"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包括左翼和右翼)的广泛的政治联盟,成为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就演变为主要是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②。它的成立对发展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有十分重要意义,"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③。因此,民盟从一开始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图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领导人合影。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章伯钧

① 本来救国会的沈钧儒为同盟的倡议人之一,只因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密切,蒋介石特别忌恨,为避免国民党借故刁难,故决定沈钧儒和救国会暂时不参加政团同盟。沈钧儒顾全大局,没有强求,1942年上半年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团同盟。

② 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第125—12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在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黄炎培、梁漱溟、章伯均等多次找周恩来商量，寻求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周恩来“深表赞同”，坚决支持，提醒他们“莫被他们各个击破”[①]。1941年1月15日和3月15日，周恩来两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小党派合组民主政团同盟的情况及同盟的方针。他说：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即指民主政团同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我们现在决定利用此时机，加强统战活动。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②]政团同盟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大力支持其活动。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驻渝参政员吴玉章、邓颖超等，在国民参政会内外，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中，给予他们许多积极支持和帮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同民主党派的领袖们交往频繁，出席他们的集会，热情接待各界朋友们的来访，参加他们的茶会、酒会、聚餐会、联欢会、报告会，向他们讲解国内外形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倾听他们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中间党派的联合和进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同盟的组织。1941年3月28日，梁漱溟专程到重庆曾家岩拜访周恩来。向周恩来通报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经过和已确定的同盟政治纲领，同时谈及他受同盟委托将到香港办报问题，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并答应转告中共驻香港机关予以协助。7月1日和7月24日，周恩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对梁漱溟办报予以支持。6月20日，梁到达香港后，在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的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廖承志曾派《华商报》社长范长江经常与梁联系，给予多方面支持。范长江了解到梁办报经费困难时，说有位南洋华侨

①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8、265页。

② 《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835页。

愿意资助，第二天就送来可购黄金 36.6 两的 5000 元港币。梁漱溟意识到这笔款是中共给的。9 月 18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10 月 10 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已在重庆成立，公布了同盟的纲领和宣言。

《光明报》的问世，特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和宣言的公布，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蒋介石大发雷霆："不能让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外自命仲裁的政团成立。"千方百计封锁民盟成立消息，训令各级报刊对民盟的成立不准报道和评论，发动国民党在港报刊"围剿"《光明报》，策动香港英殖民政府搜查光明报社。

与蒋介石千方百计阻止民盟成立的恶劣态度形成对比，中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关和手段，给民盟以公开的有力的支持和协助。民盟的公开活动，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 10 月 28 日发表社论，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纲领给予高度的评价，说"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称赞它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旗下，更进一步的努力，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以促进抗战胜利之到来，民主政治之真正实施"①。11 月 16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部分民主人士在重庆召开茶话会，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应邀出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表示赞成同盟的主张。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

民主政团同盟建立后，张澜主席经常到设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盟本部领导民盟的活动，特园是民盟领导成员之一鲜英的私人住宅。由于南方局在重庆的曾家岩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包围监视，出入不便，特园便也成为南方局和政团同盟活动的中心场所。在这里，周恩来及南方局其他领导人同民盟以及盟外的民主人士商谈时局，讨论国是，交换意见，同他们讲形势，宣传中共的政策。当时特园成了民主人士的一个俱乐部，被誉为"民主之家"。特园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贯彻执行中国共产

① 《民主运动的生力军》，《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图为民盟成立地——鲜特生公馆(鲜宅),又称"特园",被誉为"民主之家"

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场地和历史见证地。

总的来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出版报纸和公开活动,都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在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它虽然只是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产物,但毕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①,因而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党的诞生,也预示着中国的政治格局将产生新的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还不曾有过在力量和影响上能超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中间性党派,从此,中国的政治天平上增加了一个不能为人忽视的砝码。此后,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民盟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黄炎培为鲜宅题词"民之主也",既是对鲜特生公馆的赞词,更是对民盟成立的颂歌。

①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宣言》,转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四、支持九三学社的成立

九三学社前身为“民主科学座谈会”，诞生于抗日战争后期，它的成立和活动，始终得到南方局的指导和帮助。自1939年以来，在周恩来、潘梓年的支持下，重庆的自然科学界人士，如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近20人组成不公开的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同座谈会成员保持经常的联系，《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由座谈会的一部分成员负责编辑。这个座谈会对宣传科学，团结自然科学工作者起了积极作用。当时，“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经常参加南方局在新华日报社举办的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时事报告会等活动，成为新华日报社和南方局信赖的朋友。延安急需西北地区气象资料时，涂长望提供了气象资料和一大批气象书籍；延安急需农业技术和良种时，金善宝提供了良种和技术资料。

九三學社開成立大會
通過社章綱起發表宣言
提出對當前時局主張
九三學社總起

图为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有关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的报道

1944年下半年，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独裁统治，挽救民族危亡的民主运动高潮中，重庆的科技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些民主人士，许德珩、劳君展、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等人，对时局深感焦虑，在周恩来的倡导下，经常相聚座谈时局。在座谈中大家深感有必要进一步

团结起来，以坚持抗战和争取民主为基本指导思想，组织起来，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其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为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而奋斗。

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这个伟大的日子，“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但是，与会同志希望座谈会发展成为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存在和发展。在酝酿期间，毛泽东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9月12日，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与毛泽东会面。在谈及“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时，毛泽东建议：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又说，九三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①] 毛泽东在渝期间，还会见了梁希、潘菽、金善宝等其他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与他们交流时政，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为九三学社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在毛泽东的鼓舞和推动下，“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成立筹备会并在《新华日报》、《大公报》发表了宣言。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筹备会经过四个多月的积极工作，在重庆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的有褚辅成、许德珩、梁希、税西恒、黄国璋、张雪岩、詹熊来、劳君展、潘菽、黎锦熙、李士豪等50余人。大会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对时局主张》等文件，选举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等8人为监事。九三学社成立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密切合作，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中间力量及其政治代表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协助民主党派的发展，并同它们密切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国民主党派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共两党都必须加以重视的第三方面的政治力量，影响了中国政局的发展，成为各个方面公认的一股政治力量。民主党派的成立和发展，基本上奠定了现存民主党派的组织格局。

---

① 许德珩：《毛泽东与九三学社》，《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4日。

五、支持民主建国会的成立

抗战期间，爱国民族工商界奔走呼号，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反对官僚资本掠夺，但力量单薄，效果甚微。在官僚资本的侵吞和排挤下，大批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抗战胜利后，大家一致认为，民族工业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黄炎培、胡厥文、杨为玉、章乃器等首先在一起酝酿，决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共有134人签名参加，主要有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川康金融资本家以及和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

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和章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主张和平统一，民主建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民主建国会虽然在国共两党中间执行“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但是他们争取民主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党专政，争取人民民主、自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南方局对民主建国会从酝酿到成立给予了全力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敢于同国民党斗争，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他们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这是与周恩来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分不开的。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上层知识分子，经过长期酝酿，抗战胜利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他们和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①]而且其成立时发起人中还有少数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中共党员。

1946年1月8日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应邀参加了民主建国会招待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茶会。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民主建国会对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贵会所提的意见，大体与本党向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相同”，表示对民主建国会“与闻国是”的支持。[②]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团结，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建会高举民主建国的旗帜，积极投入到反独裁、反对官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15页。

②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第177页。

僚资本、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第四节　团结中间党派，共同争取政治民主

一、与中间党派共同推动第一次宪政运动

抗日和民主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界人士所关注的两个问题。不抗日，中国必将沦亡，民主无从谈起；无民主，不能动员和调动各方力量，抗日坚持不下去，必然招致失败。因此，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一项共同任务，就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政治。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就提出了"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的问题[①]。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又明确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②]再次把民主宪政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第三党等各中间党派，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改革国家机构，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然而，蒋介石尽管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接纳其他党派参加抗战，但始终没有放弃"一党专政"的立场，对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提出的民主要求一再推诿、搪塞，甚至在服从国民政府抗日的旗号下，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胡说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的存在影响了中国的统一，提议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1938年7月蒋介石要陈诚通过黄琪翔的介绍，两次找章伯钧、彭泽湘，要求中华民族行动委员会自行取消组织，与国民党合作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被章伯钧拒绝。后来又叫陈公博找彭泽湘，要彭提出解散组织的条件，彭也拒绝了。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章伯钧应国民党之邀到南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5页。

提出一些关于抗日救国的意见，但陈立夫却提出要解散救国会。

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南方局和第三党、救国会等中间力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等起草了对国民党的建议书，接着又面见蒋介石，痛陈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宣传的严重后果，强调党不能取消，只能从联系中找出路。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和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人亦一致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

由于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比较努力，对抗日民主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同中共和各中间党派的关系还比较好，特别是先后设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更使渴望民主的人们感到有了一个争取政治民主的舞台。为此，中共和各中间党派在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发表政见、提出议案、批评时政、针砭时弊的同时，也力图使国民参政会成为“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基础”。然而，事实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将军事进攻重点放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方面，对国民党政府转而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此时，英、美为了应付德、意在欧洲掀起的战争，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缓靖政策，以防止日本与希特勒站在一起来反对英、美。在这种形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抗日转向对内防共，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限制亦日益加强。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这个“底”按照蒋介石在会议期间的解释，就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实际是想以牺牲东北和部分华北地区为代价谋求战事的结束。会议在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的主题下，决定实施“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

中共中央本着团结抗战的恳切愿望，于 1 月 24 日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希望“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信“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①。然而国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14 页。

民党却完全无视中共的正义主张，不仅公开发表了上述反共方针，而且会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反人民文件。在国民党主办或控制的报刊上，反对共产党、压制中间党派的言论也与日俱增。国民党军队还不断挑起反共军事磨擦，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取缔抗日救亡团体，查禁进步书刊，监视爱国民主人士的活动。对于国民党政治上的日益逆转，南方局根据中央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提出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　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提案批评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最主要的缺点是"民权主义未能切实的实施"，前两次参政会也有不少提案，但多未实行。提案指出："各党派之团结，既已承认其存在，但还没有予以法律上之保障，以至摩擦时生莫由解决。"因此，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在讨论审议此案时，国民党参政员群起围攻，对董案滥施刀斧，特别是删去其核心条款"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之保障"，黄炎培居中调停，但"董案结果不能圆满"，董必武愤而退席，以示抗议。黄炎培当时在日记中写道："问题在国民党政府不允许他党活动、在法律上有地位，故对董案'予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绝不放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的努力下，董案才得以通过。与此同时，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也提出了大量加强民主建设的提案。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改革政制、改组政府的要求。这次大会后，国民党变本加厉，采取种种措施，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大搞所谓"政治限共"，囚禁和杀害大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和其他党派成员。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战初期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斗争得来的某些民主权利也被统统取消。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自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55个书店中除6个书店外，均被国民党以经销"反动书刊"、"诋毁政府"之名关闭，邹韬奋寓所也因所谓"有总策动机关之嫌疑"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侦察"。

面对着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南方局同中间党派相呼应，共进退，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

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①] 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开展斗争，也帮助党外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出现的严重危机，分清大是大非。

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错误政策，使得没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的各中间党派深感焦虑和不满，许多人已不再如抗战初期那样"赤诚"拥蒋，事实使他们认识到，不实行民主政治，就不能避免政治的倒退和抗战的失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各中间党派积极响应中共的三大政治口号，纷纷要求建立全国的民主政治。邓初民撰文阐述了抗日、民主、团结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指出三者密不可分，已经形成有机的联系着的三位一体。邹韬奋也发表文章强调，要从民主政治方面着手，达到和衷共济的目的，用宪政来增加和谐，巩固团结，用实现民主政治来制止危机，使国家走上康庄大道，提出抗战时期更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

为了坚持抗战和把战后的中国引向民主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团结、进步和民主的旗帜，与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借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召开之机，进行了一场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掀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大学理学院礼堂开幕。会议讨论议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实行宪政以巩固党派团结。会上，中共参政员与中间党派参政员亲密合作，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强烈要求立即实行宪政。

这次参政会召开前，中共中央曾于8月2日召开会议，决定对这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提出关于保障民权和保证各党派团结等方面提案。南方局领导人也于8月8日和15日，两次同张澜、沈钧儒等中间党派代表和民主人士聚会，讨论参政会的提案问题。9月8日，毛泽东等中共7位参政员发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强调"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是实施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等各项办法，"克服时局危险，战胜日军汪逆的基本保证"。对国民党提出了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保障各抗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3页。

日党派之合法权利等三项要求[①]。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还在会前发表谈话，阐述对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的希望和要求。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认为：这次参政会的主要议题，仍以加强各党各派团结为首要，应尽力消除党派间的磨擦，希望“在这次参政会里能够得到更进步的结果，确定各党各派的法定地位”。救国会参政员陶行知针对国民党反共和排除异己的政策，指出“反共是世界侵略者的口号，是敌寇惯喊的口号，同时是汪逆叛徒正在用的口号。在我们则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应是救中国的最紧要的口号，所以现在应特别强调精诚团结”[②]。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在谈话中也强调：“现在有党有派是事实，现有的党与派不能解散，而要各党各派精诚团结，那就必须大家都站在民族至上的立场”。他指出：国家民族，危急至此，再不容得内部磨擦了。[③] 青年党参政员李璜在谈话中也表达了希望各党派很好商量，解决党派团结问题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政治口号，已不同程度地为各中间党派所接受，并成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的主旋律。

在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由于会前的协商酝酿，中共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相继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六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

中共的提案，突出强调了各抗日党派团结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危机，提出了三项“公平合理之解决”的办法：（一）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二）由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严令禁止借口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非法压迫之行为（如拘捕杀害，开除职业或学籍等）；（三）在各种抗战工作中，各抗日党派之党员，一律有服务之权利，严禁因党派私见，而摒弃国家有用之人才。这一提案得到各党派人士的支持。邹韬奋曾说：“这个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也是我们所赞成的，因为如果真能这样，对于精诚团结也有莫大之裨益。”[④]

①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303—304页。
② 《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第2版。
③ 《新华日报》1939年8月26日第2版。
④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

中间党派的五个提案从“政治改革”、“对付敌伪”、“巩固团结避免磨擦”、“应付非常局面”等方面，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提出实施宪政的三项办法。

民主宪政的提案首先在参政会的审查委员会中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各抗日党派的合法保障和“结束党治”问题。国民党参政员认为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不必要，更坚持反对把“结束党治”写进决议案。中共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则一致认为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极其必要，坚决主张把“结束党治”写进决议案。会上争论异常激烈，“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①。邹韬奋对国民党压制迫害“异党”和热血青年的暴行，“悲痛已极”。他严厉质问国民党：“我们许多党派领袖在这里开会，被允许开口共产党，闭口青年党，似乎是允许党派公开存在似的，但同时何以又有许多青年仅仅因党派嫌疑，甚至仅仅因被人陷害，随便被戴上一顶不相干的帽子，就身陷囹圄，呼吁无门。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承认有党派就老实承认有党派，要消灭一切党派就明说要消灭一切党派，否则尽这样扭扭捏捏，真是误尽苍生！”②陶行知也举出大量事实，说明邹韬奋的呼吁是正确的。国社党老将徐傅霖在会上也挺身而出，大呼“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国民党参政员理屈词穷，便倚仗人多势众，主张“付表决”。青年党李璜“跳脚突立”反对表决，大喊：“‘表决’是你们的事，毫不相干，敝党要找贵党领袖说话！”③于是“表决”告吹。

经南方局及与会各抗日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通过《召集国民大会从速制定宪法》。其中提出的治本办法为：（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办法为：（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因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以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④ 这个决议案尽管同各党派的呼吁和

① 邹韬奋：《经历》，第222—223页。
② 邹韬奋：《经历》，第222—223页。
③ 邹韬奋：《经历》，第222—223页。
④ 香港《大公报》，1939年9月19日第4版。

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有搪塞敷衍之辞，特别是删掉了各党派原提案中关于要结束党治的要害内容，但它毕竟承认要实行宪政，并决定组织“宪政期成会”。因此，它是中共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团结合作共同努力争取到的一个胜利。然而在当时，各中间党派热衷于宪政的实施，这既反映了他们奢望国民党能放弃一党独裁、实施民主政治，对国民党蒋介石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向往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对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还存有天真、幼稚的想法。但是，实施宪政毕竟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对全民族团结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终归是有利的。因此，对参政会通过的关于实行宪政的决议，中共是拥护和支持的，并在会后积极主动地参加和领导了民主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后，南方局和各中间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董必武、张君劢、张澜、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左舜生、章伯钧等25人依据国民参政会决议，由蒋介石指定组成宪政期成会。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许诺在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中共深知依靠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的决议，绝不可能取得民主政治，必须动员全国民众来推动民主宪政运动。《新华日报》立即于19日发表了题为《坚持团结抗战力求进步》的社论。接着又在21日发表题为《建立宪政规模》的社论，指出这次参政会对于抗战建国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实行宪政的决议。“宪政的实质，不在于条文，而在乎事实。我们拥护这一决议，但更希望政府能执行这一决议。”22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召集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的社论，指出国民大会“原当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全国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提出实行宪政的四个先决条件。

1939年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指示》（即关于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和《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藉以克服目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指示各地党组织，努力推动一些赞成宪政的政客军人、公正绅士、名流学者、左倾分子等发起成立国民宪政促进会。这种具有广泛统战基础的群众团体，应该发表宣言，出版刊物、

小册子，组织座谈会、研究会等。中共同志应积极参加其中的活动。指示提出了中共对宪政运动的立场和四项具体主张。鉴于国民党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全部接受上述主张，因此，指示提出“在不放弃对于根本主张的宣传条件之下，承认具体事实进行必要的对抗战有利的临时折衷办法”①。指示表明了中共对民主政治、宪政运动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尽管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的决议与中共的根本主张相距甚远，各中间党派对民主宪政的要求与中共的主张也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是中共并不排斥各中间党派关于宪政运动主张中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合理成分，而且还赞同、支持这些合理的进步的要求，以迫使国民党采取比较进步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积极引导并耐心等待各中间党派的有识之士实现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两次指示的精神，积极领导和推动国民宪政运动的更广泛展开。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通过宪政决议案后，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极为振奋，认为这是我国政治民主运动之一新阶段，给国家前途开拓了无限的光明。10 月 1 日，南方局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及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等应邀参加中间党派及无党派参政员张澜、褚辅成、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 13 人在重庆发起的宪政座谈会。10 月 18 日，中共参政员秦邦宪和褚辅成、黄炎培、沈钧儒等参政员 19 人，在重庆召集第二次宪政问题座谈会，从这次会议起，秦邦宪、董必武等中共参政员成为该座谈会的召集人。他们和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起参加和领导了宪政座谈会。宪政座谈会从 1939 年 10 月至 1940 年 3 月的 5 个月中，在重庆连续召开了 8 次范围极广、影响很大的政治集会，集中讨论了宪政运动与民众运动的关系、实施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实施宪政的条件、宪政与宪法的关系等问题。通过座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实现宪政的目标不能单依赖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努力，而应该努力形成社会的宪政运动。认为抗日与宪政不可分割，抗战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有胜利的把握。在各座谈会中，各界人士对国民党 1936 年颁布的“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作重大修改。提出为了切

①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327 页。

实保障人民有从事宪政运动的合法权利，应给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为促进宪政运动的发展，1939年11月19日举行的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以使宪政运动成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运动。董必武、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25人为宪政促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委。此后，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张友渔等人经常到各处作宪政问题的报告，邹韬奋并将报刊上刊登的有关宪政问题的谈话、讨论大纲，编成《宪政运动论文选集》和《宪政运动参考资料》第一、二集，向全国发行。沈钧儒、沙千里、张申府、张友渔、钱俊瑞等7人还合写了《五五宪草》一书，对国民党抗战前起草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重庆宪政座谈会和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宪政运动的开展。如桂系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是反蒋的"智囊团"，也参与"反对蒋介石'五五宪草'一事"，"组织了一个'宪政促进会'，催促蒋介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实行民主宪政"。桂系的顽固分子周绍、黄同仇、张一气等虽竭力反对，"力争否决"，可是研究会在"左倾分子"胡愈之、陈此生、张志让、张铁生的主持下，他们的反对"无效"。①

中共中央不仅十分重视大后方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而且积极参与，力求引导宪政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成立各界宪政促进会，发表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为了破除一些中间人士对国民党许诺实行宪政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把宪政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演。他强调："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② 毛泽东的这篇演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揭露了国民党玩弄假宪政的欺骗手法，竖起了新民主主

① 王福琨主编：《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6—737页。

义宪政的旗帜，促进了中间党派的觉醒，为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宪政运动在全国的不断高涨，严重冲击着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本来对实施宪政就没有什么诚意的国民党深为恐惧。1940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布《关于目前宪政运动诸问题》的指示，制定了反宪政运动的方针：规定宪政实施后，继续进行训政未完成的工作；原国大选举法组织法一律有效，“五五宪草”是合法的；关于宪政的集会和团体都要由国民党党部和政府召集和组织。为了限制、封锁关于宪政运动的消息，1940 年 4 月 18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蛮横无理地压制取缔民主宪政运动。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诬蔑、诋毁民主宪政运动，同时还指使特务破坏宪政座谈会的会场，加强了对宪政运动的控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公然宣称：“宪政时期的党治，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叶楚伧露骨地说：“研究可以，最好由少数学者在房间里研究研究，不要发表什么文章，来什么运动！”②可见，国民党当局所许诺的“实施宪政”完全是敷衍搪塞之辞，行的却是另一套。

1940 年 4 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围绕中间党派提出的“宪草修正案”，在野各党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辩论未果，蒋介石就连忙指示双方将建议整理出来，上交政府处理，结果便杳无音信。这使热心宪政运动的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好像冷水浇背，不胜寒心”③。而作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蒋介石本人，在其所作的长篇演讲中，则不同意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其后，1940 年 9 月，国民政府当局又以交通不便为由，宣布曾经许诺的应于 1940 年 11 月 12 日举行的国民大会延期，召集日期另行决定。至此，国民宪政运动的团体更加遭受迫害和限制，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即暂告一段落。

长达一年之久的民主宪政运动，虽因国民党的压制而未得到应有的民主宪政的结果，但它顺应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团结抗战的要求，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主张，虽然与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宪

① 潘公展：《宪法民主与三民主义》，《时代精神》第 1 卷第 5 期。
② 邹韬奋：《经历》，第 247 页。
③ 《新华时事》1940 年 9 月 26 日。

政主张有程度不同的差异，甚至有原则的区别，但中国共产党和他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以“临时折衷办法”，做出适当的让步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而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运动中不仅对国民党假民主，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且受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启迪和教育。这一切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各中间党派由分散活动走向了联合斗争。

二、团结各党派，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3 年 9 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决议案》，许诺“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①。9 月 18 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民主政团同盟写了《中国需要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抨击和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一些主要媒体，如《时事新报》、《大公报》、《新民报》等，也呼吁实行宪政。9 月 25 日，蒋介石宣布将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第二天，大会通过了《设立宪政实施筹备会和经济建设期成会两机构案》，宪政运动就合法地提上日程。11 月 12 日，宪政实施协进会正式成立，第二次宪政运动在大后方率先开展起来。

“开端于中间党派”的这次宪政运动②，最初是民主政团同盟发起的，因此，对于推动宪政运动尤为积极。推动这次宪政运动的方法，主要采取集会与座谈的形式。民主政团同盟和各党派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宪政宣传活动。在重庆最早举行座谈会的是由张君劢、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等 14 人发起的“宪政座谈会”。在重庆最活跃的是《宪政》月刊社，该刊 1944 年元旦创刊，发行人是黄炎培，主编张志让，都是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宪政》月刊将推动宪政运动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该社每月举办一次宪政座谈会，经常参加的人有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等，起初有十几人，后来孙科、邵力子、于右任、王世杰、冯玉祥等国民党高层人物也常到会。对于一些座谈会上将

①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8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27 页。

要讨论的问题，主编张志让事先都与周恩来联系、磋商。董必武也经常参加座谈会，宣传中共的宪政主张，介绍解放区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情况，加深了中间力量对中共和解放区的了解。

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赞成宪政，立法院院长孙科是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28期学员中作演讲，即以“宪政要义”为题，指出实施宪政就是实现民权主义。“如果宪政不能推行，则民权主义便无从实现，三民主义也无从实现，而所谓为政治建设也等于一句空话。”[①]1944年元旦，他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认识宪政与研究宪政》，对国民党内训政未完成就不能实施宪政的错误观点进行不客气的批评。1944年5月，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还创办了《民主世界》杂志，宣传宪政。

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热烈地开展起来，有些座谈会常常变成一两千人的群众集会，学术、文化、法律、银行、实业等各界人士纷纷介入，其人数、影响比第一次宪政运动大大地扩大了。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很快认识到“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因此“中央决定中共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②]。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提出保障人民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应作为实行宪政最重要的先决条件[③]。

早在1943年11月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基于希望中共牵制日军兵力以及战后与苏联争夺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迫切需要缓和国共关系来稳定中国政局，因此建议蒋介石，国共两党在战争时期建立一个联合政府。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再次向蒋介石传达了罗斯福的上述建议。8月下旬，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将美国政府有要求中国政府组织联合政府的设想和建议传达给了中共领导人，这使中共敏锐地意识到，可

① 孙科：《宪政要义》，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5—8页。转引自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67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572页。

以运用美国的影响，敦促国民党改组政府。而此时，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次宪政运动正趋于高涨，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新的政治主张。

9月4日，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和国共谈判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发出《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共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方案要求国民党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施反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立即与中间党派领导人进行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获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鉴于中共建议的核心是改变国民党政权结构，屡遭挫折的中间党派深知事关重大，故格外小心翼翼。因为根据以往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任何轻易地表态都可以给自身的生存发展埋下不利的种子，这便决定了他们对中共建议不得不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①9月14日，林伯渠等在给延安的报告中说：各党派均认为林伯渠以党的名义在参政会上提出这一要求不好，不仅他们不便表态，而且会引起极大的争论。他们建议，仍用林伯渠个人的名义在报告中顺便提出，目的在于告诉全国人民中共今后争取的目标何在②。林伯渠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1944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共发表《关于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主要报告了自5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真相，在报告结束前郑重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③。9月17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林伯渠的这个报告，重庆各大报纸也全文登载。

对于召集各党派会议和建立联合政府，林伯渠只是在结束报告前谈

①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第296页。

②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445页。

③ 林伯渠：《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第2版。

到挽救危局、准备反攻采取的急就办法中，作为原则提出来。尚未涉及实施这一方案的具体步骤。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讲，说明了建立联合政府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具体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六大步骤，使大后方的中间党派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林伯渠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演讲，赋予大后方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以崭新的内容，从此中国政治进入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加明确地反映民主运动的政治民主要求，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以后，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是具体鲜明的政治民主要求，它很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界纷纷集会，热烈支持和响应中共的主张。

9月24日，在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礼堂隆重举行群众性集会，其中有冯玉祥、覃振、邵力子、王昆仑、屈武等国民党民主人士，也有张澜、左舜生、黄炎培、董必武、张申府等各党各派的负责人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共500余人。民盟主席张澜慷慨陈词，认为"非实行民主，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①]。冯玉祥以国民党老党员的资格疾呼：大后方其他地区，如成都、昆明等人民纷纷集会，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7日，在成都的四川、华西、金陵、燕京、齐鲁等5所大学12个学生会联合发起"国是座谈会"。[②]

到会的有2000余人，张澜在演讲中大声说："中国危险到了这种地步，是政治不民主所造成的，为抗战救亡计，实行民主才能全国团结，才能人才集中，政治才能革新，扫除一党专制腐化的政治才能够救国家的危局。"最后，他强调："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③]

10月，昆明地区的民主热潮也发展起来。10日，民盟云南支部、西南

① 《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新华日报》1944年9月25日第2版。

② 《黄炎培日记摘录》，1944年9月24日，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五辑增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

③ 张澜：《在成都华西坝五大学12学生会主持的国是座谈会上的演讲》，转引自《张澜文集》，第205—206页。

联合大学、云南大学和文化界等联合发起“双十节”纪念大会，罗隆基、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吴晗等5人发表了演讲，一致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国民党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纪念大会通过了《宣言》，这“是大后方各界拥护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中言词最坦率、态度最鲜明、对时局批评最尖锐的历史性文献，可以说是代表大后方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主要意见”①。《宣言》指出：“外则强寇入侵……内政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三十三年前祖先苦心缔造的民主国家，到今天，国既不成国家，民更不是主人。”《宣言》直接指出：“国家所以造成今日局面……而专权在位十余年的国民党尤当引咎自责。”对于目前的时局，《宣言》认为唯有进行彻底改革，“首先应由专权在位的国民党立即宣布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八年抗战，牺牲了数千万人民的生命，数万万人民的财产，本应是保全民族生命建立民主政治的代价，而不是为一党一人把持权利的机会。”因此，“今日形势既有结束党治，还政于民的需要，而我们的国民亦有要求立即实行宪政，实现民主的权利”。②

12月25日，云南各界民众在云南大学召开盛大的护国战争纪念会，闻一多在演讲中疾呼，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大会通过宣言再次对时局提出了结束训政，召集人民代表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由于有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为基础，有南方局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联合推动，还有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暗中支持，所以云南省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格外受国人瞩目。

国民党为了抵制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在对全国的元旦广播中进行欺骗宣传，声称一俟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最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公开拒绝召开党派会议，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并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态度，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的强烈不满，他们以重庆、昆明、成都为中心，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如1月15日民盟发表《对蒋介石

①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第303页。

② 《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1944年10月10日）原稿，中国革命博物馆存。

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2 月 8 日重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3 月 1 日昆明文化界发表《关于挽救当前时局的主张》等,一致反对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共召开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再一次明确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 月 5 日,国民党召开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拒绝中共的主张,坚持在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立场。国共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

1945 年 7 月初,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褚辅成、傅斯年等 6 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为第三方的代表飞赴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两点协议:一是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是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蒋介石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开幕词中,将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批评和建议诬蔑为肆意攻击,仍宣布由国民党负责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成见,无条件服从国民党。这引起民主党派的极大愤慨。黄炎培等参政员立即宣布不参加关于国民大会的讨论。7 月 28 日民盟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重申民盟要求举行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

这场发端于中间党派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在中共和民盟的推动下,演变成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成为战后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先声。在这场运动中,中共和各中间党派积极合作,关系更加密切,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孤立,从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局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方向发展,奠定了战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

第四章　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其抗战进步

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间势力的重要一员，在一定条件下，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对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团结广大中间势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重要内容。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全民族力量，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斗争的重要一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从军阀混战年代就产生了矛盾。虽然地方实力派与中共也有着深刻的矛盾，但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企图灭亡整个中国，而蒋介石却继续推行消灭异己政策，随时随地直接威胁着地方实力派生存的情况下，南方局采取正确的政策，通过对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仅团结他们参加抗战和坚持抗战，而且在国共磨擦中，使他们保持中立，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

第一节　对地方实力派的新认识和新政策

一、重新认识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是拥有军队的地方军阀，包括占据了一定地盘的实力派和没有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就其领导成分看，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的领导核心，两者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土地革命战争中，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从根本上危及了地方实力派的统治基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又不同程度地威胁到根据地周围地方军阀的生存。所以，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绝大多数地方实力派不同程

度地参加过“清共”、“围剿”以及对长征中红军的围追堵截等反共活动。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这种尖锐冲突的行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关系中的主要方面。

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由于存在着多方面的利害关系，因而他们之间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可能绝对地凝固于某一种状况，只能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随着双方各自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蒋、阎、冯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中央政权中的统治地位已基本稳固，但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能直接统治的地区只限于中国东部的若干省份，其余地区，除了红军的革命根据地外，都为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所占据。1930 年 3 月至 9 月，在蒋、桂、冯、阎的四派军阀大战中，5 月间桂、冯、阎反蒋联军取得节节胜利，并于 8 月在北平成立了反蒋派的国民政府，及至 9 月，形势突然发生逆转，西北军内部分化瓦解，9 月 18 日，张学良东北军通电拥蒋，并进兵关内，占领平、津，阎、冯军腹背受敌。10 月反蒋联军终于失败。军阀混战的年代，各派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时而化敌为友，时而化友为敌。蒋介石在击败了问鼎中原的桂系、晋系、西北系等诸多对手后，力图削平群雄，一举实现蒋家的一统天下。蒋介石的“统一”，不仅要消灭敌对阶级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要消灭属同一阶级的地方实力派的割据。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实力不断膨胀，对地方实力派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单独的、分散的地方实力派已无力与蒋介石抗衡。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吞并，地方实力派迫切需要寻找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有的地方实力派已认识到其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红军的存在。虽然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在红军不直接或较少危及地方实力派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地方实力派对“剿共”采取消极的甚至“中立”的立场。这种变化，在中共与地方实力派早期关系的发展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共同趋向，实质上是地方实力派有对红军依存关系的需要。

日本侵入中国以后，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也改变了国民党内的关系。国民党地方军阀，在全民族抗战的总形势下，放弃了武装反蒋的斗争，但同蒋介石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利害冲突。他们依然拥有地盘和军队，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亦存在着深刻矛盾。在“剿共”战争中逐渐认识到蒋介石不仅要消灭革命力量，同时也要削弱他们的势力，从而日趋不

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抗战爆发后，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出于抗日和与蒋抗衡的需要，有联合中共的需求和行动。当时西南各省，除贵州外，四川、云南、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和辖区，蒋介石对他们采取既拉拢又处心积虑地进行吞并的策略。因而，他们对蒋介石中央势力乘抗战之机深入西南，推行消除异己的政策，都存有戒心，在政治上需要得到中共的援助，并或明或暗地支持和帮助在其辖区内进行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进步活动，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样，地方实力派便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有着重要作用。反蒋与抗日爱国成了维系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合作的两条强有力的纽带。地方实力派与中共不仅在反蒋斗争方面有利益的交叉，而且在民族利益方面也有共同立场，这就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内容，决定了地方实力派产生了主观上既反共客观上又联共的二重性。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共把自己统战范围加以扩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变对地方实力派的斗争政策，把地方实力派从民主革命的对象变为统战对象，逐渐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化敌为友”的倾向，确定了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地方实力派存在反共联共的两面性决定了南方局必须对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策略。而且这种联合，除了联合抗日以外，还可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一定范围内共同进行民主运动，争取他们在反国民党顽固派军事斗争中保持中立。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仍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统治集团排除在争取对象之外，所执行的是“反蒋抗日”的方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周恩来等对地方实力派存在反蒋联蒋两面性的认识，中共中央对“反蒋抗日”政策有了新的认识。西安事变前，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说：蒋介石虽然反共，但也有抗日的可能。如果中共坚持“反蒋抗日”，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恐怕很难实行，不如将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因为蒋介石是国民政府首脑，全国影响很大，国民党军队与不少地方力量都掌握在他手里。所以，张学良认为中共提出“反蒋抗日”口号欠妥。这是 1936 年 3 月 3 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谈判的情况。[①] 中共中央慎重地

①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0 页。

研究了张学良关于“逼蒋抗日”的主张后，从1936年4月底开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电》中已把国民党同全国其他党派和团体并列相提，并不再称蒋介石为“汉奸卖国贼”。不久，两广事变爆发，事变在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中共及全国其他党派和团体的斡旋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并迫使蒋介石在解决事变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不得不对日提出了强硬政策。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争取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实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认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实施“逼蒋抗日”方针的推动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且“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①。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加紧展开了争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锡山，川系刘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宁夏马鸿逵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这些名单“均经过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克农具体安排”②。

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重新认识地方实力派，对地方实力派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为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对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调整对西南实力派的统战策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便成为南方局在西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成败。

西南地方实力派属于中间势力的范畴，大都拥有一定的地盘和一支有相当实力的武装力量。如龙云部长期割据云南；桂系据有广西；刘文辉部有10万余人，拥有川南全部和川西、川东、川北一部分共70余县；邓锡侯部6万余人，盘踞川西20余县。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顽固派

①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45页。

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的形势下，如果中共能够把这些地方实力派争取过来，就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得到一支地方武装力量的支持和保护，就可以放手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使抗战获得巩固的大后方并长久坚持下去。反之，如果任其跟着国民党走，中共就会受到两面夹击，西南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就会受到限制，抗日大后方也就无法得到巩固，抗日战争也就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因此，南方局成立后，高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一方面积极团结聚集在重庆地区的各派政治力量，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开展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第一，抓住时机，促其转变。西南地方实力派从阶段属性上虽然与国民党顽固派同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反对民主、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区别，但他们都有浓厚的地域观念，对一贯剪除异己、吞并地方的蒋介石心怀戒心、貌合神离，“大多数对蒋是离心的，因为蒋介石要搞垮他们”①。为排斥国民党中央势力，维持其统治地位，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支持和帮助其辖区内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活动，并在政治上强烈要求得到中共的援助。因此，周恩来认为，“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中间力量的作用”②。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③。有的地方实力派已认识到其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中共的存在。虽然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双方之间的敌对行动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在中共不直接或较少危及地方实力派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例如红军长征路过其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区及他们之间的交界地区，地方实力派就不愿意在与红军作战中牺牲自己的利益，因而对“剿共”采取消极立场。地方实力派认识到，客观上为了生存必须反蒋，为了反蒋必须联共，反蒋斗争的共同需要是推动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的动因之一。同时，蒋介石集团溃退西南后，蒋介石为推行反共政策，加强集权统治，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渗透、排挤和掠夺，南方局抓住时机，及时转告他们，只要坚持反蒋抗战，中共就一定支援，从而增

① 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概况》，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第18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第210页。

强了他们坚持抗战和反蒋的信心和勇气，始终坚持与中共合作抗日。四川的刘文辉说：我的亲共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因为，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特别在蒋的势力已经深入四川的时候，“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①。在南方局适时的鼓励下，地方实力派对中共的态度除了比较普遍的“养敌自重”外，逐渐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化敌为友”的倾向。

第二，以兼顾其切身利益，不瓦解对方为原则。在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中共吸取以往的经验，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与方法，既达到了抗日的目的，又不侵犯和适当照顾了地方实力派的切身利益。就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领导的红军之间的关系来说，不仅前者对后者存在着既敌对又依存的情况，后者对前者亦然。亲手创建工农红军和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在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历史性的问题中，曾把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作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第一个条件②。正是由于白色政权之间的激烈冲突和频繁战争，才给力量相对弱小的红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南方局在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以兼顾其切身利益，不瓦解对方为原则，不仅给西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共化敌为友提供了条件，而且也是中共保存自身力量的一种手段，达到“双赢”。周恩来对桂系白崇禧做出不挖友军墙脚的承诺。当蒋介石加紧了控制云南的阴谋活动时，南方局通过云南省工委向龙云提出了中共关于抗日制蒋的十点建议。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撰写著名的《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总结了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经验，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斗争艺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统战政策和策略，争取和团结了国民

① 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党各个地方实力派，使地方实力派成为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区别对待地方实力派与顽固派，缓解矛盾。中共对国民党各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不同于顽固派的统战措施。国民党顽固派既竭力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也有意识地借抗日和国共磨擦来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实力。武汉、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将其中央军大部撤至大西南，却命原东北军和西北军旧部，以及离开本土抗日的川军、滇军和桂军等地方实力派军队在敌后一方面牵制日军，另一方面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地盘，制造磨擦，以使之两败俱伤。地方实力派派系复杂，其"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①，他们虽然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有矛盾，但在阶级利益上又有一致性。在国民党顽固派威逼利诱、阶级矛盾激化等种种因素的推动下，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磨擦不断发生，这些磨擦绝大部分都是受国民党顽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实力派军队执行的。例如：在顽固派的唆使下，1939年6月，川军杨森部制造了平江惨案；1939年9月，桂军172师纠合鄂东地方顽军程汝怀部制造了鄂东惨案；1939年12月，晋军挑起晋西事变；同年11月，石友三、孙良诚等西北军旧部配合阎锡山、朱怀冰等部围攻太行山区八路军等。这些磨擦事件发生后，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向蒋介石及有关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于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同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共同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应采取的对策。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而国共之间的磨擦主要表现为：顽固派利用非嫡系友军来和我在敌后磨擦，使之互相对立，互相削弱。毛泽东及时分析了客观形势，指出中日矛盾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仍然是个两面性的阶级，它并不想同人民最后破裂。我们一方面用"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两面政策对付他们，一方面又要坚持将买办的大资产阶级顽固派和没有或较少有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中，明确地把地方实力派划入争取对象范围内，只有争取了地方实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页。

派，才能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而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目的是为了将其争取过来。因此，我们的对策是，加紧进行争取友军（非中央嫡系友军）的工作，应采取各种方法在友军上下层中建立广泛的同情关系，推动其进步，来抵抗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些非嫡系军队在敌后与我磨擦的阴谋。对于地方实力派的怀疑和动摇，中共采取解释、批评和交朋友的政策。把他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同等看待，即使参加了某次反共活动的地方实力派，也把他们同顽固势力区别开来，同他们的联合与斗争都不同于对待国民党顽固派。这里有两个明显的区别：其一，联合的目的和范围不一样。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国民党顽固派的目的是共同抗日，共同抗日一结束，这种联合即行结束。而对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除了联合抗日以外，还可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一定范围内共同进行民主运动，争取他们在反国民党顽固派军事斗争中保持中立。其二，斗争的方法与手段也有很大区别。对待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目标是使之陷于孤立，而对地方实力派统战目的是为达到争取，因而手段的运用大不一样。军事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地方实力派也曾有过冲突，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实力派参加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如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阎锡山旧军的反攻，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在皖东对李宗仁系的反击等。这些局部的军事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击相比，我方更注重自卫原则和休战原则以及斗争有节的原则，使斗争更加具有防御性和暂时性。

1940年5月，周恩来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方针。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谈判中，他发觉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险已越来越严重，为此，7月24日，他又飞回延安汇报工作，研究对策。8月12日，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再次认为，在国内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二百万友军（指地方实力派军队——笔者注）……以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仍成为推动时局的中心一环。据此，南方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先后派李克农、李亚群等认真做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并先后在龙云、刘文辉、潘文华处也设立了同延安联系的秘密电台。这些争取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除桂系和部分川军卷入皖南事变，其他地方实力派不仅保持了中立的立场，甚至对国民党顽固派

给予了严厉的鞭挞，如冯玉祥、张冲等国民党民主派表示大为不满。从此，西南地方实力派对国民党顽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认为新四军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更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拒蒋的道路。正是南方局对国共磨擦有深刻的认识，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项策略方针，维系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面对西南地方实力派有两面性的特征，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采取了重点争取、积极扶持、团结合作的方针。如1941年，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又亲自会晤刘文辉，向刘分析抗战形势。通过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刘文辉不仅与中共积极配合，而且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南方局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出由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此外，南方局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节　团结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

一、推动民主人士，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

民主人士是中间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中有些是国民党元老派，有些是国民党中的上层人士、高级将

领。他们联系广泛，在国民党内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南方局与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民主人士去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的首脑人物。他与西南实力派的关系密切。中共十分重视做好李济深的统战工作。抗战开始后不久，在武汉的周恩来、叶剑英与在武汉东湖疗养院的李济深常有往来。周恩来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李济深到桂林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后，南方局又指示“通过他可以联系、影响广西、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和地方民主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南方局积极做好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促使李济深做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情。如李济深曾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刘湘的参谋长傅真吾、龙云的代表李云柘、李宗仁的代表温乔生，就国内政治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团结反蒋的事宜，争取一致行动。

在新桂系中，南方局十分注重团结陈劭先、李任仁、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人士。陈劭先、李任仁、陈此生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和蒋介石有矛盾，他们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日民主运动，在新桂系中有广泛的影响。南方局始终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他们做新桂系首脑和上层人士的工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经常与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合作，在掩护中共的地下活动、保护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帮助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困难问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通过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任职的中共特别党员，如谢和赓（白崇禧机要秘书）、侯甸（广西绥靖公署科长）、周可传（三青团广西支团部组长）、左洪涛（张发奎秘书），以及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刘仲容（桂系参议）等，在新桂系上层进行统战工作，促使广西实力派在抗日方面采取比较坚决的态度。

抗战时期南方局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积极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这不仅加强了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合作，而且对促进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促进与滇系关系的新发展

抗战时期，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团结争取工作，主要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是警惕和抵制蒋介石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阴谋，促进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二是坚持团结抗日立场，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推动地方实力派逐步向左转，并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既符合民族利益，又符合地方实力派的利益。

云南是抗战大后方的后方，地位十分重要。云南省国民党政府主席龙云在云南主政10年，手握重兵，是西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对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控制和排挤多有戒备，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1935年恢复重建的中共云南省地下组织开展了对龙云的统战工作。他们通过龙云的顾问刘震寰和省参议会中的杨竹庵等人，劝说龙云打击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抵制蒋系势力进入云南。他们还建议龙云：坚持团结抗日；与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合作，互相支援；与中共和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对中央军进驻云南要加以限制防范，要限制国民党宪兵13团的活动等。①

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新四军军长叶挺借机与龙云进行了多次恳谈。朱德等对龙云谈了“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御侮的决心”，还要龙云“转告在滇讲武堂同学，共赴国难，自有出路”。龙云还热情邀请朱、周、叶三人一同去汤山休息，周恩来因有事未去，朱、叶赴约，在汤山又与龙云长谈。朱德问及龙云云南准备出兵抗日的情况，并说明了中共抗日游击战的地位作用和特点。龙云非常佩服，对中共游击战颇感兴趣，表示“我想派一些干部到你们那里学打游击”。龙云还主动提出：“以后我们如何联系？”朱德说：“用无线电联系。”龙云给了朱德一本密码，随后由朱德的秘书另编了一本保密性强的密码，送给了龙云。至此，龙云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联系。②

1939年初，周恩来指示云南省工委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

① 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南方局领导时期云南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358页。

② 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动员群众，坚持抗战，更好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时决定将李群杰调离云南省工委书记岗位，利用社会关系进入省政府，专门对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为了加强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南方局还派了不少人到云南做龙云等人的工作。1940 年 4 月，何应钦专程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防范和镇压。云南省工委、李群杰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陈述利害，指出：若成立这个机构，国民党特务乘机插手云南，一是对抗战大局不利，二是挑动骚乱对地方不利。龙云接受这个意见，借故拖延不成立这个机构。[①] 当蒋介石加紧了控制云南的阴谋活动时，南方局通过云南省工委向龙云提出了中共关于抗日制蒋的 10 点建议：坚持团结抗日；与川康合作，相互支援；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取得联系，相互配合；防范中央军进驻云南；限制特务活动；增强军事实力；办好地方经济等，得到龙云的采纳[②]。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带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名单到昆明，策动反共浪潮，龙云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同年 7 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催促龙云召开党政军汇报会。龙云无法推诿，主持由他亲自挂帅的汇报会，抵制国民党中央的控制，而汇报会的秘书和担任会议记录的人，就是李群杰。国民党准备逮捕的人，他及时报告省工委通知转移。在皖南事变后的险恶形势下，由于云南地下党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龙云在权衡了利害得失后，对国民党的反共措施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使得中共组织和党员得以继续隐蔽下来开展工作。1940 年 11 月，南方局派《新华日报》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并发表了龙云坚持团结、抗战到底的谈话，对巩固西南大后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2 年 4 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和必要时在云南建立新的据点，南方局派张文澄、杨才等到云南与在滇军工作的方文彬组成调查研究小组，开展工作。调研组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资料；联系滇军二路军指挥部里的中共党员；在滇军建立电台。[③] 后来，龙云主动建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以便保持经常联系。1944

①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 年第 3 期，第 49 页。

② 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3—184 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93 页。

年2月，调研小组里负责电台的杨才进入昆明五华山的滇黔绥靖公署无线电总台第三机班，负责龙云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电讯联系。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1945年10月龙云被蒋介石武力逼迫到重庆时为止。整个调研组的工作一直到1946年4月张文澄回到重庆才告结束。此外，经龙云同意，《新华日报》还在昆明设立了营业分处。1943年8月间，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云南地下党派专人到南方局汇报以后，周恩来在重庆与龙云进行了面谈，交换意见，对他做了进一步的工作。当年9月，南方局派华岗（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直接同龙云接触，还派周新民、李文宜等先后到云南。华岗到昆明后，通过罗隆基的关系与龙云见面。1944年底，龙云秘密地加入民盟。①

抗战期间，滇军转战各地。中共对这支队伍很重视，利用各种关系与龙云建立联系。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云南地下党又先后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龙云为抗战组建的60军和58军开展宣传教育，激励滇军将士杀敌报国。同时，对60军军长卢汉、58军军长孙渡等滇军将领开展工作。中共党员张致中经滇军60军184师师长张冲（彝族）推荐，到184师任政训处主任。在60军开赴抗日前线，在武汉驻扎期间，张冲要求张致中和在武汉工作的滇籍中共党员黄洛峰引见，在汉口八路军办事会见了叶剑英、罗炳辉。他向中共领导人表达了追随中共坚持抗战的强烈愿望，要求中共派干部到184师协助开展工作。② 随后张冲还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③。中共领导十分重视张冲提出的诚挚要求，从延安抽调党员骨干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张子斋到184师，与原在该师的中共党员一起，建立了周时英任书记的中共秘密党支部，在张冲的掩护下，开展60军的工作。党支部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后为南方局）的指示，广泛开展交友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并为开展交友调查了解营以上军官的情况，与万保邦等滇军将领建立了统战关系。在60军中的中共党员，先后谋取到军部机要室、人事课、军事处等部门任职，有的还被委任以团长、师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1940年12月，周恩来指派中共党员朱家璧回云南开展工作。朱家

① 王昆仑、楚图南：《怀念龙云先生》，《人民日报》1984年11月19日。

② 马逸飞：《张冲在台儿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0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405页。

璧遵照周恩来"利用关系进入滇军，广交朋友，以进步面貌出现，扩大党的影响"[①]的指示，积极向卢浚泉、龙泽汇等滇军将领宣传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提出加强滇军建设等建议。他还通过地下党组织发动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18师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鼓舞士气，坚定滇军将士抗战的信心，受到了卢汉等将领的赞赏。1945年龙云下台后，蒋介石电令卢汉对朱家璧"着即查办"，卢汉却将朱降职仍留用。1941年7月和10月，南方局又先后派郑伯克、侯方岳到昆明等地工作，指示他们要善于利用云南的各种矛盾，站稳脚跟，团结广大人民，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援和鼓励下，部队里的共产党员积极做宣传鼓动工作，奔赴抗日前线的滇军将士英勇杀敌，在抗战初期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浴血奋战，立下了战功。

由于西南联合大学等高等学府迁到云南，龙云采取了较开明态度，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的民主运动得到广泛开展。1944年10月10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领导下，由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团体、昆明文化界、民主同盟云南支部以及李公朴、闻一多等进步人士联合发起，在昆明举行了有各界6000多人参加的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大会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并发表宣言，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政府实行消极抗日和独裁、内战政策，提出了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成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龙云派警察到会场进行保护。龙云回忆说："抗战时期，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日胜利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民主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行中山遗教。这也是我当日的愿望。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张澜派人和我说，组织民盟有许多困难，我就竭力鼓励他放手干，我愿尽力帮助。后来刘文辉对民盟也与我采取了一致行动。"[②]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当时被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第215页。

②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61—62页。

蒋介石对龙云深为忌恨。抗战胜利后，他要龙云派滇军赴越南受降，以便乘云南兵力空虚对其下手。南方局和云南地下党洞察蒋介石的阴谋，通过各种渠道劝阻龙云调动滇军出境。华岗对龙云说：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对他要提高警惕。但龙云却以为毛泽东与蒋介石已经在重庆谈判，国家可以和平安定了，没有引起警觉。龙云被软禁后，为帮助龙云逃出虎口，周恩来、董必武曾通知中共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吴克坚协助他从南京或上海乘船离开，但没有成功。1949 年初，李宗仁、何应钦曾多次电邀龙云到南京“共商国是”，他断然拒绝，并发表致李、何的公开信，劝他们接受中共和谈条件，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年 8 月 15 日，龙云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集团，拥护中国共产党，到北平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9 年 12 月，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图为宋任穷在昆明市民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上与卢汉（右）握手

三、推动广西实力派实行较为开明、进步的政策

桂系集团是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个重要派系，桂系的主要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把持广西军政大权，历来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矛盾重重，抗战前曾建立了一个以反蒋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共与桂系集

团在反蒋抗日、逼蒋抗日与联蒋抗日的历史过程中互有往来。抗战初期，桂系与中共合作较好，对抗日比较积极。1938 年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也驻武汉。桂系的李宗仁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武汉沦陷，周恩来与白崇禧南撤途中，就抗日救亡的重大问题几乎都谈及，并在抗战持久战战略和全民抗战上有大体一致的军事思想理论。这是中共与桂系在抗战前期较好的统战关系的政治基础。①

七七事变后一个多月，桂系即征集十万新兵，连同原有的十多个团的常备部队，编成三个军，后改编成三个集团军参加抗日。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高了桂系在国民党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迁至重庆。广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连接海外的主要枢纽，桂林则是连接中国西南、华南、华东、港澳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东江抗日游击队及南方数省中共组织与重庆南方局及延安联系的中转站。同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桂林设置行营。鉴于桂林的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桂系首领在政治上比较开明，与蒋介石有矛盾，在日军继续南侵威胁广西的情况下，李、白也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以保住广西的地盘和自己的力量。中共通过支持李、白抗战主张，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因而作出了重庆、桂林作为重点统战区域和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部署。

1938 年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在武汉时，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国民党中央军委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常有交往。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有关工作人员在向长沙撤退途中，在湖北荆门遇到因汽车故障而停车休息的白崇禧，并邀他同车先行。周恩来向白崇禧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介绍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鼓励白崇禧开放胸怀，坚持抗战，争取做民族英雄，建议他多招揽省外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好广西。劝告白崇禧：应该放开手脚和武装群众，有计划地建立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区。白崇禧"深以为然"②。白崇

① 姚蓝、邓群：《国共关系中的谢和赓》，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9 页。

② 《中共党史资料》第 30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 209 页。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

禧深感留守广西的夏威第16集团军势单力薄，必须动员各方面力量来共同抗战，保卫广西。随即做出组建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决定。白崇禧接受了周恩来关于“要巩固广西必须发动群众，你们要发动群众就要有自己的干部，干部也要训练，那么我们可以帮助你们”[①]的意见，这为中共在桂林开展统战工作和站稳脚跟创造了有利条件。周恩来还提出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要求，表示支持广西抗战，不挖广西的墙脚，不在桂军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白崇禧高度评价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周恩来的提议欣然应许。最终双方达成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协议。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设立是中共同桂系进一步加强统战关系的重要标志。它既是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设在桂林的公开办事机关，又是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构，在桂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桂林八办”建立后，周恩来三次到桂林，除指导该办事处及党的工作外，还直接与桂系上层领导人物接触，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12月初，周恩来首次到桂林时，和白崇禧谈了在桂林复刊《救亡日报》的问题。12月8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在会上作了抗日形势的演讲[②]。1939年2月，周恩来第二次抵桂林时，应白崇禧之邀，作了《军训工作之重要》的演说[③]，向桂系军政人员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同年4月，周恩来第三次到桂林，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磨擦，企图妥协的逆流，鼓励大家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遵照南方局的指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同白崇

① 陈新建：《新桂系与中共关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35页。

③ 《广西日报》1939年2月25日。

禧、黄旭初等广西上层人物交朋友，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抗战爆发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发出指示，要求加强与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下层军政干部的联络，按南方局指示做桂系下层的统战工作。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各地方党组织抓紧时机，也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做好对广西实力派中下层军政干部的统战工作。如中共南宁地方党组织派党员梁寂溪以一位爱国者的身份，到南宁地区民团指挥部工作，向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他逐渐认识到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团结抗日的重要性，表示"真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情和支持进步力量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①。1938 年，广西当局组织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了约 100 名党员参加学生军，保证学生军的进步方向，推动广西实力派坚持抗战的立场。

抗战之初，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为加强对广西的控制，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是桂系联系各方面政治势力，表示进步的一个政治组织，也算是李、白、黄的一个智囊团和反蒋的政治组织。会长是李宗仁，副会长是白崇禧、黄旭初，具体工作由担任常务理事的著名国民党左派开明人士李任仁、陈劭先两人主持。李任仁和陈劭先都与救国会有过联系，李任仁曾是白崇禧的老师，白崇禧很信任他，陈劭先在李宗仁处工作，是参议一类的人物。在李任仁和陈劭先主持下，"广西建设研究会"大量吸收公开或秘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做研究员，如李达、李四光、欧阳予倩、陶孟和、张志让、胡愈之、陈此生、夏衍、杨东莼、金仲华、千家驹、范长江、林砺儒、邵荃麟、宋云彬、傅彬然、张铁生、张锡昌、秦柳方、杨承芳、吴华梓、莫乃群、姜君辰等等，都以不同形式参加过研究会的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千家驹任经济部副主任，胡愈之任文化部副主任，陈此生任文化部秘书。

由于中共与广西地方实力派建立了比较巩固的统战关系，使得广西的政治环境较为宽松，上海、广州、武汉失守后，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从 1938 年 10 月到 1944 年 9 月，先后到桂林开展抗日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达千余人，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等，桂林成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抗日文化中心。1938 年至 1941 年，在桂林的救亡团体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第 19 页。

多达上百个。著名的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是很有代表性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团结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人的群众组织。还有一些著名的新闻、教育、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分社等，这些团体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图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内景

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除直接领导中共广西省工委、桂林文化团体的中共组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八路军衡阳办事处（交通站）、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外，还负责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省中共地方组织的联络工作。为了加强对各省的联络工作，桂林办事处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中心电台，开设了以桂林为中心的交通线网；帮助湘、赣、粤等省党组织建立电台和交通线；帮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中转电台，开辟由桂林通往香港的多条交通联络线。石磊（曹瑛）、夏之栩负责管党的组织和交通工作。

1938 年 12 月下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安排中共广西省工委代理书记陈岸带领部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去衡阳，参加根据周恩来指示八路军衡阳办事处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论新阶段》以及抗日游击战争问题的论述。1939 年 2 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先后在桂林和灵川举办两期党员训练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石磊对两期训练班的筹备、学习计划、学员资格等都作了具体指导。2 月中旬，周恩来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路经桂林，在听取桂林办事处关于广西党组织工作的情况汇报后，指示：中共广西的工作要认真整顿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构，组织不忙发展；工作宜向下层；要注意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这年春，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南方局关于派共产党员到广西三青团及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去开展工作的指示，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关系，先后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和广西三青团中去工作。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中建立了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党

支部，在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和19个县的分团部中均有共产党员担任各种职务，成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1939年春夏之间，由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当局执行“防共、溶共、限共”政策，这些地区的形势逐渐逆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及时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这几个省反共活动的情况，并利用桂林较好的政治环境，帮助已经暴露不能在当地继续工作的共产党员转移或隐蔽。6月，发生平江惨案。李克农对惨案发生的原因、教训以及处置意见认真地进行了研究。7月1日，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及新四军领导并中共湘、粤、赣三省委，建议新四军军部向第九战区提出抗议，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向国民政府交涉，通令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及八路军、新四军办事机构严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继续进攻。当日，李克农又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揭露平江惨案的真实经过，要求严惩凶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还召开追悼新四军平江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6名被害烈士大会，印发平江惨案材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的罪行。

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收到此宣言后，即印2000份向社会散发。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南方局的决定，由石磊主持召集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成员开会，宣布撤销广西省工委，成立桂（林）柳（州）、玉（林）梧（州）、南宁三个特支，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动员群众抗战，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在这期间，中共广西各级组织认真贯彻宣言精神，开展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桂系所开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进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8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被国民党第九战区逼迫停止在邵阳办公，工作人员转移到桂林，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转移到衡阳等地继续开展工作。11月，徐特立被迫离开湖南到达桂林后，在桂林办事处的安排下，在《救亡日报》发表谈话，说明自己被迫离开湖南的经过，揭露国民党湖南当局的反共阴谋。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湘、赣、粤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广西的形势也开始逆转。1940年4月1日，李克农

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湘、赣、粤及广西出现的复杂形势，同时提出争取这些省份形势好转的工作方针。这期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进一步加强与这几个省党组织的联络，设法帮助其转移和隐蔽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1940年间，先后帮助中共湖南省委组织转移600余名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有的在桂林隐蔽起来，有的转送到新四军或延安。1940年5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被国民党军队围逼转移到海陆丰的东江地区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返回东江地区坚持抗日。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接到指示后，即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李克农研究贯彻意见，以中共广东省委的名义报告中共中央，并指示东江地区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曾生、王作尧等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曾、王两部分别返回东莞大岭山区和宝安阳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重新发展壮大。

武汉、广州沦陷后，桂系感到抗战需要发动群众，白崇禧曾经说过："蒋介石原以为日本人不会进攻武汉，因为日本人要讲和。事实证明，蒋介石错了。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就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和谈的人紧密联系。"[①]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帮助下，通过中共党员的深入工作，1939年初桂系又开办起"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旨在培养具有现代政治军事科学知识的新干部，巩固桂系在广西的统治。校长由省主席黄旭初兼任，原广西师专校长、中共党员杨东莼以救国会民主人士的身份被聘为教育长。实际上黄旭初只是挂个名，一切由杨东莼负责。他们参照延安抗大的方针办校，开辟了一个革命教育阵地。两年内培养了1300多名地方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使地方干校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重要的宣传阵地，使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阵地扩大到全省。[②] 后来，国民党中央CC势力派人到广西发展三青团，为协助桂系不让国民党中央势力插进广西，杨东莼等在八路军办事处指导下，从广西地方建设干校第一期学生中调出一批人，筹建广西三青团，并分到各地建立了各县的三青团。因此，广西的三青团建立之初中共党员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抗战初期桂系组织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中共党组织也动员了约百名中

①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29页。

② 王福琨主编：《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第30页。

共党员和大中学校学生参加，后来在学生军中也发展了一些党员，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各地游击队的部分骨干是学生军的成员。

1939年，叶剑英兼任南岳游击训练班副教育长，也多次到桂林对桂系上层人物和广西各界人士做统战工作。从1938年12月，叶剑英先后应邀到广西大学、广西学生军第二团、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李子园储才学校发表演讲，分析抗战形势，宣传中共全面抗战路线和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特别是1939年5月在李子园储才学校所作的《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讲，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予以批判，对白崇禧在抗战初期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加以发挥和补充，指出它在敌进攻阶段确曾起过伟大的作用，但在第二期抗战中应加以修改，现在“不仅要保障已有的空间，并还要争取已沦陷的空间”，我们必须“以大力打小仗，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这表现了中共与桂系在战略上的协调。①

应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之邀，1939年5月28日，叶剑英在桂林作《积小胜为大胜》的抗战形势报告。图为叶剑英在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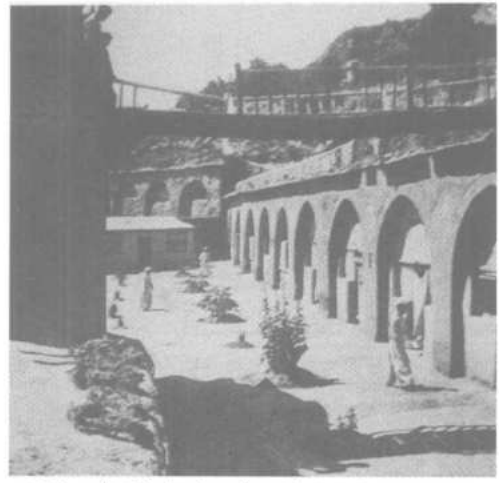
广州、武汉沦陷后，桂林成了抗日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西南地区连接海外、沟通内地的联络中心。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利用这个有利的地理优势，为接送人员、筹运物资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及其家属，回国、回乡参加抗日的华侨、港澳同胞，途经桂林时，大都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接送。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中共湖南省委

① 《救亡日报》1939年5月30日第3版。

书记高文华，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人曾山等往来桂林，都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接待、警卫、护送。1939 年 11 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古大存、区梦觉等到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接待并帮助他们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然后辗转赴延安。1940 年春，抗日军政大学第 3 分校教育长庄田、大队长谢斌等受中共中央指示，分别到海南岛、珠江地区工作，以加强对这两个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他们从延安到达桂林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派秘密交通员护送其到达目的地。这年秋，马来亚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彭光涵等 10 多人被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到香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派秘密交通员曾昌明到香港将彭光涵等接到桂林，然后又派军车送他们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经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转送去各抗日根据地的爱国青年有上千人。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掩护下，在广西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的琼尤恩大夫，日本著名作家、日本在华反战同盟西南支部负责人鹿地亘，保卫中国同盟德籍成员王安娜，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等外国友人，路经八路军桂林或在桂林开展工作时，都得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接待、支持和护送。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克服重重困难，为八路军、新四军转送大量物资。这些物资除少量是从国民党有关军需部门领取外，大多数是由自己筹集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从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中募捐来的。广州失陷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筹集到的物资多经海运至越南海防，再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派人到那里接运。1939 年 5 月，李克农亲自布置交际科长邱南章、交通运输科长龙飞虎、财会科长殷承祯，带领 20 多名运输副官和司机，到海防接运由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转来的一大批物资，及 20 多名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青年。这批物资包括汽车 10 辆、救护车 2 辆、汽油 7000 加仑、无线电器材 30 大箱及一批医药、医疗器械、被服等，数量达 50 余卡车。接运人员用沿途设站、往返转运的办法，经过 4 个多月的辗转奋战，克服重重困难，把这批物资和 20 多名华侨青年送到延安。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还经常把募捐得来的款项汇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购买物资转送到抗日根据地。

从 1940 年 10 月起，国民党顽固派与国民党广西当局采取特务破坏与派人催逼等手段，强迫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面对复杂的形势和险恶的



图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延安建立的后方医院，桂林办事处为其筹集和转运过药品、医疗器械

环境，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一方面加强对工作人员革命气节的教育，周密安排在桂林的知名文化人士转移，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另一方面，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继续存在或延缓撤离。11 月 3 日和 1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几次派人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催其必须在本月 19 日前结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根据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的精神，申明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在执行北移前还有许多事要做，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如要马上结束，则请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来一正式公文。12 月 7 日，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再次派人催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销。次日，李克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提出延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时间，或改设运输站。中共中央同意后，李克农即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致电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申述理由，以争取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延缓结束或改设运输站，同时请李济深帮助疏通。但此时李济深也无能为力。他即复电李克农：务希即通令年终撤销，切勿再延。

1941 年 1 月 6 日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致电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和文化人士转移问题给予明确指示。14 日至 16 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广西日报》连续刊登奉令撤销的启事。1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并转李克农：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应立即撤退，否则李克农会被拘押。22 日，李克农带领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桂林经重庆转延安。途中广为散发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传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后，为了加强和巩固对广西的统战工

作，周恩来又派李亚群到桂林建立了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他对李亚群说："桂林这个阵地不能丢，一定要保存下来大大发挥作用；广西同其他地方有差别，一定要做好交朋友的工作。"①李亚群到桂林后，在李济深支持下工作逐步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回到桂林，李任仁、陈劭先以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名义掩护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安置。李亚群还建立文化工作组，成员有邵荃麟、张锡昌和狄超白等，加强对文化界的工作，使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在艰苦条件下又活跃起来。蒋介石对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竭力想从中插手加以控制，他亲自给李任仁写信，表示欢迎在桂林的所有文化界知名人士到重庆工作。李任仁看后不予答复，许多进步文化人仍继续留在桂林从事抗日民主活动，直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才分散转移到西南各地。

在南方局的鼓励和推动下，桂系当局在抗战期间表现相当积极。"桂系军队先后投入战场者有5个军，战斗力亦比一般地方军阀部队强，在上海和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中，都有较好表现。"②抗战期间，桂军转战苏、浙、皖、鲁、鄂、豫等省，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和桂南会战等重大战役。抗战八年，广西出兵94.67万人，按人口比例出兵之多，居全国首位。新桂系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外，也和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③

四、对国民党第四战区的军事统战工作

1938年夏，余汉谋任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时即成立政治部，由其亲信李煦寰任主任，左恭（进步人士）任主任秘书，并邀请中山大学著名进步教授尚仲衣任政治部主管军内外宣传教育的第三组组长。中共广东省委派了石辟澜、叶兆南（孙大光）、刘潜迅（刘向东）、司马文森、黄新波、郁风等党员到第三组工作。

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后，李煦寰为了招收一批青年学生，加强其军队政治工作，决定成立第四战区政治工作大队（简称"四政大"）。中共广东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12页。

②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稿》（1），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陈新建著：《新桂系与中共关系史》，第202页。

③ 曹裕文：《略论广西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桂海论丛》1995年第4期，第15—19页。

省委为了帮助余汉谋部队坚持抗日，就动员一批党员投考该大队，考入的有李静筠（李静，女）、曾冬（曾东）、朱慕湛（女）、汪柳苑（汪梅，女）、杨应芬（杨重华）、李见心、陈坤仪（女）、汪绥祚（苏凝，女）、陈兴中、区元枢、伍殿衮、林琅（女）等12名党员。入队前，省委军委书记林平（尹林平）指示：到余汉谋部队的任务是做统战工作，要帮助友军提高战斗力，使之能坚持抗战。同年7月成立"四政大"中共支部，李静筠任书记，曾冬、杨应芬、朱慕湛任小组长，由林平亲自领导。当时党支部的任务是积极向战区军民宣传中共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扩大中共的影响，团结教育队内青年，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

从广州沦陷前至1939年4月止，党支部先后吸收党员8人，全大队党员增至20人，占全体队员三分之一。这期间，上级党领导由省委青年部长吴华（吴济生）接替军委书记林平直接领导党支部。支部除了经常传达中共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外，还利用队员集中休整总结工作的时机，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武装党员，帮助全体人员提高政治认识和工作能力。对新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革命传统和秘密工作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加强支部的思想建设。同时在工作中又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全体队员胜利完成各种工作和任务，因而受到李煦寰的信赖和倚重，并为后来大规模举办政工人员训练班提供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

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机关迁往粤北，1938年12月八路军韶关办事处开办。1939年1月粤北省委成立，由古大存任统战部长。八路军韶关办事处成立两年里，除了做中下层爱国人士、民主党派统战工作外，还对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先后与李章达、莫雄、陈汝棠、吴仲禧，国民党十二集团军首领余汉谋、李煦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等多次接触。

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入粤后，新任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在韶关就职，余森文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张、李、余到粤初期，为争取群众、稳定其在广东的统治局面，决心抗日，提出整军（整顿军队）、"惩贪"（惩办贪官污吏）、民运（开展民众运动）等进步口号。任用进步分子及爱国青年，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对"抗先"和各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表示支持，余汉谋还表示欢迎中共派人到他们军队工作。为此，中共广东省委在积极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同时，动员了200多名党员和600多名各地

青年参加第十二集团军举办的政工总队。该队1939年8月初在翁源香泉水开学。在中共粤北省委青年部长吴华领导下，总队中成立以廖锦涛为书记，陈中夫、陈长源为委员的中共地下工委。中队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地下工委提出“努力学习，掌握军事知识，改造旧军队”的口号。同年10月，政工总队结业，学员被分配到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师、团去做政治工作。政工队员积极宣传教育群众，争取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民众支援抗战以及踊跃参战。这对改善十二集团军中的政治工作，推动军队的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1940年7月，余汉谋、李煦寰又在始兴东湖坪继续举办政工人员补训班，将各师（旅）未经香泉水调练的政工队调来受训。同时受训的还有澳门、香港回国服务青年和从各地招收来的爱国青年。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员补训班由李煦寰挂名为主任，实际工作由总干事王鼎新负责，共产党员在班里起着骨干和领导作用。

国民党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原系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所建立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队。该特支长期隐蔽在张发奎军中秘密工作。特支的称谓也随着张发奎部队序列番号的变化而变化。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长官时，特支改称四战区特支，特支的第一任书记由左洪涛担任，支委有何家槐、刘田夫、孙慎。初建特支时共有党员10名。特支第二任书记刘田夫，第三任书记孙慎，郑黎亚在柳州时代理过特支书记。特支先后有党员共22名。在柳州时党员13名。1940年1月，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从广东韶关迁到柳州，司令部设在柳南窑埠。特支的成员也随第四战区迁来柳州，特支在柳州活动的时间较长（将近5年）。特支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和关怀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开展对张发奎的统战工作、宣传全民抗战、掩护转移进步力量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

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派。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时，特支力促一直与汪关系密切的张发奎表态声讨汪，还使其以长官部的名义，会同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给了国民党投降派和准备投降的国民党顽固派一个有力打击。在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共逆流的时候，由于特支成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执行“三勤”方针，得到张发奎本人的信任和多方支持。皖南事变发生后，张发奎是当时全国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所谓“声讨”新

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态度，掀起反共高潮。左洪涛和特支的成员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做好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高中级军官的统战工作，影响了一批受共产党影响的军官。如长官部的重要将领吴石和陈宝仓（中将正、副参谋长）、高若愚（中将高级参谋、办公厅主任）、张文（中将顾问）、张励（中将军务处长）、黄和春（中将兵站总监）、黄中廛（少将参事）、麦朝枢（中将秘书长），他们逐渐了解中共，态度逐渐明朗，他们当中有的后来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有的成为中共的优秀干部。

特支成员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在第四战区内还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2月，周恩来派胡家瑞到柳州传达南方局的指示，6月，又派李亚群来柳州传达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4年初，特支成员成功地识破了蒋介石亲信、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梁长华、宣传科长何泽宏的阴谋，战胜了敌人。1944年桂柳大撤退期间，国民党为排除异己，中统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密电重庆蒋介石侍从室，诬告左洪涛、麦朝枢、黄中廛、何家槐等四人“思想左倾”、“行为可疑”，请求国民党中央查究。蒋介石亲信即以蒋介石的名义密电张发奎查究。张便把电报给麦朝枢和左洪涛（当时黄、何两人已后撤）看，提醒他们注意言行，不要“授人以柄”，然后要左洪涛以他的名义电告蒋介石“麦、左、黄、何随职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蒋介石没再追究此事。

五、积极开展川系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南方局与刘文辉统战关系的发展　曾经担任过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拥有地方武装10多万人和70多个县的地盘，后被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的联军击败，被迫退到西康。为摆脱困境，他施展了“多角外交”企图东山再起，被人称为“多宝道人”，是西康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刘文辉曾有两次反蒋历史，与蒋介石有深刻矛盾。因此，他积极与中共接触，寻求政治上的依靠，达成了团结抗战的共识。早在1938年4月，刘文

辉在汉口时，周恩来即让四川革命元老吴玉章同刘文辉密谈，鼓励他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并接见了刘文辉的代表邹趣涛。周恩来要邹趣涛转告刘文辉，希望他变“多宝为一宝”——坚持抗战，同时指定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同邹趣涛保持联系。1938 年夏，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时曾到方正街刘宅与刘文辉会晤，谈话的主题是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刘文辉说，这次会晤使他详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他“亲共开辟一条坦途”①。1939 年 5 月，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潘文华的家中与刘文辉晤谈，对刘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1941 年 3 月，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同刘文辉联系。1942 年 2 月，通过民盟的章伯钧、罗隆基相约，周恩来与刘文辉在实业界人士吴晋航的住处直接见面，恳谈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当时形势险恶，双方都不带随行人员，进行秘密会见。针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周恩来对刘文辉说：“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同时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周恩来的谈话对刘文辉帮助很大，使刘文辉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刘文辉后来在评价这次会晤的意义时说：“周的这番话，使我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力量。经过这次会晤以后，我同党的联系，也就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此后刘文辉与中共的关系“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②。

这次会晤后不久，经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同意，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 24 军之间《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这个协定，当年 6 月，南方局派王少春偕夫人秦惠芬带小女儿和报务员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设立了一部秘密电台，与延安中共中央直接通报。王少春每天通过电台收听新

①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②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华社广播，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战场的消息传达给刘文辉，同时将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中共中央汇报。王少春等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刘文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此，自建台的第一天起，凡收到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外加标题、按语，送给刘文辉看，重要的还请刘转给成渝的朋友们传阅。刘文辉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中论及此事时写道："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我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①这个电台，只有刘文辉及其个别亲信知道，因而能历时近 8 年，从不间断，一直坚持到 1949 年刘文辉在川康地区起义。

刘文辉的部队驻在川康边境，蒋介石一直想将它拔除。1943 年和 1944 年间，他时而以"对藏用兵"企图将它消灭在康藏高原，时而要派嫡系军队进入刘文辉的驻地。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刘文辉惶恐不安。1943 年，王若飞两次会见刘文辉的代表，向他分析形势，指出：蒋介石集团是外强中干，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就会知难而退。刘文辉接纳这个意见，坚持反蒋斗争，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事后他感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②刘文辉与中共的联系，蒋介石也并非没有察觉。一次，蒋介石约刘文辉谈话进行试探。刘文辉对蒋介石说："我是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样样占全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③这些话虽把蒋介石应付了过去，但也反映了刘文辉内心深处对共产党的疑虑。刘文辉毕竟是封建军阀，他与蒋介石有矛盾，有反独裁争民主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保住他在川康的统治地位，因而有时不免产生动摇。1944 年底到 1945 年初，日军有入川趋势，蒋介石集团中的妥协论调亦有所抬头。为加强对刘文辉的工作，王若飞派张友渔到成都与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同时与邓锡侯、潘文华讨论了如何保卫大西南的问题），争取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坚持抗战，着重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国内外形势作深入

①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②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③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具体的分析，特别指出如果日军入川，蒋介石逃往西北，西南必须进行自保。张友渔到成都后，经商定，每天上午去刘文辉家，“给他分析国内外形势，阐释我党的方针政策，指出保卫大西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抗战必胜的前途”，回答刘文辉提出的有关问题，同时“明确表示我党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他们保卫西南的斗争”。这种活动每天谈一两个小时，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刘文辉曾在自述中说：“1945 年 2 月间，张友渔到成都，党派他帮助我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国际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①

1949 年 12 月 9 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彭县起义。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62 军刘忠军长与刘文辉（左二）会面

抗战胜利后，刘文辉继续同中共保持关系，但顾虑较多。1946 年春，蒋介石在重庆找刘文辉谈话。周恩来得知后，当晚即找刘文辉，要他认清形势。二三月间，政协闭幕不久，周恩来又通过民盟的朋友转告刘文辉：“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走。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特别提醒刘文辉：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站不住，希望刘文辉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刘文辉觉得周恩来这番话，不但向他讲解了政治形势，而且给他指明了政治前途。他深感蒋介石集团视他为眼中钉，在政治上排斥他，在军事上压迫他，必欲除之而后甘心；而共产党则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诚恳地关心他，热情地支持他。这种切身经历使他作出抉择，弃蒋介石集团而跟着共产党走，并终于在 1949 年 12 月 9 日与邓锡侯、潘文华一起通电起义。②

①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②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南方局对潘文华的统战工作　潘文华是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他是23军军长，抗战开始后率部出川抗日，后回四川就任28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川系的刘湘去世后，他作为其嫡系被推为武德励进促进会主席，掌管了刘湘四川的5个师、2个旅、16个保安团的武装力量，可谓实力雄厚。南方局对他也做了不少工作。1938年夏，董必武等路过成都，曾与潘文华会晤，阐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潘文华表示拥护。这年6月，潘文华任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驻四川阆中；8月，中共通过武德学友会的关系，派周朝禄、曾代吉、杨尚元等党员到阆中，做潘文华的工作。4月，周恩来到成都，潘文华主动邀请周恩来到乔毅夫公馆吃饭，作陪的有中共党员罗世文、张曙时、张秀熟、王干青。周恩来向潘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战政策。[①] 指出：国际上反法西斯战线已经形成，日军占地过广，兵力分散，必然作茧自缚，沦陷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基础。当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和愿望，希望潘等川军高级将领加强自身团结，对蒋破坏抗日和民主的行为，给予坚决抵制。西南地方力量是有条件这样做的，中共愿意在政治上予以支持。周恩来派唐午园到潘文华部任联络员，潘委任唐为绥署政治部副主任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常联系。一年后，唐午园调回南方局，潘昌猷（潘文华的二弟）担任南方局和冯玉祥、程潜、张澜之间的联系人。同时又派甘树人前往潘部，以中校秘书名义，继续担任联络工作，潘文华委他为绥署中校秘书。此后，潘文华与董必武、王若飞、林伯渠都曾秘密会晤，就坚持抗战、加强川康团结等问题进行会谈。1942年4月，王若飞在重庆潘昌猷家与潘文华交谈，就双方如何配合行动问题，一直谈到天黑，潘派专车把王若飞送回。为了加强联系，南方局派钱松甫、江洪夫妇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将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新华社重要电讯提供给潘文华，同时也将潘文华的意见要求和川康的军政动态向南方局汇报。这个秘密电台，只有潘和他的儿子、巴山警备司令潘清洲以及绥署电务处长宋子丰三人知道，直至抗战胜利绥署撤销，钱松甫夫妇平安回到重庆。与此同时，在潘文华的部队

① 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15页。

中，还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或担任校尉级军官，或被聘为顾问。潘文华曾任命中共党员田一萍为《华西日报》经理，田又创办了《华西晚报》。这两份报纸的进步倾向使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特务准备逮捕田一萍，潘文华立即把他调任上校机要秘书，保护在部队中。[①] 后来田一萍曾利用在潘文华的侍从室担任上校参谋的机会，做过很多工作。田每天负责剪报，除剪一些应付性的东西外，着重有意识地剪些有关民主运动的报道，还经常传播一些左翼方面的情况，利用各种机会对潘文华及周围的人做工作。由于中共党组织对潘文华经常性的工作，抗战期间，潘文华比较积极地支持和参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1944 年冬，经张澜介绍，潘文华和刘文辉正式加入民盟，成为秘密盟员。1947 年 2 月，中共南京局撤回延安，中共与潘主要通过张澜进行联系，潘向张澜提供了长期的活动经费。潘也对四川的中共地下党员做过力所能及的保护。1940 年，汪导予被捕，潘以汪系川陕鄂边区顾问为由，写信给蒋介石保释。车耀先被捕后，他又保护车耀先的秘书聂生明，后来在黔江还营救过被特务抓去的邓照明、划兆丰、谢若英等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潘文华非常忌恨，把潘的部队分别调到几个地方，分散他的力量，加以监视。但潘通过在上海的张澜和中共保持联系。1949 年 12 月 9 日，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这是南方局长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南方局与邓锡侯统战关系的发展　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担任过四川省长和 28 军军长等职。早在 1937 年 8 月，抗战初期，他请缨杀敌，蒋介石以娘子关吃紧，命邓锡侯为总司令兼 45 军军长的 22 集团军赶赴山西前线。这时已是深秋，士兵衣衫单薄，装备低劣，与拥有飞机大炮的强敌鏖战，损失惨重。但是，阎锡山不仅不补充装备，甚至连一张山西军用地图也不给。邓锡侯遭此冷遇，万分颓丧。这时周恩来正在太原，知道了这件事，便亲自访邓，为邓介绍山西抗战情况，分析当时战局，并将在平型关战役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用地图送给他。从此，邓锡侯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对中共也有了好感。1938 年刘湘病故后，2 月 1 日，邓锡侯被委任为重庆行营副主任，3 月 20 日，又被委任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938 年，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路过成都，1939 年彭德怀路过

① 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第 213 页。

成都，都同邓锡侯会晤，为他分析抗日形势，增强他的抗日信心。[①] 1939年秋，吴玉章、林伯渠利用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在途经成都时访问了邓锡侯。吴玉章、林伯渠向邓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希望邓搞好后方支前工作，积极支援抗战。邓听后很受启发，后来在安定后方，征粮支援抗战前线中做出了一定成绩。由于蒋介石对四川地方势力一贯分化瓦解，出川抗战义备受歧视，而在同中共的接触中，亲身体会到团结友谊的可贵。两相比较，加深了他对中共的认识，从而愿意接近中共。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杨伯恺，邓锡侯托张雪岩带信给杨，使他得以脱险。豫湘桂战役后，邓锡侯对抗战一度失去信心，派人去找周恩来。周恩来为邓仔细分析了当时苏德战争和中国抗战的光辉前景，明确指出抗战必胜，从而使邓又坚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念。1949年邓锡侯同刘文辉、潘文华在川西起义。

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团结他们坚持了抗战，而且在国共磨擦中使他们保持了中立，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昆明、桂林、成都等地一度成为抗日民主活动的重要阵地。

第三节 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争取民主政治，反对独裁

一、团结西南地方实力派，推动抗日民主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抗击一个小却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战争。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行全面抗战全民抗战，让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组织抗日武装的自由。因此，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然而，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顽固派奉行只许政府和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借口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拒绝任何民主改革。更为甚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

① 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第215页。

顽固派仍然坚持不要抗日民主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严重威胁到中国能否团结抗战和能否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改革国民党独裁统治已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中国要坚持抗战，只有尽快解决抗日民主政治问题，才能实现全面抗战和全民族抗战。因此，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和团体明确指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抗日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与此同时，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也痛感争取抗日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起来之必要，并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所以，周恩来指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①

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其反共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并企图通过抗日来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和地方实力派。因此，从爱国主义和维护自身的生存出发，地方实力派和中共在反蒋、抗日、要求民主等方面都有共同点，双方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有相互合作的要求。1939年以后，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集中与强化，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滥调，甚嚣尘上，不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也渐为地方实力派人物所忌恨。南方局抓住蒋系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或中立，推动西南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战，反对独裁。因此，地方实力派在加强自身力量和团结的同时，也逐渐对民主运动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样，在抗战期间，西南国民党统治区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从前那种单纯的地盘、军权之争相比，在内容上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李宗仁说："在政治行政上，我们反对独裁，并且认为民主政体（不是独裁制）是政治上的大道。"在反蒋抗日的问题上，西南实力派是很敏感的。1938年六七月间，龙云应蒋介石之召赴汉口，途经成都，恰逢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邓汉祥在川康整军后的局面中"商量如何把持川康，保持实力，如何表面拥蒋、暗中多方防制，使蒋对川康无从下手"，龙云加入密谈。大家都认为：川、滇、黔、康，唇齿相依，地理历史，风土人情，都有密切关系，"联合起来，尚可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第210页。

存，各自为谋，则终必同归于尽”。于是约定签订一个协定，其内容为：（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违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现，三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须实行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员商定。龙云、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在协议上签了字。不料事为王缵绪向蒋告密，蒋介石便打电报警告龙云，不要他干预川康事。不过龙云仍然与刘文辉等人保持联系，还派人到雅安与刘文辉商讨具体合作办法，约定政治由刘文辉负责（因为刘先同中共有联系），军事上则因龙云实力较强而由龙负责，还准备共同投资筹设正成商行以实现经济合作。中共方面对此很重视。华岗曾从昆明到雅安同刘文辉几度长谈，“主要就是为了密切我（刘文辉）和龙的关系”。这个过程，正是西南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所经历的由反蒋而联共的过程。①

经过南方局的统战工作，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络民主力量，对抗日民主运动予以支持和保护。例如，桂系为了壮大自己势力，联合民主力量，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桂系在安徽也联合民主力量，并直接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其政府。1940 年 5 月，广西宪政促进会在桂林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由胡愈之起草的、经白崇禧修改和许可的宣言。其主要内容是：要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反对特务政治；实行中央与地方均权。此宣言在《广西日报》和《建设研究》上公开发表，并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转载，中外瞩目，它对蒋介石利用“五五宪草”推行独裁制“给予了一定的打击”。民盟的建立和发展，川康地方实力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潘文华一次就给了 30 万元的经费，等等。这样，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实力派在政治态度上和中共有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有联合中共的要求。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得到了中共和中间民主力量的欢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在抗日民主这一大背景下，地方实力派与中共的联合，对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都具有进步意义。

南方局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成功的，正是在南方局的努力下，西南地方实力派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在

①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

这一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国共磨擦认识较深刻，充分意识到争取地方实力派对防范、避免和解决国共磨擦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比较完整地创造性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策略方针，为维系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战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与滇系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亲密合作

国民政府陆续迁川后，极力向云南渗透，龙云在中共支持下从各方面予以抵制。但龙云对蒋的势力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尤其要防范蒋介石以抗战借口控制云南。所以，龙云不单是消极防制，而且还积极地不断发表反蒋言论，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抗战后期，通过中共多渠道、多方面以诚相待的团结、争取工作，云南地方实力派日益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从而主动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对日益高涨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同情、默许、保护的态度。

1943 年 8 月，龙云同民盟中央委员会罗隆基晤谈时，提出要罗隆基设法寻找关系，邀请周恩来到昆明会晤。中共云南省工委了解到龙云这一要求后，派欧根到重庆向董必武作了汇报。10 月 10 日，中共云南党组织发动和组织昆明各界 6000 多人纪念“双十节”，大会公开响应中共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龙云派警察到会场维持秩序。1945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发动 6000 多人纪念讨袁护国 30 周年，号召发扬再造共和的革命传统，争取民主，以龙云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表示支持纪念大会的召开。1945 年 3 月，新华日报社派彭少彭到昆明，经龙云同意，建立昆明营业分销处，使《新华日报》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传播。云南地方实力派实施的一些开明进步政策，维护了云南团结抗战的局面，促进了民主进步的发展。

龙云还积极保护中共和民盟组织及成员，支持并参加民主运动，与中共、民盟共同战斗。在重庆期间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和往来，甚至到了半公开的程度。罗隆基、梁漱溟、张君劢等经常到龙云处访谈。1941 年六七月间，政团同盟五常委之一的黄炎培到昆明考察并准备在云南建立民

盟组织。他与龙云、缪云台等云南上层人士交换意见，得到龙云等的赞同和支持。1943 年 3 月，南方局派地下党员周新民、李文宜以民盟身份到昆明参加建立民盟组织的工作。此时的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也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5 月，成立了民盟昆明支部。因为有滇系实力派的支持和保护，民盟昆明支部发展得很快。该支部 1944 年 11 月发展成为云南省支部。龙云本人曾多次与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楚图南等谈话，申请入盟，后被正式批准。1944 年底，龙云成了民盟的秘密成员，一位特殊的民主战士。他不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和公开活动，但却在经济上支持民盟，并为民盟和中共的活动创造条件。龙云曾明令保障云南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提出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允许游行示威。由于有龙云的抵制，军统对民主运动也无可奈何。1944 年“五四”前夕，中共云南地下党和民盟决定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在龙云的保护下，纪念“五四”的活动在各大学持续了好几天。1946 年 1 月，旧政协开会期间，民盟缺少活动经费，龙云开了两千万元法币的支票（当时值黄金二百两），派人送到特园交给民盟主席张澜，并表示愿幕后大力支援。[①] 旧政协期间他很关心会议进展情况，还以切身体会提醒各党派，蒋介石心狠手辣，阴谋独裁，无诚意开放政权，迟早会撕毁协定，难以实现民主团结。皖南事变后，戴笠、康泽到云南要求龙云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但拿不出证据，龙云就把他们顶了回去。随后何应钦带着特务拿着黑名单来到昆明，准备搞大逮捕。在省联席会议当秘书的中共昆明支部书记李群杰，得到这有一百多人的黑名单，立即交给省工委书记马子卿，组织有关人员疏散转移，结果国民党扑了个空。正是由于有龙云为首的滇系实力派的保护，中共云南地下党一直没有遭到破坏。1946 年 5 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前夕，龙云在重庆聚兴诚银行参加一次有李济深、冯玉祥、于右任、覃振、刘文辉、谭平山、杨杰、邓初民等有声望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参加的聚会，大家在会上批评国民党腐败，蒋介石独裁。龙云深受蒋害，会上发言非常激烈。会议决定，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1948 年 12 月，龙云出走成功，到达香港，结束了三年多的软禁生活，挣脱了蒋介石的控制，最后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龙云到香港后，公开进

①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龙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6 页。

行反蒋反内战活动。他立即与中共华南局建立联系；接连派妻子顾映秋、儿子龙绳曾以及一些亲信回云南组织“中国人民自卫军”、“共革盟军”，意为中共、民革、民盟联合武装等反蒋武装，并一再督促卢汉早日起义。龙云在香港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8月15日，龙云联合黄绍、刘建绪等44人在香港招待记者，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龙云被列为特别邀请人士，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出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龙云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1月离开香港到北京赴任。龙云公开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革命道路，对滇系地方实力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的影响和策动下，众多的滇系及滇军的重要人士陆续投奔人民革命阵营。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起建立、发展和巩固了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云南各民族团结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后期昆明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民主、团结、抗日的“民主堡垒”，中共和民盟做了大量的工作，龙云也有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昆明这座全国著名的“民主堡垒”的出现，是中共与滇系地方实力派亲密合作的硕果。

三、运用灵活统战策略，促成与桂系合作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广西地方实力派，因为反对蒋介石的消灭异己政策，常受到蒋系势力的排斥与压制，与蒋介石有着较深的矛盾。为保存实力，他们需要借重进步力量的支持，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增强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愿意同中共加强合作。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以后，日本的侵华策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声明，宣布放弃他1月份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只要国民党放弃抗日，便欢迎它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运动。12月20日，近卫又发表调整日中关系的声明，提出中、日、“满”“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以此为诱饵，挑拨国共关系，加紧诱降活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和英国、美国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

团发生了严重动摇以致分裂。1938 年 12 月 18 日，亲日派汪精卫潜离重庆，20 日到达越南的河内，29 日发表响应近卫诱和声明的“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国民党当局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更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在此前后，国民党顽固派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8 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他们把反共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中，策划和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系参加了这次反共高潮。此外，抗战以来，蒋介石对桂系采取“拉白入阁，封李中原，分化上层，拉拢中层，财政统治，经济收买”的利诱政策。1940 年，蒋介石以白崇禧对桂南战役“督率不力”为由将其降级，随后又撤销桂林行营，把白崇禧调回重庆，就近控制。蒋介石采取软硬两手，对桂系施加压力和拉拢、利诱。

武汉会战后，李宗仁即委任廖磊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兼安徽省府主席，率桂系战斗力最强的第 21 集团军之第 7、48、31 军留驻大别山，设安徽省府、省党部及长官部于立煌县（今金寨县），建立起以立煌为中心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早已建立了一些根据地，桂系立足未稳时，尚能与新四军保持友好关系，当它站稳脚跟后，为扩大地盘，便不断与新四军发生磨擦，挤占新四军的防地。桂系想通过控制安徽在中原腹地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大展宏图打下基础。这与中共“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产生尖锐矛盾。1940 年 1 月，“半中央化”的李品仙主皖以后，一改过去李宗仁和廖磊的一些比较开明的做法。在李品仙的主持下，安徽省政府借整顿民众动员委员会组织为名，准备彻底改组动委会。1940 年 1 月 26 日，李品仙召集省动委会各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驻立煌各种抗敌协会的所有人员训话，强调“中央有明令，全国动委会须一律改组”。2 月 1 日，又发表《告动员工作同志书》，正式下令改组动委会，限令全体工作团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返回立煌，“集中整训”。2 月中旬，李品仙在立煌召开安徽党政整建大会，通过《敌后党政整建纲要草案》，强迫军事、行政、教育等政府公职人员及高中学生必须集体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并相继开办党政干部培训班和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培植亲信势力。迅速建立各级特务机构，秘密审讯抗日进步民主人士，开

始“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大批屠杀新四军人员。1940年4月，李品仙在江苏韩德勤的配合下，向皖东新四军罗炳辉部进攻，制造了华中首次大规模武装磨擦事件。桂系在军事上积极向新四军进攻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制造了一系列反动事件，迫害广西、安徽中共地下党员，解散安徽动委会，驱逐广西、安徽的民主进步人士，压制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收编或遣散群众抗日武装等。

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桂系首领白崇禧同顽固分子何应钦联名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等，并逼令八路军、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提示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守，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它各问题之命令”，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2月9日，何、白再次发出“齐电”，进一步作反共舆论动员。

中共对何、白“皓”、“齐”两电的无理要求予以严正拒绝，但也作出让步，答应江南新四军北移。国民党顽固派却阴谋围歼皖南新四军。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迟迟没有下定北移的决心，多次错过转移时机。直到1941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再三催促下，才缓慢地北移。但此时已失去最好时机。新四军行至茂林地区即遭国民党顽军的围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桂系军队在江北堵截新四军北渡长江，直接参与制造皖南事变。白崇禧多次电令江北桂军，以主力阻止新四军渡江。李品仙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要将新四军消灭于江滨”[①]。由于桂军在江北重兵堵截，新四军不能直接北渡长江，被迫绕道苏南渡江，致使陷入敌军重围而遭惨重损失。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不顾中共抗议，令各战区“进剿”新四军，任命李宗仁为“剿共”军“最高总司令”。李配合蒋，调集军队对华中抗日

①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54页。

根据地大举进攻，桂系李品仙部也向新四军发起新的进攻。

皖南事变后，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中共中央采取“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策略，坚决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对于参加皖南事变的桂系，中共中央认为：“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实力上的原因。”“此次反共，与蒋介石、何应钦积极合作，向我进攻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广西一派，此派首领白崇禧命令其部下，在安徽、湖北向我新四军进攻，颇为卖力。”但中共中央又认为，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①。认为白崇禧虽参加了何应钦的反共活动，但白崇禧与何在对日对中共态度上仍有区别，白崇禧、李品仙等虽参加了蒋的反共集团，但从国共两党整个斗争的情况来看，桂系仍属中间力量。

基于这样的考量，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仍执行了对蒋桂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的名单中，只提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未点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名。

对桂系在皖东、皖中的进攻，在其不听劝告停止的情况下，新四军予以自卫还击。后由于日军发动豫南战役，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对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集中在大别山区的桂军主力，也处于困难的境地。汤恩伯占领皖北后，企图夺取桂系在大别山的基地，增加了蒋桂矛盾。

“桂系在这次反共行动中，并未得利，反受损失（一部分地盘被蒋系夺去），蒋桂矛盾正在发展。”②在此情况下，白崇禧只好电示李品仙，要他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巩固大别山区，至于东进“剿匪”（向新四军进攻）已完全不提。李品仙只好遵命将138师调回大别山休整。桂系与中共和解出现了可能性。张云逸致电毛泽东、朱德，建议利用蒋桂矛盾，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并建议以他个人名义通过香港转告李、白表示和解。经过一系列的统战工作，中共实现了与桂系关系的缓和。

桂系参与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在其大本营广西也掀起反共逆流。

①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54页。

② 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374页。

首先通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必须于1940年12月19日结束。后经中共争取，延期撤销。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对该办事处加紧压迫。桂林警备司令部执行桂系首领的反共方针，准备打击桂林八办。白崇禧对桂林文化界极为不满，开始执行比较严格的书刊审查制度，一些进步书店被封闭。对蒋桂在广西的种种反共行径，中共从各方面开展工作，争取尽可能保持双方的抗日合作。李克农为了做好安全撤退的准备工作，即时派国际新闻社张铁生找陈劭先，向陈说明皖南事变真相，陈听了感到震惊。陈劭先向省主席黄旭初作了汇报，然后张铁生去见黄旭初。黄旭初暗示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撤离安全放行。谢和赓利用其白崇禧秘书的身份，向白建议，通知黄旭初协助李克农等办事处人员安全离开，同时要桂系保护夏衍、范长江等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人员，使其安全离桂。因此进步力量损失不大。

桂系参加第二次反共高潮，目的为扩大在安徽的地盘，对其他地区并无多大兴趣。皖南事变后，桂系在广西桂林虽执行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仍留有余地。黄旭初没有按照蒋介石开列的名单抓人，对外来广西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做法，或限期离开，或礼送出境。《救亡日报》主编夏衍在离桂前向黄旭初辞行，并请他代买去香港的机票。黄即令副官予以协助。邹韬奋出于对国民党当局在重庆等地查封进步书店、逮捕进步人士的愤慨，辞去国民党参议员职务秘密来桂。蒋介石随即电令桂林办公厅拘捕邹韬奋，李济深帮助邹安全离桂后，才拿电文批办。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人员和物资也得以安全撤退到重庆。作为中共重点团结争取的对象，同时也由于蒋桂矛盾的演化及中日民族矛盾仍居主导地位，桂系在此期间没有反共到底，没有同中共彻底决裂，而是采取既反中共下层，又对中共上层留有余地的政策，与中共的关系一度紧张后又趋于缓和。

1941年1月，中共组织撤退时，留下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党员在桂林坚持工作。1941年6月，南方局派李亚群、孙士祥、刘隆华、徐鸣来桂，组成中共桂林统战委员会，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同时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桂林文化组，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三人组成，以邵荃麟为组长。李亚群和孙士祥分任桂林统战委员会正、副书记。周恩来还指示李亚群、邵荃麟等要做交朋友的工作，广西同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区有差

别，要充分利用这个差别和矛盾。1941 年底，南方局又派张友渔来桂林协助李亚群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与广西地下党不发生横向联系，主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界的工作。当时身为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是中共的主要统战对象，党组织派胡希明做李济深的工作，并通过李对桂系当局施加影响，为坚持抗战和恢复发展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总之，南方局对新桂系的统战工作，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对蒋桂区别对待，掌握不同的斗争策略，与桂系实行有效的合作。

随后，八路军办事处在桂林建立，由李克农担任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设立是广西地方实力派同中共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上述地方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的斗争，联合中共和中间民主势力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力量，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配合了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民主势力掀起抗日民主宪政运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

第五章　做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促进抗战文化繁荣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一次全面较量，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也是一场政治文化的较量。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南方局始终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的统战工作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政治斗争。不断揭露和击破投降阴谋，团结大后方抗日民主力量，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抗战文化活动，组成了广泛的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广泛的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日文艺运动，涌现出一股时代文化创造的新风。通过抗日文化、抗日文艺，宣传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得到了国民党统治区中枢人士、中间势力、社会贤达、知识分子及各界民众广泛的赞扬和支持。南方局领导的文化统战工作是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分，不愧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战斗争中的一个方面军，为夺取抗战胜利，乃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

第一节 实施正确的文化政策，引领抗战文化运动

一、提出正确的抗战文化方针

抗战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斗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分裂、倒退的斗争，团结大后方的广大抗日民主力量，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推动抗战，反对投降，引领抗战文化发展进步和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南方局一成立，就将抗战文化运动继续作为一件重要的大事来抓。南方局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运动的理论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从而使抗战时期文化统战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一，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中共把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作为“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认为它“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为此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对发展抗战文化问题“特别提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①]。既然是极端重要的工作，极应该广泛发展，那就必须摆脱国民党的诸多束缚和限制而放手发展，就必须同顽固派的限制政策与迫害行为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决定了在文化运动中也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要坚持在抗日前提的统一，又要独立自主地不断扩大抗日文化队伍，广泛和放手发展进步文化事业。

第二，关于抗战文化的基本指导方针。1939 年 8 月 4 日即南方局成立半年后，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长篇报告。在阐述文化宣传工作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文化政策的方向。”“文化运动的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487 页。

众化、民主化。"[①]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就是以这一基本精神作为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指导思想。这与毛泽东在后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强调,"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②]。所谓"民族的",就是它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谓"科学的",是指反对和批判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对外国的进步文化批判地吸取。所谓"大众的",是指必须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还强调,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但就整个国民文化的内容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更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当做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同时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勤劳的人民大众和小有产者占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③],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文化就必须是为这肩负抗日重任的劳苦工农阶级和小有产者服务,而不是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少数法西斯统治阶级服务。相反,对于"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④]。就是说,在抗战文化运动中也必须做到,在注重民族矛盾的前提下不忽视阶级矛盾,在坚持民族斗争的前提下不放弃阶级斗争。因此这时的文化指导方针是真正克服了左、右倾错误而适合抗战实际的正确的抗战文化指导方针。

第三,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就是要发展进步文化力量,团结一切抗日的文化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团结、培养和爱护文化干部;参加国民教育和发展国民教育等。这些不仅是根据地同样也是大后方和敌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这些任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的发言提纲,1939年8月4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706页。
③ 《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1日第2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

务都是为当时的抗战现实所需要的，周恩来和南方局也是围绕这些任务去推动大后方的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

第四，关于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方法与步骤。周恩来主张先求量的发展，后求质的进步；先求面的发展，后求深入；先求个性的发展，后求集体创造的成功；先求思想上的进步，后求艺术上的成功①。抗战文化运动的实践证明了这些主张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证明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方法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②

第五，关于组织抗战文化运动的队伍。根据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强调"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及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③。也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④。在这一正确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南方局大力改进和加强了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从而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环境险恶的大后方，取得了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贯彻执行抗战文化运动方针政策的同时，南方局着重加强对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等进步文化团体的领导，引领抗战文化运动朝正确方向发展。

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武汉已实际上形成了以第三厅和文协为主体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第三厅和文协转移到重庆后，这两大团体仍是基本队伍。南方局巩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主要依靠这两个团体中的中共组织和中共党员领导进步分子展开工作。

全国文协成立，中共曾先后派夏衍、田汉、冯乃超、叶以群等中共党

---

①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的发言提纲，1939年8月4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1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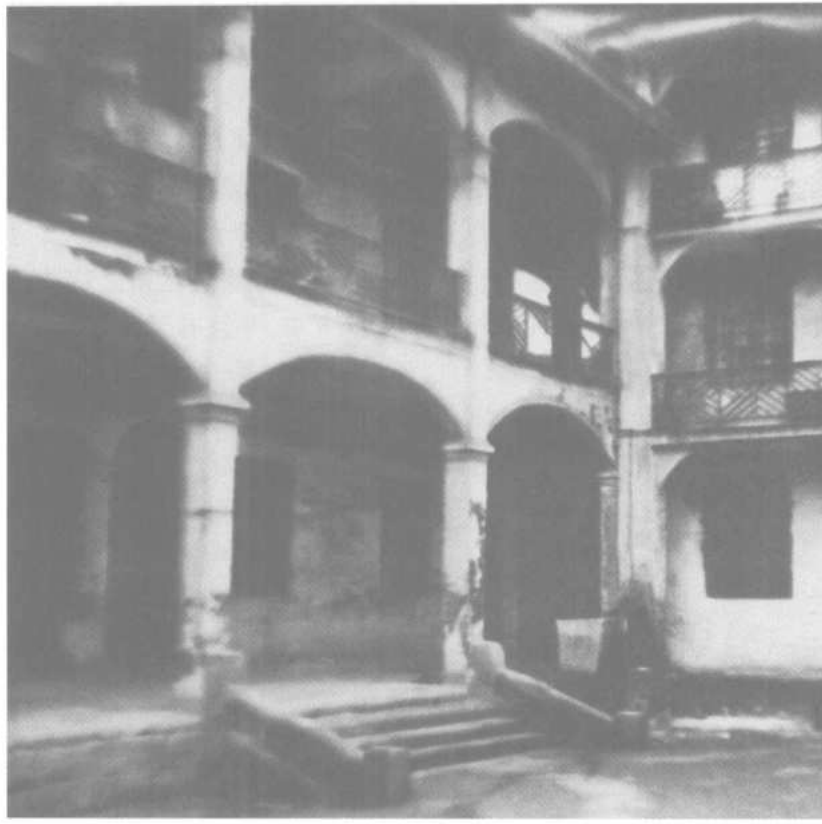
员，协助主持文协工作的总务部主任老舍等人的工作。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负责人经常会见在文协帮助做日常工作的叶以群，把党的意见转告给老舍、茅盾等，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文协的各种活动情况也都由叶以群报告南方局，南方局再组织《新华日报》和文艺界朋友积极配合加以报道，如《新华日报》为文协各项活动共发表通讯报道、社论评论等文章达215篇之多。文协在老舍的主持下，也主动争取中共领导。老舍说："有事我会找周公馆和郭老、茅公他们商议，有他们的支持和协助，张道藩的那一套就叫做螳臂挡车，自找现眼。这几年，我别的长进也许不怎么大，是非曲直总算看清楚了，救中国还得靠这个。""他用手比划了个'八'字。"[①]这段话生动说明了老舍这位进步作家跟共产党走，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鲜明态度。由于党的关怀指导和文协主动接受党的领导，文协各项工作开展得生动活跃，对抗日文化队伍的巩固和扩大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是遍设分会。文协入渝后特别是南方局成立后，不仅其总部会员增多、队伍扩大，还在各地成立了一大批分会。如1938年5月文协云南分会在昆明成立；1938年12月3日文协襄樊分会成立；1938年12月23日文协宜昌分会成立；1939年1月14日文协成都分会成立；1939年3月12日文协长沙通讯社成立；1939年3月26日文协留港会员通讯处在香港成立；1939年9月17日文协会员北碚联谊会成立；1939年10月2日文协桂林分会成立；1940年2月文协贵阳分会成立；1940年2月文协广东曲江分会成立，等等。未设分会的地方，也有文协会员并选有理事，称"外埠理事"或"各地理事"。各地文协分会的成立，表明文协作为文化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团体，其队伍迅速得到扩大和巩固。

二是公开召集各种纪念性的集会。如一年一次不同形式的鲁迅纪念会，号召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促进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和同顽固派的斗争。组织著名文化人如郭沫若、老舍、茅盾等人的诞辰或创作周年纪念。这些文化人的聚会，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强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同时也是进步文化人加强团结和联络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特别是一年一次的文协成立纪念会，是坚持和不断发展文艺界

① 《抗战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抗日统一战线，检阅抗战文化力量的大型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先后举办了“苏德战争前途”、“抗日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的分析”等讲座，向民众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形势，驳斥顽固派妥协投降的谬论，鼓舞国人的斗志；举办了苏联国庆24周年、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一周年以及纪念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家高尔基的活动。



抗战时期，进步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中苏文化协会

三是定期出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中断出版的文艺刊物，对推动抗战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文协会员还利用各地方的报纸刊物编辑出版报纸的副刊和杂志的文艺版，活跃文艺创作，推动通俗文艺的研究与实践。这就在实际上形成

了以《抗战文艺》为中枢的各地进步文艺界的经常而广泛的联系。

四是经常举行戏剧、小说、诗歌晚会及座谈会，开展对国外宣传，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发起援助贫病作家运动等活动。这些活动也都从不同角度扩大了文协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1939 年 2 月，文协在重庆召开有王平陵、谢冰莹、欧阳山、草明等人参加的小说座谈会。座谈会确定推选一个 7 人的小组委员会，负责对抗战以来的小说、报告文学等展开研究，并撰写文章向国外推介。1940 年 10 月上旬，重庆《新蜀报》副刊举行座谈会，出席的有田汉、沙汀、叶以群、宋之的等 20 余人。1940 年 11 月 23 日，文协召开了题为“1941 年文学趋向的展望”的汇报座谈会，对抗战三年来文学运动的成绩进行总结和展望。会议肯定了三年来抗战文艺运动的成就，指出了运动今后发展的方向。

调整充实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主体之一的第三厅。第三厅迁到重庆后虽不像文协那样发展顺利，并在受了种种压迫之后被撤销，但其工作和队伍却以另一种形式基本保留下来，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与扩大。第三厅与文协不同，它在政治主张、宣传方针等方面虽然实际上是由中共掌握，但它名义上却是国民政府下属的一个机构，其编制和经费都是由政府制定和拨给的。蒋介石之所以同意设立第三厅，一是可借此笼络文化人，装点门面；二是可宣传他这位抗战领袖。但他这个如意算盘却没能得逞。第三厅建立后，不但没有宣传歌颂他这位领袖，反而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因此，蒋介石对第三厅日益加以限制和压迫。第三厅由武汉迁重庆后，国民党对它的迫害日益加剧。

在国民党顽固派几次逼迫第三厅人员全体加入国民党遭郭沫若等拒绝之后，1940 年秋，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蒋介石竟以手谕下最后通牒：“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①]在这种情况下，以郭沫若为首第三厅人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为保存这批文化骨干力量，周恩来找到国民党军委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进行严正交涉，郑重提出要将这批名望很高的文化人送到延安去。蒋介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又玩弄起撤销第三厅，在政治部另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的阴谋。企图利用这样一个研究性的机构，把这些著名文化人圈起

①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1 页。

来，束缚他们的手脚。既不让他们到社会上参加政治活动，又不让他们跑到中共方面去，还美其名曰“离厅不离部”。蒋介石这一企图再次遭到第三厅同志的拒绝。后来，南方局从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出发，认为还是接受这一安排为好。周恩来向第三厅同志解释说，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文工会名义上仍算是政府机构，而有了政府这块招牌的掩护，我们便可以同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利用合法的身份开展我们的工作。周恩来的分析很有道理，第三厅的同志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文工会一直战斗到1945年才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但它的精神仍激励着人们。正如沈钧儒所说“机关可以解散，但文化工作者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解散的”①。

南方局对中苏文协进行了整顿，这也是当时巩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中苏文协，是1935年10月在南京成立的，1937年11月迁至重庆。它原是由孙科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出面组织的，曾从事过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宣传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进步的活动。当时孙科也比较积极赞同国共合作抗战。为扩大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队伍，争取利用中苏文协这个合法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团结、抗战、民主，

宋庆龄（右一）和宋美龄（右二）、宋蔼龄（右三）步出重庆中苏文化协会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339页。

抵制国民党的反苏宣传，增进中苏友谊。南方局通过多方面努力，安排王昆仑、屈武、刘仲容、郭沫若、阳翰笙、李德全、王炳南、侯外庐、翦伯赞、戈宝权、邓初民、葛一虹等国民党左派著名人士和中共党员及进步文化人进入该会，并且担任了各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使中共实际掌握了这个影响十分广泛的文化团体。例如其会刊《中苏文化》，就是由侯外庐任主编，翦伯赞任副主编。这个刊物后来实际上由南方局掌握，成了大后方又一个进步的文化宣传阵地。它在许多方面起到了与《新华日报》、《群众》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作用。中苏文协的下属组织妇女委员会，则有李德全、曹孟君、邓颖超、史良、劳君展、刘清杨、于立群等人参加，也成了南方局开展妇女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

图为《中苏文化》杂志

在南方局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努力下，中苏文协会员由初迁重庆时的五六百人，到抗战后期已达五万余人。它还先后在长沙（后沅陵）、重庆、成都、广州（后曲江）、桂林、贵阳、昆明、西安、迪化以及延安建立了分会。广泛开展各种抗战文化活动如节日、纪念日的庆祝集会，举办各种展览会，编辑出版《中苏文化》，翻译出版中苏友好等方面的书刊，为进步文化团体提供活动场所等等，这些对于充实抗战文化内容、巩固和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二、加强领导，巩固和发展文化统一战线

1939 年初，南方局在重庆建立后不久，便开展了文化统战工作。是年夏，专门从延安调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徐冰至重庆负责文化工作。1940 年，周恩来从苏联归国返渝后，即根据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的现状和需要，提出了健全南方局文化工作组织机构的问题。同年夏，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建立。同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区大城

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①]。南方局遵照这一指示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并决定由凯丰、周恩来直接负责文委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0月4日，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宣布了文委的正副书记、秘书、委员、分组及负责人名单，并于同月22日将文委的组成情况向中共中央正式汇报。南方局文委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成熟期的到来。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下增设文化组，由南方局文委兼其工作。到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与重庆局迁往南京，南方局文委即告结束，四川省委文化组在重庆继续工作。

1940年10月，南方局文委书记由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兼任，周恩来兼副书记，徐冰任秘书，负责日常工作。委员有胡绳、沙汀、冯乃超、潘梓年、蒋南翔5人，下设书店、社科、文化、文艺、宣传、新闻6个组。书店组由徐冰、冯乃超、胡绳负责，社科组由胡绳负责，文化组由胡绳、潘梓年、戴白桃（戴伯韬）、蒋南翔负责，文艺组由沙汀、光未然（张光年）负责，宣传组由冯乃超负责，新闻组由潘梓年、刘述周、吴江负责。1940年11月，凯丰离渝回延安，周恩来兼任文委书记。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徐冰负责文委并兼任南方局统委文化组组长。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文委人员变化较大，其详细变化过程尚未查证清楚。南方局文委成员先后离渝的有蒋南翔、沙汀、光未然、戴白桃、胡绳，有的如沙汀、胡绳去而复返。

南方局文委力量得到加强。夏衍、胡绳、张剑虹、司徒慧敏、何其芳、刘白羽、沙汀、邵荃麟、陈舜瑶、周而复、林默涵等先后至渝，参加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徐冰、夏衍、何其芳、邵荃麟、潘梓年、冯乃超、胡绳等人负主要责任是可以肯定的。1945年夏秋至1946年初，夏衍、胡绳、徐冰、邵荃麟、潘梓年等相继离渝，由何其芳负责文委的工作，直到1946年5月。其他如许涤新、吴敏、洪沛然等人也参加了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另据戈宝权回忆，他于1940年参加文委，皖南事变后去香港，1942年下半年回渝重返文委，1945年底离渝。张友渔在《报人生涯三十年》中回忆，1943年春他从桂林到重庆后参加文委，且司秘书长之职。

①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南方局文委是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同时又是文化工作上的具体执行者。文委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情况，广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组织、引导、配合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展各种活动，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的罗网，以求文化界为抗战而团结、进步，促进抗战文化的健康发展。

南方局文委负责的文化运动在地域上包括南方局领导的南部国民党统治区域、部分沦陷区、港澳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事实上，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主要在重庆开展。其他各省区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推动由南方局领导的各省区党组织负责，或成立专门的组织，或指派专人负责。这种负责是多层次多渠道的。在成都、桂林、昆明、香港、金华、永安、恩施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化城市中，都有专门的组织和专人负责文化工作。如桂林，先有李克农（桂林“八办”负责人）、夏衍（《救亡日报》总编）等人负责。皖南事变后，又有李亚群负责的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下设文化工作组，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张友渔等人负责；香港的文化工作，先由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香港文化支部（罗理实、李游子、杜埃等先后任书记）负责，后由香港“八办”和中共香港市委共同领导。1941 年 5 月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 5 人组成，下设文艺、学术、新闻 3 个小组。各组又设有座谈会，如文艺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学术座谈会、新闻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等。金华、永安等地的文化工作，先后由浙江省工委文化组（骆耕漠、邵荃麟）、东南局文委（邵荃麟、冯雪峰、骆耕漠）负责。广州的专门组织有广东省委粤北地区文化小组（何家槐、李育中）、广东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谭天度任书记）。除了上述专门的组织之外，南方局还根据大后方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团体、进步力量强弱等情况，或建设特别支部，或进行单线联系，在大后方文化界建立起一套全面有效的领导网络。如第三厅和文工会有中共特别支部（冯乃超任书记），政治部 7 个抗敌宣传队中有中共党员的，都建立了支部，归第三厅和文工会中共特别支部领导，皖南事变后改为单线联系。在大后方大部分的文化团体中都有中共支部，甚至在《大公报》、《扫荡报》、《商务日报》、《益世报》等报社中都有中共党员，有的还建立了支部。这样加上南方局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如郭沫若、阳翰笙、杨东莼、范长江、刘仲容等人，便从上到下形成了中共对大后方文化

运动进行领导的核心。这无疑是一套全面系统、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组织，它保证了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

“文工会”经常举办各种文艺学术讲座，推动进步文化发展。图为在赖家桥的一次学术讲座参加者合影。中坐者右起：郭沫若、杜国庠、翦伯赞

南方局文委与各省区负责文化运动的机构没有组织上的从属关系，在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的文化运动与各省区的文化运动互相配合，互相推动。但由于周恩来兼南方局文委书记，该委员会对各省区文化工作机构又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周恩来除不定期向各省区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外，当各省区党的负责人到重庆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徐冰等也常向他们通报南方局文委的工作情况。另外，《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报刊在很大程度上担负起了向各省区党组织传达南方局关于文化工作精神的任务。受南方局领导或影响的文化团体中的成员在往返于国民党统治区各城市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沟通、联络重庆与各省区文化工作的作用。如第三厅（后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协、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国际新闻通讯社（简称国新社）、青年记者协会等文化团体的成员，除以私人身份捎带回信、通过信函往来外，主要以文章、演出、刊物的传播来承担联络工作。

在各文化据点中，香港、桂林等地中共的文化工作组织与南方局文委的关系尤为密切。1941 年 5 月成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在周恩来

亲自安排下成立的，有南方局文委委员胡绳等参加。香港文委一方面在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共对外宣传的据点，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承担起了处于“隐蔽时期”的南方局文委的工作。香港沦陷后，香港文委的大多数成员又都参加了南方局文委的工作。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下设的文化组团结了大多数文化工作者，使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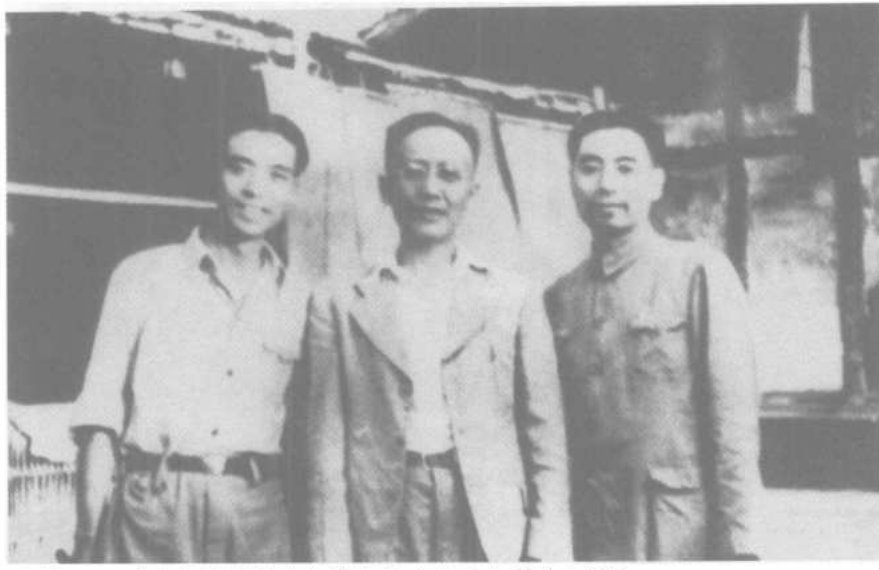
南方局文委设在曾家岩50号内，每两三周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由各成员汇报主管各方面的情况。在了解文化界动态后，分析各种倾向，讨论后决定工作方针、政策，由各成员分头执行。遇有重大活动时，则不定期召开研究会，邀请《新华日报》的同志以及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参加，征求各方看法和意见后，由《新华日报》和各方面配合行动。在活动基本告一段落后，南方局文委还要召集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南方局文委是秘密的，成员都是以合法的身份出现在重庆的各条文化战线上。冯乃超是以《红纱灯》诗集蜚声文坛的象征派诗人，创造社中坚，文协理事，第三厅第六处第三科科长（后任文工会第三组组长）。潘梓年是左联时期的作家，《新华日报》社长，文协候补理事、监事，著有《逻辑与编辑学》。光未然是《黄河大合唱》组诗的作者，第三厅的科员，文协诗歌朗诵队队长。胡绳是著名的学者，文协会员，《新华日报》编辑。夏衍（沈端先）是外国文学翻译家、电影家、剧作家，新闻工作者，《救亡日报》总编、文协理事，《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兼代总编。邵荃麟是文协桂林分会理事、文艺理论家，名著《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译者，重庆《文艺杂志》主编。戴白桃是教育家，《战时教育》的创办者，陶行知的左右臂。

南方局文委的成员以及文委领导的中共特支的成员，以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和在文化界的地位，广泛结交文化界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影响和团结了茅盾、胡风、老舍、陶行知、邹韬奋、侯外庐、王昆仑等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扩大和巩固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文委通过进步文化人占优势的第三厅、文工会、文协、中苏文协、剧协、自然科学座谈会、生活教育社等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机构、组织，推动、配合进步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在整个文化运动中，南方局文委始终高度信任文化人，贯彻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

尤其重要的是，南方局文委以《新华日报》为号角，聚集队伍，开展活动。早在1938年夏，由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作出党内决定，确认以郭沫

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勇敢奋斗的精神，在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等许多方面都有巨大成就，在文化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通过郭沫若的活动



图为 1941 年（右起）周恩来与郭沫若、阳翰笙在重庆赖家桥

来贯彻中共在文化界的方针、政策，实现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领导。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文工会，不仅成为文化界统战工作的典范，也是文化界进步人士活动的民主堡垒。郭沫若的住宅“依庐”，不仅成为南方局文委经常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布置工作的指挥所，也成为文化界人士了解中共的主张、明确奋斗方向的重要据点。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发起的全国规模的纪念郭沫若 50 寿辰和创作 25 周年活动，不仅明确树立了郭沫若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而且开创了在低潮时期开展文化活动的新形式。周恩来指示以话剧冲破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黑暗，郭沫若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等 6 部历史剧，带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周恩来在革命低潮时期“保存实力”、“提倡研究学习”的指示，郭沫若埋头研究，写出《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带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充分肯定他的贡献，以他为进步文化界的领袖和旗帜，既可加强对文化界的号召力和增强文化界的凝聚力，又有助于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和引导文化人，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

郭沫若(站立者左二)与夏衍、舒绣文等进步文化人在重庆

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文化界为抗日民主文化旗手郭沫若50寿辰暨创作25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图为郭沫若站在人们送他的寿礼——刻着"以清妖孽"字样的大笔前与文工会成员合影。左起:石凌鹤、罗髯渔、乐嘉煌、郭沫若、刘仁、冯乃超、郭劳为

担负宣传指导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运动是《新华日报》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筹备创办《新华日报》时，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党报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领导机构，党报委员会由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何凯丰、邓颖超、潘梓年等组成，陈绍禹任主席。1939 年 1 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由周恩来继任主席。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这个委员会对外则称董事会。

图为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中）、总编辑吴克坚（右）、总经理熊瑾玎（左）在报馆工作的情形

开始，由陈绍禹任董事长，1939 年 1 月起，改由周恩来继任。这个机构的设立，对《新华日报》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起着直接领导的作用。在它的领导下，制定了《新华日报》的章程。章程规定：董事会是报馆的最高权力机构，下设一室三部（经理室、编辑部、印刷部、营业部）。社长潘梓年，编辑胡绳、戈宝权、夏衍、何其芳、许涤新、刘白羽、林默涵等，又都参加了南方局文委的工作。《新华日报》是南方局文委开展文化界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新华日报》开辟了“文艺之页”、“经济讲座”、“自然科学”、“青年生活”、“工人园地”、“妇女之路”、“日本研究”、“戏剧研究”、“时代音乐”、“木刻阵地”、“科学专页”等副刊专栏，通过约稿形式，结交了大批的文化人。其中的“自然科学”专页还是由自然科学座谈会中的专家代为

编辑的。文化界朋友以和《新华日报》交友为进步的标志。南方局文委主要通过《新华日报》宣传南方局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运动的方针、路线，以《新华日报》组织、推动和配合文化界开展统战活动。《新华日报》上许多关于文化的社论、专论和短评，都是南方局文委根据文化界的状况和政治需要，集体讨论后委托专人撰写的，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具有指导作用和推动作用。如对"与抗战无关论"、"艺术至上"、"纯文学"的批判；对"民族形式的问题"的讨论，对"战国策派"、《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对国民党专制文化的揭露；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宣传；对"民族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的宣传等。《新华日报》一方面为抗战文化运动提供宣传阵地；一方面通过对文化运动的实质介入，引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南方局文委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及南方局文委成员们的工作方式、作风、品格，对当今文化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第二节　关心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聚合进步文化力量

一、团结关心爱护进步文化人士

巩固和扩大文化统一战线，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经常注意团结、关心、爱护进步文化人，同他们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不仅政治上要促使他们进步，而且在生活上也要尽量想办法关心他们，使他们拥护中共的正确主张，认识到共产党人确实是为国家为民族的，是光明磊落、可以信赖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文化人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虽然大多数人仍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救国思想，但也有人对国民党顽固派认识不清。有的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深感不满，但对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又不甚了解，因此往往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原先那种热烈而激昂的抗日情绪，此时则陷入低落。也有的虽赞成抗日救国，但不愿参加政治斗争，把文化与政治割裂开来。还有极少数文化人则

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反共独裁效力和卖命。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要把大后方的绝大多数文化人团结和争取到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为目标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中来，就需要南方局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直至感情交往、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早在1937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就曾明确指出："应该到处公开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胜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它党派的不彻底与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①]中共中央1939年12月1日发出的《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即强调在组织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中，"文化人及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指导思想，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正确分析了文化界的思想状况，并针对这一状况，坚决贯彻执行从政治思想上教育和引导文化人的做法。如大力向文化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指出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企图妥协的真相，揭露和批判汪精卫之流的叛国罪行；鼓励文化界人士到抗日前线去开展工作，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等等。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提高文化人在新形势下对抗战的认识。

1941年5月，为和广大文化工作者建立较融洽的关系，周恩来曾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给廖承志以具体指示：第一，不能仍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已经进步了，已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因他们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从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也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因为他们终究是做上层统战及文化工作的人，故仍留有一些文化人的习气和作风。这虽然如高尔基、鲁迅也不能免的。何况他们乎。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列宁……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般文化人前进。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南方局和所辖机构通过各种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周恩来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自己带头广交朋友，并将交友作为南

① 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1937年8月12日，《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第6页。

方局的一项基本任务。他经常带领文化界党员干部到民主党派和文化人士云集的地方听取意见、探讨时政。

周恩来还曾多次教育党员干部在做文化人的工作时，一定要注意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平等待人，不要以领导者自居。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他在指导夏衍如何做交朋友的工作时说："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的面要更广一些，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还对夏衍说："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①]南方局许多同志都遵照周恩来的这一教导，以诚挚友好、平等待人的态度广交文化界的朋友。南方局之所以能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周恩来所倡导的以诚相待、广交朋友这一点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广泛开展知识分子工作，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与他们做知心朋友。图为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与出席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的文化界人士在一起。左起：叶圣陶、冯雪峰、舒舍予（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胡风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04页。

不仅在平时注意广交朋友、以诚相待，在患难之际或危急时刻，南方局和周恩来更是挺身而出，尽力保护和关心进步文化人。1941 年初皖南事变后，政治局势十分险恶，进步文化人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时周恩来不顾自身安危，亲自抓保护文化界朋友的工作，将文化人分类分批撤离和疏散。而文委的主要工作，则是全力说服文化界人士离渝。皖南事变后的一个月左右，周恩来每晚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朋友。不仅谈团结抗战，而且谈历史、谈哲学、谈戏剧、谈经济，等等。周恩来同文化界朋友的这些接触与谈话，使许多文化人都十分感动，终身难忘。例如侯外庐在回忆中就曾这样写道："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所在地——重庆，周恩来同志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青年筹划路费，安排去处。"在南方局的安排下，何其芳、林默涵、欧阳山、草明、艾青、刘白羽等撤到延安，田汉、光未然、石凌鹤、贺绿汀等去昆明，茅盾、叶以群、金山、杜国庠、柳亚子等去香港。路费则是由重庆八办特别经费支出。总计安排疏散的文化人有百余人。在桂林，也是根据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示，对文化人进行了周密的疏散工作，将夏衍、邹韬奋、张友渔、范长江等安全地转移到香港。南方局领导的这次安排撤退十分成功，没有一个文化人落入国民党手中。

在政治上帮助文化人进步。中共省港地区的有关组织通过各种座谈会、读书会、个人联络等形式，帮助文化人走在时代的前列。例如，廖承志通过从事文化联络工作的杜埃关怀茅盾。杜埃经常转达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对茅盾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帮助，茅盾非常感谢，经常说："党很穷，自己生活上能够解决问题，就不给组织添麻烦了。"杜埃定期把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送给茅盾，茅盾总是捧着报纸说："有了它，就有了指路明灯。我怎能一个人就独占一份呢？"[①]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在香港要得到一份《新华日报》确实不易，中共内部也是往往几十人轮流阅读一份报纸的。茅盾掌握这份报纸，有如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如虎添翼。他正是根据《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对解放区的报道，写了不少著名文艺性评论文章和介绍解放区文艺动态的报道，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文艺阵地》、《立报·言

① 杜埃：《临归凝睇，难忘蒿雷——悼念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茅盾同志》，《羊城晚报》1984 年 4 月 10 日。

林》、《笔谈》上的。

又如，从德国回国的乔木（乔冠华）1938 年来到香港，担任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总编辑，廖承志和连贯马上与他取得联系。廖承志等在政治上非常关心这位年轻的德国哲学博士，并于 1939 年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让乔木能将自己渊博的学识紧密联系到斗争实际，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替他在一家书报社订购了世界重要报刊，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经济学家》、《后时代》、《亚细亚杂志》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他在政治上、工作上的关怀，他写出了大量非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

一些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在中共负责人关怀下加入党组织。黄文俞回忆："1938 年起，我在香港开始了写作生涯，颇有点小文化人的味道。那时开始有几个比我年轻几岁的'文艺青年'经常同我接触，说是向我讨教，称我为'先生'。我观察他们的言行，认定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还认定他们之所以与我接触，是听令于虞焕章的。其后，又有二位诗人每周与我约会，我认定他也是虞焕章派来的，1941 年 6 月 2 日，我被吸收入党，是日举行宣誓仪式，以监誓人身份出现的就是虞焕章。"①

像徐迟这样的进步青年诗人则被吸收到马克思主义读书班，钻研《资本论》、《法兰西内战》、《新哲学大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费尔巴哈》等，以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徐迟回忆这是"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第二次诞生"②。甚至像戴望舒这样的现代派诗人，在参加夏衍、张友渔主持的文艺座谈会之后，其诗风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同程度上接近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习惯，创作出为人民所称道的诗篇。

又团结又斗争，争取更多文化人。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文化人从事抗战文化事业并坚持正确的方向，中共省港地区有关组织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1939 年 3 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国民党当局想通过其在港的立法委员简又文来夺取香港文化界的领导权。但文协香港分会的核心是由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所组成，他们自觉接受中国

① 黄文俞：《寂寞中的怀念——悼杨康华同志》，《羊城晚报》1992 年 3 月 13 日。

② 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3—337 页。

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投票选举的结果，简又文仅仅当上候补理事。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于同年9月指示简又文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促进会，企图削弱文协香港分会的影响。鉴于大敌当前，且参加中国文化促进会的大都是教育、学术、艺术方面的上层人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指示文协香港分会对其采取团结的方针，经常联合该会举办各种宣传活动。同时，派杨刚以《大公报》副刊主编身份，参加该会并担任理事，戴望舒、许地山等也在其中起积极作用。这样，团结和争取参加该会的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广东国民大学校长吴鼎新、广东教育厅长金曾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陈训畬、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国民政府中央大员叶恭绰等属于中间势力的文化界头面人物，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

非常关怀国民党统治区音乐艺术工作者。南方局采取多种方式将音乐艺术工作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经常举行名人纪念音乐会。1938年12月24日，张曙在桂林被日军飞机轰炸殉难，重庆文化界郭沫若、田汉等发起，于1940年9月3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追悼大会，周恩来等100人参加大会。1946年1月5日，重庆文化艺术界在江苏旅渝同乡会礼堂举行“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参加大会的中外人士1000余人，周恩来主祭。《新华日报》出“冼星海特刊”，发表纪念文章。周恩来强调要与音乐界广交朋友，同舟共济，并且指出要做音乐界上层统战工作。他经常接见著名的音乐艺术家。如1941年，他先后接见了在育才学校音乐组义务任教的小提琴教育家、演奏家马思聪、黎国荃，钢琴教育家、演奏家范继森等，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并指示李凌等和他们建立具体联系，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关心下一代音乐艺术天才的成长。1939年1月8日，军委政治部孩子剧团抵渝。1940年8月，周恩来、邓颖超去重庆市郊区赖家桥全家院子看望孩子剧团的小朋友，同时观看了小演员演唱的《太行山上》、《流浪儿》等节目。周恩来勉励他们继续努力，要一面做好抗日宣传工作，一面要挤时间学文化。总之，在南方局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音乐活动，冲破了国民党的禁锢和封锁，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①

① 唐守荣、杨定抒：《周恩来与国统区抗战音乐》，《人民音乐》1998年第2期。

抗战以来，广大作家为民族解放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然而他们却在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专制主义的三重压迫之下，长期处于贫病交迫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如创作了《丰收》的年轻作家叶紫，因奋发工作而积劳成疾，被迫回乡养病。贫病相侵，他仍从事写作，1939 年 10 月年仅 27 岁，即猝然长逝。著名戏剧家洪深也是贫病交加，生活极度困难，由于物价飞涨，1940 年冬，18 岁的爱女因药价暴涨无钱治病而身亡，后来洪深又得了慢性疟疾等病，无钱治疗，一家三口被逼无奈，竟于 1941 年 2 月服毒自杀，幸得抢救及时才脱险。洪深在服毒自杀前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控诉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1942 年 9 月 26 日重庆《商务日报》的一篇报道说，黎莉莉、舒绣文、白杨、张瑞芳、谢添等影剧明星，其"高薪"者只能买半担上等米或两斤多白糖，最低薪者连半斤白糖也买不到。桂林由于货币贬值，广西大学教授进城，竟有把皮鞋放挎包里舍不得穿而穿破布鞋或草鞋，到了城边再换上皮鞋的。当时一般文化人都是寅吃卯粮过日子。可许多私营不法出版商还乘机拖延、克扣作家的版税和稿费。不少书商发了财，而著述者却穷困不堪。从 40 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又加强审查来扼杀抗战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同时开始对宣传抗战的戏剧征收高额捐税，实际上是"寓禁于征"。其税率竟高达票价的 25%，这给文化人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困难。

文化人生活日益恶劣的状况，严重影响着抗战文化队伍的巩固和抗战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局一方面尽力周济资助贫困文化人。如 1941 年 2 月 5 日，周恩来派人前往慰问自杀未遂的著名戏剧家洪深并资助其全家治疗休养①。周恩来还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振"南社"，并愿意为他解决困难②。另一方面通过文协发起了遍及大后方广大地区的募集援助贫困作家基金运动。1944 年 7 月 15 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文协的《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简称《缘起》）。《缘起》说："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勖军民从忠勇，曾未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42 页。

② 李世平主编：《周恩来和统一战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42 页。

而病，因病而更贫；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苟乃任其自生自灭，则文艺种子渐绝，而民族精神之损失或且大于个人之毁灭，因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由本会组织委员会妥为保管，专作会员福利设施之用。一元不薄，百万非奢，爱好文艺者必乐为输将！"[①]《新华日报》在发表《缘起》的当天，"为响应文协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就率先捐款一万元[②]。在筹募运动发起月余，1944年8月20日，著名作家王鲁彦因患肺结核无钱治愈，病逝于桂林。周恩来得知后，除了发唁电，还嘱冯雪峰转送捐款。《新华日报》接连发表了王鲁彦的死因、死讯、追悼等相关消息，使各地各界人士纷起响应。参加筹募者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热情的儿童，有勤苦的教师，有进步的工人，有新闻记者，有抗日将士，有清贫的公务员，有年轻的文艺爱好者，有命运与共的美术家、音乐家、科学家、戏剧工作者，还有盟国的友人……推动了募捐运动的发展。这次持续近半年（至1944年12月31日止）的援助贫病作家运动，共募集了达700多万元的基金。募集的资金约三分之一，用于援助因日军的进攻，在桂林等待紧急疏散的作家，资助了若干境况窘迫的贫病作家以及逝者的遗属，为贫病作家解决了不少困难。这次筹募运动除了经济意义外，还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当局对作家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专制主义压迫所造成的恶果。其次，进一步密切了作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并进一步增强了作家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力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再者，它鼓舞了作家们的斗志，给了作家们继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血汗没有白流，从而更增强了他们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对稳定抗战文化队伍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南方局对大后方进步文化人的关心和保护，不仅保全了一大批文化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避免了革命文化力量的过多损失和牺牲，而且增强了广大文化人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增加了对共产党的信赖，进一步促进了大后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① 《新华日报》1944年7月15日第3版。
② 《新华日报》1944年7月15日第3版。

二、精心组织文化人士大转移

南方局领导的文化统战工作，为保护中国文化界精英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两次精心组织文化人士大转移。第一次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组织沦陷区一批又一批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和香港，并指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领导这些文化人士，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才干，占据香港的宣传文化阵地，充分发挥这些文化人宣传抗战文化的作用。第二次是1941年12月8日，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旅港文化人陷入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险恶境地时，南方局指示中共香港工委、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周密地组织并具体承办了抢救这些文化人的秘密大转移工作，并在文化人撤退至内地和大后方途中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等指示长江局组织力量陆续将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及时转移到香港、广州，这其中包括著名人士宋庆龄、何香凝、茅盾等人。1938年底广州、武汉沦陷前后，又组织一批文化人士撤退到香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后，廖承志等在港负责人，认真总结过去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活动的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①。为了把到香港的文化人士较好地组织起来，通过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和恢复了一些抗日报刊和新闻机构，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新闻通讯》，萨空了主编的《立报》，何香凝任名誉主编的《侨胞》，恽逸群等负责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1939年1月，在廖承志等人的指导下，胡愈之、范长江筹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作为团结香港报人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②。在南方局的卓越领导以及香港工委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有效工作下，妥善地化解和消除了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把旅港文化人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建立了最广泛的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使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香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① 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9年9月至11月香港的政治环境、群运、统战等工作》，1941年2月26日，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② 袁小伦：《港岛殊勋——周恩来与战时香港文坛》，《广东党史》1999年第4期。

重要的文化宣传阵地，其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强大的生命力的抗战文化运动与内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文化专制统治形成鲜明对照。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中心之一。图为何香凝在香港与文化界人士合影。右起：欧阳予倩、廖梦醒、洪遒、何香凝、丁聪、夏衍、瞿白音、陈歌辛

1941 年 1 月初，国民党顽固派指派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率军围歼皖南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乘机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面临全面破裂的危机。面对危局，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临危不乱，一方面坚持斗争，及时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在险恶的形势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秘密而周密地布置了战斗在重庆的党员干部和文化人的撤退疏散工作。当时安排一部分干部撤退回延安，另一部分主要是文化人撤退到桂林和香港。对于撤退到桂林和香港的文化人，除了交代徐冰仔细组织外，如戈宝权、胡风等，周恩来还亲自约他们谈话，做好思想工作，交代任务使命。由于计划周密，安排妥当，被疏散的文化人全部安全到达桂林和香港。当时疏散的多数文化人都撤退到香港，其目的，第一是对国民党破坏抗战、背信弃义的一种强烈抗议，第二主要是利用这部分文化人撤退到香

港，转换阵地作战，在香港形成据点，办报纸、写文章、出书刊，占领香港文化阵地，再反射到内地来。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香港工委的领导下，撤退到香港的文化人，依托南方局正确的领导，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逐步占领了文化阵地，巩固扩大了文化统一战线，使香港成为中共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争取国际援助的纽带。这两次撤退到香港文化人的行动，既保护了大部分文化人，又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充分发挥了这些文化人的才干，达到了一举两得的目的。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香港，大批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处境十分险恶。周恩来和南方局急电在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港中存款可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负责开支……"[①]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香港组织负责人廖承志与驻港八办及东江游击队，经周密部署、奋力抢救护送，使留港

图为九龙元朗十八大塘村杨家祠，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广九大队武工队设立的据点和重要交通站。此站为营救香港文化人起过重要作用

① 《转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汉年等》(1941 年 12 月)，《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0—211 页。

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邹韬奋、茅盾、张友渔、千家驹、黎澍、范长江、乔冠华、夏衍、胡风、戈宝权、叶以群、高士其、司徒慧敏、金山、王莹、叶浅予，等等，连同他们的家属共800多人，无一损失地安全转回内地。这次秘密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谱写了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和文化统一战线的一曲凯歌。茅盾曾称这次行动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南方局疏散和撤退文化人工作，计划分别走东西两条路线，即从九龙经新界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和从香港到澳门或广州湾（湛江）转移到桂林。随后，各方面负责人就营救工作进行了分工。廖承志、连贯等人由游击队护送到西贡经水路回内地，沿途作传达、部署；刘少文、梁广等人继续留在香港组织营救工作；张文彬、尹林平等回东江游击队与曾生、王作尧等具体筹划接应文化人到游击区的措施。经过一环紧扣一环的营救工作，大批文化人陆续撤回东江等地。与此同时，周恩来和南方局就如何妥善安置内迁的文化精英们作出一系列指示。遵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部署，东江游击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疏散办法。到1942年5月，除暂时隐蔽于梅县的邹韬奋外，文化人全部安全撤离了广东。到桂林的文化人，由南方局下属的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的李亚群及脱险归来的夏衍、张友渔等利用李宗仁、李济深提供的经费，或留住桂林，或把公开的送到重庆，把不宜公开的转送到苏北新四军处。[①]在重庆，周恩来亲自对自香港脱险归来的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1942年3月12日，他致函郭沫若，共商对到达广西桂林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②]

南方局组织的这次"秘密大营救"行动，历时200多天，行程数千里，遍及十余省市。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共抢救出文化人及家属800人，并接应了数千回内地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③]精心组织文化人士大

① 中共惠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东江党史资料汇编——抢救文化人专辑》，1984年印，第17页。

② 《共商救济文化界朋友办法——致郭沫若》（1942年3月1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18页。

③ 袁小伦：《港岛殊勋——周恩来与战时的香港文坛》，《广东党史》1999年第4期。（注：陈弘君、官丽珍在《周恩来与广东抗战》一文中认为此次抢救文化人行动，共抢救出800多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梦菲在《周恩来与邹韬奋的革命友谊》一文中也认为这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活动，共营救出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家属。刘蜀永在《香港史话》及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两部著作中均持800余人之说。据此判断，抢救出800人之说更为可信。）

转移，体现了南方局对文化人的真诚相待和无私援助，为中国共产党与文化人之间互相信任、共同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深入开展

南方局在做好文化界抗战文化统战工作，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也注重做好国民党上层开明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文化统战工作，力求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使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向深度发展。

……是争取国民党上层文化要人，促进国共合作抗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为了尽快结束对华战争，改变了侵华方针，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引起了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其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但是"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①。基于此，争取国民党内进步派、中间派上层文化人士的工作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时任监察院长，声望极高，尤其在文化界影响甚大。《新华日报》报头就出自于右任的书法。南方局确认他是可以争取的重要人物。1939年冬，周恩来对屈武说：你见老先生，请转告他，"汪精卫已由重庆逃跑，投降日本去了。他虽然走了，目前重庆还有更重要更危险的投降派，他们直接间接地和敌人勾勾搭搭。请于先生注意，他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应该在国民党内仗义执言，做扶倾救危的工作"②。屈武一一转告了于右任。1940年12月7日，由南方局实际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380多人参加。南方局邀请于右任与会，他欣然出席并签名祝贺。1941年4月1日和1942年8月21日，于先后发表广播稿《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和《神圣抗战与最后胜利》，在当时文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周恩来曾对屈武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于先生是你的老长亲，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0页。

②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陪都人物纪事》，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助他认识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①于右任毕竟是国民党人，对于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多有误听误信之处。他曾问屈武："据说我们国军在前方抗战，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支，他们不打鬼子，一味地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企图是什么？"②屈武列举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许多事实，对国民党的歪曲言论一一加以澄清。通过中国共产党细致的工作，于右任对共产党的认识了解逐步加深。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当得知事变真相乃是蒋介石的一大阴谋之后，他怒斥"这种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是破坏抗战！"看到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所做的极力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的工作时，他由衷地赞扬道："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伟大！"③周恩来还通过郭沫若团结争取于右任。于、郭友谊甚笃。在1941年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诗人节上，于右任写诗抒怀。郭沫若在5月30日晚会上，亲自诵读于右任的诗："民族诗人节，诗人原不忘。乃知崇纪念，用以懔危亡。宗国千年痛，幽兰万古香。于今期作者，无畏吐光芒。"④于右任对爱国诗人屈原予以高度评价，反映出他的爱国之心。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使他内心折服，推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亲自赴渝和谈。于右任以国民党元老身份隆重设宴款待毛泽东，并请声名显赫的丁唯芬、陈立夫、叶楚伧、张群等作陪，对重庆谈判时期中共和南方局进行的统战工作无形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二是利用地方实力派为抗战文化发展服务。抗战爆发前，中共曾经对一些地方实力派进行过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继续把地方实力派作为抗日统战的重要对象，争取他们坚持团结抗战。广州、武汉失陷后，大后方越来越显示其抗战的重要地位，南方局决定利用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大后方广泛发动和领导抗战文化运动，进一步推动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首先，在广西是利用新桂系对蒋介石蚕食广西地盘的戒心，加强同他们合作，争取他们支持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

①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陪都人物纪事》，第21页。
②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陪都人物纪事》，第22页。
③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陪都人物纪事》，第27页。
④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陪都人物纪事》，第28页。

其次，利用桂系借助进步势力同蒋介石抗衡的状况，将中共领导或受中共影响的大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

第三，利用桂系抵制蒋介石势力渗透的机会，派遣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打入新桂系举办的各种文化机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救亡文化活动。

第四，利用新桂系民主派的掩护，大力开展抗战文化活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了，组织起来了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正像郭沫若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家、各种艺术部门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等不分派别、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

第三节　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以重庆、桂林为中心的抗战文化运动的勃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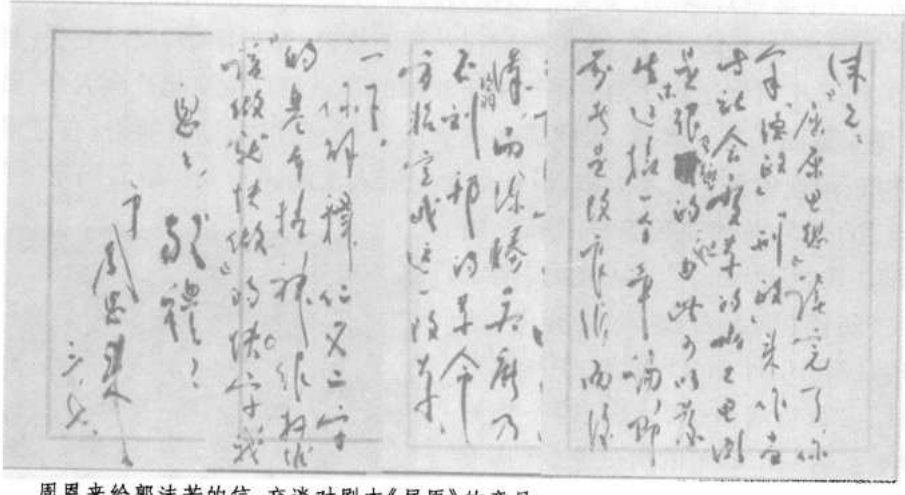
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由于是南方局的大本营，抗战文化的领导中心所在，汇集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和第三厅、文协等进步文化团体，从国民党迁都重庆时起，就形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文化的中心。在中共影响下的文艺界抗敌协会、电影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广泛开展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遍及乡野，振奋人心，推动了全民抗战，并为后来的民主运动播下了种子，也使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中心之一。如每年的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七七纪念、鲁迅逝世纪念等活动，中心内容都是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每次纪念鲁迅的大会，都开成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和提高士气的会议”[①]。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为钳制思想，争夺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笼络中间力量，成立了“文化运动委员会”。骨子里反共，场面上又不得不乔装掩饰，所以有时也空洞地呼吁抗战，也模仿着搞个纪念会之类。对此，南方局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有利于进步，加以利用，甚至主动周旋；只要国民党一冒出反共本相，就加以抵制和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5页。

反对。在大后方进步的民众文化运动中，戏剧的成绩尤为显著，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的藩篱，组织爱国戏剧演出，再现抗战文化的热烈氛围。皖南事变发生，部分文化人被迫转移，抗战文化空气一度沉闷。有压迫就有反抗，激起了大后方民主进步人士的无比愤怒，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中共在文化战线迅速占领并扩大阵地，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还击，而最有力的活动莫如演话剧。于是，周恩来同郭沫若、阳翰笙一起研究，决定把分散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场”等电影厂的进步编剧、导演、演员、美工组织起来，筹备成立一个民营剧社，用历史剧来占领舞台，在重庆发动了一个雾季戏剧演出运动。以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手法进行战斗，宣扬爱国，鞭挞投降，贯彻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由于戏剧的特点是直接唤起社会大众，要“抛头露面”，容易暴露，因此需要特殊的懂行、有组织号召能力、有艺术才气，但政治色彩又不太浓，最好是无党派人士的领头人。最后确定“中电”的著名导演应云卫任社长。随即又物色到陈白尘、陈鲤庭、辛汉文、刘郁民、孟君谋、贺孟斧等，于1941年10月11日组成“中华剧艺社”。首场演出《大地回春》一炮打响，接着是阳翰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阳翰笙借太平天国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和大批太平军将士的历史故事，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借剧中人洪宣娇之口，痛斥反动派：“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1942年演出《屈原》，更是轰动山城，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随后的《法西斯细菌》、《长夜行》、《风雪夜归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此外还联络“旅渝剧人剧团”、“中青”、“中制”及孩子剧

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指导下，以话剧《天国春秋》、《屈原》公演为标志的陪都雾季戏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国民党统治区郁闷的空气终于被击破。图为进步话剧《屈原》的剧照

团，推出许多健康向上的戏剧。而国民党方面，却相形见绌，不仅因为他们无能，而且因为他们反共，有良知有爱国心的艺人，避之犹恐不及，谁去沾惹！如张治中要排一个戏，叫名导演马彦祥去。马断然拒绝，张也奈何不得。[①] 为配合抗战进步戏剧演出，大家还及时组织剧评，以引导观众正确取向。还举办戏剧座谈会，几乎每个戏都有这类座谈讨论，气氛热烈。田汉、郑伯奇、洪深、石凌鹤、龚啸岚等出面主持主讲。此外还团结了地方名演员如张德成、刘成基、阳友鹤、陈书舫、吴天保、付心一等一大批进步艺人，同声宣传抗战。可以说国民党统治区的雾季戏剧运动高潮是南方



周恩来给郭沫若的信，交谈对剧本《屈原》的意见

局领导和推动的结果，也与周恩来的关怀分不开。“在每次上演之前，周恩来总是同郭沫若一起研究修改剧本；在上演之后，又及时组织南方局文委的有关干部撰写剧本。对每一篇剧评，周恩来都亲自动笔修改、补充。”[②]如历史剧《屈原》在国泰戏院公演后，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攻击和迫害，周恩来挺身而出，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亲自召开座谈会，讨论该剧的政治意义，又亲自组织和修改评论文章，宣传演出的成功，指示《新华日报》开辟专栏，刊登郭沫若谈《屈原》一剧和各方面对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抗战纪事》，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5页。

该剧的评价文章。围绕《屈原》所展开的这场斗争及其胜利，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长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志气。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引领着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发挥着抗战文化带头人的作用。

南方局对音乐界的文化统战工作也非常重视。一是通过报刊、电台和演剧队等形式，将解放区的音乐作品介绍到国民党统治区来，以促进和加强同国民党统治区音乐艺术家的联系，推动新音乐运动的发展。1939年11月15日，由李凌、林路、沙梅等发起成立了“新音乐社”。同年底，创办《新音乐》月刊。周恩来在曾家岩接见了该刊的主编，他强调指出“要把边区的新歌介绍给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使歌咏运动注入新的血液”。遵循周恩来的指示，李凌等通过《新音乐》月刊，将延安解放区的抗战歌曲，如冼星海的《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向隅的《红缨枪》、《农村区》，李鹰航的《小小锄奸团》等作品介绍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时代音乐”（半月刊），向国民党统治区群众介绍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展新音乐运动和秧歌的情况。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延安许多音乐艺术作品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8月、1940年9月先后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郭沫若为之作序，盛赞它“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同时冼星海的歌曲集《反攻》、《保卫祖国》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1942年，伊兰的《爱国歌声》也在重庆出版发行。1943年，李凌等的《新音乐手册》、《新音乐歌集》在桂林立体出版社出版。音乐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性、战斗性、艺术性强，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新音乐运动的开展。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音乐艺术家创作了一批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现实和向往解放区的音乐艺术作品，如《山那边好地方》、舒模的《大地回春》、《遥望家园》，《山歌社》、《中国民歌选》等，从不同侧面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的社会弊病，对宣传团结抗战起了积极作用[①]。

二是以救亡歌咏活动为中心，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这些歌咏活动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支持下进行的。1939年4月13日，演剧二队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得

① 唐守荣、杨定抒：《周恩来与国统区抗战音乐》，《人民音乐》1998年第2期。

到毛泽东的肯定，党领导新音乐工作者，将《黄河大合唱》油印本传到国民党统治区。1940年12月15日，重庆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主办，在国泰戏院举行有8个文化团体参加的晚会上，由业余歌咏团演出象征中华民族抗日强大力量的《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等出席晚会，并接见全体演员，祝贺演出成功。周恩来对陕北盛行的歌舞结合的秧歌很重视，利用这种综合性艺术形式秧歌影响国民党统治区音乐艺术界。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演出秧歌后，随即传播开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将陕北开展秧歌运动的盛况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南方局对美术界文化统战工作的开展十分出色。在美术方面，尤以木刻运动开展比较活跃。抗战爆发后，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以著名版画家王琦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木刻版画家聚集重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木刻运动，创作了数以千计的鼓舞人民抗战的木刻作品。通过《新华日报》和其他报纸的木刻副刊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文艺活动信息。据统计，仅1941年1月到1942年12月间，《新华日报》就刊登了木刻作品130余幅。周恩来在重庆亲切会见木刻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木刻事业的关怀。重庆木刻界在抗战中牢牢把握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脉搏，经常在重庆近郊县举办流动木刻展览，这种小型轻便的展览有时出现在赶场天的场口上，有时随流动演剧队挂在演出场地内外，颇吸引观众，宣传效果甚佳。王琦、丁正献、刘铁华等人举办的“大众化”抗日木刻宣传画展览，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强烈反响，获得了广泛好评。苏联著名文艺评论家特尔诺菲茨在《评中国的木刻艺术》一文中写道：“在中国木刻里，离群独居的唯美主义者的艺术是最少的。中国木刻是和人民生活及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是从这一伟大战争中吸取形象和主题，而又直接为这一战争服务的一种艺术。”1942年1月，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解散的全国木刻协会又在重庆成立，改为“木研会”，从而推动了重庆木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重庆木刻界和延安木刻界经常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共同促进了中国木刻艺术的发展。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在重庆文艺界传播，周恩来把延安500件木刻作品介绍到重庆展览，使重庆美术界耳目一新，为抗战时期重庆木刻运动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推动了重庆木刻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总之，在抗日

战争时期，虽然开展木刻创作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是重庆木刻界在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木刻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宣传抗战、歌颂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漫画界在南方局的影响和推动下，以犀利尖锐、感染力强的漫画为武器，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内容上，结合抗战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深刻变化，以揭露敌人的残暴、汉奸的丑恶，讽刺醉生梦死，歌颂团结抗战为主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37 年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漫画协会。武汉失陷后，部分美术工作者随第三厅到了重庆，在重庆开展抗战漫画运动。“漫协”迁到桂林后，桂林成为抗战漫画中心。特伟、廖冰兄、叶浅予、丰子恺等漫画家先后云集桂林，他们在南方局的影响和推动下，团结桂林美术工作者，成立漫画宣传队，兴办战时漫画师资训练班，创办刊物，经常举行抗战漫画展览。皖南事变中，“漫协”被解散，但在桂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漫画家仍继续坚持战斗。1945 年 3 月 15 日，由叶浅予、张光宇、余所亚、廖冰兄、丁聪等八位漫画家共同举办的“漫画联展”在重庆中苏文协揭幕，展出作品 100 多幅，参观者达万人以上，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这次画展举行座谈会，形成了这一时期漫画运动的高潮。廖冰兄的个人创作《猫图春秋》于 1946 年在重庆开幕。展出作品的内容，不仅涉及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黑暗，并触及了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的特务统治。展出期间，正在重庆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邓发等曾莅临会场参观。同一天，国民党中宣部一位官员也在场，他一面看画，一面发出观感。当看到一幅漫画画着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手拿一根竹竿，竿头挂了一块肥肉伸到前头，一群狼狗朝着这块肥肉奔跑狂吠，他指着这人冷冷地对旁边的同僚说：“你们看，这个穿长袍的是什么人，这不明明是陈立夫吗！这幅画的作用比我们十个中宣部还要厉害！”②可见，抗战时期的漫画运动，在南方局的影响和推动下，为宣传团结抗战，揭露敌人的残暴和丑恶，鼓舞民众抗敌士气等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桂林，从 1938 年下半年到 1944 年上半年，由于大批文化团体和文

① 钱华欣：《论抗战时期重庆木刻运动活跃的原因》，《美术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六）·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4—34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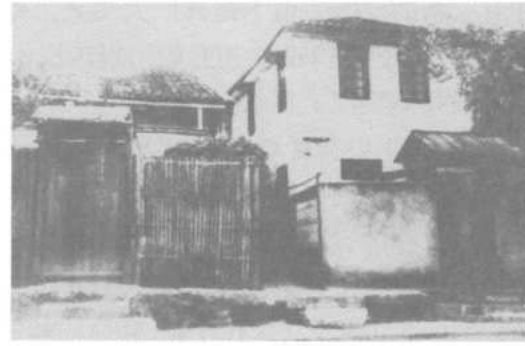
化人士的到来，推动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促进了抗战文化城的形成，从而使桂林与重庆成为一个抗战文化运动的双壁。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主观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灵魂；客观上是南方局对新桂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得到新桂系民主派和进步文化人士的鼎力支持，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加以抗日战争特殊的形势急转直下，随着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原有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沦陷，先后有大批文化人往桂林、香港转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香港的沦陷，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转移到桂林。桂林在这一时期，先后留下或短期停留的文化名人上千名，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抗战力量。再从地理位置来说，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城市，而且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是内地与海外联络的主要通道，许多进步文化人处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①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为中心线索和核心内容的。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从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陷到1941年2月28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是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前期阶段，也是抗战文艺由发展走向高潮的阶段。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大批文化人聚集桂林，桂林抗战文艺出现了一个飞跃时期。在桂林抗战文艺由发展走向高潮的第一阶段里，《救亡日报》、《国民公论》起着骨干和中坚作用。《救亡日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于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是除《新华日报》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报纸，在当时发挥了极大的宣传作用。《国民公论》是胡愈之、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等人主办的政治文化综合性刊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办的一份重要期刊。留桂的进步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以《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为主要阵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文化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集团加紧进行反共活动，《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接连发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大力宣传坚持持久抗战，坚持

① 魏华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9—12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国民公论》在发刊词中说："我们文化人，在今天国家民族最严重的关头，最重要的工作，唤醒民众，激发士气。"《救亡日报》除每天刊登一篇社论，由夏衍主笔，分析国际大事、国内抗战形势，还轮流出版戏剧、美术、音乐等方面的专刊。《国民公论》为综合性刊物，以政治时事评论文章为主，同时也开辟文艺专栏。由于南方局对桂林抗战文艺的正确领导，由于进步文艺和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战时桂林文艺呈现出蓬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938年底至1940年冬两年时间里，桂林一直处在激越高昂的抗战热潮中。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郭沫若等在桂林多次作抗战时局和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稳定了桂林局势，鼓舞了桂林人民的抗战信心，为把桂林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奠定了基础。以后宣传抗战，鼓动抗战，坚持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各种宣传活动，如演讲会、戏剧公演、街头朗诵诗、美术展览等，在桂林连续举行。桂林广播电台及广西音乐会"按期播送音乐，运用国乐特长，致力抗战宣传"。中华职业教育社每周进行一次时事演讲，聘请郭沫若、千家驹、范长江等著名人士主讲。街头上，到处看得见抗战标语、宣传画、抗战歌声、抗战号子，形成了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抗战热潮，为中国抗战文艺运动，作出了新的贡献。[①]



《救亡日报》是抗战初期国共合办于上海的报纸，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由于执行了周恩来关于《救亡日报》要尽可能保护公开合法地位的指示，该报在桂林时期有更大的发展。图为桂林救亡日报社社址

1941年初到1942年春，是桂林抗战文艺发展的低潮时期，但是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桂林抗战文艺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2月28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中共在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夏衍、范长江、廖沫沙、华嘉等，

① 李建平：《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第18—24页。

被迫出走香港。与此同时，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撤销，《国民公论》亦被停刊，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被限期停业。桂林文艺界中的中共党员与南方局的联系中断了，工作开展十分困难，抗战文化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桂林文艺工作者继续战斗，将抗战文艺运动坚持了下去，并有了新的发展。由于桂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开始出现转机，为1942年春夏以后文艺运动再度兴起高潮奠定了基础。

从1942年春夏到1944年9月，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后期阶段，抗战文艺高潮再度兴起。1941年冬，南方局派出李亚群、胡家瑞来广西，与在广西工作的抗敌演剧队和桂林文艺界中的中共党员恢复建立了联系，沟通中断了8个月的组织关系。与此同时，成立了邵荃麟、张锡昌等三人组成的中共桂林文化工作小组，领导桂林抗战文化活动和文艺运动。1942年夏，大批沪港文化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桂林，其中包括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如茅盾、柳亚子、夏衍、胡风、叶以群、蔡楚生等。其中少数人如茅盾、叶以群等稍事停留即赴重庆，大部分或长或短地在桂林留下了一段写作或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经历，使走向高潮的桂林抗日文艺运动添加了新的光彩。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恶劣，文艺家言论、创作、出版、行动极不自由，作家不能直接反映抗战实际斗争生活，又不能抨击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腐败与黑暗，因而出现了写历史、演历史，以历史影射现实，以历史的爱国精神和高尚品德激励人民、教育人民的历史剧写作和演出高潮。

文艺创作的丰收，是这一时期桂林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成果。“1941年的文艺运动是最低潮的一年……可是一过了年，情形却又好转起来。今年文艺杂志特别多，单行本丛刊也出了不少，分散的作家又复集中，出版界又现出空前的活跃状态了。由此，我们说1942年是文艺年大概也不为过吧，只这一年，我们所出的文艺杂志就有几十种，在桂林创刊的有《文艺杂志》、《创作月刊》、《文学创作》、《种子》、《人世间》、《文学批评》、《青年文艺》、《文学译报》、《文学报》，加上原有的5种共有14个文艺杂志。在重庆除原有的3种外，又出了4种。单只这两个地方，数量的惊人，怕从抗战以来少有的吧。”[①]茅盾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巴

① 《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1月1日第9版。

金的长篇小说《火》(第三部)以及短篇小说《还魂草》，艾芜的长篇小说《山野》、《故乡》，欧阳予倩的剧作《忠王李秀成》，田汉的戏曲作品《金钵记》，骆宾基的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等重要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是留桂作家对抗战文艺运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文艺刊物的出版又有了飞速的发展。单文艺刊物，在1942年至1943年两年内，就复刊17种，如《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新文学》等，1944年仍有新刊物出现。这些刊物，不仅为茅盾、艾芜、田汉、胡风、欧阳予倩等在桂林活动的文艺家提供了大量的创作园地，还发表了郭沫若、何其芳、沙汀、老舍等在重庆、延安等地作家的作品，这些刊物，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清晰可见的。①

戏剧活动在这一时期又重新活跃起来。皖南事变后，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进步演剧队伍的迫害，保护和发展国民党统治区抗日进步演剧力量，南方局指示以西南几个演剧队员为骨干，在桂林建立以民间职业剧团面目出现的新中国剧社。在中国共产党和南方局的领导下，新中国剧社逐步成长起来，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进步演剧力量之一。1942年

1944年2月，参加“西南剧照”的进步文艺社团——新中国剧社的演员在桂林

① 李建平：《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第27—30页。

3月，田汉、夏衍、洪深合作的大型话剧《再会吧，香港》在桂林上演，由于内容反映了抗战大后方的现实，揭露了官僚富豪的丑恶行径，在上演的当晚，受国民党特务的阻挠而被迫停演，后来，桂林文艺工作者采用改换剧名的方法，改为《风雨同舟》与桂林人民见面，从而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最著名的当数1944年2月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地区戏剧展览会，显示了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等戏剧工作者对开展抗日进步剧运动的宏大战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们邀请当时广西地方当局最高首脑如李宗仁、黄旭初等担任大会名誉会长，而实际领导权则由中国共产党及南方局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掌握，形成了“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①]的局面，使这次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规模巨大的戏剧汇演圆满成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这次西南剧展，从1944年2月15日开始，到5月19日结束。参加剧展的有广西、广东、四川、湖南、江西、云南等32个戏剧团900余人。涉及地域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空前的。在短短3个月里，演出了126个节目共177场，观众达15万人以上[②]。西南剧展的举行，使进步的抗日人士为之一振，称之为“七年来西南戏剧工作者建树的一次总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特派记者、名戏剧家爱金生也在国外专文介绍西南剧展时说：“如此宏大规模之戏剧盛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于极度艰困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艺，拥护民主抗战，迭予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厥功至伟。此次聚中国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于一堂，检讨既往，共策将来，对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实具有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西南剧展从3月1日至3月17日，在广西艺术馆新址举行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团队工作报告、各地剧运报告、专题演讲、论文宣读等形式，对抗战7年来的戏剧运动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总结。3月17日至4月6日，在广西艺术馆新址举行戏剧资料展览，展览用10余个团队、80余个人的1000多件文献、照片、模型、剧本、图表等丰富多彩的资料，形象生动地在观众面前描画了一部抗战戏剧运动乃至整个现代戏剧史。西南剧展还组织各路专家召开专题

① 周恩来语，转引自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人民戏剧》1978年第3期。

② 邓小飞、吴立德：《试论西南剧展在抗战戏剧史中的地位》，《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第290—293页。

讨论会，在理论上对抗战戏剧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总结[①]。总之，西南剧展是现代中国戏剧运动发展的最大盛会，是抗战戏剧运动彻底成熟的里程碑，形成了桂林文化城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文艺高潮。西南剧展举办的演出展览、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及资料展览三大活动，给全国乃至国外文化界以巨大的影响。

1944年2月，大后方各地的抗战剧团在广西桂林隆重举行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图为参加"西南剧展"的文化工作者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前合影

西南剧展刚刚闭幕，日军南犯。1944年6月19日，长沙失陷，衡阳告急，桂林危急。桂林文化界又一次动员起来，为了安定桂林的民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协桂林分会动员人民起来抗战，保卫大西南。

6月10日，李济深主持了桂林文化界"保卫大西南"动员宣传周的筹备会，确定了人选及工作计划。翌日，筹备委员会在田汉的带动下，开始积极做好舆论宣传和游行的具体准备工作。6月18、19两日，文协桂林分会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初阳画院"的画家们高举着"保卫大西南"的标语和大幅漫画，为队伍开路。紧接着便是李济深、柳亚子、田汉和桂林开明绅士龙积之等"长老团"乘坐的宣传卡车。再接着的是50多名文化人抬着一面特制的大型国旗，最后是手执彩旗，

① 邓小飞、吴立德：《试论西南剧展在抗战戏剧史中的地位》，《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第292—303页。

步行前进的桂林进步文化人和参加剧展会后留桂的戏剧工作者。游行队伍上万人沿途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百万不多，一块钱不少！”“拿出良心来吧，是时候了！”等口号。国旗献金大游行一共持续三天，募捐到的金钱，经李济深同意，一部分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部分送湘桂前线慰劳。国旗献金大游行后，由文协桂林分会发起，李济深、何香凝出面，6月28日，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成立。李济深任会长，白崇禧、张发奎、黄旭初任名誉会长，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欧阳予倩、田汉、邵荃麟、白鹏飞等27人任委员。7月4日，经该协会招考组建的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成立。由田汉带领，到湘桂铁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8月1日前后，工作队开赴桂北前线，沿途进行劳军和抗日宣传活动，文抗队的活动对前线军民产生了很大影响。1944年11月桂林沦陷，文抗队队员分别转到桂东、柳北等地继续进行抗日文化活动和参加游击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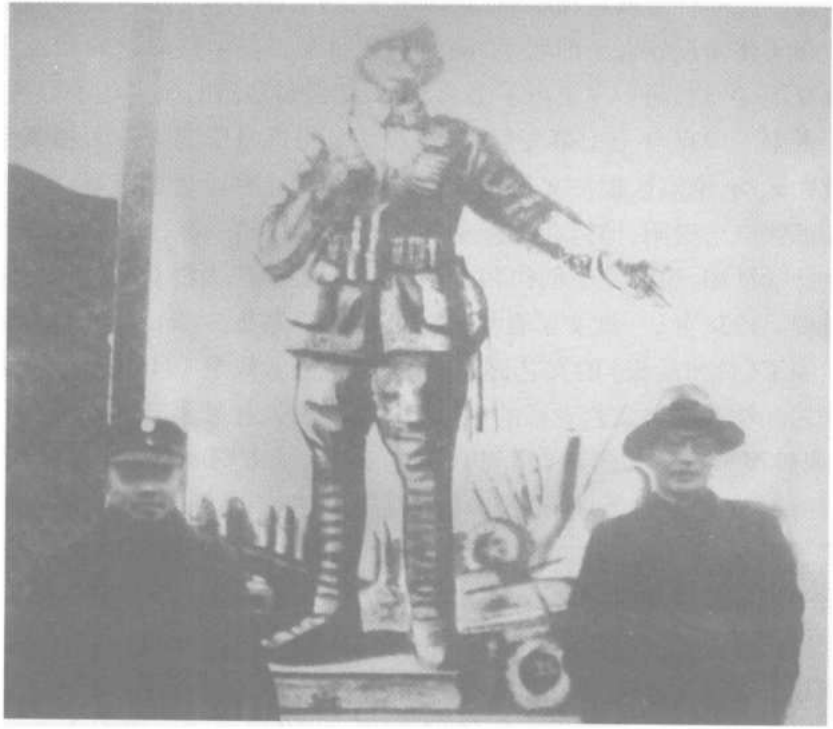
二、昆明、贵阳、成都等文化据点的形成

昆明　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昆明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其中以歌咏和话剧最为突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1937年8月，中共昆明支部派李家鼎与民众教育馆的赵国徽取得联系，组织了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日歌曲，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及时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1938年12月，发动2000多人，举行反汪示威火炬游行。次日，《云南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事后报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斥责。昆明音乐工作者为配合抗战形势，先后创作了许多新歌。最受群众欢迎的有《昆明湖》、《播种之歌》（仁苏词、张锐曲）、《青年进行曲》（胡乔木词、张锐曲）、《孙子进行曲》（徐守廉曲）、《哭那样》（安朗词曲）等。1938年3月18日，中华全国戏剧界联合会云南分会成立，高竹秋任理事长，陈豫源、王旦东、李鑫培、刘海清、范启亲、马金良等为理事。此后，昆明的戏剧活动有组织地开展起来。4月，金马剧社演出《搜查》、《卢老虎》；5月，艺师演出《重逢》（丁玲著）、《后防》（熊佛西著）；6月，金马剧社演出《飞将军》（洪深著），同时演出《血钱》独幕剧。7月1日起，艺师演出曹禺名著《雷雨》，轰动全市，沈从文、徐嘉瑞在报端发表好评，连演20余场。

随着国民党加紧对云南的控制和渗透，云南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矛盾日益尖锐，中共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开展了多渠道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同时把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以爱国师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文化运动。皖南事变后，李公朴由重庆到昆明。1942 年夏，孙起孟由中华职业教育总社派来昆明任该社云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对他来昆开展进步文化活动提示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独立开展团结、抗战宣传工作”，不必与中共地下党联系的意见[①]。孙起孟在昆明开办了进修书店、进修出版社、补习学校和中华办学等。1942 年，李公朴在昆明开办北门书屋。

1943 年 10 月，南方局指定华岗为中共代表，秘密与龙云建立直接联系。龙云对中共地下组织在云南发动的民主运动采取了同情和支持态



图为李济深和龙云在抗战工作协会制作的宣传画前合影

① 楚图南：《回忆和华岗同志在一起的日子》，《光明日报》1980 年 7 月 7 日。

度。1945 年 3 月,《新华日报》在昆明建立营业分销处,使之得到更加广泛传播。在此前后,1942 年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派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罗隆基到昆明,筹建云南地方组织,广泛吸收教授、教师、自由职业者入盟,壮大了革命力量。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周新民和华岗等中共地下党员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成立了有楚图南、尚钺、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吴晗、闻家驷、曾昭抡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会。

南方局对昆明文化界人士的工作十分重视,1943 年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先后到云南工作。周恩来做龙云工作的同时,指导和帮助昆明的民主运动,对闻一多等著名爱国知识分子给予热情的关怀和帮助。周恩来曾写信给华岗说:"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不满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①华岗等人加强了与文化知识界人士的联系,同他们交朋友。在中共的启发和现实斗争教育下,吴晗、闻一多走出了书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主斗争行列。

贵阳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在外省发展的贵州作家纷纷回到家乡参加救亡运动,沦陷区很多文艺界、新闻界知名人士和学者如茅盾、田汉、巴金等都曾旅居贵阳,他们和贵阳本地爱国文学青年一起,创办报纸杂志,成立文学社团,组织文学创作和文艺演出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8 年,一批文学青年,由谢六逸、蹇先艾、齐同、李青崖等发起并主编了《贵州晨报》的文艺副刊《每周文艺》。截至 1945 年,贵阳出版的文艺刊物及辟有文艺专栏的报纸已达 70 余种,比较重要的报纸副刊有《贵州晨报·每周文艺》、《贵州日报·新垒》、《南明晚报》等,文学刊物有《西南风》、《七七半月刊》、《中国诗艺》、《晓鸡声》等。1938 年 1 月,蹇先艾、谢六逸等成立"每周文艺社",在《贵州晨报》上的文艺副刊发表很多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文章。

1940 年 2 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在贵阳成立。这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又一文化堡垒,协会一成立,就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前路〉》(贵阳版)、《贵州日报〈革命军〉》和刊物《抗建》,组织文艺讲座,建立文艺通讯网络等。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一批进步

①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篇》,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21 页。

作家和文学青年根据“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深入社会底层，掀起了“战时文学”的浪潮。作品主要反映侵略者野蛮残暴的罪行，歌颂如火如荼的民族救亡运动。

1939年7月，贵阳大专学生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争取民主“宪政运动”大会，刘方岳担任大会主席，郭一岑作了专题发言。当徐特立从湖南赴重庆路过贵阳时，“社座”邀请徐老讲述了抗战形势和中共现阶段的方针政策以及《资本论》的学习方法。1940年《资本论》中文译者之一的王亚南路经贵阳，“社座”亦特请他就《资本论》的翻译经过、全书的主要内容作了专题报告。参加“社座”的教师们通过学习、讨论，接受了正确的观点和进步的思想后，又直接或间接地传授给学生，扩大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

1938年10月，《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设立，吴同尘负责分销处工作。它是中共设立的一个公开机构，仅有3名工作人员，承担每天分送和零售400至500份报纸的任务。为畅通发行渠道，尽可能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搜查，分销处与邮局管库房的地下党员和重庆海棠溪管运输的工人建立了秘密联系，使《新华日报》这份共产党的报纸在运送过程中从未被国民党特务查禁、没收，亦未使贵阳读者脱过期。此外，分销处还按省工委的指示，为解决香港印刷工人组织的“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的困难，发起捐助运动，参捐人数达1000人以上，收到捐款1000多万法币。事后，分销处把捐款及捐款人名单通过《新华日报》转交香港工会，并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励工人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新华日报》发表了这封信，使国民党当局恼怒万分，由于在国共合作期间，不敢马上采取措施予以破坏，但却暗中盯梢，造谣诽谤，并以“应征”为名抓走了分销处工作人员郎德服，以图破坏削弱分销处的工作。1940年底，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当局对分销处采取行动，中共地下组织得知情报后，为保存力量，立即果断地停止了分销处的工作，人员和物资都进行转移，从而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分销处的阴谋。

成都　抗战爆发后，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的名称与抗战形势不相适应了，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控制抗日救亡运动，表示愿意参与救亡活动，结果组成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救亡运动从秘密状态转变为公开合法的活动了。省抗会虽属官办，但注入有革命血液，成立初期，在动员群众、

宣传抗战、抵制日货、募捐慰劳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7年9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分队组建了星芒通讯社（简称星芒社），由江牧岳负责。9月18日，出版了《星芒周报》，由胡绩伟任主编。它以通俗易懂，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同年11月，《星芒周报》与四川青年救国会出版的《救亡周刊》合并，出版《星芒救亡联合周报》。1938年3月，原《救亡周刊》复刊；4月5日，《星芒周报》改为《星芒报》三日刊重新出刊。1939年，国民党当局在成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紧接着在1940年3月又一手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逮捕了十八集团军驻蓉办事处负责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大声周刊》、中苏文协负责人车耀先，并立即用飞机押送重庆。后来，他们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迫隐蔽和撤离，抗日救亡运动一度处于低潮，文化活动开展也很困难。

1942年秋，在赵一鹤的主持下，刘盛舆、刘克彬和王晶盎（王学燧）、崔巍（崔铁民）、钟宗等人，成立了秘密小组“蓉社”，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讨论时事政治，加强联系与团结。1943年，“蓉社”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增加到14人，后又改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1944年冬至1945年上半年，各种群众社团纷纷成立，有研究时事新闻、政治理论问题的，更多的是文学艺术社团，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开诗歌朗诵会，唱革命歌曲，演进步话剧。

第六章　开展工商界统战工作，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抗战时期，对以工商界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采取机动灵活的政策策略，显现出求真务实的精神风貌，日益走向独立和成熟。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把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促使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不断觉醒，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靠拢。南方局团结广大爱国工商界，以谦诚的态度对待他们，和他们推心置腹，逐步消除他们对中共的误解和疑虑，引导他们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引导教育他们进行经济政治斗争，真诚地帮助他们，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指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诚，与国民党的压制欺骗形成鲜明的对比，消除了爱国民族工商界对共产党的疑虑，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推动了他们的政治觉醒。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政治斗争，开始走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阵营。

第一节　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转变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的转变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民族资产阶级依附了大买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而中共长期将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随着日军的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认真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将会发生变化的特点，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

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认为他们有加入革命阵营的可能性。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①毛泽东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之后，着重指出："国民党的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②。报告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可以作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开启了大门。

全面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在 1939 年 10 月 4 日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基本的革命动力……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③。

1940 年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赞同团结抗战，赞成宪政运动，要争取自身的权益，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区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性大资产阶级，明确将民族资产阶级划入中间势力，并提出"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④。

1940 年 4 月，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增加了以下内容："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7、16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6 页。

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①

随着抗战的发展和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的日益深化，中国共产党要求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的认识提高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1940年9月6日，毛泽东向南方局、东南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加以区别的调查。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工作，无疑为开展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194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要求陈毅、黄克诚等“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最重要的任务，把这个问题的认识提高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②。这样，就把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提高到策略原则的高度加以重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中指出：“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与我们合作，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而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并要求他们“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麐、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③，争取他们在苏北同我们合作，并通过他们扩大争取民族资本家的范围。

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首次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98、581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98、58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①他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②。

二、积极开展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成熟，极大地推动了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的进展。南方局正确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大后方积极开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1940 年 12 月，南方局经济组成立，组长许涤新。经济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抗日战争中的经济问题，并团结进步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分析战时经济问题，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特别是宣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的财经政策，通过中共秘密党员和同情者，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由于阶级的对立，对工商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仍然很薄弱。有些同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认为这样会丧失阶级立场，甚至有抵触情绪。周恩来做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为了加强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周恩来专门找许涤新谈话，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不能把他们放在统一战线之外。他说："经济组的活动范围，现在只限于秘密党员，限于同情者，限于进步的经济学者，这些人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但是，要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你必须出面同民族资本家打交道，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③"党的统一战线难道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外边吗？连国民党蒋介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6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60—1061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重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9 页。

我们还要同他搞统战，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就是我们同它搞统战的理论依据，何况统战工作并不只是有团结的一面了，除了团结以外，还有斗争。有团结，有斗争，正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相适应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害怕丧失立场，只抓斗争，而忽视团结，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左'倾思想在作怪。""要打败日本，要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你做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就是为了坚持抗战，就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①]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就把民族资本家的双重性作了详尽分析，提出完全可以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矛盾，争取和团结他们，联合他们共同抗战。

抗战时期，为广泛团结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经常出入重庆工商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以真诚的态度、正直的品质、勤奋的工作被工商界人士接纳，使广大具有爱国意识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逐步成为了共产党的朋友。图为许涤新在重庆

当时同民族资本家交朋友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由于国民党统治的恐怖，不少资本家害怕接待许涤新之后，国民党特务要同他们"算账"。一些民族资本家不仅给许涤新以闭门羹，而且在吵了一架之后，高声"送客"。他们认为国民党是正统，是国家的代表；而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服从政令军令，破坏国家政府的统一。他们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打了败仗，追究原因，未尝不是因为国家的军令政令的不统一，未尝不是因为中共的闹独立性。即使在抗战后期，在国民党统治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还是拥护国民党统治的。据曾任西南实业协会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第280页。

秘书的廖石城回忆，在豫湘桂大溃败之后，在陈立夫授意下，潘序伦、吴味经、胡西园等工商界人士组织重庆部分资本家在《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发表声明，鼓吹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等等。许涤新等和胡西园、吴味经谈话，谈得吵起来，不欢而散。周恩来知道后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千万不要气馁。"他指出："工商界中大中小的利害关系不同，派别的利害关系不同，同他们接触长短不同，要耐心工作，要多多接近他们，中小企业家要接近，就是大实业家也不要放弃做工作的机会。"①

在遭受了无数次的白眼、冷落和敌意的"送客"后，许涤新和同志们以真诚与执着、谦逊与坦诚赢得了许多民族资本家的信任。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努力工作，慢慢和一些开明民族资本家，如章乃器、胡子昂、胡厥文、吴蕴初、古耕虞、潘昌猷等人建立起了联系，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日益深入。如著名猪鬃出口商古耕虞，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许涤新经常到他经营的川畜公司向他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他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也是由许涤新代为邀请的。

南方局深切地了解工商界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和不同特点，同他们的代表人物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周恩来等经常邀请工商界人士座谈，还经常参加工商界举办的座谈演讲，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中共的主张，分析政治经济形势，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鼓励他们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和他们真诚相待，广交朋友，展开了对工商界民族资产阶级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第二节　鼓励爱国工商界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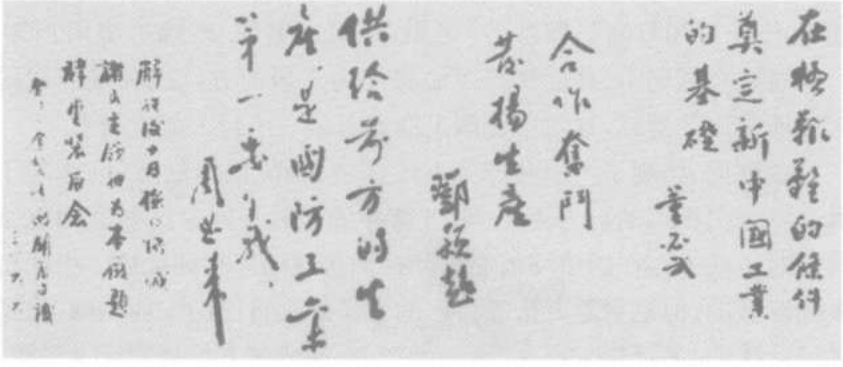
一、激励民营企业、积极生产

1941 年和 1942 年，根据地的财政发生极大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批判了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

① 廖石城：《回忆西南实业协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第 305 页。

东西的国民党作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利用自己合法的身份，把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在大后方广为宣传，并利用各种机会，以参观题词、演讲座谈或个别谈话等方式，鼓励后方民族工商界，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发展生产，保障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物资供给，为民族和国家抗战的胜利作贡献。

抗战以来，许多民营企业历尽艰辛，从沿海迁到后方。到 1939 年 1 月，在重庆有 50 多家内迁工厂复工生产（其余各厂也正积极筹备复工），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国民参政会为了解内迁新兴工业建设情况，1 月 25 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组织了部分驻渝参政员前往渝鑫钢铁厂、豫丰纱厂、合作五金厂等工厂参观。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参观胡厥文创办的合作五金厂后的题词

中共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也亲临参观。参观合作五金厂时，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下到各个车间，仔细观看了工人的技术操作，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倍加赞赏，高度评价了他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精神，给予工人巨大的鼓舞。董必武、邓颖超在该厂来宾签名簿上签名留念，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为该厂题了词：

“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周恩来）。

“合作奋斗，发扬生产”（邓颖超）。

"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董必武)。[①]

为深入了解后方民营重工业的生产情况,周恩来与冯玉祥等于1942年1月14日,前往土湾渝鑫钢铁厂参观,参观后,周总理为该厂题词:

"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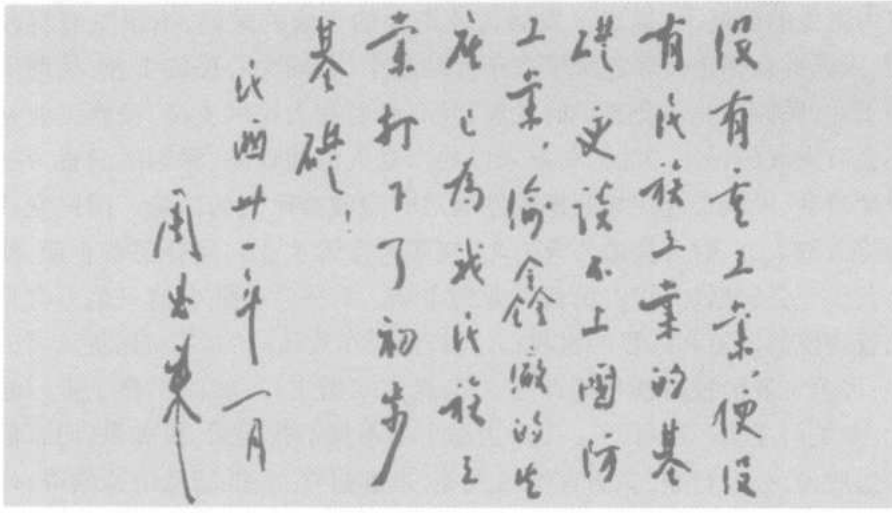
那时,在四川的民营工厂中,重工业只有29家。在冶金方面稍具规模的只有中国兴业公司和渝鑫钢铁厂两家。渝鑫钢铁厂是八一三后,由上海迁到汉口,1937年底,再由汉口迁到重庆来的。1938年7月开工到1942年1月,前后遭受敌机5次轰炸,厂房与工人宿舍先后中弹90多枚,损失甚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该厂始终坚持下来,迅速恢复生产。从规模上讲,渝鑫仅次于兴业钢铁厂,但产品却超过兴业。每月可生产灰口铁140吨,生产铸钢、竹节钢、圆钢、方钢、地轴钢等100吨左右。此外每月还生产耐1720℃高热锻炼砖(可做坩埚、冶金炉、玻璃炉窑用)150万块。周恩来在题词中,高度赞扬了渝鑫厂为支援前方抗战和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所作出的贡献,这对于爱国工商业者是一个巨大的支持[②]。

这些题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这些题词也暗含着对当时一些人存在的单纯依靠国际援助抗战的思想的批评。中国抗战需要国际援助,但是更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通过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来保障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来确保民族抗战的胜利。单纯依赖国际援助,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工业,才能为中国将来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

为展示迁川工厂四年来取得的成就和民族工业的雄厚实力,迁川工厂联合会于1942年元旦,在重庆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了为期15天的"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参加这次展出的厂矿共200余家,展出产品49类,

① 唐维华:《周总理给重庆合作五金厂、渝鑫钢铁厂题词》,《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0—161页。

② 唐维华:《周总理给重庆合作五金厂、渝鑫钢铁厂题词》,《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2—163页。



抗战时期，民族工商业因日本侵略和官僚资本压迫，处境艰难竭蹶，南方局加强与他们的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维护他们的利益，支持他们的发展，鼓励他们为抗战出力。图为周恩来为民营渝鑫钢铁厂题词

琳琅满目。举凡国计民生之物无不具备，显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生产能力和重大成就以及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令人震惊的奇迹。渝鑫、新民、建国、震旦、顺昌、艺华、上海、恒顺、达昌、中国实业等钢铁机器厂，都能生产各种工业所需要的机器。

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同各界知名人士都前往参观，甚为称赞，并题词鼓励。周恩来的题词是："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使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志，务期一物一业彻底完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都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全力助其成。"董必武的题词为："集合西南各种工业之大成，表现我国抗战建国力量之雄伟。"邓颖超为展览会写下了"联合互助，发扬科学，提倡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题词。重庆各报也纷纷以大量篇幅介绍展览会盛况并发表评论。《新华日报》在社论中强调指出："这个出品展览会就是厂家和职员、工人四年来奋斗的成果，就是他们用血汗滋培出来的好花。"[①]在题词中，周恩来一方面在

① 胡世华、吕慧敏、宗朋整理：《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提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正确的策略，指出只有将政府、人民群众和企业等各阶层真正发动起来，共同关心民族工业，扶助民族工业，民族工业才会真正的发展，没有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是不会有发展的；另一方面，周恩来以共产党人的使命感、深刻的洞察力敏锐地看到，民族工业在如此蓬勃发展之时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国民党政府将大部人力、财力扶植公营工业（实质为官营工业），侵夺民营企业，使公营工业急剧增加，挤占民营工业的市场。对民营企业有的只是不合理的管理统制政策和沉重的税收；人民群众对洋货认可的多，对国货认可的少；民营工业的投机性日趋严重，“老老实实做工厂，然而不善于走门路的，非关门或卖厂不可”①。工厂为图生存不得不找门路，拉关系，向官僚白送股份，公开行贿，安插官僚私人等，来逃避管制、抵制低价征购等；许多民营工厂大搞商业投资，以商养工，或移工作商，等等。1942 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工业日益陷入深刻危机。在民营工业生产情况最好的时候，周恩来已率先看到了它的隐患和危机。他的题词，既是对民营工业发展的鼓励和期待，同时又暗含着对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发展的提醒与警示，充分体现了一个卓越政治家的高瞻远瞩。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民营工厂的题词，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政策，又对民营企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供应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这些肯定和赞扬极大鼓舞了广大民营工业界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民族斗志，成为推动他们支援抗战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引导爱国工商界以大局为重，服务战时经济

许多爱国工商界人士对国民政府的统制政策以及官僚资本的压迫和侵夺非常不满，周恩来一方面支持他们为敦促国民政府改变不合理政策所做的斗争，另一方面开导和教育他们要以国家大局为重，要以民族抗战为重，鼓励他们要为国家民族抗战作贡献。

1940 年 4 月 29 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在重庆巴蜀中学

①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49 页。

演讲，号召工商界人士为抗战贡献出人力、物力、财力。

周恩来还多次在“特园”邀请胡厥文、李烛尘、胡子昂、古耕虞、康心远、康心如、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等集体或个别进行座谈谈话，向他们阐明中国抗战的前景，鼓励他们要努力发展生产，保障前方抗战和后方民用，赞扬他们为支援抗战所作的贡献。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抗战到底。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工商界要为国家作贡献。这些座谈会，由于双方诚恳、坦率而开得生动活泼。

古耕虞，是世界著名“猪鬃大王”，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的虎牌猪鬃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为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以1944年价格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折合黄金官价计算），相差达十倍之巨。[①] 古耕虞在回忆中说：“这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这些情况，周恩来是了解的，同时也是十分愤慨的，因而他每次与我谈话时，总是一方面听我的意见，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官僚资本掠夺人民的真相；同时这种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国民党还在实施‘统购统销’，实际上是统而不购，结果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摧残了桐油生产，大批桐树被砍伐了，舆论为之哗然。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指出，猪鬃是英、苏、美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应该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因此他与我谈话时，强调对于国民党种种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是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支援抗战。他还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他勉励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他的这些开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②]

周恩来多次夸奖古耕虞是为抗战立了功，高度评价他，认为他了

①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

②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第77页。

不起，经营有方，以收购猪鬃起家，组建起了世界闻名的猪鬃托拉斯企业。

1941年、1942年是民营企业生产情况最好的两年，嗣后逐步下降。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统制政策、官僚资本的侵夺以及国民党政府不合理的捐税政策，导致大后方民营企业逐渐衰落，经营日益困难。《新华日报》经常发表文章，鼓励他们积极想办法，走出困境。

如1944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七届年会，通过了请求政府减轻工矿负担、挽救工业危机等提案。《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对其要求给予支持，并且提出了立足自身克服困难的办法。社论不仅指出后方工业困难的症结，"乃是社会购买力的衰落，乃是事业扩展受到种种限制，乃是各个厂矿的肩膀上放着过重的负担，乃是工业生产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与资助。这些问题是与国家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租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且提出"要克服这些困难，就必须坚强自己的力量"。鼓励他们"团结是可以发生力量的。只要工业界人士，能在抗战建国的前提之下，亲密团结起来，那是可以应用集体的力量去克服困难的"。还提出"应注意的是那种大鱼吞小鱼的现象"，"大厂家应与小厂家合作"，"同时劳资之间更应有亲密合作"，才是出路，否则"无法使自己的事业能进一步发展的"。社论对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七届年会，通过的一些很有价值的提案，称为"都是解除困难所必须的办法，而且也是工业界应努力的方向"。并且勉励民族工商界"希望在开会以后，各厂家循着这条道路，抖擞精神，奋斗下去！"①

为抗战大局，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各个产业忍受国民党政府的统购统销、专卖、管制、限价、低价征购、不合理的捐税政策，等等，仍然想方设法努力生产，积极支援抗战。古耕虞回忆说："即使在抗战中间，国民党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我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仍占其全部收购量的70%以上。我当然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尤其是因为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尽管抗战中我与官僚资本作各种各样的斗争，但是这是为了防止官僚资本吞噬我这个赚大钱的企业，不是为了其他。我的基本态度是遵守国民党在出口贸易上的法令和措施。也就是说，我

① 《工业界努力的方向》，《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4月21日第2版。

是支援抗战的。我的这个态度与周恩来对我的教导有关。"[①]抗战初期，中国沿海港口相继陷落，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猪鬃到越南，通过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市场。抗战后期，中国内地对外陆路交通包括滇缅公路相继断绝，古耕虞又通过中印航线将虎牌猪鬃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取了宝贵的外汇。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的主要来源，而且还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贷物资（即易贷偿债），支撑起了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

到1945年底，后方共有工厂5998家，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工厂（其中重庆有工厂1649家，四川有1158家），其生产量约占工业总产量的80%。中小工厂满怀抗战爱国的热情，再加上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共产党人的鼓励和引导，都自觉积极地为军需民用生产，大后方的渝、川、康、滇、黔等省市，八年来共生产了动力机2721部，工具机7115部，造纸机59部，大型纺纱机106960锭，面粉机594部，电灯泡2724000个，硝酸123600箱，硫酸167300箱，盐酸193200箱，烧碱72610箱，酒精2180万加仑，纸张336000令，重革3757000公斤，轻革8567000方尺，面粉3063000袋。就在重庆，织布业动员了将近六万台铁木织机，织成了将近三万万四大小布匹，供应了大部分军布民服。煤矿业在嘉陵江地区的215家矿场，仅1943到1945年8月，即产煤224万吨，使军需民用供应无缺……这些事实说明，中小工厂不仅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为支持神圣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而且也为尔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②]

在抗战期间，面对国民党的经济统制和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侵占和掠夺，南方局以各种方式鼓舞民族工商界的民族斗志，积极引导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抗战为重，服务于战时经济，虽然在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重压下，但仍然努力生产，供给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第77页。

② 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年版，第101—102页。

第三节　支持民族工商界，争取自身权益

一、反对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抗战中后期，官僚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严重制约了民营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四大家族的财富不断积聚，民族经济却朝不保夕。1935 年，官僚资本只占全国的 10%，1941 年却占 50%，1942 年占 70% 以上。民营钢铁工业 1940 年占 58.94%，1942 年却猛跌至 8.35%。为维护民族工商界的权益，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亲自撰写了《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的任务》、《"七七"四年》等文章指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实施战时财经政策，反对官僚资本，对官僚资本的本质和危害进行深刻的揭露。他经常在与民族工商界的座谈时向工商界通报官僚资本掠夺的真相。"有一次，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和换取外汇的金额，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如此了解，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①

南方局经济组利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合法宣传阵地，专门开辟栏目，有计划地撰写文章，抨击官僚资本和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民营工商界深恶痛绝的官僚资本和统购统销的管制政策，大力为民营工商界争取经济民主鼓与呼。

1943 年秋，国民党的军需署对加工军用布的中小工厂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诬陷这些厂破坏军需；非法抓捕了数十人，整得许多织布厂停工倒闭，不少厂家破人亡。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关怀和《新华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的支持下，田钟灵、李学民、王智仁等把近千家织布厂联

① 钱之光：《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光明日报》1977 年 1 月 5 日。

合起来，成立了“军布业联谊社”与军需署斗争。

1945年1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统购统销的危害和恶果：“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统购统销’的办法毕竟是摧残生产，禁闭对外贸易的，因为在目前这种官僚机构下，统购时‘剥削生产成本，压迫农工’，不仅是深度地压低价格，甚有‘统而不购，购而不付钱’的现象，在统销方面的成绩乃是‘供不应时，丧失信用，弄得盟邦都讲闲话’。这种恶果乃是当局不许出口商出口，而自己又不能出口的结局，因此贸易界人士眼巴巴地看着中印空运增加了，但因中国出发的飞机为了增加重量，飞越皑白的喜马拉雅山，没有装运桐油生丝，亦没有装运茶叶猪鬃，却装满了昆明的石头沙子和水……”

“统购统销不但摧残出口物资之出口与运销，而且打击了后方一些脆弱的民族工业。今日纺织业的奄奄一息主要的病因就是统购统销。因为统购的价格定的太低，农民破产了，弄得产区绝大部分棉花被敌人抢购去了，弄得后方的棉花应用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缺乏，现在重庆存棉只够维持一个月，停车破产就要到来。工资方面，低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也不可能。资力薄弱的一千余家土布厂，最近竟大量倒闭。统销方面则又不肯销出来，导致‘霉布’、‘烂布’屡见叠出。人民买不到布，而花纱布统制局的仓库，却在制造霉烂，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难道我们还能默然视之吗？”①

这篇社论指出造成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统购统销，呼吁废除危害工商界的统购统销。对统购统销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1945年7月9日的时评《重庆市出口商的呼吁》对统购统销政策和官僚资本与民争利的行为进行深刻的揭露，指出“政府与民争利愈来愈面目露骨。……这一二年来当局的做法愈来愈妙。照法令的规定，统制出口的主要货物品：茶叶、生丝、桐油、猪鬃等，政府所办中茶公司，贪污腐化，弄得声名狼藉，早就表现了统制的效能。到如今由于茶叶与桐油赚不到钱，政府已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实际上是不统制了。生丝出口利润也成了问题，于是政府也就不统制了，由所谓的特许丝商来经营。猪鬃出口还是有大利可图（现在当局在国内收价为十二万元一担，在美可卖五百美

① 《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月23日第2版。

金一担，照黑市计算差不多要值法币一百五十万元），于是又紧抓不放，这种择肥而噬与民争利的行为，怎能得商人的心甘诚服？”[①]文章痛斥统购统销“是摧残生产的利器，是贪污官僚发财的工具”。对官僚资本“愈来愈妙”的与民争利的强盗行径，用“择肥而噬”来表述，可谓一针见血。官僚资本虽然已声名狼藉，但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而没有任何权力的民营企业又如何能同他们平等竞争呢？经济与政治的不平等使抗战中后期民营企业的衰落成为必然。

1945年12月11日的《新华日报》发表《谈管制政策的废除》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官僚政治下，管制政策最大的好处是便于官僚资本的活动。因为管制的锋芒是针对民营资本的，手续之苛繁，时间之延搁，打官腔，摆架子，这一切的一切哪一件能施及那些居高临下神通广大的官僚资本呢？相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大半是掌握着管制政策的”。文章列举了进出口贸易、煤业、纱花管制等行业管制政策废除的内容，强调管制政策虽然废除了，但是管制的措施方法并未废除，并用独占代替管制。“人们不但在废除的时候，顺手给他一个打击，而且在一个打击之后，又加以独占，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之设立，就是以独占代替管制。”受益的仍然是官僚资本，受限制的仍然是民营企业。指出“今天国营企业的扩大（指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之类）难道不是为官僚资本之发展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吗？”文章最后大声疾呼：“让私人资本发展吧！”[②]

对官僚资本和统购统销的管制政策，《新华日报》并没有停留在对其的抨击上，而是在为民族工商界呼吁经济民主的同时，不断强调只有废除官僚政治，实现政治民主，才是发展民族资本的根本前提，“统购统销是必须废除的，其他一切独占统制的办法必须取消，但是没有民主政治做前提，则这样的要求一定是落空的”[③]。“真正民主政治如不实现，官僚统治是决不能铲除的，正当工业界的痛苦，也永远无法解除。”[④]提醒民族工商界，只有铲除官僚政治，真正发展民主政治，民族资本的发展才会有出路。

《新华日报》还发表大量的报道、社论和专论等文章，同情民族工商

① 《新华日报》1945年7月9日第2版。
②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第3版。
③ 《废止统购统销》，《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月23日第2版。
④ 《重庆市出口商的呼吁》，《新华日报》时评，1945年7月9日第2版。

业的困境，反映民族工商业界的困难和呼声。1945年是民族工商业最为困难的时期。这一年，就“民族工业濒于破产，厂矿纷纷要求救济”、“战后工业复员与处理敌伪产业问题”、“煤业与煤荒问题”、“纺织业停工、减产”、“各盐场普遍减产”、“废止统购统销”六类问题发表的新闻、社论和专论等稿件就达251件[①]，为民族工商界反对官僚资本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例如，日本投降后，大后方的民营工业界一致不断要求没收敌伪工厂，优先租借或转卖给后方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后方民营工业经营，以弥补后方民营工业的损失；扶助后方民营工业，使他们迅速复员。但是国民党还要“统制”，还要把原属民营的包括纺织业在内的许多行业进行“国营”，政府手中握有大量外汇却不工贷，对彻底没收敌伪资产让给后方工业民营，政府一直没有明确地表示允许。

1945年8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同情后方工业界“隐蔽在他们心底的忧虑和期望”，他们“暗淡”的心情：“前面也是一团漆黑，什么可以获得的支持和凭借也没有了。”支持他们要求没收敌伪工厂、扶助后方民营工业的正当要求。社论指出：“大后方工业界偏处内地，设备皆简陋，资金亦感穷绌，沦陷区工业都在沿海，规模和资金设备，皆足使内边工厂和后方工业界失色。若不予以没收处分，并挹补后方内地的民族工业，无法在战后自存，将来中国的经济必将更为媚外亲日的买办法西斯所操纵了，后方民族产业家八年苦斗，结果竟如此，道义何在？”对于战后扶助后方工业生产问题，社论说：“我们主张政府不应该用一切国营方针来包办生产（其实就是包而不办），而且立即把控制在手里的二十亿元美汇放出来，让抗战中有功的工业界能及早订购建立工业化的起码基础。……不把这笔外汇当作民营生产的再建，而让他不明不白地流入少数人的手里，形成一种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垄断工具，这是全工业界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最后，社论提出：“第一辨忠奸，明是非，分黑白之点，政府有义务先让大后方工业界安心。第二对于战后建设工业化的方针，除出了什么什么会上决议的漂亮到使人不敢相信的期望支票以外，最少也有义务，对跟你们吃苦受难的人们发展一个明确的方针，给予一个有实效的保证。

① 1945年《新华日报索引》，第16、17、18、19、20、24页。

八年打出来的支票，今天是要兑现的时候了。”①

1945年9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大后方破旧的机器，想运回沦陷区是概不可能，也无法去与巨大工业竞争的。今后如不确立一健全经济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工业界今天的沉默，决不能长久，为了切身的权利，他们也不能长此沉默，为了国家民族的正气，尤其不能沉默。”再次强调“如果今天在抗战中出钱出力流血流汗的各阶层人民不力争，那么沦陷区收复以后，实际上仍是汉奸与敌伪合作的老板们的天下，中国人民八年流血就等于白费”。社论明确表示同情为抗战努力的民族工业家的呼吁，称赞了他们对政府财政的贡献，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竟没有一个人称许一下这种贡献，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社论最后说：“要做到是非分明，就得承认，抗战胜利是靠群民努力得来，要承认人民的功绩；忠奸有别，就得坚决肃清汉奸及与敌伪合作分子，这个大义如有含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都无法合理解决。”②

这两篇社论完全站在民族工业界的立场上，支持民族工商界的正当要求，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国营”政策，要求彻底没收敌伪资产，转给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工业经营，切实扶植战后后方民营工业的生产；要求坚决惩处与敌伪合作的经济汉奸分子。南方局真诚地为民族工业争取经济民主的斗争鼓与呼，维护民族工商界的正当权益，使民族工商界认识到中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使中共在民营工业界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战后民族工商业濒临破产，政府却不闻不问。为了生存，为解决后方的工商业危机，民族工商界在1945年下半年，展开了一系列的请愿斗争活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对民族工商界的斗争都随时予以详尽报道，从舆论上予以热烈的声援和真诚的支持。

除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外，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乘重庆市商会的机关报《商务日报》内部涣散之机，把它争取过来。共产党人掌握了该报经理部、采访部等主要部门，运用《商务日报》这个工商界重要的舆论工具，鼓励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反抗官僚资本，“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鼓励工商界为提高猪鬃等出口物资收购价格，提高花纱布工

① 《为民营工业呼吁》，《新华日报》1945年8月19日第2版。

② 《从工业界的紧急呼吁谈起》，《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9月11日第2版。

缴和轮船运费而斗争，《新华日报》则在舆论上给予支持，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做出让步”①。

曾任《商务日报》记者的杨培新在回忆中说：“《商务日报》在商言商，在政治新闻方面，只发中央社新闻，不登载左的言论，对工商界的利益坚决维护，深得工商界的拥护。沿海内迁工厂组织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头面人物章乃器、吴羹梅、吴蕴初、胡厥文、范旭东、李烛尘和金融界的王志莘、陈光甫、徐国懋，都把《商务日报》当作自己的报纸。四川实业界的温少鹤、范崇实、何北衡、胡子昂以及自流井的盐商、内江的糖商，都支持我们。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四大家族，我们对受四大家族欺凌和奴役的政学系也予以同情和支持，例如支持中国植物油料厂的张禹九、张肖梅，反对复兴公司垄断植物油出口。他的兄弟张嘉璈深得美国的支持，回国以后，特地约我在黄山见面，发泄对四大家族的不满。1945 年中央银行黄金加价舞弊案发生后，我们集中火力攻击主事的宋子文及郭锦坤，放过政学系的财政部长俞鸿钧，这使他对我们产生了好感。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对抗四大家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阵线，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我约《新华日报》记者李普同志一起去看李烛尘，李对政府低价收购永利公司产品发了一阵牢骚，我把它发了新闻。李生怕国民党找他的麻烦。可是几日后，国民党却提高了其产品的收购价格。从此，李烛尘开始了对共产党的交往。”②

《新华日报》还经常发表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卢作孚、吴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工商界代表人物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文章和谈话。

除了舆论的支持以外，周恩来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困难也尽可能给予帮助。范旭东的化工企业中国制碱公司，抗战爆发后毅然迁到大后方重新建厂。新厂进口的机器全部被蒋介石的远征军征用，国民政府决定给 300 万元贷款。新厂建成后，在当时毫无进口货的情况下，保证了国内对纯碱的需要。可是国民政府突然变卦，要把贷款作为公款，企图吞并新建工厂。同时，由于原材料价格暴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使这个著名的民族工业濒临垮台。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范旭东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

① 钱之光：《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光明日报》1977 年 1 月 5 日。

② 杨培新：《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炎黄春秋》2004 年第 6 期。

行”，以取得周转资金，但困难颇多。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卢绪章（他们都是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商量，又与范旭东晤谈，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在资金（起先是17%，后来是44%以上）、人力（龚饮冰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方面给予支持，终于使这家闻名国内外的民族工业顶住了官僚资本的吞并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渡过了难关。①

二、推动民族工商界走向联合，开展斗争

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备受官僚资本和侵略资本的侵吞和压迫，经营非常困难，不断有企业关门倒闭，他们也不断呼吁政府挽救工商业危机，但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南方局积极推动民族工商业者组织起来，走向联合，展开了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

1. 通过高兴亚推动西南民族资本家联合，反对官僚资本

到1940年官僚资本呈现出迅速膨胀的势头，吞并民营企业，挤占民营工业的市场。为推动西南民营企业家联合起来对抗官僚资本，1940年秋天，周恩来与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谈话，请他利用职务之便，把西南民族资本家团结起来，引导他们同心合力与四大家族对抗，至少使他们不致被四大家族吞噬或被诱迫投入四大家族的怀抱。高兴亚曾留学苏联，当过冯玉祥的秘书长，时任冯玉祥秘密代表。他不赞同冯玉祥组织“利他社”与迁川工厂和其他民族资本家联系，认为资本家不可靠，不肯参加其活动。周恩来对他这种想法进行耐心的疏导说服，指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帝俄时代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经济压迫，又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压迫，即具有两面性，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争取的对象。他希望高兴亚认同和支持冯玉祥的做法，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推动民族资本家之间的联合。

周恩来要求第一步先把四川主要的民族资本家，如刘航琛、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等团结起来，然后，第二步再把云南的缪云台等团结起来，

① 章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12—313页。

一起对抗四大家族。第二天，高兴亚便找到刘航琛把联合起来对抗四大家族的个人的想法向他讲了。刘航琛当时正在为四大家族伤脑筋，他立即赞同了这个主张。于是高兴亚、刘航琛一起拜访了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等，他们听后表示赞成。

图为重庆硿北温泉数帆楼。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经常与工商界人士在此会面谈话

随后，周恩来和南方局有关人员还与高兴亚共同研究了如何做刘航琛、卢作孚、何北衡、杨灿三以及云南缪云台等的团结争取工作的具体细节。经过高兴亚的努力，成功推动了这些民族工商界代表人物在重庆北温泉公园数帆楼的聚会。虽然只在成立联合准备库问题上形成共识，在资本负担、利润分配等方面却没能统一，但最终高、刘、卢、何、杨还是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当他们几家所经营的任何一家企业，在受到四大家族压迫而发生危机时，大家协力相互支援。①

通过高兴亚以他个人身份去推动说服和西南资本家联合起来，体现了周恩来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灵活策略。

2. 领导军布联谊社与中小工厂联合会开展斗争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日益腐败，其经济统制政策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榨取愈来愈烈，许多工厂停工歇业甚至倒闭，处境非常困难。董必武领导南方局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推动联合中小工商业者同官僚资本展开斗争。1939 年，根据董必武的指示，陈均打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平价购销处，以此便利多方联络工商界人士，与中小工厂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推动了他们抗日生产、进行民主斗争的积极性。1943 年，陈均又遵照董必武的指示，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部平价购销处专员的职务，创办了一个铁木

① 高兴亚：《记周总理对我的一次谈话》，《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第 158—159 页。

机厂，以小业主的身份发动中小工厂主开展斗争。①

从1943年起，陈均、董必武通过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钟灵（海燕）和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联系承织军布的布厂业主，发起组织了军布联谊社，并直接领导他们开展了反对国民军需署勒索掠夺民营布业的斗争。田钟灵是经济组的积极分子，党给他的任务是团结、争取中小工商业者。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田钟灵、李学民等发动100多家民营布厂老板，背着军需署交下的"欠圈短码"的棉纱，隐于黄山公路旁，当蒋介石经过时，一起拦路请愿，最后迫使军需署赔偿了短欠的棉纱。斗争取得初步胜利。②

为了巩固和发展军布业斗争的成果，团结各行各业为数众多的中小工厂，在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下，军布联谊社决定扩大组织，筹组中小工厂联合会。

1946年3月7日，中小工厂联合会成立，拥有会员工厂280余家，该会是在重庆局的领导和重庆局经济组的直接帮助下，由罗叔章、徐崇林等出面筹备组成的一个经济统一战线组织③。

"当时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同志对中小工联各项工作更是特别关注，不断给予具体指导，使我们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决定筹组中小工联的次日，田钟灵、王智仁等五人即到曾家岩五十号向董老汇报请示。董老热情地表示：你们建立中小工厂联合会，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我们积极支持……我决定同你们共商对付之策。还指示我们先向蒋介石请愿，再向行政院、经济部请愿。旧政协期间，我们根据董老的指示，拟具了《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董老亲笔对文稿做了修改……"④

其他如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南方局的许涤新、张友渔、李澄之等经常在工作上给予许多民营中小工厂帮助和支持。博古、吴玉章离渝前，都特地约徐崇林单独谈话，都反复叮嘱他，要斗争下去，要坚持到底。⑤

南方局领导军布联谊社和中小工厂联合会开展斗争，有力打击了官僚资本，推动了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走向联合，改变了中小民族

① 李东朗、雷田珍：《中共一大代表丛书·董必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② 李东朗、雷田珍：《中共一大代表丛书·董必武》，第228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382页。
④ 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4—115页。
⑤ 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5页。

资产阶级以往分散软弱的无力状态，开始团结起来。在南方局的引导下，他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商界中的影响。

3. 利用《宪政》月刊，团结工商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

《宪政》月刊是由黄炎培发起、张志让主编的大型政论性杂志，于1944年元旦创刊。其"内容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反民主与消极抗日，主张实现政治民主、言论、集会等自由，发挥抗战力量。刊物联系的对象是比较进步和态度居中的教授、作者、银行界工业界的资本家和工商界等其他人士"①。《宪政》月刊的活动跳出了文化界的圈子，扩大到银行界、实业界。在《宪政》发起人、赞助人名单中，除编辑委员之外，还有康心如、卢作孚、潘仰山、刘航琛、章乃器、胡西园等许多人都是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

《宪政》月刊创刊后，每月举行一次"宪政座谈会"，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在1月4日下午举行的第一次"宪政座谈会"上，主要邀请了银行界、实业界等30多人。"这些银行界、实业界等的代表人物，虽然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但是，把这些人团结到民主宪政运动中来，本身就是个重大的成功。所以这个座谈会很有影响。重庆各大报纸，都用很大的篇幅发表座谈会记录。《新华日报》上甚至用整版的篇幅发表它的座谈记录。"②这样就把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到了国民党的后院，"这在当时，是有深远的意义的。据我所知，这与周恩来副主席的支持分不开。季龙先生（即张志让）和周恩来副主席友谊很笃。在一切重要政治问题上，季龙先生都是先和周恩来副主席商量，并得到他的指示的"③。董必武经常参加座谈会，不仅就宪政问题发表意见，而且还时常介绍解放区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新气象④。

张志让虽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在政治上按党员看待"⑤，他做了大量

① 《张志让自传》，《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
② 尚丁：《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52页。
③ 尚丁：《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49页。
④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8页。
⑤ 张友渔：《抗战期间我在上层统战工作的经过》，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181页。

的工作。在南方局的指导下，张志让团结了不少银行、实业界人士。当时，“《宪政》月刊的出版，及其座谈会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酝酿、孕育和创建的过程。……通过这些活动，把后来成为民主建国骨干的人士一步步凝聚到一起”[①]。

《宪政》月刊每月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不仅在当时成为著名的民主讲坛，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进程，而且将进步民族工商界人士凝聚在一起，成为民主建国会成立的前奏。

4. 成立经济事业协进会

在中共提出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后，经济界进步人士纷纷起来公开表示拥护中共的这一主张。南方局经济组认为，这是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团结经济界进步分子的很好时机，于是在1945年夏天向南方局提出把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机关，企业中的中上层人员，工商界人士，经济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设想。这个意见很快得到董必武、王若飞同意。遂于七八月间酝酿成立筹备会，由许涤新、沙千里、罗叔章、杨修范、陈希、千寅生组成核心小组。9月13日，“经协”筹备会发表《对时局的庄严献言》，提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立即废止管制制度，取缔官僚资本，严惩工商界汉奸，切实挽救工业危机，救济失业员工等12项建议。10月24日，以筹备会的名义提出经济民主9条主张。12月23日，“经协”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胡厥文等应邀出席。会议通过了章程，推选阎宝航为理事长，沙千里、杨修范、林大琪、罗叔章、胡子婴、王寅生、耿一民为理事，并通过《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书》[②]。“这个意见书是经过经济界好几位朋友多次研讨，由王寅生执笔，基本上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精神写成的。意见书的内容很充实，它打中了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的反动腐败的要害，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尽管它所提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在当时没有做到，但在统一战线方面赢得了胜利。经协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做了不少工作。如开了一系列

① 尚丁：《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锋战士张志让与〈宪政〉月刊》，《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第154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342—343页。

的座谈会，提出‘意见书’，参加各党派组织的‘政协协进会’主办的民主晚会。这个民主晚会是为促进政协会议开得成功，贯彻执行会议的决议而举办的，一共开了八次大会，请各界知名人士演讲。……这些工作，团结了民族资本家中的进步和中间分子，推动了民主运动。”[①]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成立，将经济界的先进分子团结起来，抨击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反对官僚资本，支持工商界争取权益的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

通过引导和推动民族工商界的联合斗争，促进了中共和民族工商界的交往互动与合作，加深了民族工商界对中共及其政策的认识和了解，逐步消除他们对中共的误解和偏见，使他们一步步向中共靠拢。

第四节　团结爱国工商界，争取政治民主

一、引导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向共产党靠拢

古耕虞回忆说：“我对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我向外推，共产党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产党。”[②]古耕虞对国民党、共产党态度演变的过程，在民族工商界中是很典型的，也正反映了整个民族工商界对国民党、共产党态度演变的过程。

国民党“向外推”，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经济统制以及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侵占和掠夺。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家竭力利用手中政权的力量，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入侵民营企业，扩张自己的势力，使大后方民族工商业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引起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极度的失望和愤懑。

刘鸿生在大后方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蒋介石原来答应偿还他在上海1000余万元的损失，不仅变成了空头支票，而且四大家族还逐步侵吞他的企业。他“辛辛苦苦创办的两个最大的私营企业——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由于官僚买办股份的逐年上升，私人股份逐年下降，

① 方卓芬：《我所知道的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摘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225—226页。

②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第78页。

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官股占五分之四，私股仅占五分之一，几乎变为官僚资本的企业了”①。像他这样的上海大老板，变成了“四大家族的小伙计”②。他曾经气愤地对他的儿子刘念智说：“我衷心耿耿为蒋、宋、孔、陈工作了十余年，结果落得一场空，需要我们的时候，甜言蜜语，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翻脸不认人。我已把他们看透了。”③

“1938 年华西经理胡子昂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孔祥熙不同意贷款，却乘机提出改组意见。华西创办人走投无路，只得改组成立中国兴业公司。1939 年 7 月中国兴业公司成立时，官股已占到资本总额的 81%。孔还不满足，到 1943 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了 95%。”④

爱国化工实业家范旭东，为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付出毕生心血。美国进出口银行鉴于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自创办以来，事业成功，信誉卓著，首次破例向中国私人企业直接贷款。1945 年 1 月，范旭东同他们签订了 1600 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并且无抵押，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担保，即可放款。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无理阻挠而未果。范旭东受此沉重打击，忧愤成疾，黄疸病和脑血管病同时发作，于 10 月 4 日在重庆沙坪坝去世。

由于国民党的“向外推”，使民族资产阶级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的本质，逐步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共产党“向里拉”，主要是由于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把他们视为同盟者，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与他们真诚相待，同情他们遭受的压迫，支持他们反抗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以民族大义为重，对他们的进步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善意的批评，赢得了民族工商界大多数人士的信服和拥戴。

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有时亲自访问或接见他们，也常参加工商业者召开的座谈会。他们以理服人，真诚相待，使许多爱国工商界人士自觉地接受了中共的领导，逐步抛弃对国民党

① 刘念智：《抗战期间刘氏企业迁川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 68 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81—182 页。

② 刘念智：《抗战期间刘氏企业迁川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 68 辑，第 180 页。

③ 刘念智：《从抗日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刘鸿生》，《文史资料选辑》第 68 辑，第 185 页。

④ 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53 页；另参见《重庆工商史料》第 5 辑，第 40、44、113、114 页。

的幻想，向中共靠拢。

真诚相待、以理服人，这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特点。他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守则》第二条就是“谦诚的态度”，对盟友态度要诚恳；对他们讲道理说服，而不是命令。

胡厥文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自居于人师，他思维极为敏捷，但毫无锋芒毕露。……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画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质无华，总是给人以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一方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不知不觉之中为之折服。”胡子昂回忆在重庆的一次活动说：“各方面的人士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流泪。”①可见工商界对周恩来多么尊敬。

古耕虞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不论周恩来同我的谈话，或《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一再阐述了这个政策。……我心中是有数的，中国民族资本要生存，要发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话，都倍感亲切。”②

刘鸿生对周总理印象很深，他说：“周恩来完全不像国民党的大官，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目光炯炯，非常敏锐，讲话很吸引人，而且非常中肯。他知道我是刘鸿生，但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大资本家而敌视我。他恳切希望热爱中国的人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卖国贼而奋斗。”③他对周总理很钦佩，曾对他的儿子刘念智说：“在蒋介石政府的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官吏中，找不到一个像周恩来那样的伟大人物。”④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多次到许多爱国工商界人士家中探望。1943 年 2 月，李烛尘参加西北工业考察团，回到重庆后，由于劳累过度病倒了。周恩来特派秘书徐冰去探望他，李烛尘深受感动，从这一天起，李烛尘开

① 章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314—315 页。

②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第 78—79 页。

③ 刘念智：《抗战期间刘氏企业迁川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 68 辑，第 184 页。

④ 刘念智：《从抗日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刘鸿生》，《文史资料选辑》第 68 辑，第 201 页。

始了同中共的接触。

周恩来还多次到沙坪坝土湾胡厥文家中看望，交谈时事。周恩来对形势细致透彻的分析，使胡厥文深受启发。他还勉励胡厥文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到底，要为国家和民族多作贡献。并给他送去了延安生产的小米、红枣和编织草席等物品，使胡厥文为之感动。

范旭东是著名的爱国化工实业家，为发展中国的化学工业付出毕生心血。1945 年 10 月 4 日在重庆沙坪坝去世。《新华日报》对范旭东的逝世以及对他的悼念活动连续发表新闻，进行报道。在范旭东的追悼会上，时值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同志送去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周恩来、王若飞送的挽联是"奋斗垂册载，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和平正开始，方期协力建设，深痛中国失先生"。《新华日报》的挽联是"绩业早惊环宇内，壮怀时在化工中"①。这些挽联高度概括了范旭东一生中为中国化工艰苦奋斗的伟大功绩和留下的遗憾，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他为中国化工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

国民党的"向外推"和南方局的"向里拉"，使很多民族工商界人士认清了国民党的打拉与欺骗，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他们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了。由于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成功地开展统战工作，朋友越来越多。

"1944 年周恩来从延安到重庆，在一次会上说：'这次我到重庆，请他们到我家里吃饭座谈，都来了，这还是空前的。'国民党中的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社会部长谷正纲惊奇地说：'周恩来飞来飞去，人心惶惶，奇怪的是连产业界也和他来往。'"②

1945 年 8 月下旬，毛泽东亲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李烛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和谈。9 月 17 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赞扬了范旭东、李烛尘办化学工业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李烛尘对毛泽东雄才大略，学识渊博，态度谦和恬静十分钦敬。事后他说，"炉火纯青"四字毛泽东当之无愧。当时工商界有些具有实力的头面人物，明哲保身，不敢和共产党接触，他居然敢于发表欢

① 《新华日报》1945 年 10 月 22 日第 2 版。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315 页。

迎文章，应邀谈话，称颂毛泽东，在实业界引起人们注目。周恩来对他的表现给予很好的评价，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启发和鼓励，更激发了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热情。①

刘鸿生，日军入侵后他的企业损失达1000万元，他毅然把一部分企业迁来四川。刘鸿生自称，他对共产党有一个"从怕、疑、服到拥护"的过程，由于受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影响，才最后拥护共产党。②

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古耕虞，是个百万富翁，四川临解放时，他公司的资产达900万美元以上，属他本人名下的也有100万美元，而且都在国外，他自己说过，我所拥有的资产，完全可以到美国去当寓公，但由于受周恩来的教育、勉励，使他逐步靠拢共产党，进而接受党的领导。周恩来一声召唤，他从香港回来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成了国家干部。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像我这样可以说是垄断企业的资本家，能够逐步靠拢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同周总理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③

由于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朋友越来越多，许多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把周恩来看成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周恩来曾对南方局的同志说："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④这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也反映了南方局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二、引导教育民族工商界，争取政治民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民营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再加上国民政府的经济统治和腐败，经营日益困难，他们也曾组织团体，维护企业利益，但是力量分散而且软弱。1943年，在南方局的引导下，承织军布的一些中小企业主首先联合起来组成军布联谊社，为维护企业利益展开斗争。

到1944年，随着国民党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爆发了军事、政治危

① 张帆：《李烛尘生平简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6—87页。
②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314页。
③ 曹应旺主编：《周恩来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④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机，民营工业也很快难以维持，大后方民营经济也陷入危机。在南方局的引导下，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商界纷纷参与民主宪政运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和民营工商界人士纷纷呼吁国民党政府，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取消统制政策。

1944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第七届年会，会上通过了要求政府减轻工矿负担、挽救工业危机等提案。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以及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等5个工业团体，举行座谈会，专题讨论“宪政和经济”。吴羹梅在会上痛切陈词，“民族资本家要被官僚资本吃掉了！”①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等八十几位工业界代表一致同声呼吁：“要求政治民主！要求生产自由！要求人权保障！”②与会各单位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要求国民党取消统制政策。9月4日吴蕴初、卢作孚等民营企业家与重庆文化教育等各界共三十多人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及早实施人民渴望之民主制度”；“切实开放言论”；“必须给产业界以一切解放”等9项主张③。1945年1月21日“重庆市商会等四公会要求废止统购统销，统制以来，货弃于地，生产日蹙，国民参政会和四川临参会曾屡次建议政府撤销，未见改弦，特再呼吁”④。7月9日、14日重庆商会等再次联名呼吁取消统购统销。

虽然民族工商界参加了民主宪政运动，也提出了一些政治主张，如1945年12月26日，重庆市商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和国货厂商联合会等6个工商团体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呼吁政府“请速实施宪政，厉行民治”，“扫除政治上之贪污与腐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⑤，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首次公开发表的对时局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首要关心的仍然是企业的生存问题，他们很少甚至不关心政治。

① 尚丁著：《四十年编余忆往》，第9页。
② 《新华日报》1944年5月25日第2版。
③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79年版，第65—65页。
④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1日第2版。
⑤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456页。

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但是民族工商业却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而国民党政府不闻不问，任其死亡，并且骤然减少乃至停止订货，这又把民族工商业向危机中再推了一掌。许多民营企业停工停产，处于瘫痪状态。为挽救工业危机，1945 年 8 月 26 日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和重庆区分会三大工业团体举行会议要求政府紧急救济。1945 年 9 月，三大工业团体联合开会组成复员协进会，他们仍然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要求政府继续订货，发放紧急工贷，并选派代表就订货和工贷问题与国民政府进行多次交涉，但是直到 10 月底，毫无结果。民营工商界决定改变呼吁建议之类的温和方式，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10 月 31 日，三工业团体联合召开大会，当场通过《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情势的宣言》，会后胡厥文、吴蕴初、潘仰山等民营工业界 106 名厂长、经理冒雨到行政院请愿。民营工商界通过这一系列求生存活动，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逐步放弃了对它的幻想。

南方局针对一些民营资本家“不搞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思想倾向，教育他们认清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指出“经济与政治是分不开的。要解除产业困难，就必须以民主政治作前提、作保障。现在横在后方工业生产的问题，正是如此”①。批评了民族工商界只埋头做事，不问政治的思想，要求“后方工矿界人士，应将眼光突出经济界的领域，去注意政治，去认识政治，并推动政治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②。南方局运用各种方式，引导他们去认识争取政治民主对经济民主的重要性。

针对中小工业危机，董必武在一次集会上明确指出，“中小工业发生危机，是由于政治问题。……针对中小工联部分会员只着眼于贷款、求救济以及工为工、商为商等思想，告诉大家，以往各自为政，不过问政治，受着统制政策的摧残，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繁荣就没有办法”③。

在国共《双十协定》签字以后，周恩来先后在《新民报》负责人陈明德、邓季惺和川康银行总经理宁芷村家约胡子昂和西南工商界几位朋友谈话。周恩来着重指出，抗战胜利后，经济建设固然很重要，但当前阻止中国前进的主要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建设也是搞不好

① 《工业界努力的方向》，《新华日报》社论，1944 年 4 月 21 日第 2 版。
② 《工业界努力的方向》，《新华日报》社论，1944 年 4 月 21 日第 2 版。
③ 徐崇林：《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纪实》，《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第 115 页。

的，没有和平民主，就谈不上建国。他启发工商界人士认识到，要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应当支持和平建国方针，反对内战，反对独裁。①

《新华日报》也不断发表社论，如《民主是生产发展的暖室》②、《论民营工业的救济》③等文章宣传政治民主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有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乃是中国工业化的最主要的先决条件，也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④战后进行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需要一个和平而民主的中国……和平民主乃是经济建设的大前提"⑤。"今天民生凋敝已甚，真正民主政治如不实现，官僚统治是决不能铲除的，正当工业界的痛苦，也永远无法解除。"⑥

工商界中有一种疑虑，就是对中共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有些误解。许多人深恐中共参政后对自己经营的企业不能顺利发展。南方局积极宣传中共对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消除民族工商界对中共的误解和疑虑，和他们一道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和平民主。

在1945年9月17日的桂园茶会上，毛泽东针对工商界对共产党战后经济建设和私营工商业政策存在的误解，向民族工商界人士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官僚买办的统治，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才能得到发展。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⑦。并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邀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上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肯定了关心政治是民族工商界抗战以来的进步现象。谈到民主时，他说，中国不仅政治上需要民主，经济上也需要民主，中国的经济却是管制的太多，统制的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要去掉一切束缚，凭大家的资本、知识、劳力去发展竞争，

① 胡子昂：《丰碑永存人间》，《统一战线珍贵文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0页。
② 《新华日报》1944年1月4日第2版。
③ 《新华日报》1944年2月16日第2版。
④ 《解放日报》社论《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新华日报》1945年7月13日第2版转发。
⑤ 《经济建设如何着手》，《新华日报》社论，1945年12月6日第2版。
⑥ 《重庆市出口商的呼吁》，《新华日报》时评，1945年7月9日第2版。
⑦ 许涤新：《毛主席到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03页。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周恩來同志在星五聚餐會

演講當前經濟大勢

關於發展資本問題

關於稅收和勞資問題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指出战后民族工业发展的出路在于国家实现和平民主，并向工商界朋友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图为《新华日报》刊载的有关周恩来演讲的报道

政府也要有明确的、一贯的、有指导的政策，这样中国才能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谈到发展私人资本问题时，他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应该有三种资本同时发展，“第一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这三种资本应该在节制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而不应互相排挤与吞并。在这三种资本中，仍然是私人资本占多数，因此中国今后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我们既然提倡上述三种资本，当然反对另外三种资本：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①。他还指出，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程度，究竟是否转入社会主义，还是需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他希望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希望民族工商业家和民间团体联合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6页。

周恩来的这次演讲，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经济纲领、方针和政策，在当时的工商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吴羹梅在自述中说道："在周恩来演讲的整个过程中，听众济济的会场十分安静，人们认真而兴奋地倾听着，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我坐在会场里，全神贯注地听完周恩来的讲演。我很兴奋。我看到了我们的希望和前途所在。我想，在场的广大民族工商界人士会与我有同感。经过8年的抗战，我们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对它极度的不满和失望，希望能对另一派政治力量共产党有所了解。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使我们明白了共产党对我们的政策，了解到共产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鼓励支持我们的事业的，我们怎能不振奋！此后，我们与共产党的关系越发地接近起来。"①

胡子昂回忆说："总理的讲话使大家明确了党的方针政策，驳斥了蒋介石的造谣诬蔑。大家感到，从经济上来说，你蒋介石整得那么烂，共产党经济政策却深得人心。这一反一正，说得清楚，总理为我们工商界指出了正确方向，大家理解了为什么延安能够安居乐业，认为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威力很大。"②

他们的自述反映了当时民族工商界大多数人的心情，非常具有代表性。周恩来的这次演讲增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商业政策的了解，消除了工商界多数人心中的疑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影响更加广泛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1日发表社论，提出了"中国将要走什么路"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将同全国经济界一道为争取经济、政治民主而斗争："中国将要走什么路？政治上是真民主对不民主或假民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自由的国民经济对官僚资本和外国独占资本所垄断的半殖民地经济的斗争。中国的人民大众（连民族企业家在内）争取前一条路，而少数反民主的买办官僚，则想把中国拉回去走后一条路。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和中国的人民站在一道的，是和中国的民族企业家站在一道的。……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态度，是和全国经济

① 《热爱祖国 追求真理——吴羹梅自述节略》，《民讯》1990年第8期。

② 胡子昂：《周恩来同志及时给我们指引方向》，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291页。

界(特别是民族工业家)一致的。"①

这篇社论从国家的前途出发,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民族工商界站在一起,为争取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进行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决心,为民族工商界争取政治经济民主指明了方向。

工商界在这次斗争中,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在共产党的教育引导下,逐渐认识到:不问政治,一味强调经济民主、生产经营,企业是没有出路的。古耕虞说:"我是实业家,我不关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经营决策,这个道理浅而易见。……民族资本要生存、发展,必须反帝爱国。"②李烛尘说:"久大和永利在范旭东先生领导下,一向是苦干而不问外事。现在这一作风已走不通了。政治不上轨道,工业化就远得很。"③胡厥文在回忆录中说:"工业界应当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敢于站出来发表政见,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络工商各界,为民主建国而奋斗。中国目前最急需的不是实业,而是和平和民主。有了和平和民主,才能建立富强的国家。"④施复亮在1945年的一次星五聚餐会上说:"一切题目,最后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业界自己首先要团结起来,然后再与各界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舍此而外,别无途径可循。"⑤民族工商界的政治思想开始觉醒了,他们认识到政治的重要,并开始酝酿建立自己的政党。

1945年12月16日,以民族工商界为主体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在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集中的政治主张。在1946年1月8日举行的招待政协会议代表的茶会上,胡厥文对国民党代表在发言中所谓党派"互谅互让"的论点,指出:"党派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作为政党的礼物的。"⑥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工商界的政治觉醒。此后民族工商界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政治斗争越来越频繁地开展起来。

① 《为中国经济的民主而斗争》,《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1日第2版。

②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不尽的思念》,第78页。

③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4日第2版。

④ 胡世华、吕慧敏、宗朋整理:《胡厥文回忆录》,第77页。

⑤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2日第2版。

⑥ 《民主建国会招待政协会议代表纪要》,转引自陈竹筠、陈起城选编:《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第七章　加强对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

宗教界广大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动员他们参加抗战，南方局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采取实际行动，调整了对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政策，进一步团结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建立了包括宗教界广大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推进全民族抗战的发展。

第一节　开展对宗教界统战工作

一、对宗教界统战工作的提出

中国是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聚有大量的信教群众。在日军大举入侵的情况下，采取正确宗教政策，调动信教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任务。

1. 宗教界奋起抗战，引起中共对开展宗教界统战工作的关注

1939 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沦陷区宗教信徒也不少。怎样去动员宗教信徒投入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动员宗教信徒参加抗战，使宗教信徒成为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是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战争灾难和血的教训是刺激、促使宗教界投入抗战的重要原因。七七事变后，日本企图迅速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日机的狂轰滥炸，日军的烧杀掳掠，给宗教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寺庙、教堂和宗教圣地被占被毁，不少教士被杀害。基督教信徒、

牧师，被捕杀者众多，海南包括雷州半岛“自沦陷后，日军认为重要基地，对教会压迫威吓，不可言事形容。往往借调查之名，吊打施刑，杀害牧师王志德、符和美，焚死符协泰、符福喜，在此翻天覆地风浪中，信徒不免灰心跌倒。”①严酷的现实使宗教界人士深感“中国人如果不关痛痒地活下去，我们只有任人宰割”②。

中国宗教界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是宗教信徒奋起抗战的主要内在动力。佛、道、伊斯兰、基督、天主等宗教都以“为善”、“爱人”为基本教义。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激起宗教界的有识之士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他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1933 年 2 月，著名高僧太虚③在一次题为《学佛先从做人起》的演讲中指出：“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④基督教爱国人士胡君素在《基督徒与抗战》一文中说：“基督徒为了什么要努力参加救亡工作呢？因为我们认识这次的抗战是为了争取我们民族的生存。”⑤1938 年 2 月，回族同胞成立全国性的回民抗日救亡团体“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发表动员全国回民抗日救亡的宣言，指出：“处此日军毒焰方张、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岂肯后人；趁此时机，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⑥正是这种诚挚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使命感，表明宗教界已认识到爱国重于爱教，爱国是宗教信徒作为国民应尽的责任。这是南方局动员宗教界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国宗教发展组织化倾向日渐明显，是宗教界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战的组织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的活动都是在一些全国性或地方性如基督教全国联合会、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等组织领导下进行的。组织化的宗教界具有强大的力量，

① 沈亚伦：《四十年来的中国基督教会》，《金陵神学志》（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第 27 页；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6 页。

② 吴耀宗：《最近的形势》，《唯爱》第 17 期。

③ 太虚（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出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

④ 黄夏年：《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4 页。

⑤ 胡君素：《基督徒与抗战》，汉口《大公报》1937 年 11 月 25 日。

⑥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 年 1 月 16 日。

成为抗战中各方面积极争取的对象。南方局加强对宗教组织的引导，才能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充分发动更多的信教群众，参加全民族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从自身实际出发，利用宗教国际性特点，对外广泛进行宣传，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同时，由于主教和传教士所在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上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因而不少外国主教和传教士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1939 年 12 月 21 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敬谢全世界同情中国的宗教家》，对外国主教和传教士给予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深切敬意。宗教界在抗战中的积极表现和外国主教、传教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使中共对宗教界参与抗战的重要性加深了认识。

随着中共对宗教界抗日活动的日益重视，中共的宗教政策也逐渐成熟。中共在各种宣言、文件中，在各根据地的纲领、法令中，都申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华日报》在全国文化总动员的宗教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对宗教的态度》，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文章首先声明，共产党人是不信仰宗教的。但中国共产党人仍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意识和世界观的问题”。共产党“绝不去强迫别人遵从自己的信仰……各人有各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每个人有举行自己所信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仪式的自由。同时，每个人也有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而保持自己不信宗教的自由”①。文章不仅强调了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也申明了信仰自由（包括信仰共产主义）的权利，从而使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本精神体现得更加全面、完整。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在大后方进行领导工作的南方局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更为明确和坚定。毛泽东明确表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②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和指示，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进行抗

① 《新华日报》1942 年 2 月 15 日第 2 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 页。

日统战活动，更加强调充分发挥宗教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和国民党利用宗教反共，促使中共作出应对

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和国民党利用宗教反共，促使中共更加意识到了争取和团结宗教界的重要性。从侵华战争开始，日本十分注意利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力量，力图分裂和瓦解中国宗教界的团结，破坏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散布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的谎言，声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大亚细亚主义"的制造者矶部美氏还向东亚一切佛教民族侈谈对中国的战争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国"。广州沦陷后，中国只有西南滇缅公路保持对外交通。日本特务竭力煽动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反对开放滇缅公路，说中国政府是反佛教政府，日本为保中国佛教，所以与中国作战。日本军政当局极力唆使西藏宗教上层人士从事西藏独立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在回族人口居住较多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进行挑拨分立的活动。他们还进行"抗战是为了汉人，为了蒋委员长"，"日本是你们的保护者"、"日本帮助你们防共"等宣传。不少教派组织，以宣传宗教自立为借口，麻痹中国民众，以宗教之名，行反共之实。这些手段麻痹了很多百姓，给各地的抗日救亡带来了不小的阻碍。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周边如印度、缅甸等国也是信教国家，要维护西南后方的安全，处理好与信教国家的关系，争取他们的信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就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直接领导组织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国民党也积极利用宗教反共。如1943年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制定的反共计划书就指出：要拉拢全省各地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收买全省各地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发动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运用基督教民，向在当地之外国教师宣传中共之一切暴行，取得国际间之明了与同情"[①]。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和国民党利用宗教反共的严峻形势，引起了中共对宗教问题的重视。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03页。

3. 提出正确的宗教界统战政策

土地革命前期和中期，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宗教政策也曾出现明显“左”的色彩。在法律上，对把宗教界进行阶级区别和分别对待给予合法认定。1931 年 11 月和 1934 年 1 月两次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都一方面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①，另一方面又规定“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②中共在两次宪法大纲中公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是针对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而言的，而限制和反对宗教的相关政策则是专用于宗教界上层人士。

这一时期，在城市，将工人运动视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心。中共在宣布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给予人民以政治权利时，只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等自由，唯独不见“宗教信仰”之自由。而且还将宗教界人士、教会等与无产阶级及其组织相对立。1931 年 12 月 21 日《中央关于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中规定：“和尚、道士、牧师等宗教的负责人，虽在苏区做工，但不能加入工会组织，已加入者肃清出去。”③在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决议中是把基督教青年会等同于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指责他们“装出失业工人的拥护者与同情者的样子，欺骗失业工人”④。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从 1935 年 8 月《八一宣言》发表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相应地中共的宗教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八一宣言》中列举了中国各界同胞的抗日英雄，特别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⑤，其中，马相伯是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3 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772 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564 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548 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1 页。

天主教学者，是著名的爱国宗教领袖，九一八事变后，就积极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主动发起组织抗日团体，被誉为“爱国老人”。中共对马相伯等人的公开称赞，可以视为对整个宗教界人士态度的一次团结和友好的公开表态。但中共对宗教界和宗教界人士的态度是视其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程度来划分的。这就使这一时期中共的宗教政策不能不具有局限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共的整个统战政策由反蒋抗日主导思想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主导思想转变的前后时期。1936 年 8 月，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说道：“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在宗教界……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①]这个文件是将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宗教界人士看做国民党人，与这些宗教界力量的联合自然是与国民党联合的一部分。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国家也进行了区别对待，对各国宗教在中国的势力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1935 年 12 月，中共颁布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了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路线，同时也很快在宗教政策上得到体现。1936 年 7 月，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斯诺问道：“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对此，毛泽东回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②]毛泽东的回答中，无论是对日本宗教的抵制，还是对日本外其他国家的宗教的许可都反映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外国宗教的态度取决于它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和立场。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因为对国民党、蒋介石立场认识和政策策略的改变，而实行的对本地和本地化宗教的联合，还是因为对帝国主义认识的加深和形势所迫促使其对外来宗教采取的不同政策，都是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抗日成为时代主题下进行的，中共已经将抗日作为其思想认识转换和政策路线选择的主要现实依据，一切从实际出发，逐渐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宗教政策。

---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85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94 页。

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中共对宗教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研究也更为深入。1937年4月，李达出版了《社会学大纲》，对原始的宗教的世界观、观念论与宗教的关系、宗教的起源及其形态、古代宗教的特征及基督教的起源、宗教在现代社会上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与宗教的斗争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当读到书中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时，他写道："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他还指出："生产发达，对自然力逐渐理解的多，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源渐渐失去。然社会的阶级制度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人人心，故宗教仍然存亡（在），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与内容。"[①]对宗教本质及存在根源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研究室，调查研究蒙古、回族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就指出："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原是兴起于反对异族侵略与内部压迫的环境中，它富有反抗的精神，教义中还包含着社会的、文化教育的以至政治的制度之规约。回回民族由于自己的历史环境至今牢固地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传统。伊斯兰教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织部分，与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就利用它来作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②]对宗教实事求是的分析，为中共制定更为完善的宗教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对国家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宗教界抗日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根据中共中央的宗教政策，南方局广泛发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宗教界人士，激发宗教界的爱国热情，深入宗教界的组织，积极引导和推动宗教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认真做好对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5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87页。

二、动员宗教界抗战

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明确向中国国民党、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全国佛教联合会等团体发出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①

1. 积极报道、支持宗教界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7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抗战与基督教徒》的文章,提出"应当特别指出,基督教青年会团结了许多青年,成为中国青年中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在目前,中国民众组织性一般薄弱的状况下,基督教青年会能团结这样许多广泛、广大的青年群众,很值得我们重视"②。《新华日报》对基督教青年会团结民众组织抗日活动给予肯定,重视他们的活动,显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重视。1938年3月5日,中华基督教徒全国联合会成立,在其成立的前一天,《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华基督教徒成立全国联合会,六项使命注重抗敌救亡"为标题的报道③,从民族抗日救亡的角度给予肯定,显现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宗教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视。

1938年3月7日,《新华日报》又以"本报特写"的方式发表《基督徒联合会成立》一文,详细报道了成立大会的盛况,并且强调:在日军加紧全面进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民族救亡阵线已日益巩固起来,并以基督徒的救亡统一阵线的形成加以论证。文章指出:基督徒及其各种宗派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结成救国救民的统一阵线,这种事实雄辩地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是日益巩固了。文章最后指出:"基督阵线成立了,在民族的统一战线里又加进了一个有力的因素。"④1938年6月19日的《新华日报》全文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21页。
② 《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第4版。
③ 《新华日报》1938年3月5日第2版。
④ 《新华日报》1938年3月7日第4版。

刊载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以抗日救国为核心的8项工作纲领，还发表了《欢迎全国回民大团结》的短评指出：“由此，我全国回民不仅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的统一组织，而且有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希望把所通过的纲领——见诸实行，这不仅造福于回民，而且是增长抗日力量。”也正是在《新华日报》的引导与推动下，佛教、天主教也成立了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①。宗教界的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成立，也是《新华日报》有力推动的结果。抗战时期，宗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都是在全国性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也是宗教界从事抗日外交的组织基础。

抗战时期，南方局妇委利用“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会”开展上层妇女统战工作。图为邓颖超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会成员在一起

南方局成立后注意积极引导和指导宗教界的抗日宣传。1939年1月30日，《新华日报》以“答读者来信”的形式，专门对边远闭塞地区宗教徒的抗日宣传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其中提出：“要把日寇屠杀淫掠的事实告诉贵处僧人，要指明白，日本强盗的枪弹没有分别谁是出家谁是不出家的，僧人为了自己的性命财产，为了国家民族，应当一致起来参加抗战

① 黄淑君、杨淑珍等编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23页。

工作，第一步要做到把意识较好、较积极的联合在你周围，通过他们发动更广泛的联合。其次，是利用他们与一般落后的乡村妇女的关系进行广泛的宣传，使他们鼓励丈夫或儿子上前线。”《新华日报》这种既中肯又具体的指导，对边远地区宗教徒的抗日宣传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①] 抗战时期南方局提出，宗教界利用宗教国际性的特点，开展宗教外交。1938 年 2 月 6 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作抗日保卫民族的宣传”……而且还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唤起和联合各国民众，一致起来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物力的援助”[②]。《新华日报》的引导、推动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宗教界的国际宣传活动获得了“异常的成功”。

通过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的评论文章，一方面宗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了宣扬，进一步弘扬了爱国热情，更积极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靠拢；另一方面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促进了宗教界与南方局各地党组织的合作。

2. 加强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南方局不失时机地注意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抗战。随着抗战日益推进，湖南部分宗教界人士决定走出“清静之地”，投入抗日洪流。1939 年 4 月，南岳福严寺的巨赞法师联络上封寺的知客僧演文等 5 人密商在南岳各寺庙中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并定名为“佛僧青年救亡团”。巨赞等人的行动获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帮助。当时，正遇上身兼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南岳游干班讲课。周恩来到南岳后，广泛地接触僧、道、尼，和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当暮笳在交谈中拿出自己的纪念册请周恩来题字时，他欣然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字。周恩来的题字不仅使巨赞等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得到启发，即“杀贼”和“学佛”并不矛盾，只有杀贼除寇，才能救生事佛。为了组织更多的人“杀贼”，他们将“佛僧青年救亡团”更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之后，演文和暮笳一起找到时任南岳

① 黄淑君、杨淑珍等编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第 426 页。

② 《新华日报》1938 年 2 月 6 日第 3 版。

游干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请教名称是否合适。叶剑英首先肯定了他们的爱国之举，并建议将团体名称中的“佛教”改为“佛道”，因为南岳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还是道教圣地，改为“佛道”，有利于把佛、道两教教徒团结在协会周围；将“救国”改为“救难”，更为符合“救苦救难”之教义，比较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宗教界人士。叶剑英的建议进一步“点化”了他们的悟性，他们遂将团体更名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1939 年 5 月，叶剑英在湖南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演讲，他奉劝各位爱国僧侣，当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去幻想将来，而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南岳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之后，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起救国。1939 年 5 月 7 日，湖南宗教界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诞生。之后，巨赞、暮笳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在湖南湘潭、衡山、衡阳等地，除了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帮助抗日军队抢救伤员，为阵亡将士诵经祈祷外，还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做瓦解日军的工作。他们根据日本国民大多信奉佛教的特点，向日军散发画有佛像并有佛的传教的传单，向他们宣传“不可残害众生”的佛理。巨赞法师还创办了《狮子》月刊，宣传抗战。①

基督教爱国人士吴耀宗通过和南方局周恩来的交往，深化了对抗战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1938 年 5 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吴耀宗，就向他表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②给吴耀宗很大的启发。

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四川讲学的吴耀宗到重庆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再次见到了周恩来，此时正值皖南事变后抗日民主斗争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周恩来指出：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阐述了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次谈话，使吴耀宗进一步认识到，中国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第 279—280 页。

②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1979 年 3 月 5 日。

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希望，是一切爱国人民可以信赖的力量。

1943年5月25日，吴耀宗在重庆曾家岩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那天在座的还有董必武和其他两位同志。这次会见持续了将近一整天。周恩来向吴耀宗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以坚定有力的口吻，呼吁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当时吴耀宗谈了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他认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最后还是可以一致的。周恩来听后，坦率地表示，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中共的宗教政策。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的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换，不仅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同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下午，周恩来详细回顾了中共的历史，并对吴耀宗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中吸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中共丧失信心。临别之前，董必武应吴耀宗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他，一共五六本，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等。这次谈话对吴耀宗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从此，吴耀宗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周恩来，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吴耀宗和共产党人为抗日与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①] 南方局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争取工作，消除了宗教界对中共的不少顾虑，调动了宗教界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3. 开展对各种宗教组织的统战工作，推动宗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各方面对中共展开进攻，各地中共组织遭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5页。

受严重破坏。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针，提出“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1941 年 4 月，《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利用基督教的组织来组织群众。这一利用宗教组织来为党的群众工作服务的主张，更是以前没有提及的。中共中央当时还设想，要把部分党的宣传工作和文化工作“隐藏”在宗教活动和宗教机关，宗教机关应有“特殊组织”①。1941 年，周恩来致电上海地下党，指出为了多方保存力量，应把做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分开；在教育界、宗教机关和救济团体中都应用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在上层开展活动，以配合群众工作②。上海各基层党组织，贯彻“群众工作公开化、合法化”的方针，根据不同层次群众的觉悟程度，切身要求，组织各种符合社会习惯、切合群众需要，能够公开活动的带有文化联谊、生活互助性质的组织，其中就有基督团契等形式，并开展戏剧、音乐、美术、福利等活动，这些都成为中共开展群众宣传教育工作的公开合法阵地。上海沦陷后，在“孤岛”集中了 70 余万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栖身在社会慈善团体、教会、同乡会开办的难民收容所，其中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江苏省委专门成立难民运动委员会，并设立专门党团，通过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的慈联会收容股主任赵朴初，和国际救济会常务理事黄定慧的关系，取得救济团体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逐步掌握了慈联会各收容所和国际第一、第二收容所的实际领导权。难民收容所不但是难民救济安置场所，也成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抗日斗争培养输送人力的基地。中共中央称誉上海难民工作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创举。③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和工作，把慈善事业和宗教界上层团结起来。还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联络各界救亡协会党团，请一部分拥护中共抗日主张、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著名人士，发起举办由各界社会名流参加的各种星期聚餐会，开展深入细致的上层统战工作，增进党与各界进步爱国人士的互相了解、团结和合作，在交往中部分知名人士思想逐渐向左转，成为党的可靠朋友、忠诚战士。基督

①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 512 页。

③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7 页。

教青年会总干事、华美轮船公司总经理陈巳生在中共组织的教育下，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南方局各地下党组织通过做各种宗教组织的统战工作，团结了大批宗教界人士，推动了宗教界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

1939年4月23日，以巨赞、演文为首发起组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在南岳庙召开僧、道全体大会，接着举行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时在南岳游干班任副教育长的叶剑英来到祝圣寺，同大家交谈。当他了解到"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就要开成立大会时，立刻找为首的几个人，表示鼓励和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提议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名称定下来，同年5月7日在祝圣寺召开成立大会，叶剑英应邀参加这次大会，并作了讲演，唤起南岳宗教徒和进步人士抗日救难的热情。选举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为副会长。下设若干股，演文任训练股长，巨赞任宣传股长，明真任文书股长，曼慈任事务股长，灵涛任书记长（相当秘书长）。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开展了一些抗日救亡活动。首先在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大善寺等寺召集青壮年僧侣和少数道士70多人，举办军事训练班，5月8日开始，到6月20日结业。一个多月的集中训练结束以后，从学员中选出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佛道青年，组成两个宣传队，以巨赞、演文为首组成的叫佛教青年服务团，以暮笳、绍贤为首组成的叫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两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南方局由于充分重视宗教问题，并且依据宗教问题的实际情况，采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主动地与宗教界上层人士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政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南方局宣传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宗教政策，赢得了宗教界对中共抗战政策的支持和配合，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势力对中共"毁灭宗教"的歪曲，也使宗教界人士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突破宗教戒律，积极投身到抗战之中。抗日救国是入世行为，鼓励杀死杀伤敌人，与佛教徒信奉出世修行、戒杀生的宗教信条相矛盾，但大敌当前，佛教信徒受南方局抗战

①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门区斗争史》，第378页。

政策的感召以“护国杀敌不违佛教戒律”担当起民族责任。

南方局与宗教界的交往，改善了中共同宗教界的关系，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宗教界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促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前只看到或片面强调宗教的消极作用甚至反面作用，转变到客观地估量中国宗教的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据此制定了比较成熟和完整的宗教政策。同时使宗教界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认识，促使不少宗教界人士转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这就为后来摆脱反动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对宗教的利用和控制，自愿接受中共的领导，做了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准备。抗战中，通过南方局统战工作，联络宗教界人士，使得一批宗教界的爱国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为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开展爱国革新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开展对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一、对少数民族面临各种矛盾的分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空前团结御侮的反侵略战争。由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以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核心，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全民族抗战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是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之最，而少数民族参与人数之众，亦属空前。少数民族或聚居或散居于中华大地，日本侵略中国以来，我国除西北五省和西南的川康藏以外，大部分省区都遭到了日军的践踏。日军所到之处，少数民族和汉族同样深受其害。必须动员少数民族参与抗战，才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战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和国民党中央与各个地方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地位相对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内阶级矛盾要服从国家民族矛盾。指出“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当是团结抗日”①。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必须把反对日本侵略者当做头等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682页。

的任务，少数民族的命运是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进行彻底的抗日斗争，积极融入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中，少数民族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

但是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妨碍着对少数民族进行抗日动员，也容易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正确主张，即必须"改变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及其企图利用回族反共的错误，同时克服回族中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这是团结回汉两族共同抗日的先决条件"①。"应当根据少数民族内部的具体状况和广大人民目前迫切的需要，实行各种必要与可能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以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这是政府当局与各少数民族内部领导人士所应注意与执行的"②。

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内部上层统治者与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但已处于次要的地位。1936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为了进行蒙古人民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当团结蒙古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估计到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估计到王公喇嘛等在蒙人中原有的地位与信仰，应当欢迎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成为目前阶段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同时组织吸引广大群众到斗争中来，使抗日力量大大的增强起来。"③要团结和教育少数民族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也要积极热忱地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对上述矛盾所作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和开展民族工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基本的依据。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作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工作的南方局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地凸现出来。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52、682 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52、682 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605 页。

二、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

西南民族地区是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的大后方。抗战中，中国之所以能实施持久抗战战略抵抗日本侵略者，能够以空间换时间，是与广阔的西南、西北的民族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大后方有着密切关系的。

南方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化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分裂中国的阴谋。日本帝国主义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到制造"蒙疆自治"，再到宣称"帮助回民自治"，对中国各少数民族极尽挑拨离间、诱惑分裂之能事。因此，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和少数民族中少数亲日派的卖国活动，才能彻底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分化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罪恶阴谋，这就必须要把南方少数民族人民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能为抗战提供丰富的人力支援和物质保障。少数民族勤劳勇敢，一直是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战略力量。南方民族地区成为抗战中中国与国际社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加强联系与往来的重要国际通道。"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①]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等接壤，是中国陆地和空中前往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门户。抗战中，当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占领后，云南便成为打破日本侵略者军事和经济封锁、与外界联系并取得国际援助的重要的国际通道。

抗战期间，为了更好地把各少数民族发动和组织起来，使之与汉族共同抗击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担当起了发动、组织和领导南方少数民族进行抗战的历史重任，并就此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日救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具有"极大的权威和威信"，而且一般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者"。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

级的民族压迫方面"显然还带有革命的作用"[①]。

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少数民族的方针,结合他们既想保有手中的政治军事资源,又有一定爱国爱乡热情的特点,积极开展对彝族地方实力派龙云和滇军彝族将领卢汉与张冲、禄国藩等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加强对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团结争取。1939 年初,周恩来指示中共云南省工委: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②]。1942 年南方局在龙云的滇黔绥靖公署建立了秘密电台。龙云加入民盟后,云南昆明一时民主空气弥漫,一度被誉为"民主堡垒"。1943 年,龙云表示希望周恩来能到昆明会晤,云南地下党派专人到南方局汇报。以后周恩来在重庆与龙云进行了面谈,交换意见,对他做了进一步的工作。

南方局所属云南党组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对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开展团结争取工作。1944 年,宣威党组织根据省工委关于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对滇黔交界地得勒梁子的彝族土司禄大奎进行争取工作。禄大奎在当地是彝族土司首领,拥有 200 人枪的武装。中共党组织先后派了几批人与禄取得联系,向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继而由党员柴爱国等亲自去见禄大奎,向他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禄大奎哭诉了多年来的艰难处境,表示坚决参加抗日,只求中共信任和以前受其镇压的佃农能不计前仇给予谅解。柴爱国等表示,只要和人民一起抗日,群众工作由党组织去做。[③]

南方局也保持同桂系地方实力派白崇禧(回族)的接触。白崇禧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并且在广西支持成立广西回教救国分会支持抗战。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周恩来三次到桂林,促成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遵照南方局的指示,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同白崇禧等广西上层人物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39 年冬,当蒋介石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广西实力派保持中立,不但不参加蒋介石反共,而且还在广西掀起了一个反对独裁,要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244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1987 年第 3 期,第 49 页。

③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0—421 页。

求民主，促进宪政的运动。通过南方局的工作，推动桂系接纳了大批沦陷区来的抗日进步力量和文化人士，桂林一时文人荟萃，获得“文化城”美誉。

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势，根据南方局提出“三勤”和“三化”的要求，南方局各地党组织纷纷隐蔽下来，扎根农村，宣传抗日，巩固组织，建立游击队。坐落在彝族同胞聚居的大小凉山之间、安宁河谷的西昌，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宁属一带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8 年秋，中共川康特委派廖质生重返西昌，建立临时支部，创办《抗战周刊》，号召宁属各族人民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宗教信仰，民族危机超过阶级危机，团结一致，对外抗战。1939 年上半年，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支持下，廖质生担任了 24 军西昌行营办的《建宁报》总编辑，将《新华日报》、《群众》、《解放》等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推销到宁属城乡，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由西昌向宁属各县扩大发展，组织抗日民众的工作随之在各地开展。如 1939 年，中共党员与民族民主进步人士联合举办苍溪实验保，实验保的彝汉民众在抗日救亡宣传教育鼓舞下，轮流参加军事训练，演习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随时准备奔赴抗战前线为国效力[①]。地处粤湘边界、贯通两省的连县瑶区是广东的后方，1940 年连县为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加速建立瑶区据点的工作，安排地下党东陂地委书记萧怀义利用关系打入国民党内部，担任了管辖三水瑶区的建新乡乡长，他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开展统战工作，并与陈家岭瑶王赵土金结拜，利用《征兵法》“缓征”条款解除了瑶民征兵遭受盘剥之苦，维护瑶民政治经济权益。中共地下党利用乡公所名义撤掉一些反动保长或瑶霸，委任一些开明酋长、人士在各山头为头人、保长甚至副乡长，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瑶山的依靠。这些同志取得瑶胞的拥护和信任，被称为“清官”和“包公”。广大瑶族群众向共产党靠拢，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瑶汉齐心抗战，建立地下党控制的“三水民众抗日自卫队”，建立以三水黄洞山为中心的抗日据点[②]。1939 年春，广西地方组织乘国民党广西当

① 李全中、漆明生、张为波：《四川少数民族与抗战》，《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9 页。

②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 338—339 页。

局命令战区地组织战时工作团之机，选派党员和进步分子进入战工团，利用这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南宁区民团指挥官梁瀚嵩（壮族），经过打入南宁区民团指挥部地下党员梁寂溪的统战工作，梁瀚嵩积极支持中共的抗日救亡工作。南宁战工团成立后，梁瀚嵩任团长，梁寂溪任副团长，全团100余人均为进步分子，内有中共党员15人，成立中共党支部。南宁战工团后分赴邕宁、上思、扶南、绥渌、同正、隆安等壮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积极组织抗日自卫队①。在黎、苗、瑶等民族聚居的琼崖，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琼崖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认真在30余万夷民中进行艰苦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不仅使他们不为敌所利用，而且使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日……只有有了夷民（指黎、苗族）、山地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支持长期抗战。"1942年印发的《琼崖抗战时期干部学习资料》明确要求"调整中央地方关系，使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②。1939年2月10日，日军进犯海南岛，由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在潭口一带阻击敌军，掩护海口市人民撤退，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

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海南琼崖游击队女战士

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356页。

②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372—373页。

志。随后，独立队又在琼山、文昌毗邻的地方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2月，遵照中国共产党指示，琼崖特委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团结黎、苗等少数民族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接着，独立总队主力转移到澄迈、临高两县交界的美合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新建了六连岭、保(亭)陵(水)万(宁)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粉碎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扫荡"、"蚕食"。到抗战胜利前夕，琼崖纵队已发展到5个支队、1个大队，共7000多人，解放了海南岛五分之二的地区，有17个县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43年琼崖纵队第三大队挺进陵、保、崖地区之初，针对黎、苗族的一些上层人物对中共军队不够了解，官兵们积极配合陵崖保乐办事处的同志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注意争取团结黎、苗族上层人物。经过耐心宣传教育，得到吊罗山区苗族首领陈日光的支持。中共军队派出干部到吊罗山区指导苗族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成立苗族人民抗日后备大队，陈日光次子陈斯安担任了大队长。在黎、苗同胞的配合支持下，第三大队的活动地域日渐扩大，先后建立了五乡、加达、长兴、陵西、陵中、力善等7个乡的抗日民主政权。各族青年踊跃参军，仅崖县就有200多人参加了第三大队。①

抗日斗争中，南方局是南方少数民族当之无愧的引路人和组织者，发动和领导少数民族参加抗战所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包含了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各阶层，而且包含了国内各个民族，从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全民族的抗日力量，真正地实现了全民族意义上的抗战。各个少数民族积极投身抗战，对抗日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南方少数民族起来参加抗战，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分裂肢解我国的罪恶阴谋被彻底粉碎，打乱了它灭亡中国的步骤和计划。

少数民族纷纷组织抗日武装队伍或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全国各地以自己生活的地域为活动范围，为抗日军队提供情报和当向导，配合抗日军队的作战，直接展开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在日军两次进犯广西之际，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中共广西省工委积极领导群众开展

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374页。

抗日游击战争，通过统战关系，公开组织抗日队伍，进行抗日活动。日军首次入侵时，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收捡正规部队丢弃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以十万大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在钦州、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等县都组织了游击队。日军第二次入侵时，中共广西省工委和各地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了游击队，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桂北，有临（桂）阳（朔）抗日联队和灵川抗日游击队。在大苗山、柳城一带有抗日挺进队，并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武鸣、宾阳、上林等地的游击队不断打击敌人。居住在漫尾、巫头、山心三岛的京族人民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小组抗击日军，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①] 仫佬族、毛南族群众也组织了抗日武装，各族人民以大刀、长矛、土枪炮等作武器，广泛开展游击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抗战期间，广西各族青年积极应征入伍，奔赴抗日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各族民众不仅实行空室清野以断敌补给，而且编成民团，配合正规军破路拆桥，袭扰敌人后方，有2万余民众开赴前线，参加战斗，有6万余民众组成运输队，协助运输弹药粮草；各地还有许多民众组成的救护队、慰劳队、收容队等。

在闽东、浙南地区，红军游击队1938年春改编为新四军的一部，数千名汉、畲族的优秀儿女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重新建立了中共福鼎、鼎平县委和6个区委。至1939年，两县共发展汉族和畲族党员1000余人。中共福鼎县委先后在1938年和1939年，发动数批汉、畲族青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前后，浙江景宁县的吴山头，泰顺县的玉塔，丽水县的下武、温溪、平阳岗，遂昌县的白麻、高烊、桃源、下横、东峰等畲、汉村庄也相继建立了中共党支部。闽东、浙南地区的畲族群众，积极参加各县普遍成立的妇女会、青年会、民众队及民校等，宣传抗日，自动募捐钱物支援抗战，慰劳前方将士。许多群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自卫队。闽东中共党组织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建立了两支游击队。1941年冬成立了百余人的闽东游击队。宁德县巫山畲村的许多畲族农民参加了游击队。畲族群众在山上建立“秘密寮”，专供游击队居住，还为游击队运送粮食、购置生活用品。由于畲族群众的支持和掩护，闽东、浙南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才得以保存下来。畲族人民群众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① 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

做了自己的贡献。[①] 其对抗战的作用与意义正如毛泽东谈东三省游击队时指出那样："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②]

在滇西、滇西南、滇南边境的各少数民族土司、土目、头人等，共赴国难，守土卫国，在千里边疆建立了10余支抗日武装，主要有干崖宣抚司土司刀京版（傣族）为首的滇西边区自卫军、以六库土司段浩（白族）为首的福（贡）碧（江）泸（水）练（地）抗日自卫支队，以耿马傣族土司罕裕卿、孟定土司罕万贤为首的耿沧抗日自卫支队等，这些抗日武装，在各地组织汉、傣、佤、拉祜、布朗、景颇、傈僳、德昂等族人民积极投入到守土抗战的洪流中，他们挖断交通，拦阻敌人，用铜炮枪和长刀、弓弩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敌人占领下的西双版纳的曼掌、曼畔、曼伞等寨的傣族人民，也宁可忍饥挨饿决不当亡国奴。他们拒绝给仆从军运粮食，拒绝与分裂分子合作，大批群众逃离村寨，进入森林，开展游击活动，以简陋的武器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地处中越、中老边境的哈尼族、彝族、壮族、苗族、瑶族和汉族等群众在日军占领越南、老挝后，曾出动数千民工，在国防线上构筑了183公里的工事。红河哈尼族、彝族组织了边防游击队，经常配合正规军修筑战壕、桥梁、隧道，进行救护、收集情报等。

在湘鄂西一带，1938年10月重建的中共湘西特委、中共鄂西特委把宣传革命理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发展中共组织、积极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主要任务。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广大少数民族中开展工作，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根据苗族和土家族是湘鄂西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实际，特别把工作重点放在土家族和苗寨中，派人深入到土家族和苗族中工作，发动他们为抗战出力。许多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优秀儿女先后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湘西工委还特设了苗民部，在苗族青年中开展工作。各族群众积极参加运送军粮，修筑军用机场，仅鄂西地区从

① 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第388—3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6页。

1938年下半年到1942年4月，各族民众出民夫就达172万人次之多。一批批热血青年怀着杀敌报国的决心，告别亲人，奔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贵州，黔东南的天柱、锦屏两县侗族学生组成“抗日救国志愿学生队”，奔赴前线，下江县的侗族青年农民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榕江县的侗族农民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中共黔桂边区工作委员会在黔南、黔西南布依族聚居的部分地区开展工作，建立了抗日救国会。1944年，日军入侵贵州时，黔南的布依、水、汉等各族民众，纷纷拿起土枪、梭标、马刀、斧子、土炮等武器，各村寨自发地组织自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战。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对于牵制和消耗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打乱日本灭亡中国的步骤和计划，是具有双重作用和意义的。

第八章　加强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策略。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坚持做好对国民党统治区内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也卓有成效地做好对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

第一节　以香港为枢纽开展港澳地区统战工作

一、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初期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等重要城市的相继沦陷，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联络和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城市；同时，香港的政治形势也朝着有利于中共活动的方向变化。根据香港的战略地位和政治环境，七七事变后，周恩来首先向中共中央提出，让廖承志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去香港筹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①]。1937 年底，周恩来在武汉会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请他转告香港总督：由于八路军在敌后英勇作战，赢得了广大海外华侨的钦佩，纷纷援助款项、医药、物资，我们需要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予以接收，请港督加以关照[②]。这一要求得到口头应允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6 页。

② 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南方局党史资料》第 2 册，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3 页。

后，廖承志、潘汉年即奉命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1938 年 1 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皇后大道中 18 号正式成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对外公开名称是经营茶叶批发生意的“粤华公司”。①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出发点在于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所属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为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坚持建立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更多更好地发动广大海外侨胞，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为加强香港统战工作，南方局在香港设有两个党的组织，一个是 1938 年成立的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依托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负责，领导香港的统战工作。另一个是 1941 年成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廖承志对于整个香港工作的方针常常是负责决定的②。香港中共组织的健全和扩大，为港澳地区统战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41 年 12 月，随着香港的沦陷，统战工作委员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结束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在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政治环境做好统战工作。按照周恩来“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的指示③，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以香港为纽带，建立与海外华侨的广泛联系，争取华侨对国内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捐款和物资援助。由于香港是世界海轮来往方便的自由港，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非常重视这条与世界联系的纽带，与

---

① 1939 年 3 月 11 日，港英政府借口查禁从香港邮寄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英宣传品，派警员搜查粤华公司，逮捕 5 名工作人员。后经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交涉，港英政府于同月 15 日释放被捕人员和归还收缴的文件。经此事后，粤华公司撤销，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分散办公，廖承志改以华比银行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1942 年 1 月，廖承志等人撤离日占后的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因此解散。参见梁上苑：《中共在香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内情》，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 年版。

② 《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 年 2 月 16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1941 年），1987 年版，第 277—281 页。

③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第 318 页。

海员工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定期航班，与英属新加坡、雪兰峨、槟城、霹雳、马六甲、森美兰、彭亨，荷属棉兰、沙捞越，法属缅甸、安南（越南）等国家、地区的华侨取得联系，把日军野蛮屠杀和掠夺的罪行，成千上万的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广大爱国华侨，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如由陈嘉庚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响应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号召，在香港成立了救济总指挥部，筹集了上百万元的救济款项，派专人送回家乡救济。

由于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努力，海外华侨捐款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手续简单，深得华侨同胞的充分信任。要在香港确定一家银行代收华侨给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捐款，绝非易事。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副经理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兄弟，廖承志以自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亲身经历，向其表兄弟介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救国的决心，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邓氏兄弟倾向进步，甘愿为抗日效力。于是华比银行以邓家的进出口公司崇得行的名义，接收海外华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这样既保证了汇款汇物的安全，又达到了分筹分汇的目的。由于过去南洋及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捐款和物资，都是统筹统汇，寄交给国民政府，然后由国民政府分配使用。而实际上，这些捐款、物资一分一毫也分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手中。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交涉分筹分汇，没有得到实质进展，如今在廖承志等人的努力下，利用华比银行接收侨汇的机会，与海外侨领磋商，立即取得了陈嘉庚等人的支持。廖承志领导的统战委员会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侨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一律由"敝军驻港粤代表廖承志收转"。于是，分筹分汇取得了顺利进展[①]。廖承志领导的统战工作委员会不断接收着广大海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人力和物力援助，他们也以各种办法、用各种行动感谢和温暖着华侨的心，如凡是给八路军、新四军捐款捐物的海外侨胞，不论数额大小，一律回信致谢，并邮去收据。每过一段时间，还在报纸上公布名单，公开感谢。凡是要求不公开姓名的捐献者，要求工作同志一定尊重其要求，不强人所难（当时海外华侨和香港人士大多尽量避免与中共公开联系）。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69—170页。

这些都是小事，但与国民党政府贪污华侨捐款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说服力，扩大了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

二是建立巩固的宣传阵地，广泛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政策主张，充分发挥香港的舆论宣传桥头堡的作用。首先是利用香港出版比较自由的条件，出版中共领袖著作，扩大政治影响。如廖承志与其姐夫李少石一起，把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等译成英文，在香港雪街三达公司各印1000份。一部分书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外发行。另外一部分通过香港直接销售，如以中环娱乐戏院左侧的德忌笠街的李乾记英文书店为秘密代售点，尽管销售量有限，仅售出几十本，但这是第一家出售共产党领袖著作英译本的书店[①]。其次是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统战工作委员会在统战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最广泛地发挥各种人才的智慧和潜能，最大程度地调动一切爱国抗日力量的积极性，只有搞好海内外宣传，加强宣传舆论阵地，才能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新闻封锁，才能争取国际朋友和海外华侨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因此统战工作委员会非常重视搞好宣传工作，建立稳定的宣传阵地。1940年9月27日，廖承志致电延安及重庆周恩来，提出："为加强华侨宣传起见，我们建议：(甲)海外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盼侨委着重布置，并经常指示。(乙)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②]廖承志建议成立中国新闻社，请国民党十九路军资助，由乔冠华担任社长。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在香港成立，成员包括胡绳夫妇、胡一声、郑展等人。

把《新华日报社论集》和中共在重庆出版的《群众》在香港印刷，除在香港和菲律宾销售外，还邮寄或托海员带往世界各地的华侨团体、侨领、华侨学校，数量达两三千份。由于内容具体生动，很受欢迎。许多文章除了香港报纸转载外，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商日报》、古巴的《前进月刊》、菲律宾的《菲岛华工》等纷纷转载，扩大了中共统战政策的影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68页。

② 廖承志致延安侨委及周恩来电：《加强华侨宣传工作》，1940年9月27日，转引自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

响。凡是不让刊登中国抗战消息的国家，如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等，廖承志就与同志们采取刻蜡版油印的办法，秘密分送给华侨读者[①]。1939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为发动反共高潮制造舆论，在国内外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为了戳穿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驻港办事处派出王任叔、陆诒、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人，先后到纽约、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办报，加强在海外的宣传工作。同时，聚集《保盟两周通讯》、《时事通讯》等刊物的力量，出版华侨丛书，密切与海外华侨报刊的联系，为他们提供翔实的新闻材料。[②]

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重庆，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消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则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自己办的报纸刊物，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公诸于世。海外侨胞闻悉，异常愤慨，许多救亡团体和爱国侨领纷纷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朱德，并公开发表通电、宣言和告同胞书，强烈抗议蒋介石集团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收敛一下反共气焰，继续维持抗战。在这场争取舆论的斗争中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出色的宣传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南方局把在重庆、桂林可能遭受迫害的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包括知名人士夏衍、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章泯、萧红、胡考、于伶等撤往香港。廖承志领导的统战工作委员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很快办起了《大众生活》、《笔谈》、《世界知识》、《青年知识》、《文艺阵地》、《耕耘》、《大地画报》等进步爱国抗日报刊。夏衍奉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于 1941 年 2 月初从桂林来到香港，与廖承志等一道创办了《华商报》，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报社成立了编委会，每周一次例会，主要是讨论国际形势。在国际形势变化最剧烈的 1941 年，香港《华商报》以独到见解的国际评论和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了许多读者。国民党特务采取破坏承印、威胁报贩等多种手段捣乱，致使《华商报》发行量从一万份降到两千余份。陈嘉庚先生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派自己的得力助手到香港开办有利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因为陈嘉庚威望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 177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 376 页。

21871
Hwa Shiang Pao
華商報
晚刊
英匈斷絕外交
德遭遇強烈抵抗
南軍佔領義北部
英國空軍猛襲侵略者
中蘇航空線
粵東我軍克汕尾
德軍猛烈轟擊
強調德軍受挫
喚起僑胞
本報言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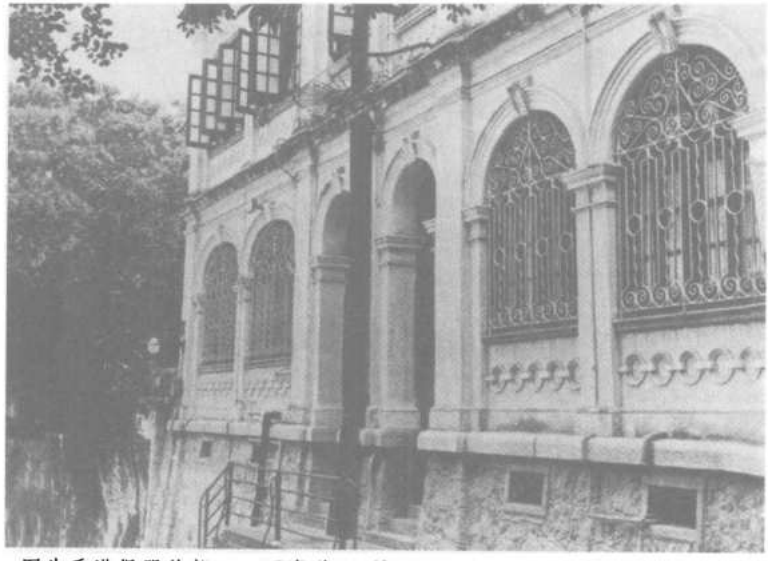
在南方局领导下，1941 年 4 月创刊于香港的《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进行宣传的据点

高，国民党特务不敢随意破坏，《华商报》一直出版到香港沦陷。①

三是发挥宋庆龄具有的特殊作用。宋庆龄独特的政治地位以及她伟大的爱国热情，在国内外崇高的威望，与世界各国广泛的联系，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海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的理想人物。于是廖承志与宋庆龄商议后，决定由宋庆龄出面发起组织筹建保卫中国大同盟。经过大量的筹备工作，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于 1938 年 6 月 14 日在宋庆龄香港九龙寓所小客厅里正式宣告成立。保盟总部设在香港西摩道 21 号，宋庆龄担任主席，廖承志担任秘书长职务。

保盟的成功运作，是南方局正确领导和影响下的产物。在保盟的中央委员中，有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孙科，有印度的贾·尼赫鲁、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克莱尔·布恩·卢斯，德国的托马斯曼以及国民党内有威望的人士冯玉祥、颜惠庆等。宋庆龄还邀请了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海弥尔·克拉克女士任保盟秘书，香港大学教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 180—183 页。



图为香港保盟总部——西摩道2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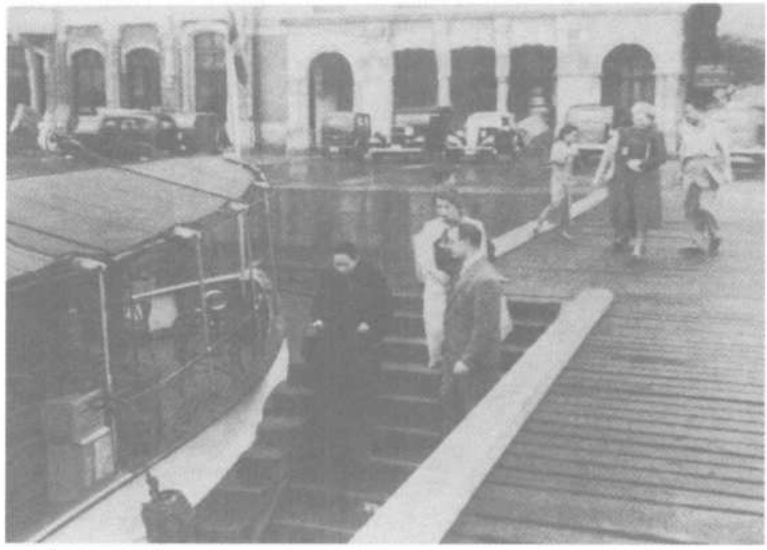
授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特兰主管宣传。①

廖承志身兼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和保盟中央委员兼秘书长，一直参与保盟的领导工作。他与潘汉年不仅经常参与保盟会议，而且一起会见国际和平人士，如贝特兰、斯诺、史沫特莱、弗朗斯等著名新闻记者，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组织支持援助八路军、新四军。保盟广泛地联络了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其中包括许多港英政府的官员、银行家、工商界、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把募捐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保盟成立一周年之时，就从各国朋友那里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募集捐款25万港元，还有一大批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②

在做好上层社会统战工作的同时，廖承志领导下的统战工作委员会也非常重视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日军从惠阳登陆，廖承志支持梁广回东江打游击，惠安抗日部队的伙食、枪支弹药等一切经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74页。

②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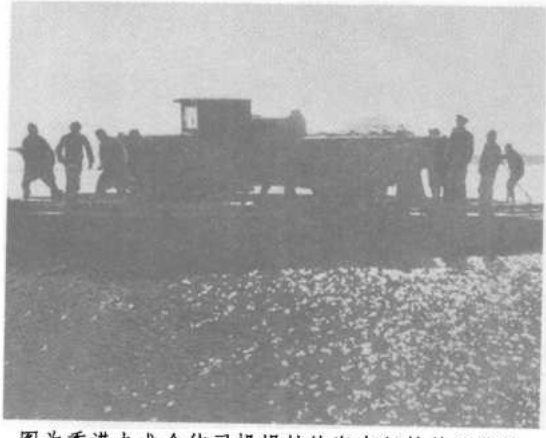
为支援国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四处奔走募捐。图为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码头察看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战物资装船

费都是香港支援。不久，日军来扫荡，游击队书记曾生带队伍退到沙头角。日敌追来，他们把枪支埋起来到了香港。廖承志见了他们，仔细耐心地给他们分析了形势。第二天，游击队又返回大陆，继续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直至发展壮大成为东江纵队。①

原是19路军将领的张炎，调任广东省第11游击区司令后，积极抗战，但国民党政府不支持不信任，救亡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他便到香港寻求共产党的帮助。廖承志立刻与张炎见面。张炎要求派学生队支持他，搞抗日救亡工作，廖承志答应组织一个有26人的华侨回乡服务团，到南路发动民众抗日。不久，南路各县的民众抗日救亡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得蓬蓬勃勃。服务团同张炎的关系相处很好，服务团正副团长被张炎聘用为政治教官，帮助培训政工人员。② 南海县有个叫吴勤的人，在广州沦陷后到香港来找共产党。廖承志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回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在党的帮助下，吴勤搞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84页。
②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84页。

起了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成了“珠江纵队”的主力之一。①



图为香港九龙全体司机捐献的汽车经桂林运往陕甘宁边区

与此同时，在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正确领导下，香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一是广泛组织救亡团体，开展募捐活动。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2万余元。1938年8月，香港的八一三救国基金运动开始于九龙的瓜菜小贩，而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宴会款项改作捐募寒衣，香港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②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募集港币4000余元，购买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桂林八办。1939年初，按照宋庆龄的建议，香港的几个妇女团体——中国妇女救援会香港分会、香港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香港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帮助保盟募集了4500多种中国艺术珍品，运至纽约、巴黎和伦敦出售，所得收入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41年5月，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黄炎培来到香港劝募公债，香港各界热烈响应，合计认购410余万元。③ 二是直接支持与援助广东内地的武装斗争。动员群众回国参战，成为广州失守以后中共香港组织领导群众运动的中心任务。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七八月间，从香港动员到广东内地的群众（包括党员约230人）650—700

①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84页。

② 刘蜀永：《香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③ 刘蜀永：《香港史话》，第70页。

人，计：动员到东江惠阳曾生游击队、东莞王作尧游击队、博罗陈文博游击队的有300人以上，其中曾生部约占90%；动员到东江华侨服务团、歌剧团、工作团等约120人；动员到琼崖（回乡服务团）约40人；动员到西江、中区等地约40人；动员到南路参加张炎的学生军约100人、服务团的30余人。动员工作还包括了财力物力的动员，所有这些团队都是由香港经常供给他们活动费与生活费。①

在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澳门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是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同胞积极响应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号召，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并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这使得日货在澳门受到打击，销量一落千丈。② 二是广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募捐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澳门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在此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加强了对港澳等地抗日斗争的领导。内地一大批爱国人士如史良、高剑父、关山月等先后来到澳门作讲演或举办画展。由于澳葡当局不允许爱国社团打出抗日救亡、抗敌、救国的旗帜，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救灾会。澳门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四界救灾会）。③ 这些救亡团体开展了宣传、筹募、慰劳等活动。“四界救灾会”是救亡团体中规模最大、影响至深的团体。他们用售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献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将士筹款。许多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涌现不少动人的情景和事例。他们“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行动，使旁观者深受感动。1938年9—10月，“四界救灾会”又发起全澳性的“义卖活动”，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共售货筹得9万多元（法币）④。献金是当年澳门同胞筹募的又一种方式。各界救灾会与“四界救

① 《吴有恒关于香港市委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16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1941年），第348—349页。

② 邓开颂等：《澳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③ 邓开颂等：《澳门史话》，第169页。

④ 邓开颂等：《澳门史话》，第170页。

灾会”一起举行八一三献金活动，设立献金台、流动献金台、献金封筒，发动献金，沿户向各界劝捐。这一活动得到各方热烈响应，3 天时间内筹到 10 万元（法币）。在民族危难之际，“花界救灾会”的歌姬舞女们亦纷纷献金，支持推销国内的救国公债，可以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商女亦知亡国恨”①。三是组建回国服务团。在八年抗战中，澳门还组建服务团回内地参战。不少澳门热血青年争先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还为国捐躯。1937 年廖锦涛、陈少陵等人发起成立“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到前方、到农村去宣传抗日和发动群众。1937 年澳门第一批青年到新会、江门参加抗日队伍。1938 年 10 月，“四界救灾会”亦组织回国服务团，在 1938—1940 年两年中，先后组建 10 个队返回内地。这些青年人年纪最大的才 24 岁，最小的 16 岁，各行各业的都有。② 总之，澳门同胞抗战时期在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历史永远铭记。

二、全力营救香港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遵照南方局的指示建立了香港秘密交通联络站。当时南方局秘密交通主要是以重庆、桂林、香港、上海为基本网点，建立了上与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下与各省委、特委相衔接，并能与解放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海外联系的全国性联络的秘密交通网。它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各种人员的往来；保证中国共产党和非党干部的撤退和疏散工作；还负责承担传达上级的指示，传递情报的重要任务。1940 年 6 月 25 日，南方局常委会听取了廖承志关于香港联络站的工作报告。香港联络站保持了与衡阳、桂林、韶关、汕头、上海等内地以及与河内、海防等海外交通联系。为了加强香港这一重要的政治交通枢纽的作用，南方局还决定从桂林抽调部分干部到香港工作，并确定刘少文负责交通管理工作，使香港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1940 年 10 月，南方局通知方方到重庆讨论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同时也认真分析研究南方局交通建设工作，会

① 邓开颂等：《澳门史话》，第 170—171 页。

② 邓开颂等：《澳门史话》，第 187—188 页。

上还确定了“尽量变成秘密的”、“与机关驻地分开”等原则。方方回到香港后，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粤东交通线为基础，建立起秘密交通站，沟通与南方局及各省、特委联系的渠道，同时在武装保护下，开辟了两条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以沟通与香港的联系。① 事后证明，在香港建立秘密交通联络站的工作，是富有战略远见的举措。抗战时期大量接收海外华侨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物资（如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从建立开始，就担负起从香港采购、领取各种军用物资并转运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的任务，同时还担负接待护送过往干部、干部家属、去延安学习人员和回国参加抗战华侨的任务。当时走的是从香港经越南海防、桂林到贵阳转重庆再到延安的秘密交通路线②）以及以香港为枢纽的两次文化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的秘密大营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任务，香港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美军在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驻守香港的英军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12 月 25 日，香港总督杨慕奇宣布投降。由于港九战争爆发突然，结束之快出乎意料之外，使得在香港的文化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顿时陷入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逮捕、杀害的危险之中。在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廖承志、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委书记梁广、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等人遵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紧急指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抢救活动。

首先是全力抢救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日军进攻香港前夕，宋庆龄原打算留下来坚持斗争，她叫人买了一些粮食和咸萝卜等储存起来，做了在最艰苦条件下坚守香港的准备。然而正是在香港沦陷前夕，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发来“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的紧急通电，指示全力以赴保护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港③。广东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

①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0 页。

② 邱南章、龙飞虎：《战斗在千里运输线上》，《广西抗战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 页。

③ 《转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汉年等》（1941 年 12 月），《周恩来书信选集》，第 210—211 页。

示，在大家的劝说下，宋庆龄在九龙启德机场被日军攻占之前几小时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①]。在重庆，保盟团结在宋庆龄周围又开始工作。周恩来得知后，专门发电指示当时转移到澳门的廖梦醒去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开展保盟的工作。[②]

图为营救脱险后回到内地的部分进步文化人士的合影

与此同时，廖承志领导下的香港党组织又秘密展开了护送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和梁漱溟等知名民主人士安全离港的工作。立即派人与广东东江游击队取得联系，并决定由东江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短枪中队长江水负责护送何香凝，柳亚子则由八路军办事处谢一超护送。何香凝与其儿媳经普椿在一起，柳亚子与其女儿柳无垢在一起，各自在专人秘密护送下，分别从九龙坳和中环水胜街到长洲岛集中。1942 年 1 月 15 日，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分别混杂在海丰大商户杨胜昌、杨祥益两户家属中，分乘地下党为其准备的两艘机帆船离开香港。在长洲往海丰的海面上漂流了七天七夜，食物和淡水均已告罄，幸得到东江游击队送来的几百斤红薯和淡水，渡过难关，方安抵海丰游击区。后经周密安排，安全转移到桂林。

① 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381 页。

② 廖梦醒：《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时期的工作》，引自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78—79 页。

秘密转移期间，二老得到地下党组织和热心群众无微不至的照料，从而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结下了深情厚谊。[①] 国民党独脚将军陈策突围时，乘坐的英国鱼雷快艇被日军军舰击中，身负重伤，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其次是全力抢救国际友人。美国空军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被日军击中座机，降落新界。为了营救这位美国飞行员，东江纵队与日军激战四天四夜，粉碎了日军陆、海军1000多人的大合围，最后救出了克尔中尉。闻名的港九大队，千方百计设法从下水道出海口潜入战俘集中营，救出秘鲁第三国际的代表等人。[②] 爱泼斯坦是美联社知名记者，也是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的重要成员，在香港沦陷时，他正生病住院。日本军队张贴布告并附有爱泼斯坦的大幅照片，到处捉他。廖承志灵机一动，生出妙计，廖承志亲口用英语给《南华早报》编辑部打了电话，说亲眼看到《南华早报》记者爱泼斯坦先生被飞机炸死，于是该报立刻登出这则消息，日军信以为真，再也不去追捕一个死人，爱泼斯坦终于获救了。[③]

南方局领导的由香港党组织具体执行的这次大营救工作，营救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共800多人，还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帮助了近100名国际友人、英军官兵及美、印、荷、比等国的侨民脱离虎口。这次抢救工作，不仅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嘉奖，还先后受到了美国陈纳德将军、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英国蒙巴顿将军函、电的颂扬，还接受盟军东南亚总部赠送的药品[④]。

三、抗战胜利后，港澳地区统战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在香港沦陷以后，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香港的社会环境十分险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统战工作委员会也因此而撤销。但香港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在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并没有停止。日军开始大举进攻香港后，东江游击队立即派曾鸿文、黄冠芳、刘黑仔等率领几支小分队紧随日

① 周春华：《何香凝、柳亚子香港脱险记》，《钟山风雨》2005年第3期。
② 黎远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桂林纪事》，《八桂侨史》1998年第2期。
③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175页。
④ 黎远明：《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桂林纪事》，《八桂侨史》1998年第2期。

军之后，分别从惠阳和宝安插入新界，很快与当地的抗日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收集许多英军溃退时扔掉的武器弹药和日用品，迅速武装和壮大了队伍。随后消灭了趁英军溃败之机打家劫舍的地方土匪，深入宣传发动群众，迅速开辟了港九游击区。局面初步打开后，东江游击队把进入港九的几支小分队合并成港九独立大队。通过斗争，港九独立大队由十几人发展到五六百人，下属四个中队。这支队伍以新界大雾山为根据地，四处出击，使敌人闻风丧胆。港九大队先后在大埔、元朗、锦田、新田以及大屿山等地，袭击日军兵营和哨所，歼灭了一部分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1943 年 11 月，港九大队在沙头角突袭了作恶多端的汉奸、伪区长温二和大埔宪兵翻译官林老虎，在水上打死了日军宪兵军曹、特务头子小贞，为民除了大害。1944 年初，为了粉碎敌人对新界、九龙等地游击队的“扫荡”，刘黑仔和黄冠芳等率人潜入启德机场，把日军的军用油库及飞机炸毁，迫使敌军停止了“扫荡”。1944 年秋，为了牵制日军，使其无法打通广九铁路，刘黑仔又率短枪队发动了一次攻打沙田四号隧道的战斗，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哨所。日军摸不清游击队的底细，只好收缩兵力，放弃了打通广九铁路的计划。

与此同时，香港党组织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并且保留了一定的骨干力量，这是香港和澳门地区统战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的强大基石。香港沦陷后，党员数量尽管比战前减少五分之四强，其中海员比战前减少百余人，但仍保留有 80 人的党员队伍，其中海员党员 12 人。全体党员已经职业化，对职业精通，技术交友，巩固职业岗位，不暴露政治面目。组织形式采取精干单线领导，主要负责干部王玉宇。分港九两地区，港方由张南负责，九龙由周权负责，以下设指导十事数人，分别领导个别支部同志。省（广东）、港（香港）、澳（澳门）、湾（广州湾）四个地方城市党组织依照中共中央指示由梁广负责，在各城市设特派员一人，采取单线领导方式，必要时设平行组织。港、澳、湾着重巩固，慎重发展。以勤职、勤学、勤交友的精神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广泛统战工作，加强干部与党员教育，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①] 1943 年，香港党组织除几人无职业外，大部分

① 《林平给中央转周恩来电——关于香港沦陷后的一般情况》，1943 年 2 月，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 年）。

党员都有职业掩护。这一年是香港沦陷以来敌人统治比前更加严酷的一年，但是党组织仍然正常发展，尚未发生意外，干部和党员有所进步。香港党组织在南方局领导下坚持斗争和稳步发展，为抗战胜利后香港统战工作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香港的努力失败，而英国方面稳定香港又没有很好的办法，被迫与港九大队达成协议。英方答应港九大队所提的如允许中方人员在港、九居住、来往、从业的自由；同意中方（港九大队）之人员组织四个区域的民众自卫武装，枪械、给养、管理均由英方负责；在新界外围几个区，要求中方在三至四个月内暂缓撤退武装；英方应允救济新界人民，由中方协助进行；同意中方在香港设办事处与英方联络等几项条件，这给中共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当时在香港的中共组织还决定在港九募捐经费，并进行秘密内线工作。[①] 1945 年 11 月 20 日，广东区党委向中宣部和中共中央报告说，香港对国际宣传工作已经展开，由驻香港办事处半公开发行《十日电讯》（将所收到新华社广播摘要译成英文），分发西报馆、香港官方及非官方之英领事几个团体、美国领事、澳门官方及国外与中共有关系之国际友人（澳门、英伦），收效颇大。香港两家西报均表示同情，采用中共电讯发表。并且要求中央宣传部派精通英文干部前来香港加强翻译工作。[②] 可见，由于南方局（重庆局）和南京局都十分重视在香港的工作，使得香港的统战工作开展得比较好。这一方面是由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坚持武装斗争打击了日军在香港的统治，赢得了英方的尊重；另一方面是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使党组织在香港继续存在和发展，保持了对香港统战工作的连续性。

1946 年 5 月，南京局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态度，美蒋日益公开一致反共，认识到南京和上海是难以久留之地。根据形势变化，于 5 月指示刘少文、吴克坚离开南京、上海转去香港。10 月，南京局又指示章汉夫、肖贤发、夏衍、乔冠华、龚澎、许涤新、刘宁一等人先后离开上海去香

① 《林平致中央电——关于我与英方谈判的初步结果》，1945 年 10 月 9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 年）。

② 《广东区党委致中宣部及中央电——关于港办刊发〈十日电讯〉情况》，1945 年 11 月 20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 年）。

港，以后还陆续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派人去香港，这样为在香港多方面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7 年 1 月，中共中央批复周恩来的建议，为了加强华南地区党的工作，有计划地领导华南地区以及港澳地区的革命斗争，指示成立香港分局，直属南京局领导。香港分局由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组成，书记方方，副书记林平。

这样，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抗战时期中共在香港有效的统战工作的基础，使得抗战胜利后香港的统战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逐步健全，大批有才干领导人的来港，使港澳地区成为中共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有效阵地。随着美蒋日益加强反共内战，在南京局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如民盟等先后来到香港，香港再次成为中共开展民主运动的中心之一。

第二节　开展侨务工作，争取爱国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

一、贯彻海外统战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从东南亚到欧美，海外华侨不分阶层、党派、团体、帮派、职业、居留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共同为全中国的神圣抗战事业贡献力量，真正实现了爱国华侨史无前例的大团结。

为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国内国外中华民族的一切力量进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策略方针，也是南方局主要领导人的共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开展建立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制定了海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就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对南方局作了重要的指示，并通报有关情况。

图为南洋马来亚森美兰华侨捐献给八路军的救护车

1938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为

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的题词是："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1938 年 10 月 14 日，《新华日报》发表《加紧侨胞抗战工作》一文，对海外侨胞的爱国光荣传统给予充分肯定；对抗战以来侨胞援助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热情赞扬；同时恳切希望全世界的侨胞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募捐方面有更大的贡献；号召全世界侨胞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工程队、慰劳队、医药用品等回国参战，同时要求政府和国内同胞给回国参战的侨胞以最大之招待与帮助。① 1938 年 11 月 24 日，《新华日报》发表吴敏的文章《帮助华侨救国工作》，对暹罗政府压制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非法行为给予抨击，声援华侨的正义举动；文章希望世界各地的华侨克服地域帮派的狭隘观念，加强内部团结；要求国内救亡团体和国民政府给华侨以应有的援助。1938 年 12 月 23 日，《新华日报》发表《侨胞在开展援华制日运动中的作用》的评论，文章回顾了欧美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肯定了他们的爱国行动，最后也希望政府和国内民众团体保持与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为侨胞提供各种抗战材料，呼吁注意和帮助各地侨胞的救国工作。② 毛泽东的题词和《新华日报》发表的三篇文章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海外统战政策策略。

1938 年秋，中共中央又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陕北公学三所院校中挑选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组成海外工作团，赴南洋各地开展华侨工作。该团到达武汉时，周恩来接见了全体成员，对该团工作作了具体指示。③ 1940 年 7 月 7 日，在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对抗战三年来的形势进行了分析，除强调加强全党统一战线教育外，特别强调加强华侨工作，设法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予帮助，使他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

1941 年 7 月 3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分析了目前太平洋局势和国

① 蔡仁龙、郭梁主编：《福建党史资料——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1987 年，第 144—146 页。

② 蔡仁龙、郭梁主编：《福建党史资料——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 147—152 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 388—391 页。

内近况，提出了对策建议。他提出，在大后方，党更应该是严密的地下党组织；在海外，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开展对英美人士、华侨、各党派、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与扩大民主运动，并请党中央派人加强香港的领导。[①]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特别强调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指示要求"必须大大的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着重指出："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活动。"[②]南方局积极地贯彻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12 月 13 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文章，全面论述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格局之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战局的规律，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和主从性等六个特点，希望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消灭法西斯[③]。这是周恩来和南方局执行贯彻中共中央海外统战方针政策的细化和具体化，并且强调海外统战工作不仅要着眼于太平洋地区，而且要与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合起来。

选择香港作为贯彻海外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桥头堡和基地。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自由贸易港，其发达的远洋航线通往许多国家和地区，除了可以就地联系港澳同胞外，又是联络散居于世界各地海外侨胞、建立广泛海外统一战线的枢纽。因此南方局指定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筹设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以此作为领导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机构。除加强做好本地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外，主要是加强对外宣传做好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当时驻港办事处创办了《华侨通讯》，利用这份油印刊物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报道祖国抗战的实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杀敌的光辉事迹，深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欢迎。《华侨通讯》的文稿，除了香港的进步报刊转载外，海外华侨的报纸，如纽约的《华侨日报》、秘鲁的《华侨商报》、古巴的《前进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70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81 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81 页。

日报》、菲律宾的《建国周刊》等纷纷转载。一些中立国家的侨报，因当地殖民当局不允许刊登来自《华侨通讯》的新闻稿，华侨就千方百计刻钢板油印，秘密分发给读者。南方局还与在海外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海外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廖承志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同志协助宋庆龄筹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保盟对外开展工作。保盟以其成员广泛的国际关系，向海外华侨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接收海外华侨捐款和物资援助。正因为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海外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坚决贯彻执行下，克服各种困难险阻，成功地在香港开展了海外统战工作。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内地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香港抢占文化阵地，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渠道，向海外广大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主张以及各方面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争取广泛的国际援助以及动员组织广大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出钱出力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做好海外侨领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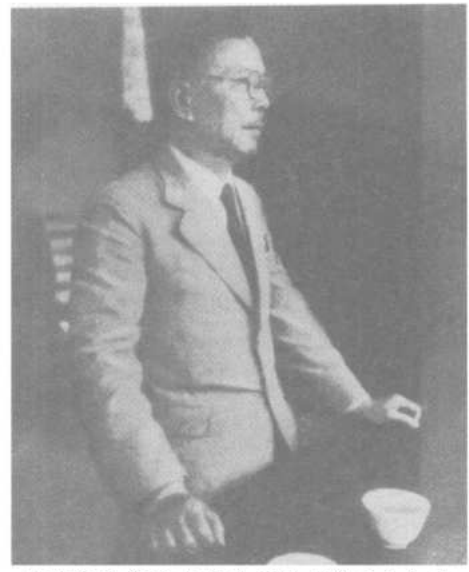
南方局海外统一战线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高度重视做好爱国华侨领袖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合作。在领导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华侨领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在广大海外华侨当中享有崇高威望，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他们既是华侨社团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又是支援祖国抗战的带头人。争取爱国侨领的支持，通过他们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组织动员广大侨胞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以及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斗争等方面发挥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对爱国华侨首领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且多次强调，“华侨工作应当主要是合法的……应争取华侨中有正义感的分子（如陈嘉庚等）积极领导华侨工作”，通过他们“在华侨中宣传中国抗战，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及艰苦，号召他们给我们以各种帮助”[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多次会见归国考察参政的陈嘉庚、胡文虎、司徒美堂等华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72页。

侨领袖，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相互沟通，真诚合作，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为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而共同努力。

陈嘉庚是著名的南洋爱国华侨领袖，他在抗战初期曾捐款几十万元支持国民政府抗日。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全国各地慰问考察。当他了解到凝聚华侨血汗的捐款许多都未用于抗战，而是进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私囊时，极为气愤。到了重庆，他又看到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愈加忧虑抗战前途。陈嘉庚提出要到西北延安去考察，却受到蒋介石的种种阻挠和刁难，经过南方局的努力，加上陈嘉庚的一再坚持，最终力排障碍，才得以前往延安。在延安，陈嘉庚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他目睹延安共产党人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延安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于是对抗战前途有了信心。陈嘉庚回新加坡时，在缅甸、泰国等地向华侨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考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看到解放区的光明，把华侨的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国民党驻新加坡的大使和总领事却指责陈嘉庚接近共产党，并煽动侨胞反对陈嘉庚，阴谋使其不能继任南洋筹赈总会主席的职位。当时，英国当局也对陈嘉庚不满，使他在南洋的活动大受限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40年3月，“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同胞慰劳考察团回国，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前去拜望，并促成了陈嘉庚访问延安之行。图为陈嘉庚率团抵达重庆受到欢迎的情形



陈嘉庚访问延安回渝后发表《西北之观感》的演讲，用事实说明延安的新气象，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轰动。图为陈嘉庚发表演讲的情形

得知这一情况，廖承志立刻致电南方局和周恩来，说“陈嘉庚返新加坡，仗义执言，颇受国民党方面的压迫……彼等热情，实足钦佩，提议由毛、朱、周致电彼等，支持鼓励……”[①]经中共中央同意，廖承志领导八路军办事处除了发动广大侨胞在报刊上写文章表示支持陈嘉庚外，又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致电陈嘉庚，并在报刊上公布。终于使国民党倒陈的阴谋破产。[②]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南洋处于日军铁蹄统治之下，中共中央及南方局非常关心陈嘉庚的安危。1942 年 2 月 4 日，延安华侨救国会电慰陈嘉庚先生，除对陈先生和南洋侨胞表示密切关怀与慰问外，坚决支持南洋华侨参加当地所在国家的抗日武装斗争，表示“誓为消灭日军而斗争到底”[③]。1945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为重庆各界举行庆祝陈嘉庚安全返新加坡大会的贺词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为重庆各界举行庆祝陈嘉庚安全返新加坡大会的贺词是“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辛苦，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这两幅贺词，既是对抗战时期陈嘉庚倾心领导海外华侨全力支持祖国抗战所作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又是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领导人对陈先生的最高褒奖和勉励。

1941 年 2 月 21 日，东南亚华侨企业家、拥有 200 万会员的客属华侨总会主席胡文虎由仰光飞抵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22

① 《廖承志致中央并周恩来电》，1941 年 2 月 4 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 年）。

② 铁竹伟：《廖承志传》，第 182—183 页。

③ 《解放日报》1942 年 2 月 5 日。

日,《新华日报》以第一版作了题为《华侨巨子,胡文虎抵渝》的专题报道。胡文虎一到重庆,不适应山城早春雾冷天气。周恩来得悉后,立即派南方局工作人员俞飞(胡文虎儿时同伴)为他送去两件皮大衣。胡文虎在重庆期间,南方局通过俞飞和他保持接触。胡文虎离开重庆前夕,周恩来、叶剑英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专程前往他下榻的嘉陵新村,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诚意。胡文虎对周恩来、叶剑英的坦诚相待由衷赞赏和钦佩,认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完全是为国家和民族着想,深得人心,尤为广大侨胞信服。他表示,海外广大侨胞把祖国抗日救亡看作是至高无尚的事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维护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支持抗战到底。①

1941 年冬,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 11 月下旬到达香港,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企图利用他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其占领秩序。司徒美堂拒绝了敌人的利诱,在爱国洪门人士帮助下化装逃出,进入东江游击区,得到东江游击队的悉心照料

1941 年,周恩来(右三)、董必武(左二)、邓颖超(右一)在红岩嘴 13 号接待美国华侨领袖、洪门致公堂创始人司徒美堂(左三)和黄兴夫人徐宗汉(右二)

① 王忠事:《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海外统战工作的重大贡献》,《重庆师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

和护送，经曲江、桂林到达重庆。司徒美堂安抵重庆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就各方面情况进行了交谈，司徒美堂深为南方局领导人的坦诚直率所感动。回侨居地后，他积极奔走呼号，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筹物，在整个抗战期间，司徒美堂从财力、物力上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很大的援助。[①] 1942 年夏天，司徒美堂先生代表美洲华侨回国访问时，曾当面痛陈蒋介石歧视、迫害八路军、新四军的不友好行为。在蒋介石特务的重重封锁和严厉警告下，他仍然出席重庆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会，发表反对分裂坚持抗战的演讲，斥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在重庆引起轰动。

三、扩大对海外华侨的抗日宣传

海外华侨统战工作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效地实现对华侨社团的政治影响。因此，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非常注重与华侨社团的联系，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密切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政治影响。

一是与海外华侨群众社团建立了直接密切的联系。早在 1938 年 4 月，长江局领导下的中共闽西南特委在给潮汕中心县委的指示信中就指出，潮汕与南洋各地关系密切，应该不断向南洋各地报道新四军和国内抗日救亡动态，同时发动组织回国工作队、服务团等。潮汕中共党组织很快与暹罗的“抗联”、安南的“东北线救国总会”及印尼、新加坡等地一些华侨群众团体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并得到经济上的赞助。1939 年 3 月，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又以岭东各地青年抗敌同志会的名义，派出两名与南洋华侨有关系的同志去南洋各地进行宣传、募捐和联系等工作。闽南的中共党组织也与菲律宾、安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华侨建立了联系。[②] 1938 年，八路军、中共驻湘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驻粤代表潘汉年、廖承志三方联名发表《第八路军致华侨社团的公开信》。信中对八路军自平型关抗战以来的英勇事迹进行了回顾，客观地分析了八路军在抗敌斗争中存在的困难，呼吁华侨社团“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民，予以八路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86—87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 388—391 页。

军健儿有效之援助，以达抗战最后之胜利，求得民族独立自由幸福之实现”。这封公开信对华侨社团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1938年4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告青年侨胞书》，对一二九运动以来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回顾，向青年侨胞阐明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任务和使命，呼吁加强与海外青年侨胞的接触和联系，号召青年侨胞“要建立起自己的坚固统一的团体”，“我们愿与青年侨胞坚强勇敢的携起手来，共同为祖国而奋斗，打走日本鬼子，建设新中国”①。告青年侨胞书，实际上是南方局成立前关于建立广泛的海外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阐述，对青年侨胞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强有力的号召作用。

二是通过当地华侨中的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创办和联系华侨群众团体、报刊、学校，充分运用和发挥这三大阵地的作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侵略罪行，号召全体华侨同胞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支援祖国抗战。旅菲侨领许立（共产党员，闽籍），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廖承志等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同时还推动菲律宾中上层人士成立了“中国之友社”，积极声援中国抗战。许立还在菲律宾创办《建国报》和“建国出版社”，建立“美范印务馆”和“全民书店”。“建国出版社”用中英文分别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等重要著作。《建国报》及时报道中共中央文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战绩和敌后解放区成就，在国外影响很大。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副刊《醒狮》（李铁民曾任过主编）和《星洲日报》的副刊《晨星》（郁达夫曾任过主编）等文化园地，在宣传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②

三是做好回国参观团、慰问团的工作，通过这些团体影响、宣传和教育海外广大侨胞。1938年春，菲律宾华侨沈尔七（闽南籍）率领“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回国，经厦门到龙岩，参加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

① 蔡仁龙、郭梁主编：《福建党史资料——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13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388—391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沈尔七于1939年和1940年又两次回菲律宾，动员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新四军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并筹集资金、药品等物资支援祖国抗战。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回国慰问团，历时4个多月，先后到全国各地慰问，南方局做了许多工作，并促使陈嘉庚访问延安8天。这次慰问，使陈嘉庚对战时中国的政治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回南洋后，他据实报告，广大侨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明白了延安的共产党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晤和访问。对陈嘉庚的慰问团活动，南方局下属的《新华日报》有4篇专题报道：《南洋侨胞慰劳团团长陈嘉庚先生抵渝》、《欢迎南洋侨胞回国慰问团》、《南侨慰劳团分三个团出发劳军》和《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嘉庚——陈氏演说坚持团结抗战，毛泽东同志特设席欢宴》，呼吁以正确的态度对慰劳团的慰问活动，不要给予过多的限制，诚恳坦白地提出一些意见供他们参考，以便对抗战有较多的贡献。对慰劳团访问延安进行了追踪报道，从而扩大了这次慰问团活动的影响。

四是派遣剧团和干部团出国，进行演出宣传活动。1938年5月，厦门失守后，中共漳厦工委派出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经香港转赴安南（越南）、高棉（柬埔寨）等国，向广大侨胞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劝募工作。在闽南籍侨领颜子俊等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一年的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当厦门儿童救亡剧团离开安南西贡时，中国共产党又决定把领队林云涛（共产党员）留下继续在安南进行华侨的统战工作。林云涛以暨南中学教员的身份，通过《全民日报》、《越南日报》、《大众报》和《华文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倾向。后林云涛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1年春夏之交，逝世于安南西贡医院。[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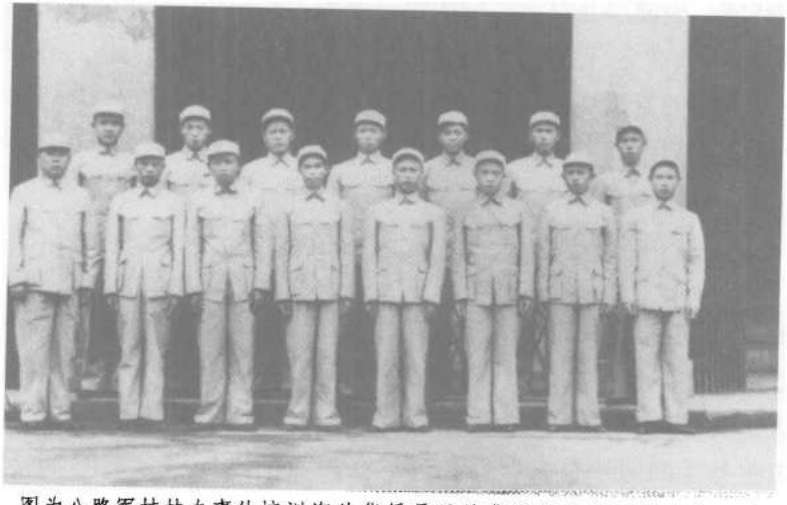
四、组织海外华侨回国抗日

1939年初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地区沦陷前，是海外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援助祖国抗战的高峰时期。海外华侨在救亡热潮中逐步认识到，只捐物资和金钱，还不能完全表达他们尽忠报国的心愿，决心组织服务队回国亲身参加各种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以至参战，于是回乡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388—391页。

服务队一批又一批地回国。在这一救亡热潮中，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主要做了华侨两方面的统战工作。

一是组织和转送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赴延安学习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需要华侨从人力上进行支持，特别需要司机、医生、护士等奇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也需要大批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政工和宣传干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香港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在海外动员和组织华侨青年以参加回国服务团的形式进行招募。驻港办事处在各地进步侨团的支持下，从众多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中，动员和组织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决心报国的华侨青年回国。其中人数较多的有两批：第一批是从新加坡、印尼、马来亚等地回来，到新四军的140名司机；第二批是从香港、马来亚、泰国回来，到延安的几十名司机、医生和护士。这些爱国华侨青年回到香港之后，全部由驻港办事处负责安全转送到各个目的地。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到延安和八路军的交通被阻断，驻港办事处便将要求回国赴延安学习和参加八路军的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送往南方的各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因此，在华南各个敌后抗日游击队中，都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仅参加东江纵队的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就有1000人以上。应该说南方局领导下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图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培训海外华侨骨干的华侨服务团训练班第二期学员在桂林的合影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南方局下属的党组织在护送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南方局华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在这些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华侨青年中，涌现出不少杰出优秀的李林式的抗日英雄，如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符克、陈琴、范清，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黄志强、陈志奋、陈笑影等，他们为援助祖国抗战，为抗击日本侵略军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②]。

二是组织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这是海外华侨参加抗日战争的最直接形式，也是南方局领导下的一项重要工作。广东是华侨和港澳同胞回乡参加抗战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他们大部分是参加各地侨团组织的回乡服务团回来的。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省各地。在众多的回乡服务团中，组织规模所起作用和影响最大的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琼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会宁团）、香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简称港学团）、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简称澳救团）和澳门中国青年回国乡村服务团（简称澳青团）。这些回乡服务团，都是在南方局领导下的党组织的推动和支持下成立的，各团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的活动也是在南方局领导下的党组织的关怀、指导下开展的。因此广东的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的工作，是南方局华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南方局《新华日报》有5篇报道华侨积极参战和回国服务团的文章。其中有2篇是悼念华侨女英雄李林的，1篇是报道慰问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2篇是专门报道机工（主要是司机）回国服务的。可见，南方局对回国服务的华侨给予了热情的报道，对他们归国服务所遇到的困难给予高度同情，呼吁国民党政府给予帮助。对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的英雄事迹予以充分报道和传播，这是对华侨优秀儿女和蓬勃开展的海外抗日救亡运动的高度褒奖。

广东的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服务团回粤之后，除各救护队到了国民党第四战区各部随军服务外，其余各团在中共广东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奔赴广东各地，深入广大城乡，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工作，发挥了爱国华侨应有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388—391页。

② 朱逸辉：《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斗争回忆片段》，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印：《华侨史论文集》（四），1984年版；张兴汉：《抗日战争中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贡献》，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印：《华侨史论文集》（二），1981年版。

的积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主要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广泛深入城市和乡村宣传抗日，救济受难同胞。活跃在东江地区的东乡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团长叶峰、副团长刘宣的领导下，带着华侨义捐的救济款和大批治伤药品、救济粮食和御寒衣服，到各地进行救济工作。他们还在各地办起夜校，建立读书会、妇女会、青救会和儿童团，宣传抗日道理。他们除了慰问部队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外，还进行街头宣传、出墙报、贴标语、教唱歌、山歌对唱等文艺节目，群众非常欢迎。活跃在海南岛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是在旅港琼崖地下党和知名人士冯裕芳博士和商人周文治、黄坚等人的倡议下成立的。当时以“琼崖旅港商会”和“琼崖旅港同乡会”的名义，向海外琼属侨领发出邀请，建议在香港召开海外琼崖华侨代表会议，海外琼属侨领热烈响应，于1938年11月在香港“全塘酒家”二楼召开琼崖华侨团结抗日会议，会上成立了“琼崖华侨联合总会”，会议决定成立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了提高服务团全体成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战地救护等常识，总会还请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派员进行训练。廖承志主任、连贯秘书长便派韩拓夫、文竟平等同志给服务团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等课程，张翼医生讲战地救护等课程。服务团到琼崖后，迅速开展工作，他们给家乡同胞带来了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材，在文昌、琼文、乐万和乐等地建立了医务所，为群众治病。他们还为部队举办医务人员培训班，共计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培训了90名医务人员，并组织了两个随军医疗队。活跃在南路、西江和粤中等地的服务团，为群众施药治病，组织群众生产救灾，渡过难关。各地服务团通过救灾工作，密切了同广大群众的关系，取得了群众的信任，迅速打开了救亡工作的局面。这些服务团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尤其是他们以自己为了抗日救国，放弃学业、工作和安定的生活，离别亲人，回国参加抗战的亲身经历来教育群众，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坚定了群众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①]

第二，组织抗日团体，建立抗日武装。各地服务团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青年读书会、青年抗敌同志会、农民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会、抗敌姐妹会、抗日儿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388—391页。朱逸辉：《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斗争回忆片段》，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印：《华侨史论文集》（四）。

童团、抗日先锋队、抗敌后援会等许多群众抗日救亡团体。仅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1939年1月组建到1940年初，组织起来的群众就达1万多人。各地的服务团在组织群众建立抗日团体的基础上，又逐步组织起民众抗日武装。东团活跃在东江，通过组织打猎队、联防队、自卫队等形式，将农村农民群众的枪支弹药动员出来，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抗日随军杀敌队、抗日游击队等不脱产半脱产的民众抗日武装。仅在博罗和增城两县交界的联和乡、泠水坑一带，东团团员就建立起"抗日随军杀敌大队"200多人。在抗日前线增城县的派潭、福和地区，由东团团员建立的民众抗日武装有3个中队，每个中队50至100人。活跃在南路地区的香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积极推动爱国抗日将领张炎，以港学的团员为骨干，组织了约1000人配备全副武装的学生队。学生队的副总队长和下属的6个中队的副中队长都由中共党员担任。这支武装基本上为中共组织掌握，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广东南路乃至粤桂黔边区的政治、军事骨干。活跃在西江地区的四会、广宁两县的会宁团，利用国民政府公开号召组织民众抗日游击队的机会，在各区、乡建立了公开或半公开的民众抗日武装队近5000人。该团还组织了一支近100人，配备长短枪几十支的抗日武装，由共产党员会宁团副团长陈子贤兼任营长，成为中共党组织直接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值得指出的是，1945年6月14日，中共南路特委特派员谢王岗，在防城县东兴、那良一带组织了一支有15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中越边境马头山脚里罗村举行起义，正式宣布成立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揭开了防城县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新篇章。为了打击入侵日军，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刚成立就立即开赴抗日前线，挺进中越边境靠越南一侧的日军占领区塘花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打击日伪军的游击战。游击队到达塘花后，立即组织深入村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侵华日军的罪行，还为患病的群众看病送药。游击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关心群众疾苦，受到群众的欢迎。游击队多次给黄摩岭、塘花地区的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后由于日军加强"扫荡"，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于8月转移到防城一带休整，继续寻机消灭日军，直至日本宣布投降。①

① 黄智明等：《机智勇敢的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广西党史研究室、广西区政治部合编：《广西抗战纪实》，第261—264页。

第三，开展战地服务，协助前线作战。1939 年初，日军进攻四会县的马房渡口，试图进犯西江，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四会县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中队奋起抵抗。会宁团组织青年奔赴前线，为部队送茶水、运弹药，进行战地鼓动，使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1939 年冬，为配合粤北抗战，东江地区国共两党领导的部队组织了袭击深圳、石龙等地敌人据点的战斗。东团的惠阳队、东宝队、增龙队积极动员群众支援部队作战。增龙队派出了两个工作组配合随军杀敌队，深入敌后打击日军和汉奸。东宝队动员群众为抗日部队侦察敌情，充当向导，运送弹药，给部队送茶送饭，抢救伤员。东团博罗队 10 名团员，在 1939 年 4 月 12 日的罗浮山战斗中，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作战，并在前线配合部队英勇杀敌。他们还收容了数十名被敌军冲散的国民党部队的伤兵，在医药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利用中草药医好受伤战士，使他们重返前线。他们出色的工作受到当地军政当局的赞誉。东团的干部联席会议决定给他们奖励，并报请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嘉奖。

第四，培养抗日骨干，重建中共党组织。为使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需要一支领导运动的骨干队伍。为此，各地服务团通过各种形式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东团”总团部和“东团”香港办事处先后在香港、惠阳县的坪山和博罗县的黄麻坡等地，举办了 10 多期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团员达三四百人次。“琼团”根据琼侨总会的指示，派出干部在广州湾南面的卫洲岛，举办琼崖青年训练班，培训的大批琼籍青年返回海南岛投入抗日斗争，不少人成为琼崖抗日斗争的骨干。“会宁团”在广宁县培训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 60 多人，在四会县培训了 30 多人。这些骨干后来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西江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骨干。广东的南路和西江地区的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破坏了，党的组织中断了活动。南路和西江地区的服务团都有党的组织，他们对恢复和重建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 1939 年至 1941 年南洋华侨援助祖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由于南方局领导下的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出色工作，扩大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海外声望，南洋华侨的许多救亡组织把大批捐款物资直接送到英勇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手中。为此，不

少地区华侨还建立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专门筹款组织。例如新加坡华侨发起了扩大援助八路军运动，发表“为援助八路军告侨胞书”，称赞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铁军”，号召侨胞踊跃支援①。马来亚华侨组织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援八援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组织了“陕北公学捐募基金委员会”，等等。

图为在路莫村军需物资转运站，李克农向南洋华侨代表黄光明回赠“祖国先锋”锦旗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南方局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加强，愈来愈多的华侨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身上。他们冲破国民党的禁令阻挠，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援。1939 年 2 月底，“南洋惠侨救乡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决定把捐款的百分之四十献给新四军，百分之四十献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另外百分之二十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②。菲律宾华侨为支持创办“陕北公学”，先后两期募捐，共得 16300 余元。“菲律宾妇女慰劳会”和“马尼拉中国妇女救济会”都各捐万元慰劳八路军。越南侨胞还派出代表，专程回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① 《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5 年第 3 期，第 17 页。
② 郭梁、蔡仁龙：《华侨抗日救国史略》，1987 年，第 20 页。

献旗赠款，表示慰问。1939 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曾生抗日游击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 20 万元。[①] 1939 年 5 月 6 日，琼崖华侨联合总会救济委员会，通过廖承志转给冯白驹游击队的捐款有国币 4 万元，医药用品一批，以后每月给该部汇款国币 6000 元，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②]。总之，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武装队伍的支持，是南洋侨胞捐款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部分。据大约估计，抗战时期南洋侨胞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捐款至少有国币 1000 万元[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侵占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广大的地区，南洋华侨援助祖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尽管暂时陷入低潮，但他们积极参加所在居住国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所在国的反侵略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祖国的抗战事业。与此同时，在南洋华侨援助祖国抗战处于不利境地时，欧美地区广大爱国华侨接过重担成为援助祖国抗战的主力军。

总之，在抗战期间，由于南方局出色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建立最广泛的海外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广大海外华侨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贡献。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被载入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史册。

① （日）《第三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 366 页，郭梁、蔡仁龙：《华侨抗日救国史略》，第 20 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 381 页。

③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华侨革命史》（下），台北中正书局 1981 年版，第 660 页。

第九章　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活动，开拓外事工作新局面

抗日战争是中国逐步摆脱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统治，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的重要转折点。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外国使馆、驻华机构和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云集的中心。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的桥头堡作用。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深入开展了国际统一战线活动，搭建起与国际社会联系、交往的桥梁，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新局面，为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奠定了初步的根基。

第一节　外事工作方针的确立与贯彻

一、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加强对外宣传

1927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加紧对中共进行军事"围剿"和新闻封锁，苏区与外界"断绝"了往来，成为了一个外人难以进入的空间。"九年以来（红色中国）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①]与此同时，国民党不断地宣传"共匪"的"暴行"。在国外，由于西方视共产主义为"异端"，同时，外国记者又不能实地采访苏区，所以西方媒体大都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而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又多为歪曲、攻击的内容，所以，"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页。

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①。如“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根本没有这种武器”②。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③。因此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加强对外宣传，改变国外对中共的认识，就显得格外重要。

中共在海外只有中文版的《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两家报纸。读者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华人、华侨，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号召广大侨胞和各国民众支援中国抗战。这对于争取华侨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于广大西方人士来说，对中共的认识仍然是很陌生的。他们更多地是从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中了解中共，因而在他们心目中，中共和红军是一股“焚毁村庄或城镇”、“杀人纵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土匪”。

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深入陕北苏区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新闻采访。期间，他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多位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访问了红军战士和边区群众。这次访问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能从这些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饰的答复，确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④。离开苏区后，斯诺在国内外大量报道了苏区的一切，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新共和报》、《纽约太阳报》、《美亚》及《太平洋事务》杂志，英国的《每日先驱报》等报刊，纷纷刊登了斯诺采自陕北的报道、照片。1937年10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正式出版，几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两个月内连续印行5版，供不应求。不久被译成法、德、意、俄、日、中等十几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斯诺对陕北苏区的采访和报道，有力地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震动了国际社会，使全世界首次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79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75页。
③ 王晓岗、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74页。

人们称他的苏区之行是“本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的壮举”，他对苏区的报道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是“多年来新闻工作的最大成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从此敲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以“中国新人”的姿态跨上了国际政治舞台[①]。

受斯诺的影响，一些对中共怀有浓厚兴趣的外国记者，在中共的安排下，纷纷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继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12日前往延安，当她第一次见到经历了长征的红军战士时，心情激动不已，在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中，她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接踵而来的是尼姆·威尔斯，她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四个月的访问，写下了《续西行漫记》。此外，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联合新闻报》驻华北记者厄尔·利夫、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美国的哈里逊·福尔曼也先后到达延安进行访问。他们的到来，把被国民党围得水泄不通的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向外面的世界作了报道，使世界对“新中国的人”有了初步的了解。中共也因此认识到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外事工作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二、确立外事工作方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掀起了全民抗日的浪潮，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中共与国民党由武装敌对转变为合作抗日。中共由“地下”变为“公开”，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国共合作所形成的有利条件，走出延安，走向全国和海外，大力开展外事工作。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失守，全国抗战中心转到武汉。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4月，成立了长江局下属机构国际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事机构。它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②]。在外事

①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411页。

工作中，中共提出自力更生的原则，但也十分重视争取外援。毛泽东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①]周恩来强调外事工作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他要求在武汉的同志要打破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他指出，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也还要妥为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否则便会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南方局积极同外国使馆和外国记者建立了独立的交往，逐渐摆脱了依赖于国民政府的外交联系。

南方局成立后，为更进一步打破国民党外事垄断的局面，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合作，广泛开展国际统一统战工作，于1939年4月专门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改称外事组，由王炳南任组长、陈家康任副组长，1942年增补龚澎为副组长，外事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周恩来离开重庆期间，由董必武或王若飞领导）。外事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交友以及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了解美国、英国对华政策、各国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扩大国际抗日统一战线。[②] 南方局外事组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开展。

图为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组人员在重庆城区的"韦家院坝"与外国友人在一起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

② 段渝主编：《抗战时期的四川》，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68页。

三、贯彻落实“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

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的精神①，周恩来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②。南方局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宣传出去”，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敌后根据地抗日军民对抗战的贡献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把国际上一切爱好和平，一切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正义事业的力量争取过来，建立和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要开拓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联系的广阔空间，打破国民党对外事工作的垄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支持，使中国共产党走上国际政治的大舞台，在发展国际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扩大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影响和联系。

在“宣传出去”方面，南方局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两大媒介，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根据地的业绩宣传出去。南方局直接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领导工作。《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坚持报道真实消息，传播革命真理，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同时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和谬误，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呼吸到新鲜空气，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③ 针对国民党宣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新华日报》坚持发表八路军战报，宣传解放区军民抗战的成绩，发表了《粉碎敌人进攻经过与经验教训》④、《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⑤、《模范的歼灭战——进攻陈庄的敌人是怎样被歼灭的》⑥、《八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74页。

③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渝内字（2004）097号，2005年版，第41页。

④ 《新华日报》1939年1月9日第4版。

⑤ 《新华日报》1939年1月8日第3—4版。

⑥ 《新华日报》1939年12月13日第2版。

路军两月血战，华北我歼寇万余，大小共250战，生擒敌伪千六百人》[①]、《鲁豫皖我一月游击战果——毙敌12000余，获枪3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②]、《集小胜为大胜，二月下半月我毙敌两万余，山西歼敌一万三千》[③]等文章。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对这股反共逆流给予坚决反击。1月7日，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指示报社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国民党制造事变的社论。当他得知《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被新闻检察官扣压，报纸被迫开天窗时，他挥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际舆论哗然。英国大使认为这是可悲的事。美国武官（包瑞德）也作了同样的表示。罗斯福私下向蒋介石发出警告，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抗日战争，如果发生这类悲伤的事件，这种援助将是无益的。国内外反应的强烈程度使蒋介石感到惊讶。[④]

二是通过公开演讲、撰写文章等途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如1940年9月20日，周恩来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发表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著名讲演，不仅使3000多听众振奋了抗战精神，而且使许多在场的外国记者深受鼓舞，纷纷向本国发去新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⑤]。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发起了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与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广泛地同社会各界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国内各界舆论哗然。针对蒋介石制造八路军"不抗日"的舆论，周恩来等人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要求发表八路军战报，指出日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的情况下仍抗战耗敌。[⑥]

三是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南方局在"宣传出去"的工作中，在各地设立办事机构，作为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和对外宣

① 《新华日报》1939年3月2日第2版。
② 《新华日报》1939年2月8日第2版。
③ 《新华日报》1939年3月8日第2版。
④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⑤ 段渝主编：《抗战时期的四川》，第37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九四九）》，第505页。

周恩來同志講
國際形勢與中國抗戰
帝國主義戰爭正益趨持久擴大
堅持抗戰勿對美日衝突存幻想
祇要團結到底勝利一定屬我們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在重庆巴蜀学校演讲。图为《新华日报》刊载的演讲摘要

传、交往的阵地是一项得力的措施。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桂林、洛阳、长沙、广州、南昌、贵阳、新疆等地建立了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和输送革命干部，为八路军、新四军等运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工业原料和工厂设备，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1938年1月，周恩来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谈后，经卡尔帮助，获得香港总督批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①]，其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八路军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设立办事机构，这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的成果。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把对外交往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使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了解国内抗战情况，以及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办事处在香港及时翻印出版了《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社论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面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并刊登大量来自抗日前线的报道，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战的业绩，揭露日军暴行。该刊在香港、菲律宾等地均有一定的发行量，海外许多华侨报刊纷纷转载该刊文章。办事处还“走出去”，先后派出王任叔、杜埃、陆诒、董维健、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402页。

声等人到菲律宾、槟城、纽约、印尼、新加坡等地协助华侨创办抗日报刊，以加强中共的海外宣传、联络工作，动员华侨青年回国投身抗战。对国外反法西斯人士的统战、交往工作也迅速展开。办事处曾接待和动员许多国际友人前往中国参加抗战，接受和争取大批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钱物。在香港沦陷前的数年中，办事处成了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出入中国内地和海外援助敌后抗战物资的中转站，南方局领导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①

四是积极开拓海外宣传新阵地，打造对外宣传新平台。皖南事变后，为使国外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洞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②。同时，为保护南方局外事组的实力和影响，周恩来把部分同志疏散到香港，建立新的对外宣传阵地，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1942年起，周恩来指示抽调罗清章、蒋金涛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选择《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局势的谈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③ 最初出油印本，印数约150册；从1943年改为铅印本，印数1000—3000册（份）。还全文翻译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及其他专门的小册子，至1946年止，共出版20余种。宣传材料除分送各驻华使馆、记者外，多数由外事组干部冒着被捕危险送到外国朋友手中，再转至海外发表。

在“争取过来”方面，南方局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实践成效，主要表现在：

第一，争取到了一批外国记者，通过他们向国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南方局积极与外国记者开展交往工作，如周恩来等南方局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报告会，并与一些著名记者，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窦登、杜尔亭、费希等交往频繁，为他们深入抗日根据地采访给予精心安排。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秋，史沫特莱、威尔斯、卡尔逊、斯诺等都先后

①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第46—4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48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545页。

访问过延安。通过外国记者，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如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抗战期间两次来华，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一书，高度评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中国人民，如实报道了皖南事变，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的阴谋，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①] 早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周恩来就同美国作家斯特朗长谈了几个晚上，向她详细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和现状，国民党两年来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谈话结束时，周恩来嘱咐斯特朗暂时不要发表这些材料，等同意时再发表。皖南事变后，他电告回到美国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随即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披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此外，史沫特莱著有《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等，她为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为伤病员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改变部队缺医少药的状况做出不懈努力。卡尔逊自抗战爆发后，用18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中国各地，他以一个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到华北前线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在八路军的作战区域走访了几个月，回到汉口后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他们讲述了他在游击区的见闻。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着重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游击区的情况，热情地赞扬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称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②]。这些记者的著述对美国舆论，乃至决策者都有相当影响。如美国官员戴普来这样解释罗斯福总统在皖南事变后明确表示不支

图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①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第37页。

② (美)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持蒋介石反共的原因："此种见解必从美国旅华著作家之言论中得之。"居里也说："斯诺及史沫特莱为之（中国共产党）撰著专书，以广流传，一般自由主义倾向之美人，受其影响甚大。"[①]也正是由于外国记者的影响，1945年2月10日，美洲十家华侨报纸通电国内，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立即成立联合政府[②]。

第二，争取到与莅渝旅外华人华侨的交往、联络，赢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持。1940年3月26日，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飞抵重庆，给抗战军民带来了慰问，并准备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以聚集力量帮助祖国抗战。他在机场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访问延安，对此，国民党想方设法加以阻挠。他们向陈嘉庚等大肆灌输反共言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中共军队游而不击，专打国军等等[③]。针对这一情况，南方局的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排除国民党方面的阻扰，来到陈嘉庚下榻的嘉陵新村，拜访陈嘉庚，就有关国共两党磨擦问题进行了交谈。事后，南方局在重庆办事处举行茶会，欢迎陈嘉庚。在茶会上，陈嘉庚发表了演讲，表示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国内若发生内战，将使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大失所望，务望国共两党坚持团结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最后，他询问去往延安的交通和行程事宜。叶剑英一一作了介绍，并告诉他到西安后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一切自然方便。正是在南方局的努力下，陈嘉庚访问延安计划终于成行。陈嘉庚曾比较信任国民党，而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有较多疑虑，如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政策、土地政策、民主问题，等等。通过延安之行，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不寻常的飞跃，转而同情中国共产党，并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回南洋后，不放过一切机会，大加赞扬中共救国救民、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捍卫真理的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上下团结、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共产党领袖如何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等。他对儿子陈国庆说："余此次劳军，经延安所见，深感中国有希望了！"他从此也就成了不受国民党欢迎的人，因为他不仅赞颂中共，还在许多场合批评、指责国民党如何政治腐败、独裁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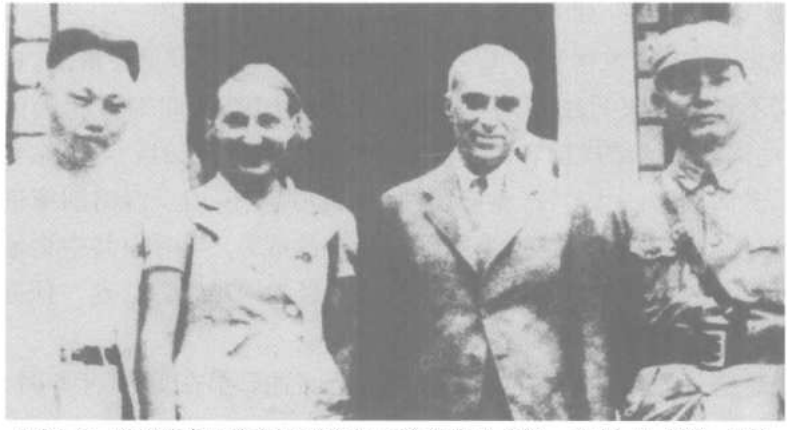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著——对日抗战时期》第三辑，第54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01页。

③ 上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第137页。

抗战不力、专搞磨擦等等。[①]

第三，争取到与莅渝外国政要的交往、沟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39 年 8 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前来中国访问。对于尼赫鲁的来访，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热心希望通过尼赫鲁访华的机会，加强相互间的接触与了解。8 月 27 日，毛泽东致电尼赫鲁，欢迎他前往延安访问。在尼赫鲁的印象中，中国共产党人比国民党更有远见，组织抗日战争也更有办法。他前往延安考察访问，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交换对民族革命斗争问题的看法，必将有所收获。[②] 但是国民党方面自然不会把陕北列入尼赫鲁的访问计划。为摆脱国民党的阻挠，尼赫鲁以要到华北去看望印度援华医疗队为借口，坚决要到敌后去。恰在此时，欧洲战争爆发，国内要求他迅速回国，尼赫鲁不得不取消访问华北计划。在尼赫鲁即将归国之际，南方局抓住时机，与他取得了联系。按照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的安排，外事组的王安娜每天都与尼赫鲁会面。通过与南方局的接触和交往，尼赫鲁弥补了他未能访问延安的不足。在重庆期间，尼赫鲁会见了南方局的领导人博古、吴玉章，双方就中国抗战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革命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与各党派合作情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欧洲及远东的影响



1939 年，叶剑英在重庆接待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右起：叶剑英、尼赫鲁、王安娜、王炳南

①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第 142 页。

②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第 110 页。

以及印度有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南方局的帮助下，尼赫鲁还与重庆的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广泛接触。尼赫鲁的访华及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推动了中印两大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1941 年 2 月 14 日，周恩来在重庆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居里会晤。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磨擦的若干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美国政府得居里报告后，立即要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①]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反共的嚣张气焰。

南方局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广泛开展外事工作，特别是南方局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更是以出色的外交风范和极具感染力的人格魅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民主大党形象和中共领导人卓越的外交才能，并赢得了外国朋友们的尊敬、信赖和友谊。南方局因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平台，更是世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

第二节　扩大与各国使馆、国际机构的交往

一、承担起与国际社会接触的任务

1936 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多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各国人民的敌人，这些国家应该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多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注意同世界上一切反侵略国家进行联络，争取他们对中国的支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②]。当时中共中央地处延安，受到国民党的封锁，要同国际社会接触极为困难，因此，这一任务落到了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南方局身上。

周恩来等人非常重视与国际团体进行交往。早在 1938 年 6 月，当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时，周恩来等人就加强了与他们的联系。周恩来告诉艾黎：组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 114 页。

②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第 117 页。

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还对“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工合”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中募捐，并将筹集到的物资、款项转送延安，对支持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①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重庆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后来又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的司令部驻地，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结合部。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 30 多个反法西斯国家在重庆设有外交使馆，另有 40 多个国家设立了各种外交机构。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公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等多个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组织，也设机构在重庆。中苏、中英、中缅、中越一类的文化协会有 10 多个。② 据 1943 年 10 月底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字，仅驻重庆的外国人就有 1129 人，其中英国 329 人，美国 168 人，苏联 163 人等等。此外，各国使者、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民间团体也频繁往来，不计其数③。而且，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著名通讯机构以及美国的《时代》、《生活》、《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巴黎晚

抗战时期，设在重庆城区枇杷山上的苏联驻华大使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 415 页。

②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 · 历史资料片图文集》，第 118 页。

③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第 44 页。

报》，苏联《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这为南方局开展对外交流、交往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方局在外事工作中，重点抓住两个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外事工作。第一个时机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南方局向英国、美国、苏联等驻华使馆提供国民党加强新闻封锁、制造磨擦和有关中国抗战情况的材料，敦促各国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以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第二个时机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为主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后，南方局向盟国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愿望，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夺取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南方局成立时，国民党已经开始逐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从客观上说，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较为努力的。但1939年初，国民党开始将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而把精力放在限制共产党方面。蒋介石非常害怕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会危及日后自身的利益，害怕中共在国际社会中声望的提高会削弱自身的国际地位。于是，他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共的抗日活动，封锁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各类消息，企图割断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以重庆为依托加强与各国大使馆、国际机构的交往，接待了外国政府要人、外国记者、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特别是广泛地接触了英美各界人士，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时势的看法和态度，揭露国民党内的反共投降活动。1939年1月2日，周恩来在重庆接见路透社记者时，揭露了汪精卫的叛国罪行。1939年5月，吴玉章在北温泉接见塔斯社记者汪伦（汪伦从延安到北碚，担任《北碚月刊》主编、《嘉陵江日报》编辑，从事统战工作），指出北碚统战工作的意义和方法[①]。1939年，国民党发起了反共高潮，南方局利用《新华日报》、《群众》作为舆论宣传阵地，呼吁各方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同时，南方局将八路军、新四军重要战报和国民党制造反共磨擦的材料，提供给驻重庆的外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1940年，国民党加快反共步伐，形势日趋严重。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大力开展对内、对外宣传工作，把国共合作正面临分裂的形势昭告国内外友好人

① 张继禄主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士，并指出，分裂危局一旦形成，只对日、德等法西斯国家有利，对英、美、加等国十分不利。[①] 南方局将半年来国共双方来往文电及国民党秘密反共文件编印成册，除提供驻华外国人外，还委托在外事组工作的王安娜带到香港和国外散发。这些对动员海内外舆论力量，制止和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都起了积极作用。[②]

1939 年 9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法国卷入对德战争，国际形势大变。英国、法国与德国矛盾尖锐。在此形势下，周恩来带领外事组人员积极开展外事活动，敏感地注视着英国、美国一切可能危害中国的对日妥协倾向和会导致中国国内妥协投降的倾向，抨击它们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以促使其坚持反对侵略的立场。1940 年 9 月，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同盟成立后，德国、意大利、日本加紧对蒋的诱降，英国、美国一改常态，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援华，拉拢蒋介石，防止其倒向轴心国。在此国际形势下，蒋介石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玛乐式的人物最能左右逢源，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因此，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外事工作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和局面。

二、与各国使节和国际人士广泛接触，打开外事工作局面

为争取和团结更多外国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打开外事工作新局面，南方局领导人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国使节和国际人士，扩大与外国使馆、国际机构的交往。南方局所接触、会晤和交往的外国人士，上至国家副总统和各国驻华使节，下至一般记者和普通士兵。

1940 年 11 月 2 日，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举行会谈。潘友新认为仅据现有材料尚难判定蒋介石已与日本妥协，并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及时将潘友新的意见报中共中央。[③]

皖南事变后，为使国际上了解事变的真相，南方局立即派遣王炳南和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

① 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中共党史资料》第 14 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第 44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 473 页。

军事件[①]。周恩来前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家里，向卡尔谈了国民党制造皖南惨案，破坏抗战的真实情况。后来，卡尔大使不仅告诫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还电告英国政府对其施加压力。[②] 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就国共关系、抗战、苏援等问题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进行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皖南事变发生后，潘友新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③] 崔可夫则提出，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④]。同时，他还转达了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件，要团结抗战的意见[⑤]。南方局的工作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同情，赢得了人心。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国、美国、苏联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⑥]

周恩来前往苏联驻华使馆祝贺十月革命节。左图为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一起；右图为红岩办事处赠送给苏联大使馆的锦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486页。
②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5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489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48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491页。
⑥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53—54页。

1941年2月14日，周恩来与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进行了会晤，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是赞成中国统一的。周恩来也表示，只要不损害中共的利益，中共就不反对美国援华。这次会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美国高官的第一次接触，双方第一次通过当面交谈直接了解对方的政治意图，这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意义非同寻常。居里离开重庆返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尽力与共产党保持抗日联合阵线"。次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在会见周恩来后，明确告知蒋介石"在战时及战争结束时勿与中共有严重问题之发生"①。

1940年3月25日，为了加强和扩大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开展中苏妇女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在邓颖超倡议下，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成立。南方局积极指导该会参加妇女界、文化界的各项重要政治活动，经常组织召开中苏妇女联谊会、联欢会、各种学术研究会、妇女问题座谈会、形势报告会、苏联儿童照片展览会、电影招待会等，介绍苏联妇女和中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情况；此外还兴办妇女俄文补习班、儿童之家等。该会的成立，是南方局开展妇女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②，为加强中苏妇女及反法西斯同盟妇女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为动员重庆各界妇女参加民主、反独裁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驻地接待罗马尼亚援华医疗队成员、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德·杨固大夫等。1938年8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德·杨固和布库尔，带着罗马尼亚人民的委托，随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来到中国。皖南事变后，杨固和另外两名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特务阻挠，从贵阳到达重庆，向周恩来提出到解放区去。周恩来三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今天的工作能够影响国民党的士兵抗日，希望继续留下来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救护医疗工作。周恩来说，我现在不就在这里工作吗？这是党派遣我在这里工作的，是革命的需要。杨固等未能接受周恩来的意见，遂向罗共中央请示。不久，杨固等得到罗共中央的指示，要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做。杨固等愉快地返回了岗位，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③

① 段渝主编：《抗战时期的四川》，第369—370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85—86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157—158页。

1944年6月7日，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流亡在重庆的韩国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韩军正副司令李青天、金植奎等十余人。6月9日，林伯渠在曾家岩50号举行茶话会，招待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妇，国际红十字会管理人员柏郎德，美国援华会爱德生等人。①

1945年9月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孙科、邵力子在"中苏文协"举办的招待会，广泛接触国内外友好人士，交流对时局的看法，阐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图为重庆中苏文协旧址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广泛开展统战工作。1日，毛泽东应邀请出席中苏文协举行的鸡尾酒会，受到各党派各界人士及外国朋友300余名与会人士和等候在街头的数千市民的热烈欢迎。13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合众社、路透社记者。毛泽东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我们共产党人希望和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入和平时期②。1946年1月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招待中外人士的新年鸡尾酒会，到会的有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捷克、墨西哥、挪威、伊朗、比利时和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的驻华使馆的大使、武官，以及中外人士500余人。这么多的外国使

1946年1月7日，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新年鸡尾酒会招待中外人士。图为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迎接来宾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33—234页。

② 张继禄主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第301页。

团、在华机构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中共举行的招待会，是南方局外事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

此外，南方局周恩来等领导人与美国顾问拉摩尔、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大使馆秘书赫戈登，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等都有过会晤，建立了联系，也与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盖尔荷恩、海明威，记者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和美国报业巨子亨利，新西兰进步作家艾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等有亲密交往和紧密联系。通过这些会晤和交往，向他们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介绍敌后解放区战场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和支持。1941 年 5 月，周恩来与美国作家海明威会晤后，致电毛泽东：海明威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因此，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

南方局以重庆为依托，通过灵活多样、深入细致的外交活动，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援，他们在了解到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后，不仅从道义、舆论上，而且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中国大力支援。不少国际友人牺牲在中国抗战的壮烈斗争中，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德国记者希伯、朝鲜的义勇军战士、日本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盟员、苏联空军驾驶员等。同时，通过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中国人民先后得到不少盟国援华救济团体和个人捐赠的钱款和医药器材等物资。另外还得到很多的人员支援：来华的国际医疗队、印度医疗队等；日本友人冈野进（野板参三）及其率领的大批人员来华协助八路军进行瓦解敌军和号召日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等工作；朝鲜独立同盟也派来大批人员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在与外国使馆的交往过程中，南方局非常重视感情联络和善后工作，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离任时，周恩来让《新华日报》接连刊登《惜别英大使卡尔爵士并致临别赠言》和《再惜别卡尔大使》及特写《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卡尔大使访问记》。这给卡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行前，卡尔称：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周恩来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①

①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第 121 页。

新華日報
社論 惜別英大使卡爾爵士
重慶臨別贈言
（下轉第二版）

在长期的交往中，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反法西斯战斗友谊。1942 年初，卡尔大使离任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和专文表示惜别之情

南方局以重庆为依托，与各国使馆、国际机构的交往特色鲜明，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机结合起来。南方局在战时的外事工作中，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扩大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赢得了重庆外交界和外国人士的广泛信任和友谊，有力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为全民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三节　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团赴延安

一、促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等国希望中国能够拖住尽可能多的日军，减轻盟军的压力。因而他们对于国民党消极抗战态度甚为不满，尤其在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在讨论军事计划时的反复无常，不顾常理的讨价还价，张口向美国要援助，动不动就拿中

国与日本单独讲和相要挟，这使得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信心开始动摇。[①] 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下了另一步棋：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②]。其实，早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后的两三天，中国共产党就表明了与美国加强联系的意向：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任务、组成、性质、目的及其意义。指示指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些民族的大团结，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条件。太平洋各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应当是政府合作，同时又是民族联盟。"[③] 1941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进一步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斗，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宣言指出：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必须实现的各项重要任务是：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中共中央这一对外政策的确定直接推动了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开展。这期间外事组的主要工作是努力争取与英国美国建立对日本的军事合作，尽可能影响英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争取他们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军队抗日实力，使其重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为此，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和封锁，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半独立外交"活动。周恩来对此作了科学总结："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进行单独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

① 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② 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第50页。

③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7—589页。

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①]南方局的"半独立外交",最终促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赴延安之行。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是南方局"半独立外交"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后,国民党曾一度放松了对中共的限制,外国记者可较容易地出入中共控制区域。但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大片国土,人民民主抗日力量逐步发展壮大时,就日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于是,国民党对中共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以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同时,不许中共发表战报,不许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报刊对外发行,不许中外记者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采访,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对中共控制区实行了严密的、高度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从1940年以后,几十万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边区,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国民党军警特务将一队队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关进集中营,严禁一切中外记者访问边区。"[②]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又欺骗世界舆论,蒙蔽盟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横加了各种罪名。在国民党的官方舆论上,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发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苏联阴谋侵略中国",充塞报刊[③]。重庆政府称中共自1937年就停止对日作战了,只是不断扩充兵力和地盘,进行颠覆政府的活动,接受莫斯科的命令,与日本人相勾结,并种植、贩卖鸦片,已经沦为"土匪"[④]。敌后抗战情形,从此难于向外界透露。在这种情形下,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就承担起了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战的重任,同时向国外记者不断宣传敌后抗战真相,并表达了中共热诚欢迎外国记者前往参观的愿望。正是在南方局的影响下,外国记者们在重庆一次次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提出申请,要求访问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但他们的要求总是被国民党方

① 周恩来1944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②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③ 李良志:《珍贵的书可敬的人(代序)——〈北行漫记〉及其作者》。福尔曼:《北行漫记》(又译《红色中国报道》),陶传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④ 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国观察组》,第61页。

面婉言或找借口拒绝，“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情况未定’”①。1944 年 2 月 16 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正式否认对共产党地区封锁的存在。外国记者立即抓住了这开放的机会，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联合请求书，请求书“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②。蒋介石权衡利弊后，最终答应了外国记者的要求，但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补救，首先是把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以抵消其影响。由国民党中宣部指派中央社、《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及一些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取名“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并派员担任该团正副领队，明确中外记者须在领队领导下统一行动的纪律。同时，国民党进行了全体动员，设立了以胡宗南为总指挥的指挥部，紧急调动了大量特务（军统派出了 362 人，中统派出了 413 人，胡宗南总部也派出了 400 名）进行监视。另外，蒋介石指拨了 500 万元作为“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的五分之三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即封锁、欺瞒、监视记者。③ 得知国民党的这些阴谋手段后，南方局立即把国民党的阴谋迅速透露给外国记者们，使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还安排了龚澎、龙飞虎陪送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以便于配合沿途照料和指点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④

1944 年 5 月 17 日，在南方局的积极支持和精心安排下，由美联社、美国《时代》杂志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新闻机构驻重庆记者发起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 21 人，他们是：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纽约时报》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福尔曼，《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夏南汗神甫，塔斯社普罗茨科。中国记者 9 人，他们是：《大公报》孔昭恺，《中央日报》张文伯，《扫荡报》谢爽

①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2 页。
②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2 页。
③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5—8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 571 页。

秋,《国民公报》周本渊,《时事新报》赵炳烺,《新民报》赵超构,《商务日报》金东平,中央社徐兆镛、杨嘉勇,此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崑,在团长谢保樵、副团长邓友德率领下,由重庆出发,乘飞机到达西安。5月31日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9日记者团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6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全面系统地给记者团介绍了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包括他们的发展壮大状况、作战状况、所抗击的日、伪军数量、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状况(包括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等等。当记者们得知中共军队已由抗战初的5万余人发展为47万正规军、200余万民兵,根据地人口8600万,抗击侵华日军64.5%(不包括关东军)、抗击伪军几乎全部等数字时,都极为兴奋;其中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武道、普罗茨科以及较公正的中国记者均表赞赏,对国民党进攻、包围、封锁边区和根据地,表示强烈不满。他们立即将叶剑英报告的主要内容向各自的国家发出新闻稿,引起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国对敌后战场极大关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必须发挥中共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美国援华武器必须平等地给中共军队一份。①

经过南方局的大量工作,最终促成了中外记者参观团1944年6月对延安的访问,从此打开了中外舆论真实了解根据地的渠道。图为毛泽东(前排左三)、朱德(前排左六)、周恩来(后排右一)、杨尚昆(前排右一)等与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合影

①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355页。

1944年9月15、16日，记者团实地观看八路军奇袭汾阳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汾阳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的战斗。他们亲眼目睹了八路军以密集的炮火、炸药包摧毁敌碉堡后，硝烟和火光冲天，杀声遍地，一群群敌伪俘虏押出战场等情景。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八路军打得好！”“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又说：“我们一定要把所看到的这一切、所拍的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传播”，“对八路军一切谣言、污蔑已被事实粉碎，任何的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①。

记者团在采访的过程中，陆续向外发表了相关的报道。如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于1944年7月1日发表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文章，随后又在旧金山电台、《时代》杂志和印度《政治家》等媒体发表了大量报道，他撰写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还被翻译成德、波、匈等多种文字出版；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等人在结束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后，用自己的笔，陆续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告知于世，相继写了《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英美报刊上发表，并于1946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合众社记者福尔曼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道》，路透社记者武道发表了《我从陕北回来》，等等。这些报道和专著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解放区的情况，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如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新四军在6年中，打过17500次以上的仗，曾经抵抗过敌人所发动的120次的大的“扫荡”战，打死打伤了24万以上和俘虏了34000以上日伪军。它的战利品包括124000支步枪及小兵器，2600挺的机关枪和100尊大炮②。这不仅宣传了新四军的战绩，也对蒋介石政府攻击新四军“称兵作乱，破坏抗战”③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二、促成美军观察组赴延安

美国政府派出的“军事观察组”奔赴延安，是南方局“半独立外交”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设想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

①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357页。

②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179页。

③ 蒋介石1941年1月7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转引自福尔曼：《北行漫记》，第180页。

限制，多方面开展民间外交工作，以争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合作和支持。早在1942年5月，周恩来就多次与美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二秘戴维斯等谈话，表示愿与美进行军事合作。如蒋介石允许，中共愿派军队受史迪威将军指挥，入缅作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共关系和中共军事实力等情况。周恩来在与美方的接触中，多次提出中共愿接受《租借法案》物资的援助，并向美驻华使馆、军方负责人、记者多次表示，欢迎他们到延安访问，也多次表示欢迎盟国政府和盟军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或设立领事馆、观察站，"（中共）热切期望美方能派一个军官小组到陕西、山西，建立美军观察站，以搜集军事情报，中共方面将提供便利。1942年初夏，周恩来向三次前来拜访的约翰·戴维斯表示中共抗日的决心。在戴维斯表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时，周恩来建议美国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山西建立观察站[①]"。同时，南方局还先后派遣刘尊祺、孟潜、金仲华、杨枣、刘思慕、葛未凡、田介人、韩幽桐、郭达等进入美国国务院在重庆设立的美国新闻处，加强了南方局与美方的联系渠道。1942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助理居里再次访华时，周恩来特致函居里表达了此意。1943年3月，周恩来在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再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向陕西、山西等地派驻观察组。但是，当时美国政府对此建议并没有多加重视。1943年底，随着中国内外部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日益关注起中国抗日战场上存在着两大力量，但它选择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作为支持对象，予以各种援助，以求其牵制和打击日本，不至于倒向日本。对中共方面，它不想违背蒋介石的意愿，与之发生任何交往。然而，热衷于搞反共磨擦的国民党集团却无意对日作战，承担不了作为一个反法西斯同盟大国应尽的义务。1944年，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丧师失地，全线溃退，损失惨重，一些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也被敌摧毁。罗斯福对中国战局深为忧虑，他对即将出访中国的副总统华莱士说："从中国传来的消息极其令我忧心啊！亨利，你代表我去中国一趟，安抚蒋委员长，给他以鼓励，说明盟国间要相互信赖，才能最后赢得这场战争。在开罗接触了这个人之后，我真是第一次感到担忧，怕中国国内的团结坚持不到战争结束。你到了中国，要尽可能使国共两党军队之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33页。

停止作战。很简单的道理，要是我们美国仇视共产党而与苏联刀兵相见的话，我们又怎能打败德国人和日本人呢？”[①]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反动激起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普遍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蒋介石集团的统治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在这关键时刻，美国政府首先焦虑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崩溃和投降日本，害怕日本由此取得不易改变的优势，而增加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负担和牺牲。它开始重视中共力量，美国军事当局当时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建立空军和无线电通讯基地，以便轰炸日本本土和将来进行对日反攻作战，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此举必须有中共的有效配合。[②]

1944 年 1 月 20 日，戴维斯在返美述职途中，路经印度，便向史迪威将军呈上了他 5 天前起草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明确写道：“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活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态，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③]这个报告的副本于 1 月 23 日送到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和时任经济顾问的居里手中，报告的内容显然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1944 年 2 月，他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军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蒋的拒绝。同年 3 月，罗斯福再次致电催促蒋介石，蒋只得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又以种种借口进行拖延。6 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渝访问，临行前，他向居里、文森特、戴维斯等曾与周恩来会见过的美国官员征求意见。他们都一致提出，蒋介石必须调整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否则就要冒爆发内战和苏联干预的风险。他们希望，美国人在延安将有助于双方形成一种比较容易妥协的气氛。华莱士到达重庆后通过向国民政府施压，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了美国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但蒋介石提出要尽量降

① 陈敦德：《接触在 1944：美国观察组》，第 90 页。

② 李良志：《珍贵的书　可敬的人（代序）——〈北行漫记〉及其作者》，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3 页。

③ 刘志远：《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在渝对外工作述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低规格。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史迪威将军以“考察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为名，派出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全称为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的美国官方代表团分两批到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共18人，有步兵、信号兵、航空兵、军医、情报员及电台工作人员，分属于美国陆海空军和战略情报局等系统。观察组的任务是了解日、伪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敌军的作战行动，敌军遭盟军轰炸的损失情况；中共全部官员名单，中共军队的战斗序列、力量分布、装备训练、作战行动、战斗力、发展等情况，中共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价，盟国为增强中共军队战斗力而援助的最有效方法，以及经济、气象等各方面的情况。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生官方关系，这是南方局积极开展外事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1944年8月4日，周恩来以欣慰的心情从延安致电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①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在延安引起了极大反响，毛泽东称这一事“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②。1944年6月28日，董必武从重庆向延安发去急电：美国军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确定，不久即可起程。做好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对于增进盟国、盟军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和推进抗日战争的进程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中共非常重视观察组的接待工作。美军观察组到来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并设宴招待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同他们多次长谈，介绍中共军队、解放区情况，并详述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对外政策等，其中彭德怀专题介绍了《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陈毅向他们作了新四军在华中七年的作战状况报告，叶剑英作了有关敌后作战及我军编制、装备的报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40页。

②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5日。

1944年8月，为使美国了解解放区情况，在南方局的努力下，促成了美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图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军事观察成员在延安

告。[①] 观察组在延安、山西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于1944年7—10月先后发出50余份报告书，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作了客观的分析，深信与中共的合作符合美国利益。戴维斯在他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他认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②]。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为中共与美国官方直接联系开辟了渠道，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决策者之间开始有了一个官方的固定交流渠道。观察组向美国国务院以及中缅印战区美国陆军司令部发回许多报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大力称赞延安的抗日民主政策，对美国决策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是直接导致抗战后期美国政府一度压蒋联共政策的催化剂。尽管这一政策因蒋的强烈反对和赫尔利等人的因素很快转化成扶蒋反共政策，但抗战时期，

①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388页。

② 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

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进行过短暂合作，这也是客观事实。应该说，促成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访问是南方局外事活动的一项重大成果，周恩来甚至从外交的意义上认为，南方局促成美军观察组驻设延安是一座里程碑。①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外事活动中取得的极其重大的成果，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新篇章。正如1944年8月1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事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新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提出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②

第四节　实现中共外事工作新突破

一、促成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大会

联合国制宪大会，是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发起，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盛大的一次国际性大会。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因此，又称为旧金山会议。会议历时两个月，其主要任务是成立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组织——联合国。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签字仪式在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大厦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50个国家的代表在印有英、俄、中、法、西5种文字的文本上签了字，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这50个签字国加上10月1日签字的波兰，被称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在联合国大会上，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中，有一名中共的代表——董必武。这是中共代表首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会议，一时产生了不小反响。中共代表资格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南方局进行不懈努力和斗争的结果，是中共发展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重大标志。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和中国、美国、

① 王明湘主编：《重庆抗战丛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第19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 一九四九）》，第580页。

英国三国的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建议成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性机构——联合国，并草拟了联合国宪章的大致轮廓和基本内容。1945 年 2 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决定于 4 月 25 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雅尔塔会议决定，被邀请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国家，应是 1945 年 2 月 8 日之前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和 1945 年 3 月 1 日之前向共同敌人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宣战的国家。雅尔塔会议还决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临时政府一起作为联合国发起国，共同向其他国家发出参加联合国的邀请。这一消息在当时传开来，使经历了近 8 年抗战苦难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激动。据重庆老人回忆，当时报童卖报时喊的是："看报看报，中国作为世界四大国，发起组织联合国……"①

中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准备派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构成方面，蒋介石企图独揽中国所有的外交事务，自然不希望其他党派染指联合国大会。因此，他指示宋子文等一手包办中国代表团，暗中选派清一色的国民党人作为会议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

但这时的中国，全民抗战已经历了 7 年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到了几乎与国民党并驾齐驱的地步，备受国内外所瞩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承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最活跃的力量，他们所领导的抗日活动是成功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总人口已达 9000 万以上。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派出的代表团，参与国际事务，其代表应充分体现民意，不能由国民党一党所包揽，否则，解放区 9000 万人的民意就无从表达。但是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根本无意让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代表团。对于国民党的做法，中共、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是不能接受的。为打破国民党的专制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措施，力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联合国代表资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通过国内外政治和舆论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针对 1944 年国共谈判开始以来，国民党一直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中共的民主联合

① 陈敦德：《接触在 1944：美国观察组》，第 332 页。

政府的主张，不予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以合法地位，却整天叫嚷要中共交出军队。因此，与国民党交涉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难于上青天，所以南方局把工作重点转向美国驻华大使、国共矛盾的调停人赫尔利，向他提出了派代表出席会议的要求。就在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消息刚出来时，周恩来就同赫尔利谈及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的组成问题。赫尔利当时不假思索地表示说：中国代表团当然要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①

1945年2月18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说明中国目前没有民主的联合政府，现有的国民政府完全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9000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民党的代表人数应只占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三分之二。国民党代表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愿，否则绝不能代表中国和解决任何问题，鉴于赫尔利即将动身回国述职，周恩来特要求赫尔利将此意见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②

但作为国共矛盾调停人的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带有成见，他对周恩来提出的合理要求根本不予考虑。20日，他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出尔反尔，说旧金山会议"承认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武装、政党，将有毁坏中国统一的可能"，并说，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须由政府及蒋介石选择"③。

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致电南方局，指示南方局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以证明国民党失去民心，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同时向各方面人士大力宣传中共主张，以争取舆论支持④。中共中央在给王若飞的指示中说，"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有利于国内民主，我们应抓住机会争取，但是蒋介石在这时不一定让步。因为，国际条件尚未成熟，国内大后方的民主阵线尚未形成，群众基础还薄弱，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没有组成，他可能拖。谈判也不能速成，只能用公开谈判的形式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目前国内各方面均拥护我党

① 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国观察组》，第33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03页。

③ 陈敦德：《接触在1944：美国观察组》，第333页。

④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3—794页。

的主张，由国、共、民（盟）三方组成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望以我党之主张发动各方面，说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国民公意。对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我党一向全力支持，并拟在大后方成立民主运动统一委员会，你在渝即以共产党的代表资格参加该委员会，以大力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①。

3月5日，周恩来致函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阐明中共主张，据理力争，并要求其将中共的意见转达国民党中央政府。信中说：“关于4月间之旧金山会议，敝党中央坚决认为，如欲使中国代表团真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则代表团的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绝不应单独由国民党政府人员代表出席，美英两国均已宣布其代表团将包括各重要政党代表，而罗斯福总统更声明美国代表中，共和、民主两党人员将各占半数。中国现状既是如此不统一，贵党方面如欲一手垄断此代表团职务，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了分裂的立场。因此，建议政府，此项代表团，除贵党党员外，中共与民主同盟应有必要之人员参加。……此项要求如不能得国民政府之采纳，敝党方面将坚决反对此项分裂之举措，并对贵党所一手包办之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所作之一切言论和行为保留自己的发言权。”②

3月9日，周恩来写信给王世杰，再次声明：因蒋介石3月1日公开谈话，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坚持召开一党控制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我党已无需再起草关于召开政协会议之建议。国民党独占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我党已派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中国代表团，若此建议国民党不接受，我党将反对国民党这种分裂行为，并保留表示一切意见之权利。③

3月9日，周恩来将致王世杰信的内容通知已回到美国的赫尔利，并再次要求其转达罗斯福。赫尔利见中共态度强硬，担心国共就此分裂，慌忙从美国复电周恩来，要求切勿作最后决定，待他来后商谈。④

与此同时，南方局积极开展对各抗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3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76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9页。
③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77—278页。
④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78页。

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扩大谈话会在重庆“特园”举行，传看了周恩来致王世杰、赫尔利的信，并谈论有关问题①。23日，中共参加国共谈判的代表王若飞在重庆良庄沈钧儒寓所会见了民主党派人士，把赫尔利给周恩来的复电告诉大家②。中共的合理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正义呼声，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以蒋介石为首的专制独裁主义者是不会轻易改弦更张的，但也有一些人能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以图促进国内团结。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就很主张中国代表团应有中共代表参加。

南方局关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斗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罗斯福在了解到中国代表团代表的国共之争后，立即给蒋介石发来一份电报，明确提出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除应有国民党代表外，还应延揽其他党派的代表。罗斯福的这一行动对蒋介石最后决定指派一名共产党人参加代表团，是个重要因素。

在选派中共代表人选时，中共方面先提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下令解散后，又提出增加郭沫若。但国民党方面如吴铁城、张群等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说，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具有当代表的资格。顾维钧则极力推荐董必武，说他过去在巴黎时和董曾有一面之缘，觉得董与别人也没有多大不同，他年事虽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在许多国际问题以及苏俄问题上，彼此观点距离不大，等等。

3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人员名单：团长宋子文，副团长顾维钧，成员王宠惠、李璜（青年党代表）、吴贻芳、魏道明、胡适、张君劢（国社党代表）、董必武（中共代表）、胡霖，顾问施肇基③。

中共虽然只有一个名额，但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共都被当做“共匪”，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始终得不到确认，即使是在民族危难的关头，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一手垄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78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79页。

③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飞电：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名单既已宣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转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06页。

断中国的外交事务，就在1945年1月的选派参加世界职工会代表会议的代表过程中，国民政府仍不允许中共派代表参加。事隔两个月，中共却争取到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董必武在美国开展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4月初，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宋子文等先后启程赴美。6日，作为解放区9000多万人民的中共代表董必武离开延安赴重庆。12日，乘飞机经印度赴美。随行人员二人，一为重庆《新华日报》总编章汉夫，一为周恩来的秘书、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陈家康。临行前夕，中国民主同盟为董必武一行举行了送别茶话会。董必武发表演讲说："我相信民主是整个世界的总潮流，民主必须在中国实现，否则世界是不会和平的……"①

在旧金山大会期间，中国国内国共矛盾日益尖锐，但作为中共代表的董必武却尽量做到了尊重、体谅中国代表团其他代表，求同存异，维护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形象，使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代表团引起了各国代表的瞩目。

1945年4月25日，由于解放区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争，董必武作为解放区的唯一代表参加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在旧金山，董必武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解放区的成绩，使华侨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图为董必武与华侨代表在一起

① 《董必武同志由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合众社重庆12日电）》，《解放日报》1945年4月13日第1版。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除参加会议以外，董必武还尽可能多地接触旅美华侨。他走进唐人街的华侨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向侨胞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战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华侨日报》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为题，连载了他的演讲，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董必武主持出版了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共印了5000册，散发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外国记者及美国人士，比较详细地向世人介绍了解放区军民在抗击日军、政权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就。

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后，7月2日，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带随员移住美国最繁华的城市纽约。在那里，为了工作需要，成立了由徐永瑛、唐明照、杨刚、徐明、赖亚力组成的工作小组，广泛接触美国人士。当然，工作的重点是更多地接触旅美侨胞。董必武曾多次到洗衣馆那样身处下层的华侨中去参观访问；还到华美协进会作了演讲；应华侨的请求，利用休息日到侨区为侨胞题词留念。还登门拜访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著名小说家赛珍珠。他还到了华盛顿，在那里拜访了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重庆工作时就与董必武相识的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约翰·卡特·文森特（中文名叫范宣德），听说后也特意赶来拜访。

董必武专程赴纽约雅陀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

董必武广泛接触国际人士，开展国际统战工作

董必武在美国活动了7个多月，广泛接触国际人士、华人华侨，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华人华侨心目中

的地位。美籍华人邝治中在其《纽约唐人街》一书中这样评述：1945 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当时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却不接触唐人街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是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还拒绝接受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时在旧金山）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并到纽约唐人街广泛走访侨胞。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思考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大会，使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政府代表团的成员资格，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实质上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的垄断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国际政治舞台。

第十章　发展人民民主战线，奠定中国政治格局基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围绕建国方针进行的一场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南方局以重庆谈判为契机，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扩大了民主的力量，并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推动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奠定了政治基础。同时，南方局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积极推进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节　以重庆谈判为契机，实现统一战线任务的转变

一、协助毛泽东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胜利而宣告结束。胜利后的中国将何去何从，历史再次让中国人民作出选择。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取得的，苏联、美国、英国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毛泽东同时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①]。只是因为兵力分散，加上内部矛盾，想打内战但一时还打不起来[②]。正如毛泽东分析的一样，国民党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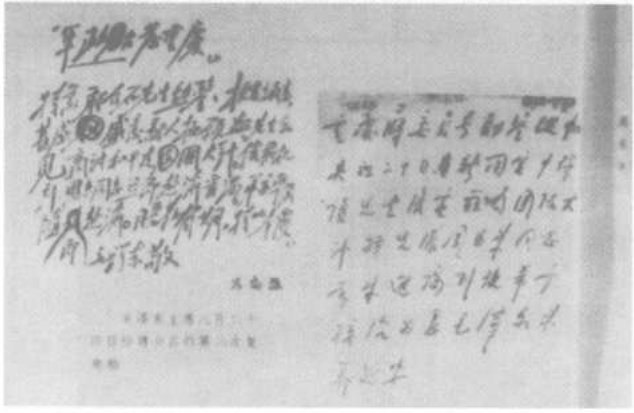
① 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国内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58页。

②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第132页。

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打起了“和平”的幌子。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三次发了“万急”电报，请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借此攻击中共拒绝和平谈判，从而把内战的所有责任都推到中共的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就利用谈判麻痹中共，以赢得部署内战的时间。正如《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所透露的，“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如果共产党来了，“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①]。但是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对国共谈判寄予厚望。针对这种形势，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实现和

蒋主席电邀毛泽东来渝
蒋主席昨再电延安
电邀毛泽东来商大计
蒋主席三电延安
敦促毛泽东来渝

蒋介石为了充分准备内战，欺骗国际舆论，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共，玩弄起了和平谈判的伎俩。从8月14日至23日，他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图为媒体有关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的报道



为了争取战后中国和平民主的光明前途，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图为毛泽东就赴重庆谈判事宜给蒋介石的两次复电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第417、419页。

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①] 8月2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去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南方局充分利用谈判的时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实现了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人民民主战线转变的任务。

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蒋介石的“鸿门宴”。他表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国和蒋介石的阴谋，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们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通知》还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强调：在谈判中，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输了理。有来犯者，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与专程来延安迎接他赴重庆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赫尔利在延安机场合影

①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第2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1154页。

8月28日，毛泽东和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受到重庆市人民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等人的热烈欢迎。国民党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也到机场欢迎。毛泽东向前来欢迎的人群致意，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①

毛泽东的到来，重庆谈判的举行，赋予了南方局新的任务。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谈判期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体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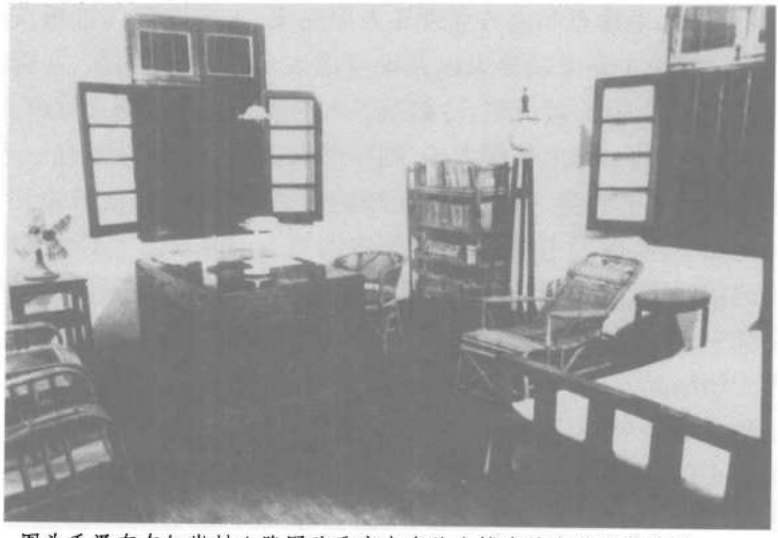
南方局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供了理想的工作、起居环境。蒋介石曾在自己的官邸山洞和黄山分别为毛泽东准备了下榻之处。但毛泽东只在山洞住了三个晚上，至于黄山则根本没去。其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本来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自来重庆已是"弥天大勇诚堪格"②，共产党岂能冒更大风险而让自己的领袖进一步住在蒋介石身边。事实上，还在毛泽东表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的消息刚一传出，延安上下一片担忧，大家表示，要谈判，就请蒋介石到延安来，我们可以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但毛主席不能去重庆。在重庆的共产党的一些老朋友，虽一方面盼望毛泽东能亲自来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是，可是另一方面又打心眼里希望毛泽东最好还是不要来重庆谈判。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鸿门宴，就在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民盟领导人张澜时，张澜告诉毛泽东："这明明是蒋介石的假戏啊"，"蒋介石在设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形势一变，他也喊民主了。"③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最初住在郊外的红岩村，与各界人士往来不太方

①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第2版。

② 柳亚子：《赠毛润之老友》，《新华日报》1945年9月2日第4版。

③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第138页。



图为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内的办公室兼卧室

便，后来张治中主动让出自己的公馆桂园作为毛泽东在市区的办公场所。张治中思想开明，与周恩来相交已久，共产党自然比较放心。这样，桂园就成为了毛泽东白天在城里会客的地方。

毛泽东在重庆总共住了45天，其中41个晚上和一部分白天都是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即南方局驻地红岩嘴13号度过的。还在离开延安前，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就亲自起草了给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电报，对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住宿安排、饮食习惯等做了具体指示[①]。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受到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干部的热烈欢迎。按照与国民党的约定，毛泽东在办事处内的安全由办事处负责。毛泽东一般是早上8点前往桂园，晚上6点左右返回，然后，就在此继续安静、安全、安心地工作到深夜以至凌晨。其间，机要科的工作人员继续把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传到各解放区，传回延安。南方局还经常在红岩小礼堂举办朴素的舞会，只要毛泽东当晚没有安排工作，就请他参加，从而让毛泽东在这种“音乐散步”中继续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10月8日晚，张治中宴请毛泽东。就在宴会进行中，意外地在红岩村附近发生了李少石遇难的事件。当时事情真相未明，许多人都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劝他当晚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616页。

就暂住桂园，而不回红岩，以防万一。但毛泽东镇定自若，仍坚持回红岩休息。他深信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寓所是安全的。

南方局领导人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左右手”和亲密伙伴。重庆谈判期间，有周恩来、王若飞两位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相伴，毛泽东如虎添翼。重庆谈判的主角无疑是毛泽东、蒋介石，但他俩只是就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磋商，大量的、具体的谈判都是在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展开的。还在离开延安前，周恩来就“积极准备文件，下达指示和协调所有事务”①。在谈判期间，除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外，周恩来还大力协助毛泽东处理其他各种重要事情，安排毛泽东与各界人士的会见，陪同毛泽东出访，并亲自为毛泽东起草一些重要的电报和文稿。在南方局驻地的小楼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房间经常是灯火通明。经过43天“剥茧抽丝的研讨”②，“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③，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代表中共方面签字的也是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王若飞。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还继续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商谈，以使《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未予解决的问题能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得到解决。

南方局另一位领导人王若飞，除了参加谈判外，经常与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各种宴会，会见各国使节，了解他们对国共和谈问题的态度。还要宴请、联络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如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向他们报告会谈的经过，并就和平、团结诸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王若飞经常是白天进行谈判，晚上连夜整理材料、准备意见，与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对策。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也费尽了自己的心血，随时随地担负着保卫任务。④ 重庆谈判结束后，王若飞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受到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又飞到重庆，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南方局的“喉舌”——《新华日报》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作了客观的报道和正确的舆论导向。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重庆有些报

①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② 《政府与中共的会谈》，《中央日报》1945年12月12日。
③ 张治中：《七十回忆：我与中共》，《重庆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辑。
④ 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引起了合国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图为《新华日报》刊载的有关社会各界欢迎毛泽东赴重庆的报道

纸马上为其帮腔。如8月22日《大公报》的社论写道：蒋主席电毛先生关于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这一点实不可有分歧。社论还写到，抗战胜利了，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针对此类言论，同日的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反击道，中国是需要团结，但"像目前这样一只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却浮着奸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①。对之前有些报纸所刊登的当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一些谬论，如中国共产党威胁着发动内战，彼等并不愿意合作，它也并非一政党，而为夺取中国政府之阴谋组织，于联合国家的胜利贡献极少，《新华日报》在22日的另一篇社论中也一一进行了驳斥。社论严正指出，我们所认为，斯文颠倒是非，竭尽能事鼓励中国反动派发动内战。24日，《新华日报》刊登读者莫一尘的来信《解决问题的关键》②，来信说，蒋委员长和毛先生共商国是必须有一个条件，即政府应马上进行各种民主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毛先生来也没有用。现在有些报纸非常强调毛先生出来，好像只要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① 这篇社论在接受新闻检查时被国民党当局扣发，于是，《新华日报》便在当天开了天窗，而于次日单页印行，随报附送。

② 《新华日报》1945年8月24日第4版。

这如果不是有意歪曲，就是一种皮毛之见，这里面显然隐藏着一个很大的阴谋。这就使大后方人民，未见其人，已先闻其声。《新华日报》首先做好了清道夫的工作[①]。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的事件，但受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新闻媒体却自始至终对谈判作低调处理，生怕替共产党制造声势。这样，在8月28日下午的九龙机场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外国记者比中国记者多。当晚，国民党《中央日报》总编辑又明确训示其编辑人员：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要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在整个谈判期间，《中央日报》严格遵守这一训示。而与此相反，8月28日这天，天刚蒙蒙亮，《新华日报》报馆的几十个机警的报童就把比往常多几倍的报纸送到广大市民手中。下午，报纸又出号外，不仅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毛泽东来渝的特大喜讯，还刊登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以及"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从而最早把毛泽东赴渝的消息传遍山城的大街小巷。在整个谈判期间，《新华日报》每天都大量报道毛泽东的活动，以至于有一天毛泽东对南方局的王炳南说，告诉报馆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登些人民来信。

为配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新华日报》不仅及时刊登了张澜《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柳亚子《解决国事最后的方案》、章伯钧对时局的谈话以及纽约侨领李国钦给毛泽东的电报，而且还及时刊登了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中国妇女联谊会和昆明教育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中国经济事业协会对时局的"献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时局"告国人书"以及纽约中国留学生和加拿大九团体"主张用民主方法制止内战危机"、"取消一党专政完成民主联合"的电报。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读者向毛泽东致敬、询问谈判进展以及为谈判提出建议的信件，并及时解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注意纠正他们中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对谈判所波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新华日报》更是不时以社论的形式给予正确的评论。如10月2日的社论写道：反民主的统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今天极大多数所希望的统一，是新式的民主的统

① 李重华：《南方局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一，这就是说，全国应该统一实现民主的政治——建立人民的政权，统一实现民主的军事——建立人民军队。有人说，为了建造三层楼，应先把第一层拆掉，这种说法不过是实现反民主的统一。

“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庆谈判，尽管由于国民党毫无诚意，而使国共代表经过艰难谈判所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成为一纸空文，但毕竟“给了公众以一个不负人民期望的回答”①。

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变

在整个重庆谈判过程中，南方局坚持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谈判的过程中，继续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逐渐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现了统一战线任务的转变。南方局以重庆谈判为契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了统一战线新格局，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格局。根据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南方局紧紧抓住了争取中间势力这个关键，因为中国社会结构形如橄榄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②。可以说，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团结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和同志们一道利用各种途径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些工作主要有：

第一，加强与国民党要员的交谈，推进重庆谈判工作的开展。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会见国民党领袖人物和上层人物，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共合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立场和愿望。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会谈就达七八次之多。毛泽东在与各界谈话时特别强调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团结的必要性，主张坚决避免内战和给人民以民主。指出：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毛泽东还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他反复强调，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

① 《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3日。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

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他还指出，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困难，只要大家一致努力，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他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一条心，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和拜访了国民党上层人物于右任、白崇禧、何应钦、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等，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阐明了共产党关于解决国内问题的一贯政治立场，指出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运动的形势，表明共产党对和谈的诚意，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他们也不得不表示要“和平建国”，陈立夫还表示对这次国共谈判要“尽心效劳”。戴季陶也写信给张治中，请他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一行，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我们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①

第二，加强与国民党民主派的接触。

毛泽东等还会见了国民党民主派的著名人物，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在会见宋庆龄时，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精神表示敬意。9月2日，重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在酒会上，毛泽东和冯玉祥初次见面，毛泽东盛赞冯将军的爱国、民主精神，希望他继续同中共合作。冯玉祥将军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好似有说不出的千言万语，谈着，谈着，眼圈红润起来，热泪盈眶。②

第三，加强与民主党派的沟通、交流，达成对民主建国的统一认识。

毛泽东、周恩来等广泛地接触各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多次会见和访晤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王昆仑、蒋匀田、张申府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等问题交换意见，希望他们和共产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民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1945年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民盟主席张澜邀请，去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1941年起成为

① 《张治中回忆录》（下），第7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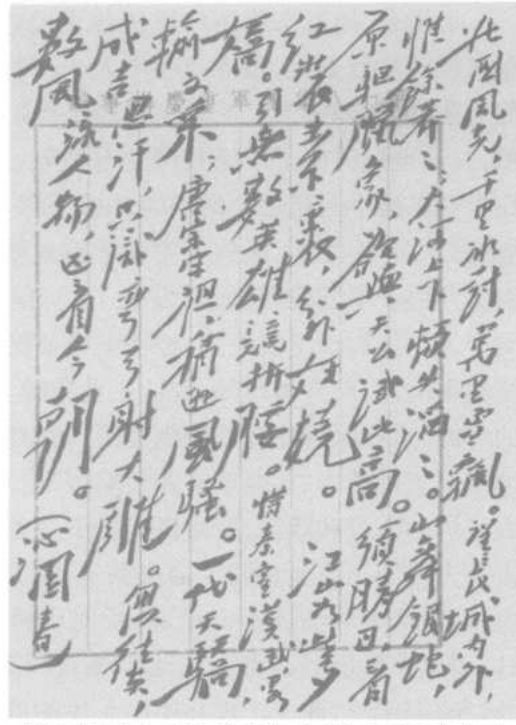
②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第422页。

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毛泽东曾三顾“民主之家”特园，与民主党派共商和平建国大计。图为毛泽东与民主党派交谈的特园客厅

中共对外召开会议、与民主人士会见的场所之一）赴宴。毛泽东在主人的纪念册上题“光明在望”以作留念。他们数次与民盟主要负责人举行会谈。谈话中，民盟领导人向毛泽东表达了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关注，申述了实现和平民主的立场。毛泽东对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斗争表示支持，对民盟提出的关于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建议表示赞赏。在一次长谈中，毛泽东首先向张澜介绍了和谈情况，并指出目前关键仍在人民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问题上。蒋介石正在美国支持下，名为运兵接收，实则准备内战。张澜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给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接着，张澜建议，将你们两党已谈一致的，应当公之于众，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承认。毛泽东欣然采纳，并提议采取由他给两党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张澜

的文章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

毛泽东等还邀请民主科学座谈会负责人许德珩会谈，鼓励他们成立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毛泽东的谈话使许德珩等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们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光荣诞生。毛泽东等还宴请了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并和国家社会党负责人蒋匀田等会晤，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在会晤柳亚子时，应他的请求，把他在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他，从此这首气势磅礴的不朽诗篇立即传遍中外。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应老友柳亚子先生之请，录词作《沁园春·雪》赠之。图为该词手迹

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和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看望了居正、柳亚子、张伯苓等。与柳亚子住同院的南开中学教师卢延英一向崇敬毛泽东，他拿来自己珍贵的纪念册，请柳亚子拜请毛泽东等题词。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当场欣然在卢延英的纪念册上题词："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题词："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题词："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这些表达我党和谈的真诚愿望，反映全国人民一致呼声的题词，使柳亚子等人受到深刻教育，柳亚子看后也题诗一首赞道："兰玉庭阶芽一枝，英雄崇拜何疑。止看三杰留鸿爪，更遭翁补小诗。"卢延英更是激动万分。①

① 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第179页。

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广泛地接见民族工商业人士。9月16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到会者有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等人。毛泽东赞扬了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并向他们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经济的政策和应有的态度，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周恩来在应邀出席的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国民党在经济上管制得多，统制得太过分，弄得市场紊乱，工业凋敝。他强调今后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讲演强调必须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同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经济的方针和政策，着重讲了发展资本、税收和劳资等问题。周恩来的讲演为民族工商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对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官僚资本具有深远的影响。9月12日，周恩来致信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在邹韬奋的笔下，“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①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和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接触中，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介绍了会谈情况，表达了中共对和平谈判的诚意，阐述了各党派加强团结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高了他们对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政策的认识，推动了他们积极参加和平民主运动，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第四，加强与国外记者和各国使节的来往，寻求实现和平民主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国驻华使节和有关团体代表，希望他们为实现中国战后的和平民主作出贡献。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往访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19页。

国驻华大使贝志高，旋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出席欧德伦大使举行的招待茶会。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大使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等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感谢各国友好对解放区和中国抗战的援助。宋庆龄、薛穆、艾德敷相继在会上讲话。

毛澤東周恩來同志等
昨訪問英法大使
並赴加拿大大使茶會
暢談均甚融洽
毛澤東周恩來同志
招待各國援華團體
感謝對邊區和解放區的援助
孫院長昨晚宴毛澤東等同志

《新华日报》刊载有关毛泽东、周恩来访问友好国家驻华大使和招待各援华团体，感谢他们对中国抗战和解放区援助的报道

9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合众社、路透社记者。毛泽东说："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我党希望谈判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我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9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于红岩住地接见在美国援华第14航空队总部服役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3个美国士兵，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亲切交谈。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并阐明了中共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9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还会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第619页。

毛泽东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接见并宴请美国援华第14航空队总部的3位普通士兵，并与他们合影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重庆与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外国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所做的大量统战工作，揭露了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引导人们认识蒋介石交替使用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手策略，看清他所玩弄的政治骗局，了解蒋介石破坏重庆谈判顺利进行、破坏国内和平实现的真相。从而教育和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推动着重庆谈判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使国民党更加孤立，不得人心，陷入了政治上的极大被动地位，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①

重庆谈判和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使人们耳闻目睹了中共代表抵渝后的一言一行，逐渐认识了中共的立场，给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使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与国民党统治区各党派、各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倾听他们的意见，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民主主张和真诚愿望，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大计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以及在政权和军权问题上的严正立场，使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士和外国友人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把统一战线工作推向了前所未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8页。

的广度和深度。许多有识之士从毛泽东那里了解了中共追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后，纷纷同情和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反蒋统一战线。这就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开拓了统一战线工作新格局，为新中国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①

第二节 与民主党派精诚合作，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和维护政协决议

一、争取政协会议召开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国内民主建国的氛围极为浓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推动或帮助各种民主力量，组成新的党派，并与各民主党派一道，为争取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努力。继中国民主同盟之后，在抗战胜利前后，其他民主党派纷纷成立。1945 年 10 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12 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12 月 30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1946 年 4 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成立；1946 年 5 月，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这些民主党派有自己的纲领，基本主张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要求和平民主。这些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基本一致，这就成为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民主党派的成立，使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不同于国民党、共产党的第三种势力，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有一定影响。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从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点出发，团结合作，努力促成政协会议召开。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重庆谈判）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

① 陈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功绩探析》，《党的文献》2003 年第 3 期。

大努力”。表示中共要与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①。民主党派对《双十协定》的签订感到十分欣慰，10月16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声称，这次国共谈判决定由政府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与民盟一贯的主张正相符合，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为应付，并希望通过党派间的政治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可是，蒋介石并不想履行诺言。《双十协定》墨迹未干，他就亲手签发了《剿匪密令》。据统计，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此外，以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两个军7万余人，由美国军舰运送，于10月至11月到达秦皇岛，在攻占山海关后进入辽西，企图在苏军撤出后全部接管东北，在战略上对关内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②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坚决进行自卫战争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③。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和评论，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民主实践社、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反内战同盟和20多家杂志社，纷纷发表宣言、评论，呼吁和平、制止内战、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月30日，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致函国共会谈代表，要求立即停止冲突，速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反对内战谈话。11月9日，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王若飞邀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商谈动员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11月12日，中国第三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用罢工、罢课、罢市及拒绝纳税的行动来制止内战，同时严正抗议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对于民盟及其代表人士的反内战活动，中共都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和支持。12月27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处下，国共谈判恢复，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交书面建议，要求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以利于政协会议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115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8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0页。

举行。28日，周恩来、董必武复信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对他们组织反对内战联合会，主持正义、呼吁和平、促进政治协商的行动表示“实深感佩”，并说明已向国民党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和平协商解决一切争论。29日，周恩来、董必武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分别宴请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史良、章伯钧等人，进一步沟通对政协会议的看法。30日，民盟领袖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要求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31日，周恩来即给张澜复信，对所提建议表示完全同意。

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中共与民盟的关系进一步加深。1945年10月19日，南方局王若飞、徐冰与民盟代表邓初民会谈，决定互相交换情报和资料。双方协定民主同盟今后收得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及有关文化、教育、农民、工运等资料，一律另行抄送一份至《新华日报》资料室，同时，《新华日报》资料室每周亦送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等资料给民主同盟盟刊民主周刊社。民主同盟的特殊文件及重要宣传品，亦由新华印刷所义务承印。11月，中共代表与民盟代表又作了进一步谈判，并签订了合作协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新中国，决定携手合作，互相支持。双方同意遵守以下各条约定：（一）双方不得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互相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二）嗣后无论任何会议，凡中国共产党有所主张，而不违背民主同盟原则者，民主同盟有支持之义务；（三）民主同盟各分子不受共产党主张之任何拘束，唯遇有与共产党主张完全相左者，可不公开发表；（四）民主同盟在各解放区可设立支部，共产党承认协助，并与共产党地方党部，交换情报。这些合作协议表明，民盟虽然标榜自己的第三方面立场，但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共同斗争，已经使他们的政治天平实际上向共产党方面倾斜。

至于国外，美国反对中国内战。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获致中国之统一”①。同日，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启程赴华“调停”内战。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44页。

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①] 12 月 27 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②]

由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南方局的坚决斗争和民主党派的强烈呼吁，再加上国外的压力，国民党方面被迫履行协议，准备举行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会议）。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发布停战令，为各党派的政治协商提供了良好的气氛。

二、力促政协会议成功

为了使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能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中共在会前做了充分准备。1945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即着手邀集各党派无党派及会外活动分子准备政协提案，研究共同纲领及宪法草案。12 月 9 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令其转告民盟，中共主张通过民主途径解决问题，请他们也在纲领、联合政府宪草等方面做些准备。12 月 16 日，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人组成的中共政协代表团抵达重庆后，即通过中外记者招待会和《新华日报》，向政协会议提出停止内战，制定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改组政府，实施民主政治等意见。并指出，政协会议的最大使命，就是要找出一条把内战与独裁变为和平与民主的可行道路。中共政协代表团还宴请会晤了民盟政协代表及在渝常委张澜、梁漱溟、张东荪，青年党曾琦、救国会沈钧儒、第三党章伯钧等人，就政协会议问题交换意见。在多次磋商的基础上，中共与民盟进一步订立了关于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的"君子协定"。中共与民盟还决定邀请马寅初、邓初民、史良、杜斌丞、陶行知、章乃器、周谷城、彭一湖等 34 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专家组成政协代表团、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的政协代表制定提案提供咨询。民盟留渝中央执行委员还召开座谈会，为民盟代表团参加政协会议确定了与中共主张基本一致的方针。所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9 页。

② 《新华日报》1945 年 12 月 30 日第 3 版。

有这些举措表明中共与民盟已经结成政治合作的联盟。

其他的民主党派也向政协会议提出希望和建议。1946 年 1 月 8 日，民主建国会举办了招待政协会议代表的欢迎会，并提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修改国民大会（简称国大）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重选国大代表，并重新起草宪法，商定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的临时宪法。民建表示不但要密切注意政协会议，而要用全力促其成功。《新华日报》登载了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的意见。中共代表董必武认为民主建国会对政协会议的初步意见与中共所提的意见大体相同。

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历时 22 天，出席会议的代表 38 人，其中国民党 8 人，共产党 7 人，民主同盟 9 人，青年党 5 人，无党派社会贤达 9 人。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政协会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开幕词，提出了这次会议“要真诚坦白，树民主楷模”；“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还宣布了国民政府保证人民权利的四项措施，即“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1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合影。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博古

位”、“普选”、“释放政治犯”[①]。周恩来也致词，明确提出了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指出：“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并此过渡期中，我们提议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之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②]沈钧儒代张澜宣读了民盟的致词，指出：“在座全体会员，尽管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我们的目的，我们求国内的和平，求政治的民主，这目的都是相同的。”[③]政协会议一开始就确定了协商的范围，一是和平建国方案，二是国民大会召开有关事项。根据政协的复杂情况，中共代表团坚持的方针和态度是：促进国民态度有所转变，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揭露与孤立国民党右派，力争通过有利于人民的协议或决定。

图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致词

在讨论怎样来改组政府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既有改组政府的空名，又能保持个人的独裁的实质。他派王世杰参加改组政府组，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用扩大两字，避免用改组两字，而所谓扩大的机构是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第2版。
②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第2版。
③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第3版。

指当时蒋介石政府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部门。蒋介石想在保留一党专制的前提下，把各党派骗到国民政府委员会，就算完成了举国一致的政府。对此，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民盟等代表一起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政府的个人专制独裁，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要把国府委员会变成一个实权机构。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施政纲领以及重要人事安排等都要通过这个委员会才能生效。①

关于国府委员的名额分配，国民党提出在原有36名的基础上再增加12名，共48名，国民党占总额的3/4，中共与其他党派只有12名，占1/4。按此名额分配，国民党可以通过任何提案。中共和民盟等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主张，一致认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必须占1/3，并要求提案表决时需2/3国府委员赞成才能通过，以此限制国民党。在名额限定分配上，又经过多次协商，确定国府委员为40名，国民党占20名。其余20名，中共提出要10名，民盟提出要6名，青年党提出民盟要多少它就要多少。这就超出了20名的总额。对此，国民党提出“八、四、四”的方案，即中共8名，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4名。这实际上是国民党埋下的一个“伏笔”，因为在国府委员会协议程序上中共和民盟一致争取的规定是：讨论一般问题时须半数通过，讨论施政纲领、用人、行政等重大问题则需2/3方能通过。这样，1/3的否决权就很重要。而按国民党的方案，中共和民盟加在一起只有12名，对任何议案均不成否决。为了表示诚意，中共再一次让步，提出由10名减到9名，民盟由6名减到5名。青年党又提出与民盟一样也要5名。为了避免因青年党的捣乱而使代表的产生受阻，同时为了中共和民盟的团结，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对民盟主席张澜说：“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在14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我们就8；你们要7，我们双方各半；你们若要8，我们就6。你们大胆提出，丝毫不必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一席话使在座的民盟领导人深受感动，最后民盟确定国府委员为7名。两家商量定后，中共和民盟采取一致行动，以表示双方坚定的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67页。

合作。①

在政协会议上，斗争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二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政治民主化包括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施政纲领等三个具体问题。国民大会是当时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问题。国民党坚持将10年前选好的1200名代表，除死亡、在抗日战争中附逆者外一律有效。由这些代表来通过宪法、实行宪政。这些人全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国民党在执行"党外无党"的政策，其他党派处于非法地位，无法参加竞选的年代产生的。现在再拿出这些人当代表，明显地存在问题。因此，国民党的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反对，连被国民党操纵的青年党也不同意，因为当年他们也没有参加竞选的合法权利。但国民党顽固地坚持既定方案，这个问题几乎陷入僵局。最后，周恩来亲自与民盟等各党派商量：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大前提，向国民党再让一步，承认国民党原有1200名代表。此外另加党派和社会贤达700名代表，并增加台湾和东北的代表150名，总共2050名。但坚持宪法的通过，须经过四分之三的同意，并且坚持共产党同民盟两方共同的代表席位占代表席位总数1/4强，以防蒋介石把国大变成他的表决机器，任意通过一部个人专制独裁的宪法。当时分给民盟的代表名额为120名，周恩来向民盟表示，若民盟不够分配，中共可以在解放区代表名额中予以补充调剂。总之两者相加的代表名额须达到一个否决权所需数字。

在宪法草案问题上，国民党企图以保护其专制统治的《五五宪草》，经过形式上的修改，作为宪政时期的根本大法。这部《五五宪草》只规定设置一个庞大的国民大会来行使创议、复决、选举和罢免四项直接的民权。国家既没有行使主权的议会，政府也不向议会负责，其中心是中央集权和总统制，总统有绝对权力，对司法院有任免权。这样的制度最适合个人独裁。中共和民盟等坚决反对这一提案，认为《五五宪草》规定的总统权力太大，大权独落于元首一身，容易流于个人专制之弊。民盟主张仿效欧美国家，实行国会制、内阁制和地方自治。这一方案试图利用《五五宪草》的形式，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以加强立法院的权力。中共支持这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68页。

一方案。因为在当时，首要的是否定国民党一党专制，限制个人独裁，这样有利于民主，不利于蒋介石一党专政，也有利于将来新民主主义的实现。经过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斗争，国民党最后被迫同意组成新的宪草委员会，审议修改《五五宪草》，并采取国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体以及地方自治的原则。

在施政纲领问题上，国共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详细方案。国民党和青年党的代表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为施政纲领的蓝本，反对反映人民民主要求的共同纲领。中共代表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民盟反对国民党的主张支持中共意见，主张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依据，同时参考各党派各界人士的意见。经过讨论，特别是中共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原则对纲领草案作了修改，会议基本接受了中共的和平建国纲领。中共还同意提出“遵奉三民主义为国之最高指挥”以及“在蒋主席领导下”等字句。中共这种大公无私的让步精神使许多中间党派为之感动。

图为中共代表团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军队国家化问题是会议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主张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即：你先交出军队，我给你一点民主。中共则坚持实行政治民主化是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对此，国共

两党的争论十分激烈。民盟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共产党在军事上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些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教育同盟者，中共一方面与民盟说明问题的要害，一方面做了让步。周恩来最后提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可以平行前进，归于一途，并指出军队也要民主化。同时，周恩来也批评了青年党的代表坚持必须军队国家化的错误主张。这样有原则的让步和坚持又团结又批评的态度，得到了民盟和其他党派的赞同。①

在政协会议复杂的斗争中，以南方局为主体的中共代表团为了团结民主党派，在不失掉原则的情况下，向朋友作必要的让步，扩大了统一战线。会议在讨论和通过的其他几个决议案中都体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共产党的真心诚意得到了民主党派的赞许。双方的真心诚意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合作的基础。

1946 年 1 月 31 日，政协会议结束。通过了五项议案，即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决议案。从这些议案来看，这次政协会议的确有很大成就，“得到了历史性与积极性的初步收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束一党政治，扩大国民政府基础，使各党派及无党派社会贤达，均有机会参加，并提高国府委员会的职权，包括决策权与用人权在内，使它成为最高国务机关”②。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是与会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努力，特别是各民主党派据理力争、同时又作重大让步的结果”③。政协会议的议案公开地否定了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内战政策，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这些决议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如果这些方案真的付诸实施，国内和平即可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即可打破；如果国民党不履行或撕毁政协决议，那么，它在政治上就输了理，广大人民群众就会看清它蓄意发动内战，坚持独裁的真面目。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指出：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 69—70 页。

② 《和平建国的起点》，《新华日报》社论，1946 年 2 月 1 日第 2 版。

③ 《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获重大成果》，《解放日报》1946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成果。""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了国内和平，使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向合法化。"因此，"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①。

三、维护政协决议

政协会议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有利于人民，反映了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愿望。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反对政协决议，会后导演了一系列破坏政协决议的丑剧。

政协会议最后一天，即1946年1月31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常委举行会议，反对政协的五项决议。政协闭幕后，国民党连续制造一系列破坏政协决议的流血事件，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为坚持政协路线，反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进行了坚决斗争。

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案公诸于世后，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家都以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将会从此开始，纷纷表示将为建设新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对会议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政协会议闭幕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谈话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明确指出各党派当前任务，最重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②

周恩来在庆祝政协会议成功联欢晚会上说把写在字面上的文字要去做，去执行，去遵守诺言。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政协决议而努力。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发给各中央局、各区委、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的指示电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重大成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第2版。

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要求全党全军要“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斗争”，以保证中国走上民主化的前途。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坚决斗争所促成，另一方面在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多个问题方面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曾对美国记者概括了这些让步。他说政协通过的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出入颇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放弃我们边区经验提的三三制，即最大党不得超过1/3的原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占1/2，在行政院占大多数；在民主宪革问题上，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在国大问题上，作了大让步，容许始终为人民反对的10年前的代表继续当任。为何作这些让步，中共中央解释：“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这种让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①同时，也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有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②“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时，实行经济复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和平及最后完成民主具有信念”③。周恩来指示：“这次会议得到很大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走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开始，值得我们庆幸”。表示中共将为履行政协决议，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④。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和平建国的起点》、《中国历史的新方向》两篇社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延安两万余人热烈聚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民盟及各民主团体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赞扬政协会议的成就。重庆、成都、北平、广州的广大学生、各社会团体以及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侨相继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他们都以为从此中国踏上了和平民主的道路

① 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8页。

②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19页。

③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第2版。

④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第2版。

和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时期。

2月2日，民建等23个团体组成的“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联合发起组织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由章乃器等人负责。决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推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李德全、马寅初、徐崇林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选举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还决定邀请政协代表周恩来、邵力子、孙科、沈钧儒、张君劢、李烛尘等12人到会演说，并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名义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庆祝大会的目的是希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广泛团结，作为党派团结的基石，共同争取决议的彻底实现！

与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热烈拥护政协决议，并积极准备履行政协决议相反，国民党当局一开始便反对政协决议。早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顽固派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国民党逼于形势压力勉强同意了政协决议。但一方面组织军警特务破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活动，另一方面于3月1日至17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全面推翻政协决议的反动决议。[①] 就在此时，陈立夫召集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重庆市党部主任方治赓等面授机宜。重庆市党部于2月8日和9日连续开会，反对政协决议，决定“遏止”庆祝大会，策划捣乱会场。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6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图为特务破坏集会后占领会场的情形

2月10日，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正式举行。但此时主席台上下及周围已被不明所属团体之数百人占领，刘野樵以总主席身份

① 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五卷，第2778页。

宣布开会。章乃器以主席团第一发言人资格上前制止，首先被打。李公朴拟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被从台上打到台下，头部被铁器打破。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均被殴打。会上被殴打重伤的就有60余人。

较场口事件后，中共和民主党派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制造血案的真相。提出严惩主犯，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人民自由等7项要求。

2月20日，国民党又在北平策动了所谓还乡请愿团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事件。接着，又在全国范围内，以苏联红军没有从东北撤退，苏联企图占领东北等为借口，一手导演了反苏反共的游行。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营业部，打伤两报的工作人员。2月23日，民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要求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日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使人权获有保障。

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部分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雇一批暴徒混在其中。游行队伍行至民生路时，暴徒趁势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图为正在行进中的游行队伍

3月1日，西安国民党特务捣毁民盟中常委杜斌丞为发行人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并继而查封该报。该报律师王任又被保安司令部杀害。同时，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

李敷仁亦被特务劫持至咸阳，以绳勒颈，并用枪击（未死获救）。为此，民盟中央向国民党严正提出：必须彻底追究责任，要求惩办祸首。

针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行径，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3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斗争”①。第三党于3月17日至23日在香港出版的《人民报》上连续发表5篇社论，抨击国民党推翻政协决议的行径。3月18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致函国民党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张群，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动摇了政协五项决议。当晚，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谴责国民党二中全会背信弃义，作出许多违反政协决议的决议。指出政协决议是民主契约，决不容许动摇和修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表现，就是想欺骗人民。希望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起来，监督政协决议的全部实现。指出政协决议“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需实现，反对修改。”②同日，周恩来向中外记者发表了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谈话，指出“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他强调“谁要破坏政协决议，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③。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社论，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关于宪法问题的决议“就是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独裁制的国家”。民主党派也与中共采取团结合作的立场，严厉斥责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径。3月19日，重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集会，欢迎李济深、叶挺、廖承志等，到会人士100余人，王若飞出席会议。李济深在会上发表谈话说：要扩大民主力量，应具备有斗争之组织。与会人士都表赞同，当即商讨决定，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推出代表组成“民主统一阵线大同盟”，内分政治、文化两大部门，政治部由各党派派出代表负责，文化部由郭沫若、沈雁冰（茅

①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第2版。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4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第231—232页。

盾)、四汉负责。他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织的活动,扩大民主力量,发展民主运动,进行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斗争。3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公开违反了政协决议中的各项民主原则,企图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21日,张澜又向记者发表谈话,宣布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以抗议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方局的领导和支持下,各民主党派紧紧团结在一起,为维护政协决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同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到了1946年5月下旬,在美国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先后抢占东北民主联军据守的新民、辽阳、抚顺、营口、鞍山、四平、长春、吉林等地。到6月底,蒋介石已将他大约200万正规军的60%调到内战前线。①

中国共产党在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紧解放区人民军队建设,做迎击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充分准备。

第三节　争取和平民主,开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一、广泛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协会议又通过了五项决议,但蒋介石根本不准备遵守决议的规定。当国民党认为准备就绪,就发动了全面内战。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南方局推动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群众运动,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开拓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从抗战胜利至1946年5月的这一段时间里,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总方针和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新部署,积极采取措施,恢复、重建或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特别是在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运动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

① 胡之信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21—1987)》,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页。

1946年2月7日，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应重庆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会之请，至该校讲演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民主问题，受到重庆师生的欢迎①。

1946年2月7日，周恩来应邀到重庆大学作《当前形势和中国民主问题》的报告。图为周恩来步向会场的情形

1946年5月24日，重庆各界90人发表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国民党大肆运兵，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同年6月6日，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揭露蒋介石的内战罪行，并通过上海人民联合会发表反内战宣言，还联合其他民主人士164人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6月19日，民主建国会发表《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在上海各报刊登。指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排斥反对党不能依恃屠杀，痛下决心奉协商为至高无尚的准则。这些主张与活动，团结和争取了中间人士，扩大了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广西活动的各个系统的中共组织把开展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各地党组织利用各种条件、关系创办刊物，占领舆论阵地。中共桂林市组织和民盟广西支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办了《民主》（桂林版）、《桂林工商报》、《少年生活》、《新道理》（复刊）等报刊。中共在桂北的组织创办了《民主战线》、《青年之声》、《时代与教育》。在宜山活动的中共党员创办了《光报》（后改称《联合日报》）。在大中学校工作、求学的地下党员，组织进步学生、教师出版校刊、系刊、班刊、墙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大学的《西大新闻》、《学生新闻》，桂林师范学院的《生活导报》、“民主走廊”（壁报联刊）等。在国民党主办的《广西日报》（桂林版、柳州版）、横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373页。

县《晓报》、《融县日报》等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则利用自己的职权，团结、教育社内的民主进步人士，以巧妙的方式进行和平民主宣传。各地中共组织都通过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以国共《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为依据，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刊载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进步言论，报道各地的爱国学生运动，报道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及其争取政治、经济合法权益的斗争，报道世界各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大势，揭露、抨击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卖国反动政策，唤醒群众的觉悟。在教育、文化、艺术部门工作的中共党员，还通过兴办书店，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华商报》、《正报》、《文汇报》等报刊，传播民主进步思想；举办群众性的歌咏、戏剧活动，演出（演唱）《日出》、《凯旋》、《雷雨》、《兄妹开荒》、《茶馆小调》、《古怪歌》、《五块钱》、《万元钞》、《民主是那样》、《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戏剧、歌曲，发挥革命文艺团结和鼓舞人民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到内战全面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必须为实现这一任务而斗争。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学生开展民主运动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中心任务的重大实践活动。这个阶段，南方局领导的学生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是著名的一二·一昆明学生运动和六二三上海学生大联合，反对内战大示威。

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27日烈士殡葬为止，前后坚持4个月之久。在这一运动中，许多重大行动都是经过西南联大的党组织认真分析研究或中共云南省工委和南方局的明确指示和具体部署进行的。国共重庆谈判后，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继续向解放区进攻。1945年11月5日，中共发言人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1月19日，在南方局领导下，重庆各党派各界群众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成立重庆各界人民反内战联合会。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号召全国人民响应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号召，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指示，决定以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为核心，通过昆明学联、各校学生会，首先在广大学生和文化界开展反内战、争

民主的活动。11 月 24 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联合通知，25 日在云南大学召开昆明各界青年“反内战时事晚会”，呼吁和平。但 24 日晚，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驻昆明的国民党中央第 5 军军长邱清泉宣布不经批准，一律不许开会，并警告云南大学，不许把礼堂借给学生使用。中共云南省工委研究决定，不能退却，把会改在联大校园内召开。同时，省工委对 25 日的时事晚会作了周密的布置，预计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尽管会场上特务用各种办法进行捣乱，但会议秩序仍然良好。25 日晚，昆明学生 6000 多人参加了时事晚会，闻一多、吴晗、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伍启元等教授不仅参加了晚会，有的还发表了演讲，主题为如何制止内战，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会议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破坏，国民党宣传机构还对广大学生的爱国行为进行诬蔑。这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等 31 所学校先后举行罢课，反内战。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下，昆明学联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 5 校代表为罢联常委，出版《罢委会通讯》作为机关刊物，通过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提出两类共 8 条要求，鲜明地表达了昆明大中学生的政治主张，要求蒋介石集团立即制止内战，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昆明学生总罢课，使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惊慌，他们先是利用三青团破坏罢课，阴谋失败后，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27 日，李宗黄召集各大中学校负责人及宪警开会，责令各校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令各校 28 日复课。同时，组织“反罢课委员会”，由邱清泉任总指挥，统一指

图为参加总罢课的学生游行队伍

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在李宗黄的指使下，遍街殴打爱国学生，闯入学校撕毁壁报，捣毁校具，强迫学生复课。12月1日凌晨，中共云南省工委从内部情报获悉反动派准备扩大镇压后，当即由罢联通知各校停止街头活动，学生不要个别外出。然而，上午10时左右，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武装镇压罢课师生，致使学生潘琰（中共党员）、李鲁连、张华昌和教师于再（中共党员）遇难，数十人被炸伤、打伤，其中重伤2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认为形势十分有利，决定坚持与扩大斗争，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发展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以壮大民主力量。在具体行动上，党组织要求扩大运动的主力军（学生及一部分教职员），争取后备军（农民及公务人员、职业青年、工人、小商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团结一切力量，向反动派进攻。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罢联每天组织100多个宣传队，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12月2日，联大举行教授会，一致表示要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4日，全市大中学校教师400余人联合发表《罢课宣言》。12月6日，罢联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组织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头、下农村、进工厂，说明事实真相，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重大意义，口诛笔伐国民党反动派，控诉国民党当局使用暴力攻打学府、残害师生的罪行，争取各阶层人民的理解、同情与支持，呼吁全国同胞支援。

图为昆明学生、市民为一二·一死难烈士举行出殡仪式的情形

昆明学生的正义行动，首先在昆明及全省各地激起强烈反响。大中学校教师、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昆明市30所大中学校教师近300人发表

《罢教宣言》，表示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以示抗议。《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
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
致電昆明學生誓作後盾
中國婦女聯誼會和東北文化協會
分函捐款昆明同學表示關切慰問
慰問昆明學生

图为《新华日报》刊载的陪都各界声援昆明学生运动的报道

在昆明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以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中共各地组织对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在重庆的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最先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刊登了一二·一惨案真相的报道。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中国青年的光荣》等数篇社论与短评，对昆明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极大的崇敬，对他们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社论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对运动的开展给予了及时的指导。解放区各地群众也纷纷集会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大会上，与会人士2000多人向昆明四烈士致哀，给昆明师生发出慰问电。周恩来应邀到会作报告，对一二·一运动予以很高的评价，陆定一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内战，反对武装干涉》的演讲。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昆明惨案是当前全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昆明学生与教授

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四川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精神，把正在高涨的群众斗争与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受难师生结合起来，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面目，把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12月3日，成都各大学的31个学生团体和11个文化团体在《华西晚报》上联合发表《慰问昆明学生信》。重庆的学生、青年纷纷投书《新华日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声援昆明学生的爱国行动。成都各大中学学生站在斗争前列，以各种形式揭露事件真相，抗议暴行，发出“严惩凶手，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的吼声。6日，成渝两地大中学校学生分别成立一二·一惨案后援会。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东北文化协会以及在渝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8人分别致电声援昆明惨案受难师生，并汇去10万元作为死难学生的安葬费和受伤学生的医疗费。8日下午，四川大学数百名师生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满怀悲愤地在校内举行昆明殉难同学追悼会。9日，成都大中学生5000余人在华西坝召开追悼昆明死难烈士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发出声援通电。重庆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1万人在长安寺集会，纪念一·二·九10周年，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学生。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罗隆基、史良、章乃器等与会致祭。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唤起广大群众反内战求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爱国热情，使爱国民主运动在四川形成高潮，使坚持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空前孤立，进一步在政治上陷入更加不利的困境。

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对昆明学生发出声援电，还发动师生捐款支援。南宁、梧州、陆川、博白、平乐、昭平、罗城、忻城等市、县的学生也分别举行集会、座谈会，出版壁报，声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罪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

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许广平、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都参加了声讨国民党镇压学生的罪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

这一运动从学生发展到工人，从城市扩大到乡镇。重庆、遵义、成都、

上海等地都为死难的爱国学生举行追悼会。这次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南京、南昌、杭州、福州、天津、桂林等地也举行了群众性的声援活动。从此，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压迫，要求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

这次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威力。它不仅团结、教育、推动了中间状态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进而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而且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打击并开始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一二·一运动后，中央日报社社长钱昌顾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已丧失人心。同时，这次斗争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为解放战争时期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在这期间，上海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大示威。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拥护。国民党为了坚持法西斯专政，不顾人民的反对，不断地挑起内战，仅1946年1月至6月，国民党军队就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达4365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①]，内战危机迫在眉睫。上海学生、工人、民主党派以及市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1946年5月5日，民盟、民进、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等50多个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发表宣言，主张立即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6月中下旬，正当全面内战大有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为了挽救和平，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阎宝航等11人（学生2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但是当代表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60多岁的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和其他代表以及《新民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高集、民盟的叶笃义等均被打成重伤。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及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等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下册），第893页。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亲往医院看望被打伤的代表。图为周恩来在马叙伦的病床前

闻讯后，当夜赶赴医院问候受伤人员。周恩来还向学生代表陈震中介绍了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阴谋发动内战等情况，并表达了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进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亲切关怀。6月24日，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并以备忘录分致马歇尔和徐永昌，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的暴行，提出惩办祸首等6项善后办法。

这一事件更进一步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实质，提高了觉悟。此后，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革命方面，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美反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二、挫败国民党包揽“国大”阴谋

蒋介石之所以“热衷”于和谈，是因为谈判是他内战的掩护，同时又以和谈为借口，来换取更多的美援。因为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华政策的声明中提出：当中国向和平及团结前进之际，美国则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其国，改进其农业及工业经济，并建立一军事组织。美国亦准备在合理条件下对中国所提出信用借款的贷款之请求予以善意的考虑，俾能有助于全中国健全之经济及中美间健全的贸易关系之发展。[①] 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予以揭露。1946年4月1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他说，中共在同国民党谈判以来，屡次让步，委曲求全；国民党得寸进尺，并无团结诚意，何应钦、陈诚等暗中备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46页。

战，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向解放区推进，意在“剿共”，破坏和平，造成国内战争。战祸罪责归咎于国民党。他代表中共郑重声明：“中共至万不得已时，即当迫应战。”①4月4日，周恩来在重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对时局问题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共一向主张全部实施政协决议，坚决反对一切修改或推翻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问题。而国民党想推翻政协决议，极力破坏停战、恢复交通与整军复员的方案，目的是挑起内战。并表示，这些问题未解决之前，决不参加政府。要求外国朋友在中国依然是不和平、不民主、不安定和未组成举国一致的政府的情况下，不要随便帮助国民党政府，以增加中国的不安，而应帮助中国结束一党训政，取消独裁，坚持政协、停战、整军等决议，以助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安定与统一。② 对于中共的态度，蒋介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当他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3日，国民党在不与中共及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商量的情况下，就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单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和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士都把这看成是国民党要关闭和谈大门的一个信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立即发表声明：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国民党）任何片面决定之约束，并仍坚持速开政协综合小组商讨国大及有关问题之主张。贵方如仍加以拒绝，并因此而引起纠纷，其责任应由贵方负之③。民盟也就这件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④

为了诱使各党派参加国民大会，蒋介石又作出和谈的姿态，策动第三方面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节。10月上旬，民盟和青年党的代表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前往上海，劝周恩来返回南京。马歇尔也秘密到沪，劝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会谈。但这时，国民党正在进攻晋察冀解放区。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晤时提出，只要国民党停止进攻，中共即同意回南京恢复谈判。马歇尔无法替蒋介石作出答复，结果不了了之。第三方面人士这时对时局深为忧虑，各自怀有不同的目的和想法。青年党希望和谈达成某

①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141页。
②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142页。
③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21页。
④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0页。

些协议，以利于该党在召开国大占有的几个席位做做官；民盟则希望国共双方均作些让步，避免内战扩大，达成国内和平。也有人担心中共打不赢国民党。10月9日，第三方面政协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在上海交通银行集会，商谈时局，要作最后努力，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后，全体入京①。他们对孙科提出政府军队应无限期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按政协决议和程序召开会议，解决问题。他们在访晤周恩来时，希望他回南京。周恩来表示，他们对政府所提的建议正是中共的一贯主张，愿与各位代表共同努力。②10月11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上海分会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当前的症结是停战问题，内战的产生，是好战分子背叛了本党总理孙中山的主张和"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反而继承了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迷梦，制止内战主要依靠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力量，因此，必须团结和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强大的力量③。

可是，国民党拒不停止军事进攻，并攻占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国民党的行径使第三方面的许多人士十分恼怒和失望，梁漱溟向记者们愤愤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④在上海的民盟代表紧急集会，取消去南京的决定。这时，国民党又一次耍起了两面手法，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大打，另一方面却煞有介事地派人大肆为和谈奔走呼号。他们想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时候如期召开国大，中共如不参加，就拉第三方面参加，孤立中共，并把破坏和谈的责任推给中共。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发表谈话，重申中共的态度说，国民党政府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表明其决心推翻政协决议，实行全面破裂，中共将不受国大约束，因此所引起的长期内战，全面分裂的责任，应由政府担负。⑤10月13日至17日，国民党吴铁城等先后宴请和会晤了第三方面的梁漱溟、李璜，并策动第三方面人士劝周恩来回南京商谈，最后确定了第三方面选出章伯钧、罗隆基、

①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60页。

②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1页。

③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61页。

④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2页。又，梁漱溟曾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此时他的觉醒很有代表性。

⑤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61页。

黄炎培等为代表，并劝说周恩来去南京谈判。

为了团结和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士，也为了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周恩来授权秘书陈家康发表了继续和谈的声明。声明说：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精神，为民主和平呼号奔走，悲天悯人，可感可泣。谈判之门已重开，定于21日将此种谈判移往南京继续举行。中共救濒于分裂之中国，如救垂危之慈母，如有一线生机，无不竭力以赴。然而成败利钝之关键，则仍操在政府手中，中共愿追随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及全国人民之后，一致努力争取。[①] 为了不使朋友们失望，中共代表周恩来、李维汉与第三方面代表胡霖、沈钧儒等21人先后到达南京，准备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代表们一到，蒋介石即予接见，交代政府方面由孙科代表，声称自己要去台湾，说完就走，前后只用了8分钟。这给代表们当头一棍，各方代表浩浩荡荡来到南京，蒋介石却走了，第三方面人士冷了半截，但为了挽救和平，他们仍然奔波于国共和马歇尔之间。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东北解放区安东。第二天晚上，与黄炎培等人在梅园新村商谈的周恩来得此消息后，表示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已无必要，他将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梁漱溟、黄炎培等竭力挽留，并表示民盟今后将加强同中共的合作，民盟和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中共协商并征求同意；中共代表亦作了相同的表示，以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的名义，孤立中共，欺骗人民。[②]

随着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临近，如果提不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开谈判将流产。第三方面人士很着急。作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更是焦躁不安，他想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该方案在未与中共商量前就分别送给了国民党和马歇尔，同时，也送给了中共代表。当梁漱溟把方案向中共代表团作说明时，周恩来十分生气，他斥责梁漱溟等不遵守有什么提案和行动要事先商量的口头协定，并严厉地说："这个方案完全有利于国民党的。国民党进攻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我们一刀。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打的，我们还可以打游击，但要考虑你们的前途。我是信任你们

①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71页。

②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78页。

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①]由于第三方面再也提不出什么方案，他们知道即使提出了也不能被接受，只好建议三方面直接商谈。周恩来表示同意。10月29日，三方面代表在孙科官邸举行非正式会谈。孙科主张一个问题解决之后再谈下一个问题，全盘一起谈会构成困难。周恩来主张第一个问题，是国大延期，如不即日下令延长，国大前改组政府和行政院皆不可能，中共只有离席退出商谈。[②] 对于这个问题，孙科不能作肯定答复，因为蒋介石不同意延期召开国大。于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谈成。这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包围延安，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已准备撤退，最后决裂已是近在眼前。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于1946年11月15日开幕，和谈的大门被蒋介石关闭了。

国民大会开幕的当天，民盟召开了中委和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一致批准了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在交通银行第三方面座谈会上所表示的民盟不参加国民大会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民盟一贯坚持争取和平、统一和民主的政策的。决定以民盟代表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5人的名义发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正式声明。当晚，罗隆基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说明了民盟的态度[③]。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召开的。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仅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主张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和平谈判的道路，并企图使独裁、内战、分裂、卖国合法化。所以，中共坚决反对，决不承认。“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④]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发表声明：他决不承认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愿望，劳协不能同意反对中共和民盟[⑤]。民盟坚持与中共保持一致，拒不参加国大，使国民党要孤立共产党的阴谋没有得逞。第三方面许多人没有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3—74页。
②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80页。
③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98页。
④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99页。
⑤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299页。

参加“国大”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坚持开展统一战线的一个成果。正如1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对党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项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①] 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李维汉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②]

三、开辟第二条战线，壮大人民民主力量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则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逐一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在东北、热河等地区开始局部反攻，从此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以新的态势跨入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年头。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发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向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美蒋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③]。周恩来在会上也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提高到同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

①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300页。

②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5页。

③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329页。

地位[①]。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47年4月成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周恩来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5月23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强调"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我们要在为和平的斗争中，证明蒋不会给人民以和平。"[②]根据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完整地提出蒋管区工作的总方针：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斗争的策略是"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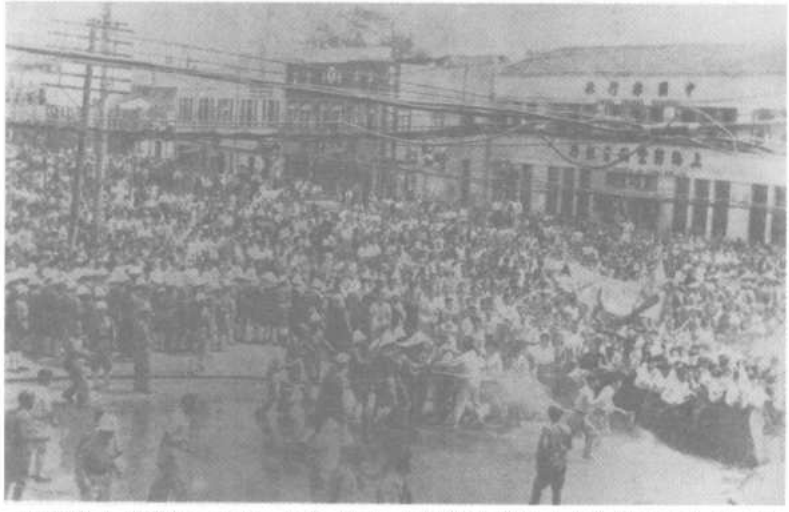
由于内战的扩大，国民党军事的失利，经济崩溃加剧，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引导群众开展了与自身利害关系相联系的经济斗争。斗争的要求和方式是：公教人员和各业职工要求公平配给、解冻生活指数，开展各种形式的怠工、罢工。学生以增加公费、保障学业、改善生活和学习条件为突破口，发展到反对借外债打内战，增加教育经费，职业学生（国民党特务）退出学校。这些斗争的特点是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提出合理的要求和采取合法的形式。1947年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3000余人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饥饿、增加伙食费等要求，并支持中大教授会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等5项要求。学生们质问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国家的钱哪儿去了？""国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南京学生的斗争，迅速得到各地学生的响应与声援。学生们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1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不得"越级请愿"；有意见只可派代表陈述，代表不得超过10人，违者依法解散；如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应予解散，否则送"司法机关处理"等。蒋介石发表谈话，对学生运动大加诬蔑和威胁，说学生们如"妨及公众之利益与他人之自由，则其自由即不受法律之保障而应受法律之制裁"，因为"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5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1986年版，第297页。

③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5页。

肆暴戾之青年，为保障整个国家之生命与全体青年之前途，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①]。但是各地学生并未被蒋介石的恫吓所吓倒，而是更加被激怒。5月19日，上海学生示威游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竟派警察局马队阻拦并冲散游行队伍。20日，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派代表到南京，和南京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并上书蒋介石，表明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立场。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马队进行镇压，以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喷射，百余学生被打伤，血染南京街头。这就是五二〇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群众对反动政权以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表示愤慨。中共上海局决定组织全国学生总罢课，抗议当局的暴行，并向社会揭露真相。血案发生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中，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要求上海局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尽管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②]。6月1日，数百名全副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五二〇惨案激起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军事斗争相配合的第二条战线。图为上海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遭军警镇压的情形

① 李勇、张仲田编著：《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第370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8册），第297—298页。

武装的军警宪特冲进武汉大学，开枪打死3名学生，受伤者数十人。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上海、北平、天津、重庆、成都、青岛等地逮捕学生、教师、记者约3000人。这就是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各地党组织成立"营救被捕学生委员会"，派代表向政府交涉。被捕学生家长、教授也赴京请愿，许多有正义感的知名人士挺身而出进行营救工作。由于各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捕人员，表示要增加学生公费，解冻生活指数。这次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遍及60多个城市。

对于周恩来"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和1947年以来的两次大规模学生运动，毛泽东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①

第二战场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国民党中央社在显然缩小的统计数字中承认，从1946年12月到1948年6月，共发生学潮109次，506天，惊呼学潮与中共的"一切号召和要求是完全密切呼应，若合符节"，"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公然在政府后方开辟所谓第二战场"，"反饥饿运动"已"变质为反征兵、反征粮、反内战的叛乱运动"，"严重性已达到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非彻底肃清不可"②。

团结与争取民主党派，是第二战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尽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召开"国大"时，民盟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拒绝参加，这对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阴谋是一个重大打击。但是，第三方面人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难免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1225、1227页。

②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78—79页。

现出动摇，有不少人仍想过走“第三条道路”。对他们，国民党是诱、骗、吓、打，力图分化他们，把他们拉过去，孤立中共。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对非原则问题善于妥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以维护团结；原则问题则提示本质，晓以利害，善意批评，并依靠进步分子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坚定进步立场，求得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解放战争时期，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投身于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因为军事失利和经济崩溃，加上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被搞得焦头烂额，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日益严厉，在许多城市宣布戒严，实行宵禁。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三家民营报纸被封闭。民主人士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周恩来对蒋管区民主人士的安全非常关心，多次打电话给地下党转告他们作长期打算。1947 年 10 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民主人士在蒋管区难以立足，张澜、罗隆基、章伯钧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时，早有准备的周恩来致电地下党转告他们转移香港，并指示香港分局的连贯做好安置来港民主人士的工作。其后，郭沫若、沈钧儒、茅盾等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上海地下党还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送黄炎培赴香港，送张志让、叶圣陶、郑振铎等 32 人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图为《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一”口号

194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后，即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代表赴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周恩来亲自拟定代表名单，征求蒋管区地下党意见，安排护送代表赴解放区的路线。周恩来提出：“应多邀请一些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①]至

①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第 79 页。

1949年春，共有70余位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已成定局。1949年4月，百万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南京政府覆灭，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已提上日程。6月中旬，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商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问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图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参加会议的各界、各党派领导人合影

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光辉篇章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陪都重庆的代表机关，是联系国共两党的枢纽，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国内外各方面代表人士直接交往的主渠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维护国共合作以推动全民抗战是南方局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新中国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图为周恩来在红岩办公

第一节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确立了中共大统战格局

一、南方局历史使命和地位的特殊性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可能成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空前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把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同时把争取民主的任务也放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来完

成。这是因为只有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抗日的民主与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全面抗战。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乃至妥协投降倾向，危及统一战线和抗战前途。这就决定了中共及其南方局必须对当局折冲樽俎、为统战另辟蹊径，才可能维护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进民主，坚持抗战。面对这种形势，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将统战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对国民党当局以斗争求团结，对于中间势力则加大了团结争取的工作力度，从而在适应新形势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统战工作的新思路，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新途径。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中共中央局，一般都是中共中央设在一定地区的代表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对该地区各级党组织进行领导，并完成中共中央所交付的有关该地区的各项任务。这种机构仅具有地区性。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出现了像长江局、南方局这样不仅具有地区性，而且主要是受命处理有关国共关系和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文化、党建、群众工作等带全国性重大问题的中共中央代表机构。和历史上的中共中央局相比，这时的中央代表机构便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地位。

从历史的发展上看，应把 1937 年 12 月成立于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视为南方局的前身；1946 年 5 月，在国民政府因抗战胜利而还都南京之时，南方局亦由重庆迁往南京，称为南京局，这是南方局工作的延续。因此就应把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看作一个整体。与同时期设立的其他中央局以及历史上有过的中央局相比，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的确有许多新特点。1939 年 1 月 13 日建立于重庆的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和董必武任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是中共方面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负责人。董必武、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人还是代表中共常驻重庆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周恩来等南方局的主要领导，集下述两项重大任务与一身：既担负着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又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地区（包括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此外，还要担负同外国驻华使团、在华国际团体及国际友人联系的工作。管辖区域比长江局时期还要大，除了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

西、福建等省以外，还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同海外华侨的联络。南方局是秘密的，但仍然以公开合法的八路军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这个机构和获准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为依托，把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开展工作。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所建立的中央局所没有的，也与抗战时期其他几个中央局不同。

南方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当时已是矛盾冲突不断的国共关系。1939年6月上旬，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中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两党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但报告同时指出，整个形势基本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要团结。[①] 报告中的结论是南方局针对当时局势，对未来时局发展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这一判断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也被证明是正确的。7月3日，周恩来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危险”，而克服这一危险的主要任务便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同时，还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诸如三民主义问题、政权问题、军队问题、民众运动、文化宣传等工作逐一进行细致的分析，提出处理这些问题的明确原则和具体办法。这一报告深刻剖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对具体的统战工作也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组建半年多来的南方局的工作成果。[②] 毛泽东在随后的会议发言中，对周恩来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从发展统一战线、发展党的组织、推进了战争动员等六个方面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成绩。同时提出巩固党、深入群众工作、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是南方局今后工作开展的三个重心，并指出“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③]。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5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48页。

治口号，明确指出了当时的主要任务和斗争方向。在1940年3月延安召开的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进一步指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对待各种社会力量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

南方局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940年夏，毛泽东在讨论南方局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需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他认为：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战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当然，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把工作的主要方面摆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将农村武装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一样。这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而毛泽东上述有关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重要性的提法，则是同争取中间势力这一带战略性的问题密切相关。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肯定南方局以往工作中已注意了“中间势力”的问题，强调指出：“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才了解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其重要性在于：是否能争取中间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中间势力的主要成分集聚于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又主要集中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所以，争取中间势力这一重要任务就主要落在南方局肩上。会议期间，毛泽东指示：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均由周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①] 毛泽东还一再讲：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带有全国性，要进一步发展。同年9月，为领导和推动整个敌后城市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总责，并以重庆作为推动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据此，南方局成立了由周恩来兼任负责人的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②]

南方局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为完成所面临的新的亟待解决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4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修订本），第467—468页。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独特历史使命。第一，要始终维护并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时期南方局的首要任务。虽然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曾一度出现过良好的势头，然而对国民党来说，它始终未真正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还拒绝制定国共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何组织形式。所以，遇事两党之间只能通过派出代表接触、交涉、协商和谈判来调整彼此的关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日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方针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对国民党进行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面对时局的逆转，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南方局依据这个指导方针，本着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设法拖住蒋介石集团，使其能够长时间留在抗日阵营之内以利于坚持长期抗战，并尽力维护这一合作关系。第二，必须不断加强同其他党派团体的联系与合作，这是团结中间势力的关键。全国各界上层代表人物大都集中在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区域，他们也是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广州、武汉沦陷后，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地域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主要的工农业生产和财经、贸易、金融事业，各种主要的文化机关和团体大都集中在这里。因此，在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区域设立中共中央代表机关，就能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发动各阶层群众，引导他们投入到民族和民主革命运动中来。而且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区域也是各国使团的驻地，自然是中共加强国际联系和交往的最理想场所。第三，加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是适应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从幼年走向成熟，形成了系统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党内还涌现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骨干，这些就是夺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然而，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页。

现民主政治而斗争。这就需要在不断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扩大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阵地，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为广大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甚至国际人士所了解，得到他们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由此可见，南方局的全部历史使命，就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带领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同敌后根据地人民一道，为完成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所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虽然坎坷，但毕竟在中国开创了全国性执政党与非执政党联合领导模式的先例。它促成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基础。

二、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提升了中共统战工作新境界

中共中央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部署和赋予南方局的重大使命，使南方局具有了与历史上的中央局和当时其他几个中央局未曾有过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南方局成了中共中央设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要的前哨阵地，也是率领国民党统治区（抗战时期还包括南方敌占区）人民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指挥部。

1.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南方局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承担着沟通和改善国共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特别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情况下发动一系列的反共高潮使斗争形势异常复杂。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大规模武装袭击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制造博山惨案、平江惨案、成都抢米事件等反共事件。南方局在向中间党团人士说明真相的同时，特派潘梓年等赴成都向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说明真相，争取他们保持中立，避免事态扩大，维护抗战大局。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中，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周恩来、叶剑英

深知事态的严峻，向中共中央持强硬态度的毛泽东建议“对国民党先取缓和态度”。该建议被中央采纳，确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方针，政治上争取了主动，争取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共合作濒于破裂之际，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通过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和判断，毅然决定坚守重庆，争取时局好转，并得到中央同意，从而保存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和国共两党合作的主渠道，维护了国共合作。此后，南方局又根据中共中央策略方针，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两面性，继续采取拉蒋抗日的政策，以斗争求团结，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不得不收敛军事上的反共行为，而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正是因为南方局的坚持，国共合作的局面才得以维系到抗战胜利。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南方局运用各种公开的渠道向国内外传播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消息，找国民党交涉，特别是通知了美国和英国有关人员，从而制止内战的爆发。对三次反共高潮的揭露、击退和制止是南方局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特殊贡献。这都是南方局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策略的结果，从而使几度出现危局的国共合作关系化险为夷，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南方局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结合的过程中，使中国共产党走出边区，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南方局积极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斗争的同情与支持。周恩来亲自抓外事组的工作。南方局外事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交友、了解国际形势，重点是弄清美英的对华政策，各国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设法影响各国对华政策，扩大国际统

周恩来冒着日机的轰炸，在红岩村防空洞的席棚下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一战线，以有利于中共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促进抗战胜利。[①]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形势日益关切，皖南事变爆发前后，正是南方局积极的外事活动，提供了国民党反共分裂活动的翔实资料，敦促苏、美、英等国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以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也使各国驻华新闻记者能及时了解事实真相，向世界作客观公正的报导。这些活动成了击退蒋介石集团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苏联、美国、英国、中国为主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同盟正式形成，在这种形势下，南方局进而把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争取实现中共解放区战场同美英盟军的合作抗日，作为外事活动的目标。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促成了中外记者团于1944年5月至10月访问西北和延安，同年七八月间，由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抵达延安。从解放区和敌后战场欣欣向荣的景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战场衰败没落情景的鲜明对比中，各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与无能，由此产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对中国共产党则给予很高的评价。记者团和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是周恩来和南方局多年对美、英等国从事外事活动的结果。周恩来在当年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说：这两件事不是普通的外事活动，而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②]。

由于南方局在加强与苏联联系的同时，也开始与美英等有关国家建立了官方的外交联系，从而在击退和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召开旧政协等问题上得到了他们一定的支持。这一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互相结合，推动了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南方局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局面，成为新中国外事和外交工作的先导。

2.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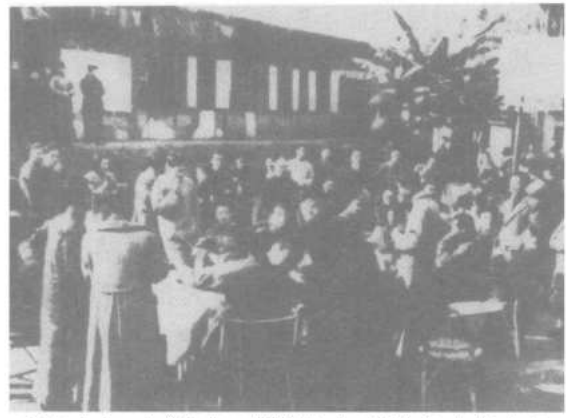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始终围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实现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不懈

---

①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外事组：《南方局外事工作概况》，《南方局党史资料》1986年第1期。

② 王明湘主编：《重庆抗战丛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第190页。

努力。南方局特别注意做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的工作，积极扶持和帮助中间党派建立和发展政治组织，开展向国民党政府争取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斗争。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南方局政治上引导、危难时刻支持和帮助的结果。皖南事变后，三党三派[①]痛感国民党的分化和迫害政策，在南方局的扶助下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南方局负责人还经常与民盟人士共商国是，共谋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在南方局的积极扶持和帮助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中间党派在抗日战争后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重要政治力量。随着民主力量的壮大，1943 年以后，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宪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南方局因势利导，积极领导并推动了宪政运动，并在运动中进一步加强了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培育和壮大了民主力量，使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逐步认清国民党反民主的真面目，从而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逐步克服了动摇性。



1941 年初，在《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招待会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等数百人到会祝贺。图为招待会的情景

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南方局把一大批社会经历不同、政治倾向各异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经受革命实践的考验，沿着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就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而巩固的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对中间势力的成功争取与团结，是南方局创造性地实践党的统战思想的结果，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帮助同盟者克服政

① 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治动摇，引导他们不断前进的结果。这一结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南方局所取得的成就，胡乔木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国民党区域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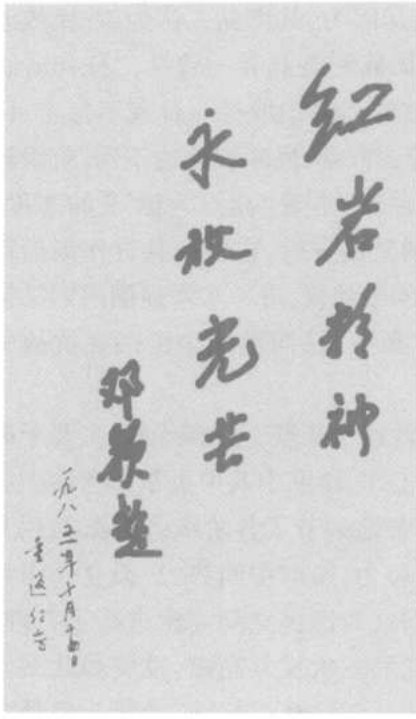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宝贵经验

一、凝聚人心，共赴国难，是南方局统战工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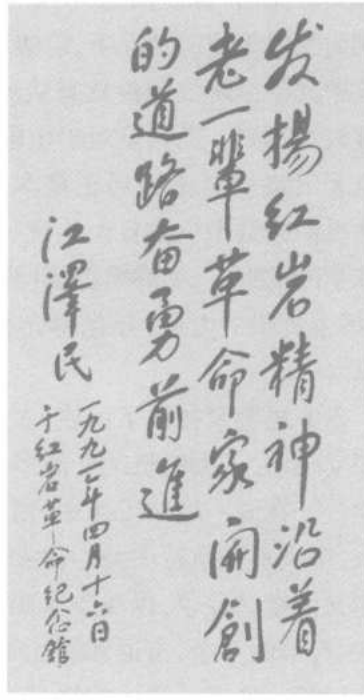
南方局不但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在新中国形成并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爱国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使南方局的革命斗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从更深的层次而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培育出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四大革命精神，而红岩精神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一个秘密的中共中央派出机关为核心所培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为我们当今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

①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图为邓颖超题词手迹



图为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视察红岩革命纪念馆题词

在南方局留下的诸多宝贵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在于：在全民族利益基点上各党各派之间摒弃前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共赴国难。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下，在各界、各阶级、各阶层民众积极响应中，在民族危难的情势下国民党调整政策后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政党、政治势力绝不能把党派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

周恩来曾说：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其中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当整个民族需要合力御侮的时候，这种国家便成为整个民族对抗外来帝国主义侵略以求自己民族独立解放的统一机关了，而且这种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个阶级所共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

个意义上提出'保卫国家'的口号"。这是因为,共产党人认为,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具有一致性,"任何阶级欲维护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达不到。尤其是对于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①。南方局正是本着这一原则,本着"相忍为国"②的态度,正确贯彻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使国共合作局面得以维系的前提下,始终掌握了国共关系的主动权,进一步增强国内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力量,分化蒋介石,使其孤立,从而增强全民彻底抗战的力量。

南方局紧紧扣住了民族、人民的利益这个基点,在国际国内主要矛盾急剧变化中,不失时机地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协助中共中央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南方局妥善地调节了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击退和制止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发展和壮大了人民力量。体现了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中,南方局正是牢牢把握了民族利益这个基点,准确估计形势,帮助中共中央确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方针,坚守阵地,赢得中外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击退和制止了反共逆流,维持了抗战的大局,政治上也争取了主动。在这过程中,一切中间势力也以民族利益为基点,与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

二、领导集体的正确抉择,是南方局统战工作能开创全新局面的重要因素

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在当时矛盾重重、形势多变的环境中,南方局成员

① 《新华日报》1941年6月15日和22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0页。

的睿智和魄力以及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1940年3月，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严防国民党顽固派进逼的指示精神，立即采取应变措施，要求所属各级党组织改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1941年底，周恩来把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具体化为“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隐蔽精干这一方针的正确执行和运用，不仅使中共的组织得到巩固，力量得到保存，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增长了才干，发展了队伍，同时以职业为掩护打入敌人内部，掌握了大量社情敌情，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策略，使几度出现危局的国共合作关系化险为夷，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中共中央、毛泽东曾一度考虑采取强硬态度对待国民党的无理要求。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周恩来、叶剑英深知事态的严峻，为顾全抗战大局，争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南方局向中共中央建议“对国民党先取缓和态度”的建议被采纳，确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方针，从而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共合作濒于破裂之际，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通过对形势的缜密分析和判断，不顾危险毅然决定坚守重庆，争取时局好转，从而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和国共两党合作的主渠道，维护了国共合作。此后，南方局又根据中共中央策略方针，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两面性，继续采取拉蒋抗日的政策，以斗争求团结，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不得不收敛军事上的反共，而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正是因为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坚持，才使国共合作的局面得以维系到抗战胜利。这是南方局领导集体最具功底、成员最见精神、工作最闪光辉的一页。

侯外庐在回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活动时写道：“小民革的成员也来自各个不同的民主党派。除上述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外，还有许多救国会著名人物，如金仲华、闵刚侯、曹孟君、吴觉农；有东北救亡总会的高崇民、阎宝航；有第三党的学者潘菽……此外，还有一些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和一批进步青年。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

的斗争，都参加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心悦诚服地听取共产党的意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有这样的决心和行动，相当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我党政策和领导的英明。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执行党中央统战政策的水平和艺术是卓绝的。周恩来同志身在重庆，与大西南蒋介石控制下的各方、各界广泛而深入地结交，意义决不仅仅在于他所做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和他所取得的具体的斗争成果，而在于他身体力行，证明了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襟怀和至诚"①。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居住在周公馆里的共产党人做着一件与美国交往的出色工作，他们以批评的眼光，现实主义的观点同美国人讨论各种问题。虽然他们现在随时有被捕并被投入集中营的危险，但他们仍然本着惊人的团体精神和坚定信仰照旧开展革命工作"②。中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誉，展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成员的个人修养和魅力、对时局深刻洞悉的卓越政治才能和灵活的对外政策所反应出的宽广胸怀。从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深深吸引了众多西方有识之士，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奔赴延安投身抗战。

南方局成员在中华民族陷于深重灾难之际，为了反法西斯及民族大义所表现出的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博大的政治胸襟、灵活的方针策略、坚毅的政治立场、崇高的道德素质追求以及光彩夺目的个人魅力，是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总结、继承和发扬的。

三、又联合又斗争，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驾驭局势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却并未真正打算放弃反共政策。特别是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明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有时非常尖锐。在当时民族矛盾仍处在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这种既抗日又妥协，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

① 侯外庐：《南方局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活动》，《当代党员》2005年第8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下），第704页。

策，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右的倾向，一种是无限制地一味斗争的“左”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因此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提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毛泽东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②]。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有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

南方局坚定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统战工作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工作艺术。所谓联合，就是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前提下，尽量地支持国民党内的抗日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针锋相对，而不是无原则地让步，尤其是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坚决地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包括“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也包括在被迫与其决裂时进行武装的流血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使其投降和反共的阴谋不能得逞，以保证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联合和斗争两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③]南方局正是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政策，保证了能够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清醒而全面地驾驭局势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实行既统一又独立的政策。虽然这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和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但在面对客观的具体环境时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维护统一战线大局，又必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须同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作坚决斗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博大的胸怀广交朋友，把国民党统治区一切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形势极其复杂和险恶的情况下，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始终使国民党留在统一战线之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对人民最大利益的最好维护。抗战胜利以后，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发展经济，实现民主。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完全违背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对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作坚决的斗争。南方局及时揭露国民党的内战政策，积极组织、精心安排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组织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内战爆发的时间，也使国民党一发动内战就处于孤立的境地，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对人民最大利益最好的维护。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陪同下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

策略问题是革命导师列宁一直十分重视的问题。他曾详细地阐述说，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

同时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极其重视列宁的这一策略思想，并在应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使其不仅用于对敌斗争，而且用于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的斗争。

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集团，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掌握着国家的政权。他们利用这种国家权力在抗战中长期采取了两面的政策，既有主张团结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一面。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力量来说，既要坚决有效地同顽固派作斗争，又要掌握好分寸而不致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处理的问题。以周恩来为领导的南方局充分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总结历史的经验，充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

南方局在运用“利用矛盾”的统战策略中，充分注意到不把国民党看成是铁板一块，而是看到它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既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和进步派。对其不同的派别，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中间派和进步派，孤立顽固派。即便是对顽固派，也作进一步的分析，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由于南方局善于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并尽力去扩大这些矛盾，才做到了反对少数最主要的顽固派，有效地争取到多数，从而达到对顽固派各个击破的目的。

统战对象的两面性，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策略。由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两面性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并不相同。因此，同他们的联合与斗争都不同于对待顽固派。这里有两个明显的区别：其一，联合的目的和范围不一样。国民党顽固派是坚持反共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危及到其统治，不得已才进行抗日。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联合国民党顽固派的目的是共同抗日。而对地方实力派来说，抗日是民族大义，但在加入抗日大潮时必须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是联合抗日，中共组织可以利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用和地方实力派的联盟在一定范围内共同进行民主运动，争取他们在反顽固派军事斗争中保持中立。其二，斗争的方法与手段也有很大区别。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地方实力派也曾有过冲突，这主要是由于地方实力派参与了顽固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如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阎锡山旧军的反攻，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在皖东对新桂系的反击等。这些局部的军事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对顽固派的反击相比，中共更注重使斗争更加具有防御性和暂时性，从而达到孤立顽固派，争取地方实力派的目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对蒋介石实行反击时，中共不点李宗仁的名字等等，都是这种策略的体现。

四、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战工作新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战胜利极端重要，“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解放出来，将决定于对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①。毛泽东强调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的重点是团结争取中间势力。

抗日战争时期，从阶级或政治力量来讲，主要是两极，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中间势力”②。“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③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④。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力量。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因素。他们要求抗日，主张民主，同中共的主张有若干的相同之处，因此是必须和可以团结及争取的力量，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毛泽东对中间势力的地位作用高度重视，而且对他们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64页。
② 胡绳：《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页。
③ 胡绳：《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405页。
④ 胡绳：《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405页。

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①。他把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的条件概括为:“(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②共产党是否有充足的力量与顽固派斗争并取得胜利,既是争取中间势力的条件,同时又有赖于中间势力的加入。因此,尊重和保证中间派的利益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为完成争取中间势力这一重要任务,吸取了武汉时代太重视国共合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和地方势力的教训③,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广泛接触各派中间势力,在“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两个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主要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④ 他们是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力量。中间势力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都是摇摆不定的。当顽固势力侵犯中间势力利益时,中间势力会倒向进步势力;当进步势力侵犯中间势力利益时,中间势力便倒向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关键就是要照顾中间势力的利益。南方局在争取中间势力的过程中都体现了照顾中间势力的利益要求。

在抗战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民主派,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与中共合作,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主要代表人物有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另一部分是实力派,主要代表人物为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后者大革命前后曾与中共对立,又与蒋介石有尖锐矛盾,抗战后则拥护抗日民主,与中共逐步接近。1938 年 6 月,在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联络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从多方面支持了国内抗战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率保盟迁往重庆,南方局与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盟继续保持亲密联系,在各种政治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7 页。
③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612 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419 页。

争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并肩战斗。保盟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系的重要桥梁。

周恩来与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建立了亲密合作的关系，特别派王冶秋、赖亚力等中共党员到他身边工作。为支持李济深，南方局特派张友渔、梅龚彬、于炳然等中共党员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南方局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蔡廷锴等共同酝酿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 年 3 月，民促正式成立，推举李济深为主席，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1943 年初，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分别会见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甘祠森等，帮助他们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在南方局支持下，建立一个能团结更多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组织的条件逐渐成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于 1945 年 10 月 28 日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主要的政治代表，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在抗战时期，他们均主张抗日救国，并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南方局本着“扶助进步团体，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方针[①]，引导和支持中间党派的爱国民主要求，培育和壮大了民主力量，使他们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逐步认清国民党反民主的真面目，最终与中共真诚合作，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站在人民一边，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势力重要的经济代表（实质上也是政治代表）。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争取中间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南方局从成立之初就设立了经济组，专门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亲自去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工作，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摧残状况深表关切。还通过《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周恩来等的讲演，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教育，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表彰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精神，鼓励他们为争取抗战胜利作贡献。特别是周恩来 1945 年 10 月 19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第 470—471 页。

日应西南实业协会之邀所作的《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对蒋介石集团极为不满，而又对中共尚有疑虑的情况下，为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对蒋介石集团的幻想，争取他们参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①南方局对民族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只是一种真诚交往中的鼓励、引导和帮助，多是靠人格力量的感召，但却起到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进而团结教育民族工商界人士寻求政治民主，最终走到人民的阵营。这种实践成为中共统战史的成功典范。

地方实力派是拥有军队和地盘的地方政治集团。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又一重要内容。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既有反对革命，同进步势力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政策矛盾冲突的一面。因此想利用中共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南方局便利用这个矛盾，对他们采取团结、利用的政策，促进他们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的态度，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分别同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多次会面，共商团结抗战大计，向他们讲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心，并应他们的要求派遣中共党员到其部队进行联络工作，还在各部架设电台，以便他们随时同中共直接联系，帮助其防备蒋介石的侵蚀。南方局对云南地方实力派领导人龙云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昆明抗日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被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桂林也一度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南方局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不仅还实力派坚持了团结抗战，在国共磨擦中保持了中立，而且还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从而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使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在抗日战争与共产党合作，坚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第58页。

持抗日民主的立场，在解放战争中最终走向人民阵营。

对中间势力的成功争取与团结，是南方局创造性地实践中国共产党统战思想的结果；是中共同各党派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过程中日益密切合作的结果；是中共正确政治主张和斗争纲领积极影响的结果；是与中间势力互相尊重、患难与共的结果；是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帮助同盟者克服政治动摇，引导他们不断前进的结果。南方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间力量，最终使中国革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

五、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实现民主政体而斗争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倒退活动，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求予以切实改进。民主是历史的潮流，是抗战的需要。抗日战争的历程，充分证实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制定和成功运用，使抗日战争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得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同时，通过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取得了政协决议的胜利。

就民主党派整体而言，它是作为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反对者而崛起的，是作为爱国主义者捍卫民主、自由和独立而诞生的，是作为共产党的同道者和合作者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因此，它的民主政治实践往往与反专制独裁、抗日和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联系在一起。南方局积极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奠定了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为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方局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处境最艰难、内容最复杂、规模最宏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南方局的工作，也以其卓著的成就和历史贡献永载史册。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勇敢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实践中战胜了强敌，为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方局的领导在身体力行的

统战工作中树立了良好风范，培养了大批统战工作干部，使统战工作不断深入发展，将同盟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风雨同舟，共同发展壮大进步。确立了迈向新中国的政治交往、政治参与等基本政治架构和文化精神，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下),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1992 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5.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1986 年版。

6.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印:《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1941 年),1987 年版。

7.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8.《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9.《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1.《毛泽东文集》第 1—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2.《毛泽东文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3.《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16.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7.《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18.《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19. 胡绳:《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21.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8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 1989—1949》(修订本)(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23.《董必武传 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24.《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 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27.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2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29.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0.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1.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2.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3.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

34.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

35.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抗战史 1931—1945》,重庆出版社 2005 年版。

36. 王明湘主编:《重庆抗战丛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37. 马洪武、王德宝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38.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39. 王向远：《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昆仑出版社 2005 年版。

40.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1990 年版。

41.（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42.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 1985 年版。

43. 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9—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44. 李蓉：《走向辉煌——毛泽东统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华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45. 李燕奇：《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形成及演变》，华文出版社 1996 年版。

46. 李勇、张仲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

47. 李静、廖心文：《周恩来交友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

48. 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4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50. 中华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 6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51.《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52.《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53. 邹韬奋：《经历》，三联书店出版社 1978 年版。

54.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

55.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

56.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五辑增刊，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57.《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58. 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59. 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60.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稿》(1),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61. 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62.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龙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63. 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6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65. 李世平主编:《周恩来和统一战线》,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66. 章君谷:《杜月笙传》第 3 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67. 王泓、刘英:《秘密大营救》,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68.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陪都人物纪事》,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

69. 舒济编:《老舍和朋友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70. 江明武主编:《周恩来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71.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篇》,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7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下),重庆出版社 2004 年版。

73. 胡世华、吕慧敏、宗朋整理:《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74.《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75. 李东朗、雷田珍:《中共一大代表丛书·董必武》,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76.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77. 曹应旺主编:《周恩来的智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78. 尚丁著:《四十年编余忆往》,重庆出版社 1986 年版。

79.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

80. 黄淑君、杨淑珍等编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

81. 朱晓明、甄小英主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华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82.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83.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84.《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85. 杨策、彭武麟主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86. 铁竹伟:《廖承志传》,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87. 任贵祥、赵红英著:《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 1999 年版。

88. 刘蜀永:《香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89. 邓开颂等:《澳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90.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91.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广西抗战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92. 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93. 蔡仁龙、郭梁主编:《福建党史资料——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1987 年。

94. 郭梁、蔡仁龙:《华侨抗日救国史略》,1987 年。

95.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三联出版社 1979 年版。

96.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97. 段渝主编:《抗战时期的四川》,巴蜀书社 2005 年版,第 368 页。

98. 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主编:《统战春秋——重庆见证的岁月·历史资料片图文集》,渝内字(2004)097 号,2005 年版。

99.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100. 张继禄主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101. 陈敦德:《接触在 1944:美军观察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102.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103. 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04.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105. 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06. 曹英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史全鉴》第五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107. 胡之信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1921—1987)》,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108.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文物出版社 1977 年版。

109.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10. 姚蓝、邓群:《国共关系中的谢和赓》,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111. 陈新建:《新桂系与中共关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112.《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 1984 年版。

113.《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漓江出版社 1992 年版。

114. 王福琨主编:《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15.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

116.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党史资料》,1986 年第 1 期、1987 年第 3 期。

11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6、18 册),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18.《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119.《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20.《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

121.《中共党史资料》第 14、18、30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22.《文史资料选辑》第 17、33、68、80、85 辑。

123.《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

124.《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28 日。

125.《新华日报》1939 年 2 月至 1947 年 1 月。

126.《新华时事》1940 年 9 月 26 日。

127. 香港《大公报》1939 年 9 月 19 日。

128.《大公报》(桂林版)1943 年 1 月 1 日。

129.《广西日报》1939 年 2 月 25 日。

130.《人民日报》1983 年 12 月 24 日、1984 年 11 月 19 日。

131.《光明日报》1977 年 1 月 5 日、1980 年 7 月 7 日。

132.《文汇报》1979 年 3 月 5 日。

133.《羊城晚报》1984 年 4 月 10 日、1992 年 3 月 13 日。

后 记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作为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规划的课题，编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对此十分重视，先后有两届主任参与了该课题的研究。

一是对统战基本理论、基本史料的征集和研究。课题组成员先后阅读了基本的书籍：第一，领袖人物著作和中央统战工作的基本文件，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文集》、《中央统战文选》等；第二，统战理论书籍，如《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统战政策和策略》、《国共关系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等；第三，背景书籍，如《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史》（三卷本）、《中国政党关系史》、《日本文化侵略》、《日本教育侵略》、《日本的个性》等；第四，政治运作的基本理论书籍，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学导论》、《民族审美生态学》、《政治人类学》、《交往与社会进化》等，主要目的是更深入地解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特点，力图吸收政治人类学的某些成果，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话精神的政治运作特点；第五，历史史观构建的书籍，如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以及胡绳、胡乔木等经典的党史著作。

二是对南方局资料的征集和研究。课题组先后到湛江、广州、重庆、成都等地收集资料。主要有：第一，南方局的基本史料，如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南方局工作》（五卷本）、《中共南方局文集》、《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南方局》等书籍。第二，参加学术会议，先后参加了广西抗战文化研讨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战争等会议，收集了大量有关的论文资料。第三，对南方局所管辖的部分省市的资料进行了征集，如《广东党史研究文集》、《重庆抗战史》、《抗战时期的四川》，从而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史料。此外，加大对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湖北、海南、安徽等省的资料征集力度。

三是展开对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的局部研究。课题组对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研

究采取稳步推进的工作策略，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个研究，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整体推进研究工作。先后对桂林抗战文化、广西抗战进行了专题研究。编纂了《党领导下的广西抗日游击战争》，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中国共产党与广西抗战——政治交往理性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专著和多篇论文。

课题组成员对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研究经过理论和局部研究相结合，逐渐深入，历经三年努力，终于完成书稿。本书先后由覃文成、王福琨两任主任亲自抓，研究员江虹、姚蓝，处长、副研究员韦秀康、樊东方参与了研究与修改。具体分工是：前言（刘绍卫），第一、二章（黄莺），第三、四、五章（刘绍卫），第六章（郭强），第七章（周艺），第八章（唐咸明），第九章（刘玄启），第十、十一章（邓群）。张丽红对前言、第一、二、三章进行了修改，刘绍卫对第四、五、六、七章进行了修改，黄莺对第八、九、十、十一章进行了修改。全书由邓群、唐凌负责统稿，邓群定稿。

书稿完成后，先后两次召开审稿会征求意见。会后各章作者对书稿进行了修订，并到重庆、武汉、桂林等地进行资料文献的核实、补充，弄清了一些具体的史实。

本书得到了中共广西区委的高度重视，原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潘琦同志亲自参加了2004年6月南方局历史编写小组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对本书的编写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同志，科研管理部主任张树军同志、副主任姚金果同志，地方处处长姚佩莲同志，第一研究部副主任李蓉同志，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全同志、张鲁鲁处长、简奕副处长都曾给予具体的指导。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文丰义副馆长对本书也给予帮助。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几度征求有关省市党史部门同行的意见，对书稿的修改与完善起了重要参考作用。

为出版本书，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同志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广西人民出版社的赵彦红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工作，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研究编写过程中借鉴与参考了不少学者的成果，在书稿注释中多有反映。但限于篇幅没有一一列出，在此致歉。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的欠缺，错误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南方局旧址◆
NANFANGJU JIUZHI

ISBN 978-7-5098-0264-9
9 787509 802649 >
定价：53.00元